冰心传

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严书

肖凤

冰心传

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

冰 心（一九八二年）

冰 心、吴文藻夫妇（一九八二年）

年轻时的冰心

青風同志：

作品《永心结》收到了，十分感谢！

出里真生反省失实之处（附来函）及我们为责任权利润同志五届市委四次扩大会议所作的决定，已分别于今日报送市委宣传部。

为使读者对我市都市报报道失实的此次风波的由来及详细过程有所了解，我们将有关材料合为一册，排版后呈作为罪证一份。

当此通讯稿予清之际

十二月六日

我的生命的道路，如同一道小溪，从浅浅的山谷中，缓缓地、曲折地流入“不择细流”的大海。

——冰心：《冰心文集·序》

致青年读者

——代 序

(一)

时间：1984年6月11日上午。

地点：北京西郊一座高等学校宿舍大院内的高知楼。一间清洁、明亮的书房里。

一位慈祥的老者坐在我的对面。——她的那张很有特点的面庞，能给任何初识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八十四岁的高龄了，肤色依然白里透红，除去又高又阔的额头上刻着几条明显的皱纹外，其他地方仍然显得白皙细嫩。一双丹凤眼，眼角稍微有点下垂，但是还能射出熠熠的光彩。在这流动的光彩中，与其说是流露出睿智，不如说是流露出了更多的慈爱和宽厚。嘴巴的线条很柔和，缓缓吐露出来的语言，是聪慧的，谦逊而又严谨的，听起来非常入耳，带着有德、有望、有智的东方老人特有的那种令人倾倒的修养。当我向她请教：对于为她立传，可有什么意见时，她沉思片刻，慢慢地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真。我希望写得能够象我。"

这句话说得真好。

这句话象一道潺潺的清泉，顿时流到了我的心里，使我感到滋润和熨贴。

“真”，是冰心坚持了一生的文学观。她在年轻的时候，就提出过自己的文学理想“只是一个字‘真’”，“能表现自己的文学，就是‘真’的文学”[①] 的主张。她在自己的小说《遗书》里，也曾借着作品中的人物宛因之口，抒发过她本人对于写作“真”的文学的见解。她在长达六十多年的文学创作活动里，都在沿着她为自己规定的这一“真”和“善”、“美”的文学理想而前进。正是她的文学主张和实践，使她赢得了一代接一代的读者群，和文学晚辈们的喜爱与敬仰。

我本来的意愿也是想努力写出一个真实的冰心来。我想通过冰心的全部创作活动，勾勒出她毕生对于文学艺术的追求，勾勒出她在五四运动以后的文学创作史上做出过什么贡献，勾勒出她在自己的文学作品里写下了什么欢乐和痛苦、向往和追求，提出了哪些人生的课题，她想告诉读者哪些内心的秘密！我想在对冰心文学创作活动的介绍中，请广大的青年读者朋友们更加了解她，与她成为精神上的知心朋友。

我深深地相信：只有“真”，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而虚假和伪善，不管用什么样的花言巧语包装，总要凋谢和枯萎，而最终总会被人们所抛弃。

歌德曾经把描写自己的传记称为《诗与真》。这个题目是意味无穷的。善的和美的文学艺术创作，就是一首真实的诗

① 冰心：《文艺丛谈 (二)》

歌。一位追求真善美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一生，也是一首真实的诗歌。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愿对冰心老人的“真”字，以及一切坚信“真”字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们，深深地顶礼。

(二)

年轻的朋友们，请允许我把这本《冰心传》奉献给你们。

这是我为你们写的第三本传记。

我在几年前出版的《萧红传》和《庐隐传》里，描写了那两位女作家坎坷而又短促的一生。当时，我是想要努力写出真实的萧红与真实的庐隐来的。不过，对于我自己说来，那两本书还是探索传记文学创作的初步尝试。然而，我在其中抒发的内心感情，以及对于真、善、美的向往，却引起了不少青年读者的共鸣，这种现象的发生，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当我捧读着许多陌生的朋友寄给我的信件时，我象是在一片充满了真诚友谊的海洋里游泳。真诚的心是可以相通的，真诚的心灵就象一团灼热的火，能够彼此照亮前进的道路，并互相温暖对方的心。有的青年朋友，甚至中年朋友告诉我：拙作曾经使她们对那两位素不相识的女作家，流下了同情的热泪，我深为朋友们的善良心地所感动。但我真诚地希望：拙作不仅带给她们（或他们）同情和忧伤，拙作也愿带给她们（或他们）欢乐和鼓舞。我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来提笔撰写我的第三本关于女作家的传记——《冰心传》的。

在这本《冰心传》里，我要向你们讲述一位长寿的女作家的故事。你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大概在童年时代就知道了她的名字，读过她的那些文笔清新秀丽的优美散文，也许

有人还与她本人见过面。为这样一位你们熟知的女作家写传记，是不太容易的，这就象为你们熟悉的人物画像，比为你们不认识的人物画像更难一样。所以，当两年前，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负责人，让我为他们撰写《冰心传》时，我曾经颇感犹豫。因为我虽然从带红领巾的时候起，就读过她的散文、小说和诗，并在作大学生的时候，在许多群众场合里见到过她，非常喜欢她的作品，但是，在这位既是一代才女的女作家，又是学贯中西的女学者面前，我觉得自己太幼稚了。另外，我还觉得自己的气质与这位老前辈的气质相距较远，因此，在这个课题面前，担心把握不准，曾经踌躇不前。然而，随着对她生平、作品的逐渐熟悉和了解，我对她的为人也就愈来愈敬重。特别是她的那句“真。我希望写得能够象我”这样朴实无华的话，竟然出自一位闻名中外的女作家之口，又使我对她的抽象的敬意，升华成为亲切的景仰。

我愿意把我所理解的冰心，写成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不是现在你们见到的这位慈祥的老妇人，而是她所走过的道路——一个聪颖过人、喜欢幻想的小姑娘，一个才思敏捷、温文尔雅的女大学生，一个虽然声名显赫但却仍然温柔含蓄的中年妇女，直到一位儿孙满堂的幸福的老祖母。她是时代的宠儿，也是中国知识女性中很有福气的一个。时代为她提供了美好的背景，她本人的聪明才智也为自己铺设好了成功的道路。

人，是一个多么值得研究的课题。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爱好、禀赋、气质、情操和性格。有的人战胜了生

活，战胜了自己，替自己插上了翅膀，在美好的境界里翱翔；有的人却无法做到这一点，他为生活的阴影所腐蚀，为自己内心的阴影所腐蚀。为什么会这样呢？怎样才能够使自己消除掉腐蚀，使自己升华起来呢？对于这样的问题，也许不会有人不关注的吧。

传记文学，就是研究人的，就是准备回答这些问题的。如果是一位严肃和高尚的作家，例如罗曼·罗兰，他所撰写的传记文学作品，无疑就是人生的指路标，它一直鼓舞着读者，在自己迈步的阶梯上，攀向神圣和崇高的顶峰。莎士比亚曾通过哈姆雷特的口说出过这样的话："人是多么了不起的杰作！理性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是的，只要每一个人都具有理性，都发挥创造的力量，世界就会变得愈来愈美好。

每一位为创造美好世界做出过贡献的人物，都是值得人们敬仰，值得人们学习的。冰心是"五四"新文学道路的开拓者之一，"五四"精神——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冰心贯彻了一生。民主，就是反对专制和暴政；科学，就是反对愚昧和野蛮。只有走民主和科学的道路，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鲁迅是毕生为此而奋斗的普罗米修司式的人物。那么，冰心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哪些贡献呢？本书就想讲述这方面一些有关的故事。

(三)

假若青年朋友们仍象过去一样地待我——有兴趣读完这

本书，那么，请允许我借用冰心老人六十年前的一句话，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我心中莫可名状。

我觉得非常的荣幸！[1]

① 冰心：《给儿童世界的小读者》

目　　次

致青年读者——代序…… 1

第一章　童年…… 1
　　㈠ 爱 …… 1
　　㈡ 海…… 12
　　㈢ 书…… 24
第二章　北京 …… 36
第三章　“五四” …… 66
第四章　问题小说 …… 92
第五章　爱的哲学…… 115
第六章　留学…… 150
第七章　返国…… 203
第八章　大后方…… 254
第九章　战后…… 289
第十章　归来…… 301

后　记…… 317

第一章 童 年

(一) 爱

我有快乐美满的家庭

——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十五》

爱，是冰心童年的精神养料。

一个人童年时代的境遇如何，往往会深深地影响她（或他）的一生：她将有什么样的理想和追求；她将对世界和人生抱着什么样的态度；她将形成哪样的性格；她将具有何种的心地；她将热爱什么，痛恨什么；等等，都会看到童年留下的烙印。

冰心这位多福长寿的女作家，就有一个温暖幸福的童年。她的母亲和父亲，给了她足够的、真挚的爱。正是这种温柔动人的爱，从小就渗透在她的心田里，成为她思想和行动的一种善良的出发点。长大成人以后，形成了她所独有的爱的哲学，成了冰心创作的旨趣。在过去那个阴霾和黑暗的旧中国里，冰心爱的，是普通的人和普通的家庭。她希望每一个

家庭、每一个人，都象她自己和她的家庭一样地幸福。正因为她看到了一些普普通通的善良的人遭遇着不幸，她的那颗温柔的心，就变得不平静起来。由于有了真挚的爱，她才否定那些不公道与不合理的秩序，因而也就产生了憎，虽然她还不知道，应该如何改变它。

冰心，本名谢婉莹。1900年（清光绪26年）10月5日，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市（当时还叫做闽侯县）隆普营的一所大房子里。在这所大房子里，居住着她祖父谢子修老先生操持的一个大家庭。这所房子里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有一个池子，池子里还养着金鱼。

因为冰心七个月时就离开了她祖父的大家庭，所以她当然不会记得这个幽静的大院子在当时的景象。虽然她十一岁时也曾返回过她的出生地小住了一年多，但是，这座大院子，还有它的清澈的池子以及游荡其中的小金鱼，并未成为她后来创作灵感的源泉。因为她童年时代的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山东烟台的大海旁边度过的。北方的大海给了这位南国的女儿最早的艺术熏陶，使她在奇幻的大海旁边形成了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她长大以后的文学创作是从大海的波涛声中汲取营养的。青年时代的冰心，是海的女儿，大自然的女儿。由于她毕生形成的审美情趣，冰心的海也是温柔的、秀美的；它既不象普希金的海，充满了辽阔和神秘的气息；更不象海明威的海，粗犷而惊险，永远激荡着人们搏斗的气魄。冰心的海，具有女性的温柔和圣洁，这是一种可以洗涤人们内心污垢的美。不过这是后话了。

冰心的父亲谢葆璋先生，是谢子修老先生的第三个儿子。在他十七岁的那一年，谢老先生的朋友严复，回到故乡来招募海军学生，谢葆璋在应试通过之后，便穿起了一件旧棉袍，告别了父母和兄弟，离开了故乡，跟着严复北上了。他进了天津紫竹林水师学堂的驾驶班当学生，在这里，认识了后来成为他的顶头上司的海军上将萨镇冰先生，当时，萨镇冰是天津管轮学堂的正教习。

谢葆璋由于学习刻苦，年轻干练，而步步升迁。在冰心出生的时候，他已经担任了“海圻舰”的副舰长。那时候的海军副统领兼“海圻舰”舰长，就是萨镇冰。

冰心的母亲杨福慈，是一位性格极温柔、极安静的女人。她身体很瘦弱，而且多病，每天除去做家务，就是看书，虽然恬淡处世，天性却是极敏感、极富感情的，是一位典型的，在当时并不多见的，有文化的贤妻良母。

她与谢葆璋的婚姻，虽然是在她九岁的那一年，由双方的父亲在做诗谈文时包办说定的，但是，待她十九岁嫁到谢家之后，小夫妻却感情极好，使他们这一房里，总是充满了温暖、和谐的气氛。

封建婚姻制度，从根本上说来，是残酷的，扼杀人性的。“五四”以后的文学创作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控诉封建的婚姻制度，鼓舞一代青年为了争取美好的爱情和自主的婚姻而斗争。然而，世界是十分复杂的，任何事情都有例外，包办婚姻有时也能结成幸福的家庭，但是这又绝不等于封建婚姻制度就不是罪恶的了。—— 生活真是一个变幻无穷的万花筒！

冰心是这对恩受夫妻的长女，也是父母膝下唯一的女儿。因为母亲后来又生了三个弟弟。虽然也生过一个妹妹，出生几天就夭折了，所以膝下只有冰心这一个女孩。因此，这个小女孩就成了母亲的掌上明珠。后来，当冰心懂事之后，母亲曾经向她含笑地、低低地诉说过她童年时代的故事：

> 不过有三个月罢了。偏已是这般多病，听见端药杯的人的脚步声，已知道惊怕啼哭，许多人围在床前，乞怜的眼光，不望着别人，只向着我，似乎已经从人群里认识了你的母亲！
>
> 你的弥月到了，穿着舅母送的水红绸子的衣服，戴着青缎沿边的大红帽子，抱出到厅堂前。因看你丰满红润的面庞，使我在姐妹妯娌群中，起了骄傲。①

在小冰心刚满七个月的时候，父母就抱着她离开了故乡福州，登上了北上的轮船，到上海去了。因为上海是个大港口，巡洋舰无论开到什么地方，都要途经上海港，停泊几天，谢葆璋就能回到家里，与妻儿团聚。

这是小冰心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她日后热爱眷恋的大海。在她懂事了以后，她的母亲曾经告诉她，正是在北上的轮船上，母亲抱着她站在栏杆旁边，在海浪声的伴奏之下，小冰心第一次呼唤了“妈妈”。但是，冰心的爸爸说：世上没有七个月就会说话的孩子。然而母亲坚持说：小冰心就是这样

①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十》

的孩子。为此，小两口经常戏谑地争论，直到冰心长大成人之后，这件事仍是他们家中的一桩疑案。

而天下哪一位母亲，不是总希望自己的孩子是最聪明、最美丽、最纯洁的呢！

轮船抵达上海之后，他们在市内的昌寿里安置了一个温暖舒适的小家。这时是1901年的5月。

后来，冰心的祖父谢子修老先生，也带着他续弦的妻子，来与儿子、媳妇、孙女儿小住。

这位续弦的继祖母，是一位会做衣服的好手。她能做出极好看的小衣服，来装扮这个小孙女儿。夏天的时候，她用雪白的洋纱，给小冰心缝制背心或衣裤，再沿上黑色烤绸的边缝，既凉快又淡雅醒目。只是那时冰心太小，她又去世得早，冰心只能在长大之后，从照片上看到她的肖像，那是一位上身穿着沿缀着阔边的上衣，下身穿着青纱裙子的老太太。

谢葆璋是海军军官，常年在外，要隔几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杨福慈一边忍受着别离之苦，一边与谢子修老先生和续弦的婆母一块儿，抚育着亲爱的女儿。关于小冰心这段时间的生活，母亲后来曾经向她追述过：

> 有一次你病得重极了，地上铺着席子，我抱着你在上面膝行，正是暑月，你父亲又不在家；你断断续续说的几句话，都不是三岁的孩子所能够说的，因为你奇异的智慧，增加了我无名的恐怖，我打电报给你父亲，说我身体和灵魂上都已不能再支持。忽然一阵大风雨，深忧的我，重病的你，和你疲乏的乳母，都沉沉的睡

了一大觉，这一番风雨，把你又从死神的怀抱里，接了过来。①

每逢谢葆璋返航归来的时候，就是一家人最快乐的日子了。白天他们厮守在一起，快乐地说笑。夜晚，当小冰心睡着了以后，他有时就带着爱妻，坐上马车，到黄埔滩上去兜风，观看上海外滩雄伟的建筑群、美丽的夜景。

冰心和母亲的感情极好。母女俩常常紧紧地依偎在一起，悄悄地说些甜蜜的知心话。小冰心喜欢听母亲向她讲述关于她自己的故事，母亲喜欢女儿过来抱住她，与她亲近。小冰心最怕母亲凝神不动，每当母亲遥望窗外，或者稍稍发呆的时候，她就会跑过去，摇撼母亲的身体，呼唤她："妈妈，你的眼睛怎么不动了？"有时母亲想让女儿过来抱住她，就故意地凝神不动。她们经常这样亲密地相偎相依，有时微笑，有时互相感动得流泪。

母女之间这种感情的交流，培育和丰富了冰心的内心世界。她的母亲这种柔情蜜意的浇灌，在她童年的心中积淀了许多倾诉不完的思绪。一旦当她形成写作的念头时，这种纯洁的情愫就自然而然地流淌奔泄了出来。在冰心一生的创作中，有许多讴歌母爱的篇章，这些篇章使许多曾经享受过母爱的读者，增添了新鲜而丰富的体验；也使许多不曾享受过母爱的读者，感受和体察了这种无私的感情。这就是为什么她的有些作品，总能够深入人心和经久不衰的原因。由于社会的动荡和时代的剧变，人们有的时候也许会不满意仅仅是

①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十》

描写母爱的作品，他们想更多地看到生活里的火和血，生和死，挣扎和搏斗；但是，母爱，这一种人人都会珍视的普通人的纯洁情感，毕竟是高尚而且无私的感情，是人类赖以生存并要世世代代流传下去的感情，它是永存的。

关于自己的母亲，冰心后来在成年之后，曾经这样描写过她：

> 小朋友，可怪我告诉过你们许多事，竟不曾将我的母亲介绍给你。—— 她是这么一个母亲，她的话句句使做儿女的人动心，她的字，一点一画都使做儿女的人下泪！
>
> 我每次得到她的信，都不曾预想到有什么感触的，而往往读到中间，至少有一两句使我心酸泪落。这样深浓，这般沉挚，开天辟地的心情啊！愿普天下一切有知，都来颂赞！①

关于自己和母亲的关系，冰心后来在成年之后，也曾经这

> 母亲，你是大海，我只是刹那间溅跃的浪花，虽暂时在最低的空间上，幻出种种的闪光，而在最短的时间中，即又飞进母亲的怀里。②

我挚爱恩慈的母亲。她最初也是最后我所恋慕的一个人。我提笔的时候，总有她的颦眉或笑脸涌现在我的眼前。她的爱，使我由生中求死—— 要担负别人的痛苦；使我由死中求生—— 要忘

①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十二》

②③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二十八》

记自己的痛苦。①

母亲，……除了你，谁是我永久灵魂之归宿？③

小冰心，就是这样一直沐浴在母爱的温柔、深沉的海洋里。这份丰富的感情养料，不仅灌溉了她童年时代的心田，也滋润了她一生的情感。

冰心的父亲谢葆璋，虽说是一位行伍出身的海军军官，却也是一位舐犊情深的可爱的父亲，他对自己这唯一的爱女，也是充满了柔情。

他舍不得让女儿吃一点儿苦。当大家庭里的伯母、叔母们催促给小冰心扎耳朵眼时，他就借口说："你们看她左耳唇后面，有一颗聪明痣。把这颗痣扎穿了，孩子就笨了。"② 他还不让孩子穿紧鞋。小冰心深知父亲对她的疼爱，所以，她刚一感到鞋子有点紧，就故意地在父亲面前一瘸一瘸地走，父亲一见，就立刻埋怨母亲说："'你又给她小鞋穿了！'母亲也气了，就把剪刀和纸裁的鞋样推到父亲面前说：'你会做你给她做，将来长出一对金刚脚，我也不管！'"③ 父亲就会真的拿起剪刀和纸来剪鞋样，小夫妻经常为了此事笑谑口角。

那是到了烟台之后，小冰心早晨梳小辫子的时候，父亲总来帮助母亲，拿着照像匣子，哄着小女儿，嘴里还柔声柔气地说："站好了，站好了，要照像了！"一边说，一边摆出

① 冰心：《寄小读者四版自序》
② 冰心：《童年杂忆》
③ 冰心：《童年杂忆》

了姿势，假作照着像，又短又粗的两个小辫子，天天都是在父亲哄着的时候将就编起来的。

一天夜里，小冰心跑到了山顶的旗台上，父亲心急如焚，在山下着急地呼唤她，寻找她，那种挚爱的心意，小冰心一直深深地记在脑海里。直到成人之后，在美国读书时，当她思念父亲的时候，仍然想起了这动人的一幕，以至于内心立刻涌起了爱感。

她在成年以后，写了一篇名为《海上》的短篇小说，不象她在许多散文、小说与诗里，歌颂着母爱，这篇名为《海上》的小说，是专门歌颂父爱的。她写了两对父女之间的深情，那位穿着深黑的军服，袖子上缀着几圈金线的海军军官，无疑就是谢葆璋的化身，而那个第一人称的“我”的小姑娘，对她父亲的崇拜和依恋之情，正是冰心对她父亲感情的再现。

人们常说冰心是最善于讴歌母爱的女作家，这自然是一点儿也不错的。然而由于她的双亲之间伉俪情深，由于她的父亲舐犊情深，因此，父爱，也是她创作中的主旨之一。由于在当时的时代环境里，年长的妇女很少与社会接触，因此，在冰心那些歌颂母爱的篇章中，就不象歌颂父爱那样，还包含着对于他的事业的崇拜之情。冰心在文学创作中的坚定不移和永远执着，无疑是接受了她父亲精神力量的影响。

除去享有双亲的挚爱之外，小冰心还享有丰厚的手足之情。她与三个弟弟之间情感深厚，他们常常在一起谈天讲地，说古论今，游戏嬉笑，亲如一人。

后来，当冰心长大成人之后，远离家人到美国留学的时

候，她的弟弟们常常给她寄出冗长而恳挚的书信，告诉她："从松树隙间穿过的阳光，就是你弟弟问安的使者；晚上清凉的风，就是骨肉手足的慰语！"①

冰心爱把自己的三个弟弟，比喻成三颗明亮的星星：

我凝望天空，有三颗最明亮的星星。轻淡的云，隐起一切的星辰的时候，只有这三颗依然吐着光芒。其中的一颗距那两颗稍远，我当他是我的大弟弟，因为他稍大些，能够独立了。那两颗紧挨着，是我的二弟弟和小弟弟，他两个还小一点，虽然自己奔走游玩，却时时注意到其他的一个，总不敢远远跑开，他们知道自己的弱小，常常是守望相助。

这三颗星总是第一班从暮色中出来，使我最先看见；也是末一班在晨曦中隐去，在众星之后，和我道声"暂别"；因此发起了我的爱怜系恋，便白天也能忆起他们来。起先我有意在星辰的书上，寻求出他们的名字，时至今日，我不想寻求了，我已替他们起了名字，他们的总名是"兄弟星"，他们各颗的名字，就是我的三个弟弟的名字。②

小弟弟啊！
我灵魂中三颗光明喜乐的星。
温柔的，
　无可言说的，
　　灵魂深处的孩子啊！③

① 冰心：《童年杂忆》
②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十三》
③ 冰心：《繁星·四》

她把自己的母亲，比喻成静美的月亮："我半夜醒来，开眼看见她，高高的在天上，如同俯着看我，我就欣慰，我又安稳的在她的爱光中睡去。"①

她的庄严勇敢的慈父，则被比喻成清晨即出、雍容灿烂的太阳："早晨勇敢的灿烂的太阳，自然是父亲了。他从对山的树梢，雍容尔雅的上来，他又温和又严肃的对我说：'又是一天了！'我就欢欢喜喜的坐起来，披衣从廊上走到屋里去"③，开始一天新的生活。

这样温暖和谐的家庭，世上虽不少见，但是在中国的女作家群里，冰心童年时代的处境，确实是难得的。它使小冰心一直沐浴在爱的空气之中，使这个聪颖过人、才思敏捷的小姑娘，形成了善良的心地，和温柔、文雅的性格。

如果说"五四"时代玉成了冰心一生的道路，玉成了她文学创作的丰收，那么，她这个温暖和谐的家庭，却是她获得这些成就的最为重要的契机。从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说过"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这句话之后，"穷而后工"几乎成了文人的一句口头禅。经过极度的艰难困苦之后，是有可能写出动人的好作品的，但是在比较平坦和顺利的人生道路上，也并不是注定了就不能写成出色的作品，当然由于生活经历的差异，在这些不同作品之间，也许会出现迥然不同的风格。冰心的作品，就是以她自己温柔、文雅

①③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十三》

和清婉的风格，获得了好几代读者的心的。不过这是后话了。

（二）海

我只希望我们都象海！

——冰心：《往事·十三》

海，是童年冰心的伟大摇篮。

海以自己博大的胸怀，千姿百态、美丽奇幻的容颜和内涵，陶冶了童年冰心的性灵与情感。

上面已经说过，冰心七个月的时候，父母就带她离开了故乡，到上海居住去了。几年之后，在她三、四岁的时候，也就是1903年到1904年之间，谢葆璋奉命到山东烟台去创办海军军官学校，小冰心又跟随父母迁居到烟台。

他们一家，先住在烟台市内的海军采办所，后迁至烟台东山北坡上的一所海军医院寄居，之后又搬到东山东边的海军练营旁边新盖好的房子里。新盖的房子离海很近，“北面的山坡上，有一座旗台”，“旗台的西边有一条山坡路通到海边的炮台”，“这里还驻有一支穿白衣军装的军乐队”。“炮台的西边有一个小码头。父亲的舰长朋友们来接送他的小汽艇，就是停泊在这码头边上的。”①

① 冰心：《我的童年》，写于1979年7月4日。冰心共写过两篇题为《我的童年》的散文，另一篇写于1942年3月27日。

女作家正是在这烟台的大海旁边，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代的。冰心自己后来曾说过："我从小是个孤寂的孩子，住在芝罘东山的海边上。三四岁刚懂事的时候，整年整月所看见的：只是青郁的山，无边的海，蓝衣的水兵，灰白的军舰。所听见的，只是：山风，海涛，嘹亮的口号，清晨深夜的喇叭。生活的单调，使我的思想的发展，不和常态的小女孩，同其径路。我终日在海隅山陬奔游，和水兵们作朋友。"①

烟台海滨的天，是辽阔无边的；烟台海滨的水，是虚怀广博的。它们浩瀚得没有边际，一直延伸到无限的远处，天水连接的地方。这博大的苍穹和大海，又时时改变着自己的颜色和脾气：有时在蔚蓝色的天空下面是青蓝色的海水，它们温柔地摇摆着，泛起朵朵白色的浪花，而在浪花和海水上面，又点缀着道道金光；有时在灰色的天空下面是青灰色的海水，风和海浪糅合在一起，急骤地拍打着岸边的礁石；当夜晚来临的时候，天空和海洋都变成了漆黑的墨色，但又常常有星，有月，陪伴着它。

一个心灵敏感的孩子，可以把大海当作一名伟大的导师，从它广博的胸怀里，接受启示和教导；也可以把大海当作一本精深的巨著，从它众多的书页里，汲取知识和营养。

小冰心常常一个人抱膝坐在门口的石阶上，沉默地注视着大海，驰骋着自己天真的幻想。在她成年之后，母亲曾经向她追述过这样的一段往事：

① 《冰心全集·自序》

晚餐的时候，灯光之下，母亲看着我半天，忽然想起笑着说："从前在海边住的时候，我闷极了，午后睡了一觉，醒来遍处找不见你。"

我知道母亲要说什么——我只不言语，我忆起我五岁时的事情了。

弟弟们都问，"往后呢？"

母亲笑着看着我说："找到大门前，她正呆呆的自己坐在石阶上，对着大海呢！我睡了三点钟，她也坐了三点钟了。可怜的寂寞的小人儿啊！你们看她小时已经是这样的天真而沉默了——我连忙上前去，珍重地将她揽在怀里……"

母亲眼里满了欢喜慈怜的珠泪。

父亲也微笑了。——弟弟们更是笑着看我。

母亲的爱，和寂寞的悲哀，以及海的深远，都在我心中又起了一回不可言说的惆怅！[①]

一个只有五岁的小姑娘，竟会独自默默地坐着，在三个小时里一动不动地眺望着大海，她既没有想到要站起来去嬉戏，也没有对大海的神秘的威力，产生任何的恐惧之情，她只是象一个小小的幻想家似的，任情地驰骋着自己的想象力。

冰心自己，曾把大海称作她童年活动的舞台，而称她自己为这个舞台上的"独脚"演员。她在步入了老年之后，曾经这样述说过大海与她童年生活的关系：

这是我童年活动的舞台上，从不更换的布景。我是这个阔大

① 冰心：《往事·十》

舞台上的“独脚”，有时在徘徊独白，有时在抱膝沉思。我张着惊奇探讨的眼睛，注视着一切。在清晨，我看见金盆似的朝日，从深黑色、浅灰色、鱼肚白色的云层里，忽然涌了上来；这时，太空轰鸣，浓金泼满了海面，泼满了诸天……在黄昏，我看见银盘似的月亮，颤巍巍地捧出了水平，海面变成一道道一层层的，由浓墨而银灰，渐渐地漾成闪烁光明的一片……

这个舞台，绝顶静寂，无边辽阔，我既是演员，又是剧作者。我虽然单身独自，我却感到无限的欢畅与自由。①

她对深沉奥妙、变幻无穷的大海充满了爱恋。后来，当她长大成人之后，有人曾经问她：“为何爱海？如何爱海？”②她听到这种提问，总是觉得“快乐充溢”，“并非喜欢这问题，是喜欢我这时心身上直接自海得来的感觉”。②她是这样回答这个提问的：“爱海是这么一点一分的积渐的爱起来的。……”③

的确，这种自幼就无意识地积淀起来的对于大海的爱恋，后来终于形成了有意识的对于大海的颂扬和膜拜。她把自己在大海旁边驰骋的幻想，以及在这些幻想之中蕴藏的哲理的因子，逐渐地凝聚成为对于生活哲理的探求。

这种对于大海的爱恋之情，终身伴随着她，也伴随了她的三个手足情深的弟弟（她那位最小的弟弟，长大成人之后，甚至继承了父业，到远洋中去航海）。在他们长大了之后，还经常亲密地坐在一起，以大海做为谈论的题目。在一个普通

① 冰心：《海恋》

②②③ 冰心：《往事 （二） ·五》

的夏天的傍晚，冰心和弟弟们一块儿乘凉，他们就以大海作话题，比赛词汇和想象力，看谁把大海形容得最准确：

我们说着海潮，海风，海舟……最后便谈到海的女神。

涵说："假如有位海的女神，她一定是'艳如桃李，冷若冰霜'的。"我不觉笑问："这话怎讲？"

涵也笑道："你看云霞的海上，何等明媚；风雨的海上，又是何等的阴沉！"

杰两手抱膝凝听着，这时便运用他最丰富的想象力，指点着说："她……她住在灯塔的岛上，海霞是她的扇旗，海鸟是她的侍从；夜里她曳着白衣蓝裳，头上插着新月的梳子，胸前挂着明星的璎珞；翩翩地飞行于海波之上……"

楫忙问："大风的时候呢？"杰道："她驾着风车，狂飚疾转的在怒涛上驱走；她的长袖拂没了许多帆舟。下雨的时候，便是她忧愁了，落泪了，大海上一切都低头静默着。黄昏的时候，霞光灿然，便是她迴波电笑，云发飘扬，丰神轻柔而潇洒……"

这一番话，带着画意，又是诗情，使我神往，使我微笑。

楫只在小椅子上，挨着我坐着，我抚着他，问，"你的话必是更好了，说出来让我们听听！"他本静静的听着，至此便抱着我的臂儿笑道，"海太大了，我太小了，我不会说。"

我肃然—— 涵用折扇轻轻的击他的手，笑说："好一个小哲学家！"

涵道："姐姐，该你说一说了。"我道，"好的都让你们说尽了—— 我只希望我们都象海！"

杰笑道，"我们不配做女神，也不要艳如桃李，冷若冰霜的。"

他们都笑了—— 我也笑说："不是说做女神，我希望我们都做个'海化'的青年。象涵说的，海是温柔而沉静。杰说的，海是

超绝而威严。楫说得更好了，海是神秘而有容，也是虚怀，也是广博……”

大海，陶冶了小冰心的性灵，丰富了小冰心的想象力，后来，又赋予了冰心创作的灵感。

难怪当她登上了文坛之后，就经常写作以大海为题的诗、散文和小说。她自己就曾经说过：“每次拿起笔来，头一件事忆起的就是海。”[①]

大海的美丽多姿给冰心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她在上面提到过的那篇小说《海上》的一开头，就描写了海景给予“我”这个小女孩子的难忘的美感：“谁曾在阴沉微雨的早晨，独自飘浮在岩石下面的一个小船上的，就要感出宇宙的静默凄黯的美。”“岩石和海，都被阴雾笼盖得白濛濛的，海浪仍旧缓进缓退的，洗那岩石。这小船儿好似海鸥一般，随着拍浮。这浓雾的海上，充满了沉郁，无聊，—— 全世界也似乎和它都没有干涉，只有我管领了这静默凄黯的美。”

她在另一篇小说《遗书》中，又曾这样地描写过海上的晚霞：“晚霞真是好，五彩的锦衾般覆盖着金海。岛山渐渐的青淡下去，似乎要睡着。”

即使是在后来，进入了高龄却又遭遇到乱世的时候，她也仍然爱着海：

当我忧从中来，无可告语的时候，我一想到大海，我的心胸

① 冰心：《往事·十四》

就开阔了起来，宁静了下去！[1]

大海，不仅陶冶了冰心的性灵与情感；大海，也赋予了冰心严肃的思考。

谢葆璋是一位爱国的军官。他在小冰心出生之前，曾经参加过闻名世界的中日甲午海战。那时，他是威远舰上的枪炮二副。威远舰在大东沟决战时，被日本侵略军击沉了。谢葆璋泅水到了大东沟的岸上，光着脚走到刘公岛，从那里辗转回到了福州老家。在他浴血奋战的时候，他的年轻的爱妻，曾经度过了一段忧心如焚的日子，“因为海军里福州人很多，阵亡的也不少，因此我们住的这条街上，今天是这家糊上了白纸的门联，明天又是那家糊上白纸门联。母亲感到这副白纸门联，总有一天会糊到我们家的门上！她悄悄地买了一盒鸦片烟膏，藏在身上，准备一旦得到父亲阵亡的消息，她就服毒自尽。祖父看到了母亲沉默而悲哀的神情，就让我的堂姐姐，日夜守在母亲身旁。”[2]

小冰心出生之后，全家跟随他来到了这大海之滨的烟台，他就常常带领着自己的爱女，在海边散步。

尤其是在夏天的黄昏，散步之后，父女就在海滩上“面海坐下”[3]，他们的背后，是慢慢地落下去的夕阳，他们的面前，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而在对面很远的地方，仿佛海上的

① 冰心：《我的童年》，写于 1979 年 7 月 4 日。

② 冰心：《我的故乡》

③③④⑤ 冰心：《童年杂忆》

一抹浓云似的，那就是芝罘岛。岛上的灯塔，已经在一会儿一闪地发出红光。父女俩常常这样子静默地坐着，小冰心陶醉于眼前的美景，就会不由自主地对父亲说："爹……烟台海滨就是美，不是吗？"[13]

父亲听到这样的话，就会摇头慨叹："中国北方海岸好看的港湾多的是，何止一个烟台？你没有去过就是了。""比如威海卫，大连湾，青岛，都是很美很美的……"[14]

小冰心听到这里，就要求父亲带她去看一看。

听到女儿的话，一向慈祥温和的父亲，竟然"拣起一块卵石，狠狠地向海浪上扔去，一面说：'现在我不愿意去！你知道，那些港口现在都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威海卫是英国人的，大连是日本人的，青岛是德国人的，只有，只有烟台是我们的，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个不冻港！'"[15]

父亲这满含着热爱，又满含着悲愤的话语，给小冰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十年以后，当冰心追溯这段往事的时候，她还说："因此，我从小，只知道热爱童年所在地，'我们自己的烟台'……"[1]

除去带领女儿在海边散步之外，谢葆璋还教给小冰心如何打枪，如何骑马，如何划船。夜晚，就指点她如何看星星，如何辨认每一个星座的位置和名字。

他也常常带领着小冰心到军舰上去，把军舰上的设备、生活方式，讲述给女儿听。每当小冰心走近军舰的时候，它那巍峨的雄姿及雪白、清洁、整齐、光亮的外表，都使小冰心

① 冰心：《人民坐在罗圈椅上》

异常敬羡。

小冰心经常见到父亲的上级和好友。象上面提到过的萨镇冰先生，民国第一任海军部长黄钟瑛上将，等等，他们的既严肃又慈爱的形象，和他们的严守纪律、恬淡处世的为人，都给冰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从小便把这样的人以及她的父亲，当作理想的人物来崇拜。她一心一意地想着：等到自己长大了之后，要学父亲，学父亲的好友和上级，做一个象他们一样的人。

说来读者也许不信，但这却是真的：我们这位文雅、安详的女作家，童年时却是一直男装到十岁的——“我整天跟在父亲的身边，参加了他的种种工作与活动，得到了连一般男子都得不到的经验。为一切方便起见，我总是男装，常着军服。父母叫我‘阿哥’，弟弟们称呼我‘哥哥’，弄得后来我自己也忘其所以了。”①

她在散文《梦》里，又曾借助文中的主人公“她”，来描摹自己童年时代的生活。这个被叫做“她”的小姑娘，常常“穿着黑色带金线的军服，佩着一柄短短的军刀，骑在很高大的白马上，在海岸边缓辔徐行。”“她”还“会打走队的鼓，会吹召集的喇叭，知道毛瑟枪里的机关，也会将很大的炮弹，旋进炮膛里。”“她”的父亲“常常带她去参加那军人娱乐的宴会，朋友们一见都夸奖说：‘好英武的一个小军人！今年几岁了？’父亲先一面答应着，临走时才微笑说：‘他是我的儿子，但也是我的女儿。’”这个“她”，无疑就是冰心自己的化身。

① 冰心：《我的童年》，写于1942年3月27日。

小冰心对大海的热爱，是与对她父亲的热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她曾经说过：

父亲啊！
我怎样的爱你，
　也怎样爱你的海！[①]

1908年，当小冰心的二弟出世之后，全家又迁居到海军学校后面的新房子里。谢葆璋在他们所住的一间面海的屋子上面，又添置了一间楼房，登上这间楼房，眼下就是大海。“这大海横亘南北，布满东方的天边，天边有几笔淡墨画成的海岛，那就是芝罘岛，岛上有一座灯塔……。”[②] 这间望海的楼房是小冰心常去的地方，“我最喜欢在风雨之夜，倚栏凝望那灯塔上的一停一射的强光，它永远给我以无限的温暖快慰的感觉！”[③]

小冰心对海的爱恋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以至于她非常向往作一个看守灯塔的人。她在苦思苦想了几年之后，终于把心愿吐露给了慈爱的父亲。请看她与父亲的一段对话：

……“爹爹！”父亲抬起头来。“我想看守灯塔去。”

父亲笑了一笑，说：“也好，整年整月的守着海——只是太冷寂一些。”说完仍看他的书。

① 冰心：《繁星·一一三》
② 冰心：《海恋》
③ 冰心：《我的童年》，写于1979年7月4日。

我又说："我不怕冷寂，真的，爹爹！"

父亲放下书，说："真的便怎样？"

这时我反无从说起了！我耸一耸肩，说："看守灯塔是一种最伟大，最高尚，而又最有诗意的生活……"

父亲点头说："这个自然！"他往后靠着椅背，是预备长谈的姿势。这时我们都感着兴味了。

我仍旧站着。我说："只要是一样的为人群服务，不是独善其身；我们固然不必避世。而因着性之相近，我们也不必避'避世！'"

父亲笑着点首。

我接着："避世而出家，是我所不屑做的，奈何以青年有为之身，受十方供养？"

父亲只笑着。

我勇敢的说："灯台守的别名，便是'光明的使者'。他抛离田里，牺牲了家人骨肉的团聚，一切种种世上耳目纷华的娱乐，来整年整月的对着渺茫无际的海天。除却海上的飞鸥片帆，天上的云涌风起，不能有新的接触。除了骀荡的海风，和岛上崖旁转青的小草，他不知春至。他抛却'乐群'，只知'敬业'……"

父亲说，"和人群大陆隔绝，是怎样的一种牺牲，这情绪，我们航海人真是透彻中道的了！"言次，他微叹。

我连忙说："否，这在我并不是牺牲！我晚上举着火炬，登上天梯，我觉得有无上的倨傲与光荣。几多好男子，轻侮别离，弄潮破浪，狎习了海上的腥风，驱使着如意的桅帆，自以为不可一世，而在狂飚浓雾，海上山立之顷，他们却蹙眉低首，捧盘屏息，凝注着这一点高悬闪烁的光明！这一点是警觉，是慰安，是导引，然而这一点是由我燃着！"

父亲沉静的眼光中，似乎忽忽的起了回忆。

"晴明之日，海不扬波，我抱膝沙上，悠然看潮落星生。风雨

之日，我倚窗观涛，听浪花怒撼崖石。我闭门读书，以海洋为师，以星月为友，这一切都是不变与永久。”

“三五日一来的小艇上，我不断的得着世外的消息，和家人朋友的书函；似暂离又似永别的景况，使我们永驻在‘的的如水’的情谊之中。我可读一切的新书籍，我可写作，在文化上，我并不曾与世界隔绝。”

父亲笑说，“灯塔生活，固然极其超脱，而你的幻想，也未免过于美丽。倘若病起来，海水拍天之间，你可怎么办？”

我也笑道：“这个容易—— 一时虑不到这些！”

父亲道，“病只关你一身，误了燃灯，却是关于众生的光明……”

我连忙说：“所以我说这生活是伟大的！”

父亲看我一笑，笑我词支，说：“我知道你会登梯燃灯；但倘若有大风浓雾，触石沉舟的事，你须鸣枪，你须放艇……”

我郑重的说：“这一切，尤其是我所深爱的，为着自己，为着众生，我都愿学！”

父亲无言，久久，笑道：“你是男儿，是我的好儿子！”

我走近一步，说：“假如我要得这种位置，东南沿海一带，爹爹总可为力？”

父亲看着我说：“或者……但你为何说得这般的郑重？”

我肃然道：“我处心积虑已经三年了！”

父亲敛容，沉思地抚着书角，半天，说：“我无有不赞成，我无有不为力。为着去国离家，吸受海上腥风的航海者，我忍心舍遣我唯一的弱女，到岛山上点起光明。但是，唯一的条件，灯台守不要女孩子！”①

① 冰心：《往事 （二） ·八》

这是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冰心这位富于幻想的女孩子，她在小小的年纪，就会构想自己未来的生活。而且她的想法又是多么地高尚—— 她要为众生而操劳，终生当一个汪洋大海里的灯台守；她的想法又是多么地勇敢，真象她的父亲夸奖她的那样，充满了男儿的气概。冰心后来给予读者的印象，往往是一位十分女性化的女作家，而她在童年时代，却是充满了飒爽的男子气的女孩子。一个人性格的成长，真是充满了曲折而又复杂的心理历程啊。

大海，融进了冰心的生命，她的一生，都与大海不可分割了。

(三) 书

好书永远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 冰心：《三寄小读者·通讯四》

书，是冰心童年的亲密朋友。

冰心自小是个聪颖异常的女孩子，四岁的时候，就跟着母亲认字片。但是，单个的字片，满足不了冰心的求知欲，她更感兴趣的，是那些有人物、有情节、悲欢离合的故事。于是，在刮风下雨的天气，她不到海边去的时候，就纠缠住母亲或奶娘，请她们讲《老虎姨》，讲《蛇郎》，讲《牛郎织女》，讲《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故事。

1906年，她的大弟弟谢为涵出世了。她的母亲没有时间再担任她的启蒙教师，就把这个职务让给了冰心的舅舅杨子敬先生。

杨子敬先生是冰心父亲的文书，同盟会员，全家和谢葆璋家居住在一起。他的思想很开明，他知道小冰心爱听故事，就答应她，每天晚饭之后，都给她讲。她从舅舅的嘴里，第一次听到了美国女作家斯陀夫人的小说《黑奴吁天录》，美国南部黑奴们的悲惨命运和他们勇敢抗争的故事，使小冰心激动不已，她“总是紧握着眼泪湿透的手绢，在枕上翻来复去，久久不能入寐。”[1] 也是从舅舅的嘴里，她第一次听到了《三国志》的故事。这个小女孩，竟然觉得刀光剑影的三国故事，比儿女情长的牛郎织女痛快得多。她听得入了迷，晚上不肯睡觉。每天上床，都要奶娘劝着哄着，还是不愿意脱鞋解衣。

为了讨得舅舅的欢心，她对白天的功课，做得加倍地勤奋了。可是舅舅是有工作的人，公务一忙，晚上就顾不上给外甥女儿讲故事。每逢这种时候，小冰心就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有时舅舅竟然一连间断了五六个晚上不给冰心讲故事，这个文静的小姑娘，急得天天晚上在舅舅的书桌旁边徘徊。然而这个狠心的舅舅，竟固执地埋头于自己的公务之中，不接受外甥女儿的暗示。小冰心急于要知道故事的发展，没办法，只得自己拿起《三国志》来，边猜边看。有的字她实在不认识，但是因为反复出现，字义居然被她猜着了。她就这样又猜又看，又看又猜，囫囵吞枣，一知半解地读下去，

① 冰心：《悼杜波依斯博士》

越读越有兴趣，居然把偌大的一本《三国志》，一口气看完了。这一年，小冰心只有七岁。

从此开了头，她看完了《三国志》，又拿起《水浒传》，看完了《水浒传》，又拿起《聊斋志异》，就这样，一本接一本地看下去了。

她看书看得着了迷，手不释卷，头也不梳，脸也不洗，海边也不去了，有时一边看书，一边自己喜笑，自己流泪。这种样子，母亲在旁边看了，十分忧虑。为了让女儿散散心，转移转移注意力，就竭力地劝小冰心出去玩玩，她却不听。有一次母亲实在急了，把她正看着的《聊斋志异》（卷一）夺了过去，撕成两段，她也不哭，也不叫，只是趔趄地走过去，把撕成两段的书拿起来，接着看。她的这种痴迷的傻样儿，反把母亲逗笑了。

她就这样地读着。到了十一岁，她已经看完了全部的“说部丛书”，以及《西游记》、《水浒传》、《天雨花》、《再生缘》、《儿女英雄传》、《说岳》、《东周列国志》等等。

在她读过的众多的中国古典小说里，她觉得无味的是《红楼梦》，而令她最不喜欢的是《封神演义》。她的这种童年的艺术直觉是非常有趣的。《封神演义》尽管也揭露了暴虐无道的商纣王，然而全书宣扬的是一种因果报应的宿命论思想，人物也大都写得千篇一律，没有什么性格。不喜欢这部作品，说明这位聪颖的小姑娘长着一颗健康的头脑，头脑里装着自然和纯洁的艺术趣味。至于读了《红楼梦》而觉得毫无味道，这肯定是因为她的年岁太幼小了，她还无法领略什么叫做男女之间的爱情，况且她生活在一个幸福和谐的小家庭里，根

本无法理解一个封建大家庭里包含的那些勾心斗角和宗派纠纷。在“五四”以后，不少小说家都在创作爱情题材的作品，显出了自己与封建主义秩序决裂的态度，庐隐的《海滨故人》和淦女士的《隔绝》，就是因此而赢得了青年读者的倾心的。然而，冰心却几乎没有写到过爱情，这是下面还要说到的。

中国古典小说虽然把冰心领入了文学宝库的大门，但却无法完全满足这个小姑娘求知的渴望。她对一切新鲜事物都感到兴趣，除去旧小说之外，她还开始贪婪地阅读外国小说、报纸，甚至是关于革命的禁书。

外国小说是父亲的朋友们送给她的。父亲每次带着小冰心到军舰上去玩，他们都把小姑娘抱到圆桌上，把她围在当中，让她讲《三国演义》的故事。这些威武的军官们，觉得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会讲“董太师大闹凤仪亭”等等，是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每当小冰心讲完了，他们就把自己手里的外国小说，送给她作礼物。这些小说曾是他们海上生活的伴侣，而冰心正是从这些水兵们的馈赠里，接触了外国文学，第一次从林纾翻译的半文半白的文字里，了解到了我国疆土以外的人生故事，象《孝女耐儿传》、《滑稽外史》、《块肉余生述》等。狄更斯的这些小说，经过林纾古奥的文笔表达出来以后，外国小说的那种充满了生活气息的韵味，就大大地被削弱了。因此，这些作品并未给冰心留下很深的印象。

冰心的小舅舅杨子玉，当时正在唐山路矿学堂求学，每到暑假，就来烟台，与谢、杨两家团聚。他是甥侄辈们最欢迎的人，因为他最会讲故事。—— 什么林则徐烧鸦片烟，什

么洪承畴卖国，都讲得有声有色，慷慨淋漓。

他还带着一些禁书，都是同盟会的宣传革命道理的小册子，如《天讨》等刊物。《天讨》是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临时增刊，上面登载了许多激烈的反对清朝政府的言论，象章太炎的《讨满洲檄》和吴樾的《暗杀时代》等，尽管带上了一些偏激的种族情绪，却充分地揭露了清王朝的专制与腐败，洋溢着一种正气浩然的革命气氛，具有极大的煽动力量。看这类书籍，如果被官府发现，轻则逮捕入狱，重者被杀头，因此是十分危险的。倾心于革命的成人们，也只能彼此偷偷地传看，是绝对不让小孩子们知道的。但是，越是瞧着这些小孩子，越是不许他们看，他们反而越想看。于是，表哥们就怂恿着小冰心，偷偷地拿来，然后急急忙忙地看，看完之后，再偷偷地送回原处去。

这类书有时也由杨子敬、杨子玉兄弟与朋友们偷偷地互相寄阅，总是经过了伪装，装在肉松或是茶叶罐里，寄来寄去的。冰心在四十年代，曾经这样地追述过这段往事：

> 三十年前，我的几个舅舅，都是同盟会的会员，平常传递消息，收发信件，都由母亲出名经手。我还记得在我八岁的时候，一个大雪夜里，帮着母亲把几十本《天讨》，一卷一卷的装在肉松筒里，又用红纸条将筒口封了起来，寄了出去。不久收到各地的来信说："肉松收到了，到底是家制的，美味无穷。"我说："那些不是书吗？……"母亲轻轻的捏了我一把，俯在我的耳朵上说："你

不要说出去。”[1]

小冰心就是这样漫无目的地，但却是兴趣盎然地在书的海洋里游泳，书海启迪了这个小女孩子的智慧，而大自然的海洋又使这个小女孩子学会了编织自己的幻想。于是，住在海边，又读了许多书的小冰心，开始用她那只稚嫩的小手拿起笔来，写起了小说。

这是这位后来成为中外知名女作家的第一次创作尝试。而说来真是有趣，这位后来写爱，写海，写童心，笔端充满了柔情的女作家，在童年时写的第一部白话小说，却叫做《落草山英雄传》。据她自己后来回忆说，那是一部“介乎《三国志》、《水浒传》中间的一种东西”。[2] 因为词汇不够，老是重复“金鼓齐鸣，刀枪并举”之类的字眼，重复了十几次，实在没劲儿，便停笔不写了。然而又不甘心，她的第二部小说是文言的，换用了《聊斋志异》的体裁，取名叫做《梦草斋志异》，又是重复“某显者，多行不道”之类的字眼，重复了十几次，也是实在没劲儿，便也停笔不写了。

除了书籍之外，戏剧也曾以巨大的魅力吸引过她：“有一次，父亲的一位朋友请我们到烟台市去看戏，从一个久住山沟的孩子看来，上市是一件多么大的事啊！这次看戏，给我的印象极深。我还记得这座戏园叫做‘群仙茶园’，那天正好是演全本《三国志》，从《群英会》、《草船借箭》起，到《华

① 冰心：《我的母亲》

② 《冰心全集·自序》

容道》止，正是《三国演义》中最精采最热闹的一段！看到我所熟悉所喜爱的人物，一个个冠带俨然地走上台来，我真是喜欢极了。我整整地伏在栏杆上站了几个钟头，父亲从后面拍我肩头和我说话，我也顾不得回答。”[1] 在她成年以后所写的小说《六一姐》里，冰心又曾绘形绘色地描写过一年一度的烟台社戏的景象。

在冰心十岁的时候，从南方来了一位表舅王垿逢先生，接替了杨子敬先生的职务，成为小冰心的第二任启蒙教师。王垿逢先生是一位很有见识的教师，他对小冰心最重要的规劝是：“读书当精而不滥。”[2] 这样，在王先生的指导下，小冰心开始学习《国文教科书》，以及《论语》、《左传》、《唐诗》、《班昭女诫》、《饮冰室自由书》等等。又在王先生的循循善诱之下，开始爱上了诗。她读诗，并开始学习着写诗。

1911 年，烟台海军学校发生了汉族学生与少数满族学生（都是北京的贵胄子弟）之间的风潮，北京派来了一个名叫郑汝成的调查员查办此事。郑是谢葆璋的老同学，他背地里告诉谢，近几年来一直有人到北京密告谢葆璋是乱党，劝他立即辞职，免得落个撤职查办的下场。谢葆璋同意了，他的几位同事也一起递上了辞呈。这样，在 1911 年的秋天，谢葆璋便恋恋不舍地告别了他所创办的海军学校，带领全家，辞别了烟台的大海，南下回故乡福州去了！

在返回福州的途中，全家在上海虹口住了一个多月，这

① 冰心：《京戏和演京戏的孩子》

② 《冰心全集·自序》

时候，爆发了震撼人心的辛亥革命。为了慰劳起义的军队，群众纷纷捐款，十一岁的小冰心，也献出了自己积攒的十块压岁钱，送到上海《申报》，报社发给她一张收条，上面写着“幼女谢婉莹君”等字样。小冰心小心翼翼地把这张纸条珍藏了起来，准备留作永久的纪念。

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之后，冰心又跟随父母继续南下，从水路回到了故乡福建。这是冰心懂事以后，第一次返回自己的诞生之地。

当她从看惯了的山东的渤海，走进了福建的闽江的时候，她的最突出的印象，就是：“江水实在比海水安静温柔得多！”[1] 后来，在她长大成人之后，她曾经写下过如此的一首短诗，来描述闽江给她的印象：

清晓的江头，
　白雾濛濛；
是江南天气，
　雨儿来了——
我只知道有蔚蓝的海，
却原来还有碧绿的江。
　这是我父母之乡！[2]

等他们回到故乡福州的时候，冰心的祖父谢子修老先生，已带领着这个大家庭，迁居到了“城内南后街杨桥巷口万兴

①② 冰心：《还乡杂记》

桶石店后”[1] 的“南后街八十六号”[4]。这是一所大宅院。它“具有很典型的福州民宅特点，除中轴建筑外，左右两旁还有许多自成院落的房屋，每个院落都有水井；北院之西还横亘着一列坐西朝东的双层楼房，楼房之西为花园。”[2] 这所房子本是《与妻书》的作者林觉民的家，林觉民于 1911 年 4 月被清廷杀害后，林氏家族为逃避株连，很快地从这里秘密搬走，将这所宅院卖给了谢子修老先生。

谢子修“是个教书匠，在城内的道南祠授徒为业。”[3] 他是谢家第一个读书识字的人，他的父亲本是长乐县横岭乡的一个贫农，因为天灾，逃到了福州城里学做裁缝。又因为不认识字，一次被人家赖了账，竟然春节前还无米下锅，谢子修的母亲为此急得自缢，幸亏谢子修的父亲发现得早，连忙把她解救下来，两人抱头痛哭之后立下决心，如果将来生个儿子，拚死拚活，也要让他读书识字。于是，谢子修成了一个教书先生。而他在福州的大书房，就成了小冰心回到故乡之后的乐园，她总是钻进去翻书看。她的祖父很爱她，在一个清静的冬夜，这位老人抚摸着小孙女的头发说：“你是我们谢家第一个正式上学读书的女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地读啊。”[3]

回到故乡之后的小冰心，除去继续贪婪地读书以外，还

①④ 冰心：《我的故乡》

② 曾毅、王铁山：《灵气独钟的福州南后街八十六号—— 记林觉民、谢冰心故居》

③③ 冰心：《我的故乡》

有一个不小的变化，那就是：一向喜欢男装的小姑娘，第一次和堂姐妹们接触，也换上了小女孩的服饰。在女孩儿群里，小冰心也学会了女儿态，正如她以后叙述的："五色的丝线，是能做成好看的活计的；香的美丽的花，是要插在头上的；镜子是妆束完时要照一照的；在众人中间坐着，是要说些很细腻很温柔的话的；眼泪是时常要落下来的。女孩子是总有点脾气，带点娇贵的样子的。"[①]"这调脂弄粉，添香焚麝的生活，也曾使我惊异沉迷。"[②]

1911年的秋天，十一岁的冰心考取了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第一次过上了正规的学校生活。

这所学校位于福州城内的花巷，原是一所旧家宅第，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有一口很大的池塘，池塘上有一道石桥，桥的两旁还有两处亭馆。冰心所在的教室旁边还有一个小池子，池子旁边种着芭蕉。环境是很幽雅的。

然而，过惯了甜蜜、温暖的家庭生活的小冰心，开始步入学校生活的几天，很不习惯，曾经悄悄地流过不少眼泪。但是，赞成女孩子上学的长辈们要有话说，出来劝她辍学，她就沉默地忍受着。

逐渐地习惯了，并且交上了许多要好的小女朋友。其中，就有后来成了她的良友之一的王世瑛。

她在这所学校里，"只读了三个学期，中华民国成立后，

① 冰心：《梦》

② 《冰心全集·自序》

海军部长黄钟瑛”[1] 打电报，召她父亲去北京，这样，她又跟随着父母，告别了故乡福州，北上了。

温暖的家庭，辽阔无边的大海，富有精神营养的书籍，一起熏陶了童年冰心的性格。待她步入中年之后，在四川重庆的歌乐山上，曾经这样总结过她自身性格的特点：“第一是我对于人生态度的严肃，我喜欢整齐，纪律，清洁的生活，我怕看怕听放诞、散漫、松懈的一切。”“第二是我喜欢空阔高远的环境，我不怕寂寞，不怕静独，我愿意常将自己消失在空旷辽阔之中。因此一到了野外，就如同回到了故乡，我不喜欢城居，怕应酬，我没有城市的嗜好。”“第三是我不喜欢穿鲜艳颜色的衣服，我喜欢的是黑色，蓝色，灰色，白色。有时母亲也勉强我穿过一两次稍为鲜艳的衣服，我总觉得很忸怩，很不自然，穿上立刻就要脱去。”“第四是我喜欢爽快，坦白，自然的交往。我很难勉强我自己做些不愿意做的事，见些不愿意见的人，吃些不愿意吃的饭，母亲常说这是‘任性’之一种，不能成为‘伟大’的人格。”“第五是我一生对于军人普遍的尊敬，军人在我心中是高尚，勇敢，纪律的结晶。关于军队的一切，我也都感到兴趣。”“说到童年，我常常感谢我的好父母，他们养成我一种恬淡，‘返乎自然’的习惯，他们给我一个快乐清洁的环境。因此，在任何环境里都能自足，知足。我尊敬生命，宝爱生命，我对于人类没有怨

① 冰心：《我的故乡》

恨，我觉得许多缺憾是可以改进的，只要人们有决心，肯努力。”①

① 冰心：《我的童年》，写于1942年3月27日。

第二章 北 京

我对北京的感情，是随着居住的年月而增加的。

——冰心：《我到了北京》

上面说过，1913年，谢葆璋接到了当时的海军部长黄钟瑛令他北上北京，出任海军部军学司长的电报之后，他就立刻启程，北上赴任了。

几个月以后，在这一年的初秋，他的妻子杨福慈也收拾停当，带着他们的女儿冰心和三个儿子，由孩子们的舅舅杨子敬先生陪伴、护送着，启程北上了。

这次举家北上北京，与十年前北上烟台一样，仍然是取道水路。所不同的只是，上次杨福慈膝下只有一个女儿，而现在，又多了三个儿子。

这一支由两个大人和四个孩子组成的家庭大军，告别了山青水秀的故乡福州，开始了行程几千里的自南至北的漫长旅程。

他们先登上了去上海的轮船，在东海上航行了几天，之后，就进入了黄浦江口，到沪作短暂的停留和休整，然后，又

登上了去塘沽的轮船，在渤海里航行了几天，最后，终于驶进了塘沽口的十八湾。

在烟台看惯了青蓝色的美丽的大海，又在故乡福州饱览了亚热带特有的郁郁葱葱和姹紫嫣红之后的小冰心，乍一看见十八湾的浑黄的河水和极浅的河滩，内心里立刻涌起了一股抑郁和烦躁的情绪，—— 她觉得这里的颜色，实在是太黄了，太单调了！

抵达塘沽之后，他们又坐上了火车，先天津，后北京。虽然陆路代替了水路，而令人抑郁、烦躁的黄色，依然不改。小冰心想起了初秋的南国—— 那里，是一片充满了生机的绿色。深绿，浅绿，翠绿，墨绿，相间交错，彼此映衬。而这里，初秋的北方，却只能够在一大片一大片的黄色的基调上，偶尔看到一小块一小块的绿色，点缀其间。车窗外面那一望无际的农田里，总是黄多青少，虽然方圆十分辽阔，却显得缺乏生气。这些一望无际的缺少生气的农田，给热爱大自然、初次来京的小冰心，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当火车徐徐地驶进北京东车站的时候，谢葆璋已经站在月台上，迎候着自己的妻儿和妻兄。他把他们接出了站台，然后又把他们安置在站外等候的马车上。小冰心就这样，生平第一次踏上了北京的土地。

北京，这座历史上的名城，它曾经是几代封建王朝的京城，当时，又是袁世凯政府的所在地。对于一个初次见到它的仪容的人说来，它应该具有怎样的雄姿和怎样的魅力，才能算得名副其实呢？

冰心是在大海旁边长大的孩子，又刚刚告别了有着亚热

带风光的美丽的故乡，她曾经饱览过大自然变幻无穷的神奇形象，以及绚丽美妙的色彩，这个从小就爱独自幻想的小姑娘，会对将要成为她的第二故乡的北京城，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

关于北京，小冰心早就听到过不少不很诱人的说法。在她很小的时候，她的舅舅们——老同盟会员杨子敬先生，还有正在大学读书的年纪较轻的舅舅，就在家庭里的闲谈中，多次地讲起过北京和那里的皇宫。他们讲过清政府的昏庸和腐败，讲过北京市容是如何的破旧和颓败，老百姓的生活是如何的贫穷和困苦。所以，当小冰心知道父亲已经为他们全家在北京租好了房子，母亲和舅舅就要带领自己和弟弟们到北京去，她却对这个将去的地方没有什么迫切的向往。

这时候，小冰心已经跟随着父亲、母亲、舅舅和弟弟们，离开了北京东车站。首先映入小冰心眼帘的，竟是一座灰色的又高又厚的城墙。小冰心坐在马车里，好奇地观赏着窗外的街景——果然象她舅舅们所说的那样，这个赫赫有名的京城的市容，原来竟是如此的破旧与颓败。除去又高又厚的灰色城墙之外，就是黄色的土路，这些土路是用黄土铺成的，只要风一吹，就尘沙飞扬。

再看看街上的行人，他们大都穿着色彩单调的衣服，个个都象满腹心事的样子，走起路来没有神采。有的迂缓，有的匆忙。在这些行人中间，还间或看到人力车夫，他们汗流满面，穿着破烂的衣裳，拉着坐客，或是疾走，或是奔跑。也有一些衣不蔽体的贫民，蜷缩在门洞里。这些人的形象，小冰心看了，都觉得心酸。

这一切，仿佛是向初来北京的小冰心，印证舅舅们早年对她的讲述，使这个喜爱大海和南国风光的女孩儿，产生了一种茫然的心绪。

十年后，当冰心长成为一个大姑娘，告别了祖国和亲人，到美国去留学之后，她在地球的那一面，想念北京的时候，还没有忘记北京给予她的这个最初的印象。她不由自主地写到了北京的灰色的城墙，和尘土飞扬的街道，泥泞的小胡同，以及奔走着的流汗的人力车夫。可见她在少女时代第一次见到北京时，北京留给她的印象有多深！

那一次，坐在马车里，只是因为见到了分别半年之久的亲爱的父亲，才使她的茫然漠然的心绪，又渐渐地和缓了过来。

就在小冰心思前想后的时候，马车已经走进了东城一条宽敞的大胡同里。这条大胡同，后来因为演出过形形色色的历史故事而闻名中外，这就是有名的铁狮子胡同。

在这条大胡同的中间偏东一点儿，向北边斜插过去，还有一条曲里拐弯的小胡同，叫做中剪子巷。马车逐渐地减慢了速度，弯进了这条小巷子的南口，停在了十四号的门前。—— 这个十四号门里，就是谢葆璋在北京安置的新家（为了找到中剪子巷十四号这个院落，笔者曾经三次去中剪子巷胡同寻找，又请教过几位对冰心老人十分熟悉的作家朋友，但是因为年代久远，时事变迁，门牌号码几经变更，实在难以确定哪个大门就是本世纪初的十四号。为此，笔者又专门请教了传主谢冰心先生，冰心在她 1985 年 8 月 8 日给笔者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的中剪子巷十四号旧居，是进铁狮子胡同，

南口，路西，不远，那大院恐已盖满房子了。”根据冰心本人的指点，笔者又去中剪子巷寻访，在靠近中剪子巷胡同南口路西不远的地方，确实已经挤满了房子，因此确实已经无法辨认昔日的十四号，而只能确定一个大致的方位了）[①]。

当时的十四号院有一个不大的院门[②]，左边门框上挂着一块写有“齐宅”两字的黑底金字牌子，这是一所典型的中等人家的宅第。齐家是这所宅子的房东，他们是旗人。户主齐老太太年轻时当过和敬公主府的奶妈子，公主府的后门就在十四号门的旁边，而大门则开在铁狮子胡同。谢葆璋家居住的房子，是向齐家租来的。

齐、谢两家在这所宅子里合住，但从房子的布局来看，他们又自成格局，互不干扰。进院门后往右边走，一座两扇门内，那是齐家的住处。而进院门后往左边走，走过一个小小的长方形的外院，再走进一座朝南的四扇门，则是一个不大的三合院。这个三合院，就是谢葆璋家的住所。

三合院里，有三间正房。正房前面有廊子，里面东西两边还各有一个套间，每个套间里都盘着砖炕。这五间北房，就是谢葆璋夫妇和四个孩子的卧室。

五间北房里，除去东西两个套间之外，三间正房，是两明一暗的，它们修得很讲究：有玻璃的后窗，还有雕花的隔扇，隔扇上的每一个小木框里，都嵌着一幅画或一首诗——画，是水墨的或彩色的花卉山水；诗，是我国古典诗人的名

① 详见笔者《为冰心写传》一文，载1986年1月28日《文汇报》。

② 这是根据谢冰心先生本人的记忆描写的，见冰心《我到了北京》。

句。这样讲究的装饰品，小冰心在烟台或在福州的家里，从未看见过，因此很喜欢，也在她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进入老年之后，她还能够背诵其中的一首七律：

飘然高唱入层云
风急天高忽断闻
难解乱丝唯勿理
善存余焰不教焚
事当路口三叉误
人便江头九派分
今日始知吾左计
柱亲书剑负耕耘

除去正房之外，还有三间东厢房，两明一暗，这是谢葆璋的书房兼客厅。东厢房对面是西厢房，也是两明一暗，用作冰心舅舅的卧室，兼作冰心弟弟们读书的书房。从这个三合院正房廊前的东边过去，还有一个很小的院子，这是厨房和厨师的住所。

谢葆璋家就在这座三合院里，一共住了十六年。

辛亥革命虽然已于两年前就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延续了几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一年前的元旦，又宣告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了临时大总统。可是不久，在封建军阀的压力下，孙中山就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多少志士仁人为之流血牺牲，好不容易得来的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却被一个心怀叵测的无耻之徒袁世凯窃取。这个曾经向西太后告密，用谭嗣同等维新派的头颅和鲜血染

红了自己的帽顶子的卑鄙小人，在北京就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1913年6月，满脑子封建思想的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动，开始为复辟帝制和他本人日后登基大造舆论，竟然利用手中的职权，通令各省尊孔祀孔。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面，进了海军部之后的谢葆璋，这位拥护共和，向往民主，思想开明，热爱祖国的军官，就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了。冰心到了八十岁的高龄，还记得她小时候，父亲进京的前几年，在烟台海边的沙滩上，对她说过的一段话："我在巡洋舰上的时候，还常常到外国去访问。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我觉得到哪里都抬不起头来，你不到外国，不知道中国的可爱，离中国越远，就对她越亲。但是我们中国多么可怜啊，不振兴起来，就会被人家瓜分了去。可是我们现在难关多得很，上头腐败……"[1] 但是现在，辛亥革命毕竟已经胜利了，腐败的清朝政府毕竟已经被推翻了，时代不同了，谢葆璋满以为就可以大干一场，振兴中国的海军了。没想到，袁世凯控制下的官僚衙门，比腐败的清朝衙门好不了多少。他兴冲冲地从故乡赶到北京，却被困在一个阴谋小人所控制的封建衙门里，他的处境和心情，自然就与他在烟台大办海军学校时不一样了。所以在女儿冰心的眼睛里，他是消沉得多了。

后来，待冰心长大成人之后，在五四运动发生后不久，她曾写了一篇描写辛亥革命后不久北京衙门状况的小说《去国》。这篇小说里的人物之一朱衡，他的心理状态，就很有一

① 冰心：《童年杂忆》

点儿当时谢葆璋心情的影子。朱衡在辛亥革命前就是同盟会里的重要人物，他为辛亥革命贡献出了父亲遗留给他的万贯家财，为革命忘我地奔走，怀抱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热情，过着“今日海角，明日天涯”，“剑外惟余肝胆在，镜中应诧头颅好”的日子，终于盼来了辛亥革命的胜利。然而，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官场内依然是腐败不堪，封建军阀们一言战，金钱就消耗在硝烟弹雨里；一言和，金钱又耗费在应酬疏通中。可是一遇见对国计民生有用的事情，政府就一个钱也没有了，什么事都不做了。这样的政局，使这个老同盟会员十分寒心，十分悲愤。他和他的革命同志们为之流血牺牲，抛头颅，洒热血，奋斗得来的原来是这样的共和。这样的结局，简直是太令有志之士失望了。虽然朱衡绝不就是谢葆璋的艺术再现，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出来：朱衡这个人物的心境，尤其是他对当时政治局面的失望，确实包含着当时谢葆璋心情的成分。谢葆璋当时的处境，谢葆璋当时的心情，一定给女儿冰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这位女作家后来构思这篇小说，提供了创作的素材。

进了海军部之后的谢葆璋，再也不能够陪伴着心爱的女儿，到海边去骑马，去散步了；他似乎也再没有过去那样浓厚的兴致，与女儿谈天说地了！他过去在海边，曾经时常带领着小冰心，到海军军官学校去玩耍；可是现在在北京，他却决不带女儿冰心到衙门里去。

他排遣自己郁闷心情的唯一办法，似乎就是种花。大概是要把南国的色彩，转移些到土黄色的北京来，谢葆璋在自家住的三合院里，砌了一个小花台，每天下班回来，就卷起

袖子种花。

但是这个小小的花台，还满足不了谢葆璋爱花的欲望，他又在外面那个长方形的院子里，搭起了一个葡萄架子，栽上了葡萄秧子。这些葡萄秧子，都是他在海军学校的老朋友们，从烟台给他寄来的。

继而他又把自己的花园，渐渐地扩展到了大门以外的地方。他在门口种起了容易成活生长的野茉莉和蜀葵。

光是花园还不够，他又为孩子们立起了一个秋千架子，引来了十四号周围的儿童。这群孩子一边在这里玩耍，一边就给这个有秋千、有花园的地方，起了一个绰号，叫做“谢家大院”。

“谢家大院”是中剪子巷的儿童们聚会的地方，除了看花和打秋千之外，他们还在这里跳绳，踢毽子，放风筝，抖空竹，练自行车，等等。因为有孩子，又招引来了“打糖锣的”担子，这担子里面真可说是包罗万象，—— 有糖球，有面具，有风筝，有刀枪，价钱很便宜。锣声一响，孩子们立刻从四面八方跑来，谢家的三个男孩也会从院子里飞奔而出。这时，“谢家大院”就会比平时热闹多了。

这院内院外的场景，就是小冰心初到北京后生活的世界。

冰心初到北京之后，没有进学校，白天父亲去上班，她就在家里陪伴着母亲和弟弟们。这时候，母亲的身体比以前更差了，常常觉得臂腕酸痛，小冰心就常常帮助母亲梳头，并开始学习着做女红，料理家务。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家，这时候已经开始懂得了母亲的难处—— 原来，料理家务是一

件极操心、极不容易对付的事情。

她的唯一的消遣，是翻看母亲订阅的几本杂志。象《小说月报》，还有《东方杂志》，《妇女杂志》，等等。那时的《小说月报》上，既有图画，又有小说。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林纾、周瘦鹃等人翻译的外国小说，还有笔记，文苑，新知识，谐文，译丛，风丝雨片等专栏，真可说是丰富多彩，包罗万象。对于这位十三、四岁的少女说来，比她童年时候在烟台的大海边，以及后来在福州她祖父的书房里，看到过的那些书，还要引人入胜。她当时并未料到，七八年以后，她会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一员，在自己现在如此热衷地阅读着的杂志上，发表她自己写作的“问题小说”。

在晚上，她就帮助弟弟们复习功课。复习完了，就给他们讲故事。故事的内容，都是她在现在，或过去从中外古今的小说里或杂志里看来的。她从小就熟读《三国志》、《水浒》、《聊斋志异》、《孝女耐儿传》、《说部丛书》、《西游记》、《天雨花》、《再生缘》、《儿女英雄传》、《说岳》、《东周列国志》等等大部头小说，还有林纾翻译的《块肉余生述》（今译作《大卫·科波菲尔》——笔者注）等外国小说，《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将，《聊斋志异》中的人，鬼，狐狸精，《天雨花》与《再生缘》中有才干的女孩子左仪贞及孟丽君，都是小冰心在童年时代就十分神往的人物。现在，她又从诸如《小说月报》等杂志里，看来了新创作的各种各样的中国小说，与新翻译过来的形形色色的外国小说。再加上她的一点想象，一点虚构，编成冰心式的体裁，一个片断、一个片断地讲给弟弟们听。直听得他们如醉如痴，有时微笑，有时流泪。冰

心后来长大成人之后，曾经在她自己的组诗《繁星·八三》中，写过这样一段：

小弟弟！
你恼我么？
灯影下，
　我只管以无稽的故事，
　　来骗取你，
绯红的笑颊，
　凝注的双眸。

含着深情，回忆了她与弟弟们亲密相处的情景。而少女冰心当时的讲故事，就是女作家将来走上创作道路的口头练习。一年之中，她竟给弟弟们讲了三百多则故事，真是一位少年多产的口头文学小作家。

有时候，她也领着三个弟弟在院子里做游戏，玩北京的儿童们最喜欢玩的花样——老鹰捉小鸡之类。

除去口头讲述故事之外，她又象童年时代那样，第二次提笔练习写作小说。她写了一篇讲述一位女革命家事迹的《自由花》，又写了一篇《女侦探》，都是用文言文写成的（那时，倡导文学革命的高潮还没有到来，所以冰心的写作尝试还没有使用白话文，而是使用文言文）。而且都是没有结局的长篇小说。这是女作家将来走上创作道路的第二次笔头练习。

这时的冰心毕竟是孩子。有时。她也和弟弟们一起去玩耍——看花草，打秋千，跳绳，踢毽子。有机会的时候，还

极有兴趣地观看王府后门出来进去的满族贵妇人，她们身穿颜色鲜艳的旗袍和坎肩，脚蹬高底鞋，梳着“两把头”，髻后拖着很长的“燕尾儿”，彼此见面、告别，都要不住地蹲下去、站起来，站起来、蹲下去，请安问好，频频寒喧。这种架势，小冰心过去从来没有看见过，她觉得新鲜极了。除去观看旗人习俗之外，只要“打糖锣的”担子一来，她也跟着弟弟们去参观。这“打糖锣的”担子给冰心的印象极深，直到老年之后，她有机会与民间艺人面人张相识，还请这位面人张给她捏了一副“打糖锣的”担子，把它摆在自己的书柜里，用来纪念自己少年时代的这段生活。

至于“谢家大院”以外的世界，她就几乎很少接触到了。—— 那时候的北京城里，可去的地方很少。故宫、景山和北海，都属于紫禁城区，不对百姓开放。只由舅舅带着，去逛了一趟东四牌楼的隆福寺庙会。隆福寺离中剪子巷不远，步行十几分钟，即可到达。

庙会里十分热闹，各种各样的卖货小摊儿，栉比鳞次。有卖北京小吃的食品摊儿，什么煎饼，油条，糖火烧，蜜麻花，蒜泥灌肠，白水羊头肉，豆腐脑儿，江米切糕，驴打滚儿，炒肝儿，小枣粽子，等等，真是品种齐全，应有尽有。也有卖服装鞋袜，各式帽子，布头儿，胰子，牙粉，胶鞋，雨伞，各种日用品的小摊儿。还有卖古玩玉器，金银手饰的。除去卖东西的之外，还有说书的，变戏法的，唱小戏的，算命的，练武术的，也都竭力地在吸引着逛庙会的人们。

不过，最吸引小孩子的，还是卖玩具的玩具摊。这里有用彩纸扎成的戏装小人，有文官，也有武将。象舞台上的武

将一样，这些戏装小人的武将，也是全副盔甲，头上也插着翎毛，背后也扎着几面小旗子。这个卖戏装小人的玩具摊，吸引了冰心和与她同来的几个小弟弟的目光，他们看啊，看啊，总看不够。

呈现在这里的，是一个红火的，纷乱的场面。有着浓厚的北方习俗的色彩，是生长在海边与南国的小冰心，不曾看见过的，因此给她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还有就是代表母亲，陪着房东齐家的女眷，到东安市场的吉祥剧院，去听过几次京戏。—— 那是杨小楼主演的黄天霸故事，还有梅兰芳主演的《汾河湾》。

然而除了逛过一次隆福寺庙会，听过几次京戏之外，生活的天地似乎始终限制在“谢家大院”以内的地方。见到的人，除去父母、舅舅和弟弟，就是房东姓齐的一家人。生活的内容，除去上面述说的那些，就是偶尔在夜晚，听见从胡同里传进来的叫卖声，—— “赛梨的萝卜”，“硬面饽饽”，“羊头肉”，“铁蚕豆”，“热馄饨”，“肉包子”，……有的响亮，有的沉闷，有的悠长，有的凄清。还时而夹杂着算命瞎子敲出来的小锣声。这种生活情调里充满了纯粹的北京风味，但却常常使热爱大自然的小冰心，内心感到彷徨，而且烦闷。

这样的生活，她过了一年。

从年纪那样小的时候起，就一直默默地迷恋于大海的冰心，她对北京这座初来的城市，以及这个市井天地的狭小，和生活情趣的单调，感到烦闷和不习惯，这是非常自然的。这就象迷恋于市井生活，并常常能在市井生活中发现无穷奥秘的人，可能会觉得汪洋无际的大海由于远离人群，也显得过

于单调一样。不管是什么样的生活天地，都看你对它是否熟悉，是否热爱；假如你能将自己的热情，全部灌注进去，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光怪陆离，丰富多彩，广阔得简直没有边际。自幼就被大海陶冶的冰心，在她长大成人以后，由于她的独特的艺术情趣和性格，写出了具有冰心风格的作品，形成了冰心特有的文学创作的道路。尽管她在少年时代就来到了北京，并开始接触了北京市井的生活，她却不可能，也决不会，在她以后的文学作品里，象老舍那样，写出充满了浓郁的北京风味的人物和故事来。

冰心到了八十一岁的高龄，回忆起她少年时代初来北京时的感受时，这样说：

> 走到北京的最初一段，却如同列车进入隧道，窗外黑糊糊的，车窗关上了，车厢里的电灯亮了，我的眼光收了回来，在一圈黄黄的灯影下，我仔细端详了车厢里的人和物，也端详了自己……①

> 北京头一年的时光，是我生命路上第一段短短的隧道。②

然而，正是这个在她的少年时代，曾是她的生命史上的第一段短短的隧道的北京，却在她以后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渐渐地变成了她所热爱的第二个故乡。这不仅是因为：她本人

① ② 冰心：《我到了北京》

在这里读完了中学，又读完了大学，在这里发表处女作，在这里成名，在这里执教，在这里结婚，在这里安家，在这里作母亲，在这里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而且也因为：在她的少年和青年时代，这里也是她最爱的那个家——她的父亲，她的母亲，她的弟弟们，居住的地方。当她在大学毕业后，到大洋彼岸去留学，她苦苦思念的，是北京和住在北京的亲人。当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她到云南去避难，苦苦思念的，也是北京，是住在北京的年迈的老父，和位于燕京大学校园内的她和吴文藻的家园。

她在四十岁的年纪，就这样写过："我如今镇静下来，细细分析：我的一生，至今日止在北平居住的时光，占了一生之半，从十一二岁，到三十几岁，这二十年是生平最关键，最难忘的发育，模塑的年光，印象最深，情感最浓，关系最切。一提到北平，后面立刻涌现了一副一副的面庞，一幅一幅的图画：我死去的母亲，健在的父亲，弟，侄，师，友，车夫，用人，报童，店伙，……剪子巷的庭院，佟府堂前的玫瑰，天安门的华表，'五四'的游行，'九一八'黄昏时的卖报声，'国难至矣'的大标题，……我思潮奔放，眼前的图画和人面，也突兀变换，不可制止。"①

全国解放后，她和丈夫、孩子们从日本归来后，再一次定居在北京。她的孩子们象她本人年轻时一样，在北京读书和工作。她的相濡以沫的丈夫，安眠在北京。她在北京过着安静的晚年。

① 冰心：《默庐试笔》

因此，正如本章题记所引的，冰心老人自己在八十一岁的高龄，所写的另一句话那样：

我对北京的感情，是随着居住的年月而增加的。

家中闲居的生活，使聪明的小冰心觉得无聊。于是，在1914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她就向她的第一任启蒙教师，也是她的舅舅的杨子敬先生提出——她要去学校上学。

疼爱外甥女儿的杨子敬，赶紧向他那些长住北京的朋友们打听，可有什么好的女子中学；他们便向他介绍了一所很有名气，校址又离谢家很近的学校——东城灯市口公理会的贝满女子中学。

谢葆璋是见过世面的人物，他知道教会学校的教学认真，英语口语也纯正，而且除了教书和读书之外，并不勉强学生入教，所以，他就坚决地支持女儿去上学。

冰心的母亲杨福慈，是一位很有见识的妇女。她一直鼓励女儿要好好读书，学些能耐，将来长大了，能到社会上去就业。她常常向女儿讲述自己经历过的一件伤心事情：那是在她十八岁的时候，她的哥哥结婚的前一天，家里的长辈们都在忙着，为她的哥哥布置新房，她在旁边看着，只高兴地、好心地插了一句嘴，问：那小桌子上，能不能放上一瓶花？她的一位堂伯母，就很不高兴地打断了她，说："这里用不着女孩子插嘴，女孩子的手指头，又当不了门闩！"这件事给杨福慈的刺激很大，所以，她在结了婚，成了家，尤其是有了一个聪明过人的女儿之后，她就时时提醒小冰心说："现在你有

机会和男孩子一样地上学，你就一定要争气，将来要出去工作，有了经济独立的能力，你的手指头就和男孩子一样，能当门闩使了！”[①]

这样，在1914年的秋天，杨子敬先生就带着冰心，到贝满女中报了名。

贝满女中座落在灯市口“公理会大院内西北角的一组曲尺形的楼房里。在曲尺形的转折处，有横写的四个金字‘贝满中斋’——那时教会学校用的都是中国传统的名称：中学称中斋，大学称书院，小学称蒙学。”[②]

报了名之后，小冰心就被一位中年的美国女教士——这就是贝满女中的校长斐教士，领到了一间教室里，让她坐在位子上，递给了她一道中文老师出的作文题目，叫做“学然后知不足”。事有凑巧，原来这个作文题目是小冰心在家塾里早就做过的，于是她不费思索，拿起笔来，一挥而就，让这位美国女校长看得十分惊奇赞叹，立刻对杨子敬表示：她可以插入一年级，明天就交费上学吧。

就这样，冰心成了贝满女中的学生。

贝满女中是一所新型的学校，教学内容与过去读四书五经的中国传统教育，迥然不同，完全是从欧美的学校里借鉴过来的——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历史，常识，语文，英语，体育，等等。冰心正是在这里，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受了系统的科学教育。

① 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② 冰心：《我入了贝满中斋》

在考进贝满女中之前，除了在福州女师预科上了短期学校之外，冰心所受的教育，都属于家塾性质。家庭教师——舅舅杨子敬先生，虽然思想维新，是个民主主义者，但是他所教授的功课，却仅限于文学、历史诸方面。所以考进贝满女中之后，她认为文科毫不吃力，老师在课堂上讲授的古文，大都是她早就看过，或背诵过的，引不起她多大的兴趣，她一边听着老师讲，一边就悄悄地看小说，或写数学作业。

她仍象童年时代那样，心中充满了幻想，脑中常常涌现出画意和诗情。一个微笑，一束花，一片大自然的风光，就能无意间深深地刻印在她的记忆之中。从表面上看，她正行进在学校生活的刻板轨道上。然而在她的心里，却总是保留着许多关于美，关于善的意念和印象。在她长到了二十岁的时候，她还常常回忆起她在十五岁时经历过的生活画面，虽然她不曾讲起这是在哪一天，在什么地方发生的，但是从她那美好的回忆中，你却可以了解她在少年时代的聪慧，以及她对善，对美的执着的爱：

这是她在十五岁时经历过的一个转瞬即逝的生活场景。这场景一直保留在她的记忆之中。——“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的流着。近村的绿树，都笼在湿烟里。弓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着，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 他抱着花儿，赤着脚儿，向着我微微的笑。”①

① 冰心：《笑》

其实，那时的冰心，自己也还是一个孩子，然而她忘不了她在路旁无意之间邂逅的这个孩子，也忘不了这个孩子手中的那簇花。正象她后来所说的那样：

在别人只是模糊记着的事情，
然而在心灵脆弱者，
已经反复而深深地
镂刻在回忆的心版上了！①

这个爱幻想的聪慧的少女，她的作文实在好，一次竟被老师批了一百二十分。同学们很喜欢这个性格温柔的小作文能手，因为她的学名是谢婉莹，她们就给她取了一个亲昵的绰号，叫她“小碗儿”。又因为她站起来回答老师的提问时，口音还是地道的山东烟台话，不会京腔，她们又戏称她“侉子”。这个小“侉子”，“小碗儿”，作文不仅写得快，而且写得好，同学们知道了这个情况，就常来麻烦她，请她帮忙，让她替这些小懒虫们写作文。这些小姑娘们为了讨好这位在大海旁边长大的小作文能手，有的给她买冰糖葫芦，有的给她买糖炒栗子，害得这位外表腼腆，其实是极要强、极好面子的小小女作家，不得不在完成了自己的那份作文作业之后，再接受同窗们的请求，代替别人写作文作业。有时写完了自己的之后，还要再替同学们写出两三篇来。

然而这位擅长作文的小姑娘，将来并不准备当作家。因

① 冰心：《往事》

为她发现，自己的自然科学知识，根底太浅——比如在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上学时，数学只学到加减乘除，而一到了贝满女中，数学就学代数，中间缺了一大段，没有学过，也没有补上，所以入学后的第一次数学月考，就得了个“不及格”的成绩。这个“不及格”，给了小冰心很大的刺激。她下决心要学好数学，不仅学好数学，她还要学好一切数理化的功课。同时，同班的孩子们之间，又有着很强烈的竞争心，所以，小冰心就一天到晚地老做功课。而花费时间最多，用的力气最大的，就是数理化。“我在学校里，对于理科的功课，特别用功，如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生物以至于天文、地质，我都争取学好考好，那几年我是埋头苦读，对于其他一切，几乎是不闻不问。”① “我把精力都放在理科方面，什么代数、几何、三角，……尤其喜欢几何，因为我父亲是学航海的，他常常告诉我，对于学航海的人三角、几何都非常重要，所以我也就很喜欢这些学科。”②

这位埋头攻读数理化的小姑娘，正幻想着当医生：“我是从入了正式的学校起，就选定了医生这个职业，主要的原因是我的母亲体弱多病，我和医生接触得较多，医生来了，我在庭前阶下迎接，进屋来我就递茶倒水，伺候他洗手，仔细地看他诊脉，看他开方。后来请到了西医，我就更感兴趣了，他用的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我虽然不敢去碰，但还是向熟悉的医生请教这些器械的构造和用途。我觉得这些器械

① 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② 冰心：《谈点读书与写作的甘苦》

是很科学的，而我的母亲偏偏对于听胸听背等诊病方法，很不习惯。那时的女医生又极少，我就决定长大了要学医，好为我母亲看病。我父亲很赞成我的意见，说："古人说，'不为良相，必为良医'，东亚病夫的中国，是需要良医的，你就学医吧！"①

在学校里，冰心是一个严肃、勤奋的好学生——遵守校规，努力读书；在家庭里，冰心是一个孝顺的女儿和亲爱的姐姐——尊敬父母，爱护弟弟。

但是，时代的风云并没有忘记这个温柔规矩的女孩儿。父亲谢葆璋在她的童年时代为她播下的爱国思想的种子，也在她的心灵深处扎下了根。这次举家北上途中，小冰心在上海和天津的租界里，都曾看见外国的警察如何欺侮中国百姓。抵达北京之后，又曾看见外国的军队，如何在东交民巷东边的驻兵操场（即现在的东单公园）耀武扬威。1915年日本军国政府利用袁世凯一心一意想要称帝的野心，以帮助他称帝为条件，向他提出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二十一条的苛刻要求。窃国大盗袁世凯为了尽快地达到复辟帝制、本人登基的目的，竟然准备卖国投靠，同意接受二十一条。这件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当时只有十五岁的谢冰心，也毅然参加了爱国学生反日讨袁的示威游行和募捐活动。

她和贝满女中的姑娘们一起，列队从灯市口一直步行到天安门西侧的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这是一个春日，待她们的队伍走进中央公园的社稷坛附近时，四周已是人山人海，

① 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中学生和大学生们的情绪，也象头顶上的春日一样热烈而饱满。贝满女中的领队之一李德全（后来成为冯玉祥夫人），那时还是一位十七八岁的年轻姑娘，她代表自己所在的学校，勇敢地走上了社稷坛，向着密密层层的学生队伍，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说。性情恬静的少女冰心，是生平第一次亲眼看见并亲身经历这样悲壮伟大的场面。

这一天过后，在中剪子巷十四号谢葆璋的书房里，就挂上了一幅白纸，是当时印行的以岳飞字迹摘排出来的《五月七日之事》，就是纪念这次国耻的。这个细节，正表现了谢葆璋一家热爱祖国的心情。

少女时代的冰心，在父亲的教育和时代气氛的熏陶下，开始为祖国的前途担忧。后来，待她步入青年时代之后，说出过这样充满了悲愤的话："我们的日历上一年到头有许许多多的国耻纪念日。"如果再不救国，"将来我们的日历上，有国耻的日子将多于没有国耻的日子了"。①

贝满女中这所教会学校，除去教授功课之外，还向女孩子们传授宗教思想，教授《圣经》课。少女冰心也是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义，《圣经》故事，耶稣，爱，等等。这些思想开始向她的头脑里灌输，使得这位从小就陶醉在父母之爱的温暖怀抱里的小姑娘，逐渐地萌发了一种思想，即她想用"爱"的眼光，去看待她所认识、所接触的人，去对待她所遇见、所看到的事。这种思想，待她长大成人之后，就

① 冰心：《最痛快的一件事》

形成了冰心特有的处人与处世的哲学，这就是被她自己称之为“爱的哲学”的一种人生观与世界观。不过对在贝满女中读书时的少女冰心说来，这种哲学仍是一种潜在的、幼稚的意识，她只是愿意用充满了善意的眼光，去看人和看事，并且用充满了善意的心灵，去对待人和事。这种待人处世的善良出发点，支配了她的一生，并且几乎始终贯穿在她的所有作品中，形成了她的独特的思想和风格。她的杰出的成绩表现在其中，在纷乱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活里，她的彷徨与惆怅也同样表现在这里。

1916年6月，复辟称帝的袁世凯，在全国反对封建复辟的一片声讨浪潮中死亡。中国的政体，又恢复了表面上的共和制度。然而，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仍有不小的市场。曾经一度在光绪年间参加过维新变法运动的康有为，这时候，却又积极地唱起了尊孔的调子，他上书当时的代理大总统黎元洪，请求把孔教定为“国教”，并列入宪法。仍然拖着长辫子的封建军人张勋，更做了极为反动而愚蠢的尝试，在1917年的夏天，竟然拥戴已被辛亥革命废除了的末代皇帝溥仪，再登上皇帝的宝座。当气势汹汹的张勋，在徐州集结起他的辫子军人马，准备杀回北京的时候，北京城里，早已纷纷传说，野蛮而又愚昧的张勋辫子兵，就要开进北京城里来了。北京城里的老百姓，早就知道辫子兵是没有纪律的部队，假如他们闯进北京，必然要到居民家里骚扰，如果这样，妇女和年轻的女孩子的安全，就失去了保障。况且，谢葆璋一家和杨子敬先生的政治态度，都是拥护共和的。所以，谢葆璋决定，

先把妻子儿女送到烟台去，暂避一个时期。

这样，十七岁的少女冰心，就与母亲和弟弟们一道，第二次到了她童年时代生活的地方——烟台。

冰心当然十分愿意回到她童年时代生活过的大海边去，况且能够坐在她一向喜欢的大轮船上，沿途领略大海的风光，这应该是一次十分惬意的旅行。然而，不，这次旅行简直象逃难，因为无数的家庭都把张勋的辫子兵看得象瘟疫一样地可怕，都想尽快地离开北京，所以，从塘沽至烟台的轮船非常拥挤。军学司长的家眷，竟然只能坐在闷热的货舱里，与许许多多逃离北京的人们拥挤在一块儿，度过了几十个小时的窒息、炎热、黑暗的海上生活。

等到轮船终于抵达烟台港时，冰心赶紧走出货舱。迎面立刻吹来了徐徐的海风，大海，又一次在这位海的女儿面前，展现出自己神奇而又美丽的容颜。冰心望着她久违了的大海（她已经离开这里五年了啊！），深深地呼吸着拂面的海风吹送过来的大海特有的气息，感到无比的馨香和亲切，仿佛在货舱里忍受了几十个小时的炎热、窒息的气息，都被这清凉的海风吹得无影无踪了；货舱旅行带来的郁闷和失望，也被这蔚蓝色的海水洗涤尽了！她面对着自童年时代就无比熟悉的大海，内心里轻轻地向它诉说着：大海啊，你的女儿又返回到你的身边来了。

谢葆璋的老朋友、现任的烟台海军学校校长曾恭甫，正在码头上等待着他们一家，并把他们母子五人，安置在从前他们住过的房子的西半边。

冰心又住进了她童年时代住过的房子，她又可以象她儿

时那样，随时凭窗眺望大海的丰姿，或者到海边的沙滩上去玩耍，去散步了。所不同的只是，过去的她，还是一个小姑娘，而现在，已经是一位十七岁的大姑娘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年龄的长大，她觉得，面对着的自童年时代就很熟悉的大海，还有沙滩，山峦，灯塔，等等，似乎与过去的它们相同，却又似乎与过去的它们有了一点儿不同。因此，在她的十七岁的心田里，就引起了许多的感触：

> 原是儿时的海，但再来时却又不同。倾斜的土道，缓缓的走了下去，—— 下了几天的大雨，溪水已涨抵桥板下了。再下去，沙上软得很，拣块石头坐下，伸手轻轻的拍着海水……儿时的朋友啊，又和你相见了！
>
> 一切都无改：灯塔还是远立着，海波还是粘天的进退着，坡上的花生园子，还是有人在耕种着。—— 只是我改了，膝上放着书，手里拿着笔，对着从前绝不起问题的四围的环境思索了。
>
> 居然低头写了几个字，又停止了，看了看海，坐的太近了，凝神的时候，似乎海波要将我飘起来。
>
> 年光真是一件奇怪的东西！一次来心境已变了，再往后如何？也许是海借此要拒绝我这失了童心的人，不让我再来了。”①

冰心非常愿意在她热爱的大海边多住些时日。但是，暑假就快结束了；而且，张勋复辟的丑剧只演了十几天，就匆匆地收场了，辫子兵被赶出了北京，象走马灯一样的，北京又恢复了表面上的共和政体。由冯国璋任代理总统，段祺瑞

① 冰心：《往事·八》

任国务总理的北洋军阀政府，执掌了政权。所以，冰心这次只在烟台住了不长的时间，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她就与母亲、弟弟们告别了父亲的老友，告别了过去的老屋，乘船离开烟台，又回到了北京中剪子巷十四号的家中，准备上学去了。

冰心在贝满女中求学的这几年，正是五四运动的思想准备时期。当时，思想界的那些勇敢的领袖人物们，如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鲁迅，等等，都在这几年里，陆续地从国外回到了国内。他们立志要从启蒙青年的思想入手，于是，便开始大量向中国青年介绍外国进步的思想和文化。同时，也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勇猛地向传统的封建教条及僵尸一般的偶像，发出了声讨的檄文。

他们都是当时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和有识之士，用后辈人的眼光看，也可以说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巨人。他们为了改造中国国民的精神状态，都在热诚地向国内引进西方的哲学、法律、政治、经济、道德伦理、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的学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掀起一个类似欧洲文艺复兴或法国启蒙主义那样的运动。

现在的青年读者们也许都知道，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愈来愈多的中国青年学生，开始走出国境线，到外国去求学。据我国赴美留学生在本世纪初创办于美国的《中国留美学生月刊》披露的数字，在五四运动爆发前的 1915 年，在美国的专门学校及大学里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已经超过了一千二百人。当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的无理要求之后，这些留美学生，绝大多数都表现出了巨大的爱国热情，《中国留美

学生月刊》十卷六期发表了以《我们的责任》为题的社论，向留美同学发出了热血奔腾的呼吁："我们应该做对国家最有贡献的事，如果必要的话，甚至牺牲生命。……中国现在需要能干的人才比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更为迫切。因此，我们的责任十分简单——回国去！"几乎与此同时，在本世纪，我国赴日留学生人数也在急剧增长。根据舒新城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一书中的统计，到了1906年，留日的中国学生已经有了一万三千人。这些留日学生中的不少人，回国后都成了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政治思想，在二十世纪初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也极大。陈独秀青年时代在杭州求学时就攻读法文，后来又去日本留学，据说也到过法国。他十分赞扬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学说，甚至法国的文学。胡适说他"深受法国文化影响，又看得懂英文和法文"。[①] 1915年，三十六岁的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了上海。当时，专制独裁的袁世凯还在台上，正一心一意地梦想登基作皇帝，知识分子没有丝毫的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警察有权控制所有政治性的或社会性的结社以及任何的出版物。就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面，刚刚回国的陈独秀，却勇敢地创办了后来成为"五四"时期思想界旗帜的杂志——《新青年》。在《新青年》的创刊号里，陈独秀发表了一篇名为《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的文章，高度赞扬拉斐特提出的人权学说，拉马尔克提出的进化论学说，以及圣西门和傅立叶提出的空想社会主

① 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

义学说。陈独秀对欧洲的许多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和作家都非常赞赏，他主张推倒传统的腐朽艰涩的中国古典文学，建设起完全新型的中国的写实文学来。[①] 他说他自己不但爱卢梭、巴士特，更爱雨果和左拉，不但爱康德、黑格尔，更爱歌德和郝卜特曼，不但爱培根、达尔文，更爱狄更斯和王尔德。他希望中年民族也能产生一批象他们一样伟大的作家。他热诚地表示："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今译作雨果——引者注）左喇（今译作左拉——引者注）桂特（今译作歌德——引者注）郝卜特曼、狄铿士（今译作狄更斯——引者注）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②]

另一位"五四"启蒙运动时期的旗手李大钊，在他1916年夏天从日本返回祖国之后（这一年他二十八岁），就出任了《晨钟报》副刊的编辑，在他发表于1916年8月《晨钟报》创刊号上的《"晨钟"之使命》一文里，他也表示了自己的与陈独秀相近的看法。李大钊认为：法国之所以能够发生1789年的推翻帝制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是因为法兰西民族产生了象孟德斯鸠和卢骚这样的思想家。基于同样的观点，他同时认为：代表德意志民族的灵魂的，不是象俾士麦那样的政客，

① 陈独秀的原话是："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见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②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而是象海涅这样的诗人。因此，他极力主张改造我国的旧文明，旧文化，旧文艺。他希望我国也产生出象孟德斯鸠或卢梭这样的思想家来。李大钊说："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他还充满了热诚地表示："记者不敏，未擅海涅诸子之文才，窃慕青年德意志之运动，海内青年，其有闻风兴起者乎？甚愿执鞭以从之矣。"

1917年1月，杰出的开明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以欧美的大学为蓝本，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这所昔日充满了纨裤子弟恶习的半衙门状态的高等学府，变成了一座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可以坦诚地阐述自己的新鲜见解，又可以互相交流思想的，充满生气与活力的论坛。蔡元培实行兼容并包的办校方针，在他选聘教授的时候，绝不受党派与政治立场的左右，只要是学有专长又能够言之成理的人，都可以在北京大学任教。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抱有各种不同的信仰又都学有专长的教授，都被蔡元培请上了北大的讲坛。他任命陈独秀为北大文学院长，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等，这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们，都先后参加了北大的教授团。当时，最富有生气和最具有才干的中年和青年知识分子们，都自然而然地聚集在蔡元培的领导之下。而这些杰出人物的思想和言论，对当时的一代青年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这些人物的倡导之下，一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传统的文学观，提倡写真主义的新文学的文学改革与文

学革命的浪潮，就在“五四”事件发生的前夕，在当时的大学里，蔓延开来了。

几年之后，青年女作家冰心，就用她的写实主义的“问题小说”和她那些清新动人的散文诗，实践了这些巨人们倡导的文学理论，为“五四”以后的新文学，贡献出了令读者喜爱的新作品。

1918年8月，十八岁的冰心，以全班最高的分数，从贝满女中毕业，并按照贝满女中的传统，以第一名的身份，编写了“辞师别友”的歌词，在毕业会上做了“辞师别友”的演说。

毕业班的十八位学生之中，有十四位分别回到了原来的母校（升入贝满女中之前的另外一所教会中学）去教书，而只有冰心与另外的三位同学，从贝满女中升入了协和女子大学预科。——这既符合冰心要当医生的愿望，又得到了她的父母的支持。

正是在这里——协和女大理预科，冰心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活；也是在这里，冰心迎来了震撼全国、也震动了整个世界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影响和改变了她一生的生活道路。

第三章 “五 四”

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把我“震”上了写作道路。

—— 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了。

从政治历史的角度说—— 它把中国的近代历史，从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推进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但是，这场运动的意义自然还不止于此，那就是—— 它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同时，也改变了一代知识分子（包括冰心本人）的命运。因为五四运动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启蒙主义思潮的开端，启蒙主义要求人们从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中挣扎和觉醒起来，反对专制和愚昧，争取过一种平等和自由的生活。具有文化修养，和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潮影响的一代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就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这样的责任。

关于五四运动的历史真象，只要我们查找翻阅 1917 年至 1921 年前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刊物和报纸，就会使我们这些无幸参加这一伟大历史变革运动的后人，对于当时

那一代思想界的巨人们奋笔疾书，大声呼吁出来的，震聋发聩的，各种社会的，政治的，道德伦理的、文学艺术的以及其他方面的种种主张，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五四运动以后，直到现在，这中间虽然经过了六十多年的时间，而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许多学者，包括中国的学者，也包括外国的学者，却一直不断地有人在研究五四运动及其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意义，或研究它对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影响。这些学者中间，有的是亲身参加过五四运动的所谓“五四”时代的青年，也有的是年纪略轻，没有来得及亲自参加五四运动的后来人。他们在各自的著作中，所阐述的对于五四运动的认识和观点，可能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他们的看法却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他们都异口同声地承认：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

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古老中国，一直保持着小农经济，这样的经济状态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而不曾变动，这就使中国长期呈现出一种死气沉沉的、停滞的、静止的状态。也正是这种经济制度，才使封建主义的专制政治制度延续下来。在封建专制制度统治下的思想界和学术界，也必然就是一潭死水。在封建统治者的眼里，除了孔丘的学说之外，其他的一切学说都是异端邪说，都是不能允许存在的。

到了近代，鸦片战争以后，欧洲资本主义的工业经济和科学技术，渐渐地侵入了中国，种种不平等的条约陆续地强加在了中国人民的头上。中国人民一方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同时也深深地感到了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腐败。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不对国家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伦

理道德进行重大的改革，中国就不会有能力抗衡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中国的思想界，也必须改变一潭死水的状况。这正如在五四运动发生后不久，李大钊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农业经济挡不住国外的工业经济的压迫，中国的家庭产业挡不住国外的工厂产业的压迫，中国的手工产业挡不住国外的机械产业的压迫。"

鸦片战争可以说是揭开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同时也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序幕。爆发于1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可以算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的第一个革命高潮。它是以反对腐败的清朝统治和地主阶级的压迫为号召，而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领袖洪秀全，向中国的农民群众介绍了流传于西方的基督教原始教义，把西方基督教原始教义中有关平等和博爱的思想，与中国农民的朴素的对民主和自由的要求结合了起来，在我国的土地上，宣传了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革命主张。

1898年，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企图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面貌，来改革中国的封建政治制度，以他们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了变法维新运动。他们提出了要求摆脱外国侵略，实现民族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改变君主专政制度，走资产阶级君主立宪道路的主张。他们还组织学会，创办报纸，宣传变法维新，介绍西方的文化，展开了新学与旧学之争，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严复，一位留学英国的知识分子，我国近代史上最早的翻译家之一，冰心祖父谢子修老先生的朋友兼同乡，在上世

纪末和本世纪初，就将英国科学家赫胥黎在《天演论》中阐述的进化论思想，及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里阐述的有关民主与法治的思想，第一次从西方引进到中国。同时，他还向中国的知识界介绍了欧洲文学名著。

本世纪初，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学习了法国和美国进行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经验，第一次提出了要在老大封建帝国的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主张。他组织了同盟会，他的同志们在全国各地创办了许多报刊，积极地鼓吹革命，宣传民族、民权、民生这样的三民主义。他们一方面揭露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一方面又与改良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许多革命党人积极活动，联络会党，争取新军，发动了多次的武装起义。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为了反对封建专制，建立民主与法制，奋不顾身地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他们的带领之下，终于在 1911 年爆发了辛亥革命。

然而，辛亥革命只是从表面上结束了帝制。封建主义的思想，还牢固地控制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头脑。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事件，都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不久发生的，它们十分形象地证明了 :要清除人们头脑中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比推倒封建主义的专制制度还要困难。而且，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两位著名人物康有为和严复，他们曾经大量地向中国知识分子传播过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学说，给了腐朽的封建制度以巨大的冲击，不愧被称为十九世纪末期的先进的中国人。但是，由于种种历史的与个人的原因，他们又与封建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非常浓厚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以至于到了五四运动前后，竟然又狂热地鼓吹起尊孔和

崇儒来，堕落成为典型的保皇派和复辟派。这一切，都说明了：要想彻底地摧垮封建主义，把一个腐朽的、落后的、贫穷的、人和人之间不平等的旧中国，变成一个民主的、科学的、独立的、富强的新中国，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历史进程。

五四运动时期的有识之士，都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们才从启蒙思想入手，发动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不过，具体地说，发生“五四”事件的近因，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上对山东问题的处理，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感到极度的失望和愤怒。最先把这种愤怒化为行动的，是北京的学生。

五四运动前夕，北京学生的思想，就非常活跃了。在先进的教授们的努力之下，大学生们开始接触了西方先进的思潮，过去闻所未闻的一些名字，如卢梭、孟德斯鸠、海涅、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列夫·托尔斯泰、易卜生、莫泊桑、萧伯纳、狄更斯，等等，强烈地吸引着他们，这些人物的新鲜的、别具一格的思想和见解，都使刚刚冲破了八股文罗网的中国青年们着迷。

除去外国人的著作以外，中国历史上一些爱国的、立志于改革的志士仁人的著作，如康有为的《大同书》，谭嗣同的《仁学》，以及记载外族侵略者屠杀汉人的《扬州十日记》等，以及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也在大学生们中间，普遍地流传着。

对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及腐朽的政府早就不满的大学生们，内心里一直充满着改革的激情。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

的惨败，直接地刺激了他们爱国的热情。于是，他们立刻就积极地行动起来了。

从5月1日至3日，他们热烈地讨论了三天，目的是想要找到一种合适的方法，来痛快淋漓地表达一下他们对腐败的中国政府及外国列强的不满，最后，他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立即召集北京所有的大学生，举行一次示威大游行。

5月3日晚上，由北京大学发起，在沙滩附近北河沿的北大法科，召开了北京大专学生代表的临时紧急会议。到会的竟有一千多人。会上决定，在第二天，也就是5月4日的中午十二时半，举行群众大会，游行示威，抗议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时选派代表到除日本以外的各国公使馆，陈述对青岛问题的态度。会议的气氛极为热烈，北大法律系的一个学生，当场撕下来一块衣襟，用手咬破中指，写下了“还我青岛”四个鲜红的大字。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学生，痛哭流涕地表示：如果不举行示威游行，他就当场自杀。

5月4日，是星期日。这一天的上午十点钟，十三所大专学校的学生代表又在法政专门学校开会，陆军学校也派了学生代表列席。这个会议开了一个半小时，通过了五项决定：⑴ 通电国内外各团体，呼吁他们抗议巴黎和会的山东决议案；⑵ 设法唤醒全国各地国民；⑶ 准备5月7日（这一天是国耻纪念日，是四年前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后最后通牒的日子）在各地召开国民大会；⑷ 联合北京所有的学生，组织一个永久的机构，负责学生活动以及与其他社团联络关系；⑸ 决定本日下午游行示威的路线，由天安门出发，经过东交民巷入崇文门大街等地。下午一时半

左右，天安门广场已经聚集了三千多名学生，他们分别来自十三所大专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和汇文大学两校的学生来得最早，接着是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警官学校、铁路管理学校、税务学校、中国大学、民国大学、朝阳大学等校的学生。北京大学的学生到得最晚。因为上午十一时左右，忽然有几个政府的军警长官及教育部的一个职员驾临北大，劝告学生不要参加游行，为此双方展开了辩论，致使北大的学生队伍最晚到达天安门广场。

下午两点钟左右，学生队伍开始从天安门广场出发，向东交民巷各国公使馆前进。在队伍的最前面走着的是两位山东大汉，他们举着两面当时的五色大国旗。在他们后面，又有人举着一幅赠给三个卖国贼的輓联，这条輓联上写着：

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这里是以曹操和章惇的姓来指喻曹汝霖和章宗祥。参加游行的学生都举着用白布或用白纸做成的小旗子，上面用中文、英文和法文写着“打倒卖国贼”、“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款”、“拒绝签字巴黎和约”、“抵制日货”、“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反对强权政治”等标语。

也有的小旗上，画着讽刺漫画。

学生们一边举着小旗呼喊着口号，一边向围观的群众递

送他们事先印好的传单。这传单名为《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上面印有恳切而又激昂慷慨的文字：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上要求併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游行，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

今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大学生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有秩序地走着。围观的群众静静地站在街上，看着从学生们手中接下来的传单，听着学生们呼喊出来的口号，有的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有些放学回家的小学生们，在路上遇见了这些素不相识的示威游行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就自动地加入了游行的队伍，有的还帮助大哥哥大姐姐散发传单。有些外国人也向大学生们脱帽，喝采，有的还挥动着帽子，向大学生们表示同情和敬意。

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走到了东交民巷西口，要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的时候，警察挡住了去路，声称这个地区享有治外法权，中国人不得擅自入内。中国人不得走入属于中国的一块领土，真是岂有此理！大学生们派出了四名代表，先到美国公使馆去见芮恩施。大学生们想要问问他，巴黎和会将

要承认二十一条这事是否属实，他本人是怎样看法。因为这天正逢星期日，芮恩施到门头沟那边的寺庙旅游去了，不在公使馆。用芮恩施本人在以后回忆五四运动时所讲的话来说，就是：他逃掉了一次严重的考验。离开美国公使馆之后，学生们又派了六名代表先后到英国使馆、法国使馆和意大利使馆，同样是因为正逢星期日，各公使都不在馆内，只由馆员接见了代表，对他们表示同情。

学生们的大队在东交民巷外等候了两个小时左右，使馆区的外国警察坚决不准中国的学生队伍通过东交民巷，开来的中国军队与警察的队伍也已经包围住了东交民巷的入口，强迫学生后退。

这时候，忍无可忍的大学生们愤怒起来了，他们除了要爱自己的祖国之外，别无他求，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本国的军警却用这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同胞，于是他们高呼："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

他们退出了东交民巷，掉头朝北，然后朝东，沿着户部街、东长安街、东单牌楼，一直朝前走。他们一边走，一边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卖国贼陆宗舆！""卖国贼章宗祥！"一边继续散发他们的传单。

下午四点钟左右，学生大队来到了曹汝霖家的大门口，曹家的大门紧闭着，门前是持枪把守的军警。这个曹汝霖是个大滑头，他是东京法学院的留学生，曾经在北大法律系的前身京师大学堂附设的进士馆作过法律助教。后来他从政了，他的一切言行都以沽名钓誉、谋取私利为目的，曾经积极地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因此受到了这个窃国大盗的重用及大力

提拔，当上了袁世凯手下的外交总长，专管袁世凯的对日外交，二十一条的谈判以及以后中日所签的条约，都是由他领导处理的。袁世凯死后，他又拍上了内阁总理段祺瑞的马屁，先当交通银行总理，后任交通总长。他当官有术，虽然北洋军阀政府的总理接二连三地更换，他却一直安稳地坐在交通总长的宝座上，后来还兼任了油水很大的代理财政总长。他参加处理了所有的向日本银行的借款，并利用职权盗窃国库，大大地饱了私囊。据五四运动后不久一位记者确凿的调查，曹汝霖的私产，最起码也在二千万元以上。在巴黎和会期间，他做为一个中国人，竟然代替日本政府向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施加经济压力。而昏庸的北洋军阀政府，竟在五四运动后的第二年，授给了他一枚三级勋章。就是这样的一个卖国贼，在抗日战争期间又为日本军国主义效力。1949 年全国解放前，他逃到了台湾，次年又从台湾到日本，受到了过去与他有过各种往来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照顾。1957 年又移居到美国，成了一个美籍华人。

当时，学生们要求曹汝霖出来，解释他与日本秘密订约的原因。守卫的警察不但不理睬学生们的要求，反而强迫学生后退。

这时候，学生们的愤怒情绪已经达到了极点。他们高声喊叫着："卖国贼！卖国贼！"的口号，许多学生把手里拿着的小白旗扔进曹家的院墙内，有的学生还捡起了石头，向着曹家的院子里抛去。有五个勇敢的学生，跃上曹家的院墙，跳进了曹家的院子里，搬开了堵住大门的石头和木块，把曹家的大门打开。于是，大队的学生就涌了进去。

学生们以为，这时候，曹、章、陆三个亲日分子，一定正在曹家的客厅里开秘密会议，于是就先径直地朝客厅跑去。但是，客厅里却一个人也没有，书房里也一个人都没有。愤怒的学生们气极了，一边激动地高呼："曹汝霖在哪里？""拖出曹汝霖来，揍他一顿！"一边就把客厅和书房里的瓷器当成了发泄怒气的对象，噼里啪啦地摔碎在地上。之后，学生们又跑到曹汝霖两个女儿的卧室，也没有人，就把铁床的柱子和零件拆了下来。然后转到曹汝霖妻子的卧室，曹妻锁住了房门，学生们就用刚刚到手的铁柱子把房门撞开，见曹妻一个人在内，就问她曹汝霖在什么地方，曹妻说他在总统府吃饭未回来。

其实，当学生们来到赵家楼曹宅门外的时候，曹汝霖确实正与章宗祥以及当时的交通部航政司司长丁士源，还有一个日本记者中江丑吉（他是曹汝霖的好友）在家里商量事情。狡猾的曹汝霖一看见学生们丢进院子里的石头，就立刻换上了佣人的服装，打扮成佣人的样子，从窗口跳了出去，从家里的后门逃出，穿过一条小胡同，叫了一辆汽车，急驰到东交民巷，躲进了外国人开的六国饭店里。①

学生们找不着曹汝霖，就把他的卧室里的镜框家具等物打了个粉碎。又把他的抽屉打开，想要搜出一些卖国的秘密文件，但是一无所获。只得翻箱倒柜，把首饰等等抛在地上，用脚踏碎，以泄心头的怒火。

之后，学生们又来到了曹汝霖父亲的房间里，在这里，也

① 冰心：《童年杂忆》

未找到曹汝霖。他们又找到了曹汝霖的儿子，和曹汝霖的一个年轻的小老婆。学生们对曹汝霖的父母、儿子、小妾都未惊动，只是吩咐卫兵们把这四个人通通带走，只把他们房间里的燕窝银耳等物品，摔在地上。

到处都找不到曹汝霖，使得学生们无法排解心中的怒火，就捣毁家俱，放火烧屋。这时候，有的学生忽然发现，有三个人躲在地下室的锅炉房里，这三个人就是章宗祥、丁士源和中江丑吉。学生们冲进去，误认为章宗祥就是曹汝霖，于是立刻把章打倒在地，章躺在地上装死。等学生们走了之后，中江丑吉才把章扶起来，两人逃到了曹宅附近的一家卖油盐的小铺子里。不久，章又被学生们认了出来，把他拖到小铺子的大门口，问他到底是谁，他不肯说出自己的姓名，学生们便把他打得失去了知觉，又抓起店里出售的松花蛋，把它们抛掷在章宗祥的身上。

当这场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席卷着中国知识界的时候，冰心已经长成为一位十九岁的年轻姑娘。在此之前，她绝对不曾想到：这场运动会改变她的生活道路，把她推上文坛，使她成为中外知名的女作家。

她当时正在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读书，是个一心想当医生的大学一年级学生。5月初，大学生们正酝酿着要举行示威游行的时候，她正住在东交民巷东口的德国医院里，陪着她动了手术的二弟，在精神上安慰他，在生活上照顾他。她是事先向学校请了事假的，所以学校里和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她一概不知道。

非常凑巧的是，5月4日那一天的下午，她父母家里雇用的女工，到德国医院给冰心姐弟送东西。这一带，是大学生们游行示威的必经之路。从铁狮子胡同到东单，再从东单至东交民巷东口，这位女工一路上看见了好几百个学生，他们的手上举着纸旗，嘴里喊着口号，向沿街围观的群众递送传单。马路两旁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这位女工费了很大的力气，才从人群中挤到医院。她一走进冰心姐弟的房间，就把路上所见的新闻，如此这般地告诉了冰心姐弟。

这是冰心在5月4日的当天，第一次听到关于这个运动的新闻，她觉得非常新鲜。但是因为这位女工，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学生运动并不了解，所以冰心听了之后，并没有弄明白这个运动的真实情况。女工刚走，黄昏时候，就有一位探视的亲戚，又走进了冰心姐弟的房间。这位是个知识分子，对巴黎和会，二十一条，曹、陆、章三个卖国贼，以及学生运动等等，都很清楚，就把当天所发生的事情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描述给冰心姐弟听。

当冰心得知详细情况后，感到十分兴奋。她想起了自己在贝满女中读书时，到中山公园社稷坛参加反日讨袁爱国集会的情景，想起了童年时代在烟台的大海边，父亲向她讲述过的他青年时代参加甲午海战的经历，以及他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沿海港口的悲愤，使得她对今天的卖国贼—— 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感到无限的轻蔑与愤慨。

这时候，她虽然身在清洁宁静的病房里，心却随着新来的信息，飞向了屋外那广阔的世界。她望着外面的夜色，兴奋得睡不着觉。父亲自幼灌输给她的爱国思想的种子，在她

的心底里萌动。她多么想仍象在中学时代那样，和同学们一起，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去啊！她的心怦怦地跳着，一夜不曾合眼。第二天一早，她就劝说好了二弟，一起出了医院，回家去了。

这样声势浩大的运动，当然对冰心就读的学校——协和女大，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当冰心陪着二弟返回家中，安排就绪，然后再到学校一看，情形已经与过去大不相同了。

协和女大本来是所教会学校，一向与政治运动相距甚远。过去对于什么社会问题，政治形势，思想潮流，等等，一向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然而到了五四运动的时候，教会学校的院墙，似乎再也无法抵挡得住汹涌澎湃的时代潮流了。爱国思想的浪潮，终于也冲进了协和女大的校门。本来象修道院一样的校园，也变成了集会活动的场所。在时代浪潮的推动之下，她们的爱国热情也被激发起来了。她们象北京的其他大学生们一样，也痛恨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和无能，痛恨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她们密切地注视着时局的发展，积极地参加了社会活动。

为了镇压学生运动，在5月4日的当天下午，北洋军阀政府总理钱能训，就亲自派出了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兵统领李长泰，让他们自己出马，带领着警察、军队、宪兵，来到了赵家楼胡同。在吴、李当场督战的情况下，那些本来对学生们的行动保持着一种宽厚的中立态度的普通警察和士兵，也忽然改变了态度，开始在赵家楼胡同以及东单附近搜捕爱国学生。被捕学生的双手，被用粗绳子绑缚到身后，稍有不

服，就用枪柄、短棍或拳头打他们，军警们把这些被捕的学生们关押在侦缉队的木栅栏里，有的甚至与刑事罪犯关押在一起。晚上，钱能训又在他的官邸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严厉镇压学生运动、处置被捕学生、封闭北京大学、撤换北大校长蔡元培等决议。

但是，北洋军阀政府的这些倒行逆施，反而从反面推进了五四运动浪潮的进一步高涨。

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召开了学生代表会，成立了“以尽学生天职谋国家之福利为宗旨”的学生联合会。接着，北京的女子大学和女校又联合成立了女学界联合会。一向平静的协和女大也组织了自己的学生会，并且参加了北京女学界联合会。过去对教会学校的校规及生活方式安之若素的女大学生们，现在都一反常态，个个表现出了情绪亢奋，紧张异常的模样。他们一听见学生会里传出来什么最新消息或紧急消息，就都立即放下书本，涌出教室，到学生会里打听消息，或到走廊上，校园里，交换意见。这些女青年们都一反过去的温柔敦厚的女儿态，经常聚集在校园里，慷慨激昂地议论国家大事，有时甚至面红耳赤地争论不休。

冰心当时虽然只是预科一年级的学生，在协和女大的校园里算不上是一个骨干分子，但她却因为擅长作文，被选作了协和女大自治会的“文书”。既然协和女大的学生会参加了北京女学界联合会，是女学界中活跃的一员，自然而然的，冰心也就成了联合会宣传股里的一名成员。去女学界联合会和北京学联参加会议的，都是高年级女生，冰心虽然不出去参加会议，却有许多文字宣传的工作，需要她做。

她们宣传的内容很广泛。比如：为了抵制二十一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就从抵制日货开始。这些年轻的姑娘们，就三五成群地举着写有抵制日货的小旗，向市民和商人发表演说，挨门挨户地走到商店里，劝说店家和顾客不要买卖日货。正是因为这些爱国学生的宣传，才使得愈来愈多的商人们激发起了民族感情和爱国热情。到了6月初，发生了北洋军阀政府大批逮捕学生的事件之后，更多的商人公然地站到了学生运动一边，用罢市和抵制日货的行动，来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行动。

女大学生们还亲手制造出文具、绣花手绢之类的日用品，到街上去出卖，因为这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货。

为了慰问、援救被捕的同学，冰心和她的女同伴们，还到处去募捐，有时跑到长安街上，有时跑到天安门前，拦住来往的过客或人力车，请求大家慷慨解囊，捐些铜子。

当反动政府公然审讯爱国学生的时候，冰心就与她的同学们一起，组织起一大队一大队的人马，堂而皇之地开进法庭去听审。

除去上述这些活动之外，这些年轻的女大学生们，也开始用白话文作武器，写作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文章。想要通过这些文章，来表达自己关心时局、过问国事的一些见解。尤其是作为“文书”和宣传股成员的冰心，更是写得起劲。文章一经写出，就想拿到报刊上去发表。但是，拿到什么地方去呢？说来，事有凑巧：冰心的一位表兄，名叫刘放园的，当时正在北京《晨报》当编辑。他的年龄比冰心大得多，冰心对他，一直以长辈之礼相待，不大敢与他说话。但是，写作

过宣传文字的冰心，这时候为了发表自己的见解，就勇敢地把自己的文章，拿给这位表兄看。小表妹冰心的这个举动，使刘放园先生大为惊奇，读过文章之后，又异常欣喜。这样，女大学生们的宣传文字，就陆陆续续地在《晨报》上发表了。

那时候，各种新思潮，开始涌进中国的大门。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博爱，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随着这些思潮的涌入，各种各样的刊物，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晨报副鐫》，《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觉悟》，《语丝》等等刊物和报纸，先后创办和流传，给中国的文化界带来了新的气息。

刘放园先生不断地把新出版的《新潮》、《新青年》、《改造》等等杂志，拿给冰心，鼓励她多多阅读这些杂志和报纸，看看那些有思想的教授和大学生们，是怎样看待和分析社会问题的，尤其是让她多多阅读大学生们的新作，以便让冰心自己也鼓起勇气，努力写作。

《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是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办刊的主旨非常明确，就是要批判腐朽的封建传统，唤醒一代中国青年，把建设一个民主的、科学的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的身上。他在第一期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就充满热情地发表了自己对青年一代的看法："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

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他并向青年提出了六点希望，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新青年》杂志也是文学革命的发难者。陈独秀从1917年开始张起文学革命的大旗，先后编发了一系列倡导文学改良与文学革命的重要文章，象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与《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陈独秀本人的《文学革命论》，钱玄同的《寄陈独秀》的公开信，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新文学派导演的双簧信事件——《王敬轩君来信》及《复王敬轩书》，等等，都是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鲁迅在“五四”时期的主要著作（包括小说和杂文），绝大多数是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他的《狂人日记》是《新青年》杂志发表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他的卓越的杂文《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以及他的许多随感录，都是彻底反封建的檄文，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的罪恶，也是在《新青年》上发表的。

“五四”时期最响亮的口号“德赛二先生”，最早从《新青年》杂志提出，陈独秀执笔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可以代表这个杂志坚决拥护民主与科学，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坚韧不拔的态度：“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

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新潮》是由一些年轻人在 1918 年的冬天创办的，他们当时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指导他们办刊的，是他们的教授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所以这个刊物在当时，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新青年》与另一本由陈独秀、李大钊合编的刊物——《每周评论》的积极支持者。《新潮》在自己的《发刊旨趣书》中表示：要“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他们反对封建礼教，主张伦理革命，认为封建伦理道德只不过是封建君主为了愚弄民众而制造出来的玩艺儿。他们提倡个性解放，提倡婚姻自由与男女平等，因而在青年男女中拥有广大的读者。在文学方面，他们拥护文学革命的主张，尤其是响应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的口号。周作人本人曾短期出任过《新潮》的主编，所以《新潮》主张，要用“人化的文学”来代替腐朽的士大夫文学。基于这样的看法，他们对欧洲的进步文化非常推崇。办刊的年轻人中不乏创作家和翻译家，所以，他们在刊登新创作的同时，也大量地翻译介绍了欧美的哲学、历史、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学方面的著作。为了更集中地介绍欧美文化，他们甚至专辟一期，出版了《世界名著介绍特号》。

《改造》是 1920 年 9 月由《解放与改造》改组而成的杂志。刚从欧洲回来的梁启超与蒋百里，成了它的编辑和主要

撰稿人。梁启超在《发刊词》中提出了这个刊物的方针，首先是要实行“思想革命”，因为“不良制度”是由“不良思想”维持的，只有实行了思想革命，才能做到“颠覆制度”。其次，他还提出了要确保个性的自由，“确信谋人类之福利当由群性与个性互相助长，务使群性能保持平等，务使个性能确得自由，务使群性与个性之交融能启发向上”。第三，他反对“思想统一”，主张对于世界上有力的学说，都采取“无限制输入主义”，允许国人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个主张，是与他的第一点主张互为补充的。但同时，他又反对“浅薄笼统的文化输入”，而提倡“忠实深刻的研究”。第四，与他本人的有些观点互相矛盾的是，他一方面主张颠覆制度，主张无限制的输入主义，一方面又同时主张整顿和发扬中国的固有文明。这个刊物既介绍过列宁的著作和十月革命后苏联颁布的一些法律条文，又介绍过德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既介绍过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又介绍过罗泰等欧美哲学家的学说。尤其是因为梁启超本人并不只是一位单纯的学者，所以，《改造》还出版了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特辑，如《废兵问题研究》、《自治问题研究》、《联邦研究》、《社会主义研究》、《教育问题研究》、《军事问题研究》、《制定省宪问题》，等等。

冰心自己说过：“放园表兄觉得我还能写，便不断的寄《新潮》、《新青年》、《改造》等，十几种新出的杂志给我看。这时我看课外书的兴味，又突然浓厚起来。我从书报上，知

道了杜威和罗素，也知道了托尔斯泰和泰戈尔。”[1]

冰心是一位很有福气的女孩子，在她刚刚提笔写作的时候，就得到了一个又是亲戚又是内行的刘放园先生的鼓励和帮助。不仅如此，她同时还得到了自己的双亲的支持和帮助。后来，当冰心写作问题小说与散文诗的时候，她的父亲和母亲，总是一边阅读着女儿的手稿，一边帮助女儿斟酌词句，有时还向女儿提供小说中的人物对话。1932 年的春天，冰心在香山的双清别墅，为北新书局整理自己全集的文稿，面对着眼前烂漫的春光和盛开的桃花，她怀着深厚的感情，追忆过母亲读她文稿时的情景：

> 重温这些旧作，我又是如何的追想当年戴起眼镜，含笑看稿的母亲！我虽然十年来讳莫如深，怕在人前承认，怕人看见我的未发表的稿子。而我每次做完一篇文字，总是先捧到母亲面前。她是我的最忠实最热诚的批评者，常常指出了我文字中许多的牵强与错误。假若这次她也在这里，花香鸟语之中，廊前倚坐，听泉看山，同时守着她唯一爱女的我，低首疾书，整理着十年来的乱稿，不知她要如何的适意，喜欢！[2]

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家庭背景和社会背景下面，过去一心想当一名医生的十九岁的理预科女大学生冰心，开始拿起笔来。

不过，从现在我们看得到的材料中得知，冰心最早发表

---

①② 《冰心全集·自序》

的文章，并不是后来引她走上文坛的“问题小说”，而是一篇记叙文性质的杂感，这篇杂感的名字叫做《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

这件事情的背景是这样：

1919年先6月28日，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迫于国内爱国同胞的压力，终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向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总统提出了全体辞职书。以“五四”游行示威为开头的爱国学生运动，终于以这样的结局告一段落了。因此，学生联合会便宣布学潮停止，可以开始复课了。7月，蔡元培也答应了重新返回北京大学，重任北京大学校长。表面上看来，五四运动是以爱国学生的胜利告终了。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当蔡元培答应回到北大重任校长的消息传出来之后，政府中的反动分子便又重新制造阴谋了。

当时掌握着北洋军阀政府大权的段祺瑞，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封建军阀。他为了对抗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南方革命势力，一直把象蔡元培这样开明的学者，和拥护共和，拥护孙中山，拥护民主与科学的爱国青年学生，当作心腹大患。他操纵的安福系反动政客，一直想要借机打击那些曾经积极地领导和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和教授。7月16晚上，他们举行了一个宴会，想方设法地收买拉拢了几个学生，准备第二天也举行一个由他们操纵的集会，目的就是要打击那些积极参加“五四”活动的学生和教授。安福系早在宴会之前就事先拟定好了各项决议案，他们诬蔑“五四”事件的骨干分子是少数好闹事的、自私自利的、沽名钓誉的人物，胡说正是这少数几个人强迫大批懦弱的学生拥护他们，才发生了“五

四”事件。安福系无耻地强奸民意，假冒一千个学生的名义宣布说，多数学生都反对五四运动，并且反对蔡元培回校。

当天深夜，参加这个宴会的两个学生，就把安福系的阴谋告诉了他们的同学—— 五四运动中的活跃分子。第二天，当安福系的阴谋者正在北京大学的法政大楼开密会时，一百多名支持“五四”运动的学生冲进了会场，把被安福系收买了的五名学生抓了起来，审问了他们，取得了他们承认与安福系勾结的书面口供，然后把他们锁在了北大理科的房子里。后来，这五个学生和他们的同谋，在安福系的策动之下，投诉警察局，直到晚上，才被警察从被锁的房子里解救出来。第二天，那些反对安福系的阴谋活动，冲击了他们密会会场的学生首领，反被警察所逮捕。之后，北洋军阀政府的地方法庭，就判决他们犯了执行非法审判罪。

关于这件事，北京《晨报》（刘放园先生所在的报纸）1919年7月29月第二版上，曾经刊登过这样的一条新闻，标题是：《北大学生竟被捕矣，已有三名被逮，此外尚有八人》：

> 前因安福系欲破坏大学，利用许有益、俞忠奎等在法科大学秘密开会，商议实行破坏之手段。事为该校干事会所闻，群起质问，许等佯为悔过，自具悔过书而退。翌日复受人鼓动，遂恼羞成怒，通电各处并诉诸警厅，皆以被打伤为词，此前数日事也。乃昨早忽有北京大学生鲁士毅、王文彬、朱耀西等三人被法庭拘捕之事，此外尚有孟寿椿等八人亦在票拘之列。

5月4日的怒潮刚刚平息，北洋军阀政府就又导演出了

这样的丑剧，广大学生和知识界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一位著名律师刘崇佑挺身而出，自愿在法庭审判时当场出庭，为爱国学生作正义的辩护。

这场由段祺瑞政府一手导演的，让几名被军阀收买了的走狗充当原告的丑剧，前后只上演了八个小时。

冰心在她所写的这篇文章《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里，记述的就是她在二十一日到审判厅听审的情况，以及她当时的心情和感受。

她一方面如实地记述了这场法庭斗争的始末，另一方面也是用事实向社会呼吁，要求公众主持正义和公道。

残酷而冷峻的现实，刺痛了这位温文尔雅的十九岁的女大学生的心。她在法庭里旁听的时候，“耳中心中目中一片都是激昂悲惨的光景”，使她的身心“充满了感慨抑郁的感情”。直到返回温暖的家中之后，她还不能摆脱这场法庭斗争给她留下的深刻的印象和强烈的震动，一个人坐在廊子上，怔怔地回想。家里雇用的张妈，看到她这样，就问她是怎么回事，她告诉了张妈，没想到这位普普通通的乡下妇女，竟然说出了如此明智的话语：“学生打吵，也是常事。为什么不归先生判断，却去惊动法庭呢！”冰心直觉得这位劳动妇女的智慧和品德，实在比那些制造事端的反动政客要高明得多。但是公道和人心，有时却要受到强权的压制。冰心想到这里，觉得郁闷而又悲愤。直到她写下了这一切，才算是吐露出了郁积的感想和不满。

除去写作之外，冰心还参加了女学界联合会的演剧筹款活动。

有一次，女学界的各个女子大学的演剧队，到青年会里来排演，协和女大上台演出的剧目是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年轻的冰心也兴致勃勃地扮演了一个角色，走上了舞台。

这时候，台下的观众席里，坐着一位姑娘—— 冰心在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读书时的同学、同乡，现在已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学系的大学生，也是女学界的活跃分子的王世瑛，她认出了台上那位小个子的女演员，就是她的老同学谢婉莹。当幕间休息的时候，冰心“独自走到楼上去，坐在黑暗里，凭栏下视，忽然听见后面有轻轻的脚步，一只温暖的手，按着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一个温柔的笑脸，”[①] —— 于是，这对中间有八九年没有通过音讯的老同学，这一次，在五四运动的高潮里，在北京，在女学界联合会的活动里，意外地重逢了。

五四运动的浪潮，文化革新运动的浪潮，终于把冰心卷出了狭小的家庭和学校的门槛，使冰心接触了社会，使这个思想纯洁的女青年，渐渐地看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社会生活里，处处都存在着令人窒息的社会问题。她有一颗正直的心，她不能不把她所看到的，听到的，和她本人的所思，所想，所感，用笔记录下来。于是，这位过去一心想

① 冰心：《我的良友—— 悼王世瑛女士》

作医生的年轻姑娘，就被时代的浪潮推上了写作的道路。

可以说，“五四”改变了冰心的志向，改变了冰心以后的职业，也改变了冰心的生活道路。

第四章 问题小说

我只想把我所看到听到的种种问题，
用小说的形式写了出来。
—— 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五四运动，这个奔腾澎湃的运动，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思潮。正如冰心在三十几年之后回忆的那样：“五四运动的前后，新思潮空前高涨，新出的报刊杂志，象雨后春笋一样，目不暇给。我们都贪婪地争着买，争着借，彼此传阅。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新青年》里鲁迅先生写的小说，象《狂人日记》等篇，尖刻地抨击吃人的礼教，揭露着旧社会的黑暗与悲惨，读了使人同情而震动。”①

正是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思想，把一代敏感的、正直的青年知识分子，卷出了家门和校门，使他们走进了社会。

而当他们走进了社会活动的旋涡，他们就必然会用年轻的头脑，来观察、审视社会的痼疾和问题，并开始思考着、探索着改变社会现状的途径和方法。

① 冰心：《回忆“五四”》，写于 1958 年 4 月 18 日。

十九岁的女大学生冰心，这时已经长成为一个温柔、沉静的大姑娘，她有着小巧玲珑的身材，一张丰满的鹅蛋脸，一双细长的、明亮的丹凤眼里，射出聪慧的、探究的光芒。在年龄相仿的年轻姑娘群里，她的模样儿也许并不格外出众，她格外出众的地方是：生就一颗极为善良、易感的，而又极其正直的心。当她也象她的许许多多的同时代人那样，走出家门和校门，开始观察着社会，观察着人生，并开始思索着、找寻着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和方法的时候，她同时也就拿起了自己的笔，奉献出了她的独具特色的“问题小说”，来提醒人们的注意了。

有多少问题摆在这位女大学生的面前，困惑着她的心，又引动着她的思索，诱发着她的感慨啊：

外国列强的侵略；军阀混战；贫富悬殊；封建制度、封建家庭对青年的压迫和摧残；妇女问题；家庭问题；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等等，等等。真是内忧外患，无所不包。

她的瘦小的身体里，她的软弱的女性的心灵里，承受得了吗？

作为一个女性青年知识分子，一开始，很自然的，她对家庭问题、妇女问题和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就首先表现出了格外的敏感与关注。

有着几千年漫长封建历史的中国家庭，表面模式都很相近，但是内容却千差万别，有的家庭很幸福，而有的家庭很不幸，不幸的家庭又有形形色色造成不幸的原因，正如一位俄国文豪在他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所写的那样“幸福的家

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冰心自幼生长在幸福的家庭里，她十分珍爱自己的家庭。那种思想开明的父亲，加上有教养的母亲，再加上亲密无间的兄弟姐妹结构而成的和谐的小家庭，正是冰心家庭的写照，也是冰心的心目中理想家庭的模式。但是，世界上的家庭并非都是如此理想的。她也耳闻目睹了许多不幸家庭的惨剧。这样的家庭，使她感到痛心，尤其是当这类悲剧发生在知识分子身上，又影响了他（或她）的事业和前途的时候，更使冰心痛心。有的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所以未能发挥自己的特长，报效社会和祖国，除了社会痼疾所制造的障碍之外，家庭不睦倒往往是更为直接的原因。这种现象使冰心很难过，所以她的第一篇“问题小说”，写的就是两个家庭的对照。

在这篇小说里，冰心描绘了两对青年夫妇的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着重刻画了两位作风不同的家庭主妇，带给丈夫和孩子的迥然不同的影响。冰心理想中的家庭主妇是象亚蒨那样的女性青年知识分子，在婚前要接受完美的教育，在婚后则是能体贴丈夫、会教育孩子的贤妻良母。冰心极不喜欢那种娇慵，懒惰，不理家务，没有受过教育的女人。要么睡眼惺忪，拖着鞋子，要么打扮得珠围翠绕，出去打牌，结果弄得夫妻龃龉，经济拮据，孩子也缺乏应有的教育，最后竟把受过良好教育的丈夫逼上了死路。而模范妻子亚蒨的丈夫“三哥”，虽然也对时事有些灰心，但是因为夫妻和谐，家庭美满，居然还能保持住“大英雄当以赤手挽时势”的劲头。

冰心这种对于家庭、女性和婚姻的见解，有她以后所写的小说、散文甚至于诗歌里，还得到了继续的表现；她的这

种见解，与当时的以至于以后的其他女作家的见解相比较，可以说，还是相当平稳的。

新型的夫妻关系究竟应该怎样构成？妇女究竟应该解放到什么程度？——这类问题，直至今日，仍然是人们感到兴趣的问题。也许是，只要世界上存在着男人和女人，这类问题，就会永远受到人们的关注。

冰心在《两个家庭》这篇小说中作出的回答，对于今天的所有女性说来，也许已经使其中的不少人，感到不能满足了；然而，她在“五四”时期提出的答案，在当时，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以后，也许还会引起人们议论的兴致。

这篇题为《两个家庭》的问题小说，连载于1919年9月18日至22日的《晨报》上。这位名叫谢婉莹的女大学生，给自己取了一个十分好听而且好认、好记的笔名——冰心。

关于为什么要取这两个字作笔名，十三年后，她写了如下一段话作解释：“一来是因为冰心两字，笔画简单好写，而且是莹字的含义。二来是我太胆小，怕人家笑话批评；冰心这两个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两字和谢婉莹有什么关系。”[①] 而当小说正式发表的时候，在“冰心”后面，又加上了“女士”二字，从此之后，年轻的女作家冰心，就正式登上了文坛。这一年，她十九岁。

家庭问题一直是年轻的女作家冰心关注的问题。但是，家庭悲剧并不只是限于夫妻之间，它有时也发生在父与子这两代人中间，而当家庭矛盾是以两代人的冲突表现出来的时候，

① 《冰心全集·自序》

家庭问题就与青年问题交织在一起了。冰心有个非常开明而且非常爱她的父亲，在她自己的家庭里，借用一个当代的名词，决不存在着“代沟”。但是，“五四”时代的青年，能够生活在这样家庭里的幸运儿，是很少的，大部分的青年爱国学生，都会受到封建家庭的限制和压迫。

冰心十分同情和理解家庭处境不佳的同时代人，她想代替这些人说几句心里话，所以，她在写完了《两个家庭》之后，又写了一篇名为《斯人独憔悴》的小说，发表在1919年10月7日至11日的《晨报》上。她在这篇小说里，写了两个爱国、进步的青年学生颖铭和颖石兄弟，与他们的专横暴虐的汉奸父亲之间的冲突，这个代表着封建保守势力的父亲太凶狠专制了，颖铭、颖石兄弟只与他交锋了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从热血的青年无可奈何地后退到了封建军阀的顺民，虽然苦闷、“憔悴”，但也无法可想了。这种青年一代向老年一代妥协的悲剧，如果是发生在女儿和父亲之间，结果恐怕就要更惨了。

在冰心的另一篇小说《是谁断送了你》之中，她写了女学生怡萱被父亲的封建偏见活活逼死的故事。怡萱的父亲认为女儿根本不必上学，就是勉强上了学，也是“姑娘家只要会写信，会算账，就足用了。最要紧的千万不要学那些浮嚣的女学生们，高谈‘自由’‘解放’，以致道德堕落，名誉扫地，我眼里实在看不惯这种轻狂样儿！”怡萱是个苦命的孩子，虽然在叔叔的支持下终于上了学，却受到了一个不知姓名的流氓的骚扰，她父母亲看到了这流氓写给她的关于约会的莫须有的信，双亲根本不体贴，不理解，也不信任女儿，竟然

不问青红皂白，就粗暴地阻止女儿求学。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断送了，夭逝了。

象怡萱一样夭逝的女孩子，还有《庄鸿的姐姐》中的未曾出场的女主角，也就是“我”的弟弟的同学庄鸿的姐姐。这篇小说开始的时候，她已经去世了。去世的原因完全是由庄鸿倒叙出来的，一个小学教员的家庭，供不起姐、弟两人都上学，虽然庄鸿的姐姐有着优异的才质，只因是个女孩子，自然要给弟弟让路了，失去了希望，心情抑郁，终日劳碌，没有几年就死了。

冰心对这些有才能，有志气，但是因为家境贫寒不能深造的女孩子，充满了同情，但也没有什么解决问题的办法，她只能通过庄鸿的嘴，无可奈何地喊出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中交票要跌落？教育费为什么要拖欠？女子为什么就不必受教育？”

被封建家庭摧残的青年，除去象颖石颖铭兄弟及怡萱那样被禁锢于家庭牢宠之中的情况以外，绝大多数女青年，倒是更面临着被封建婚姻迫害的命运。这是摆在五四时代女性青年知识分子面前的，最为切身也是最为尖锐的问题。

有多少有理想、有抱负、有聪明才智的年轻姑娘，被封建家庭，用包办婚姻这条绳索，毁灭了前途，甚至毁灭了生命。只要有年轻姑娘的地方，就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冰心生活在一个尊重女儿、爱护女儿的民主化的家庭里，不会遇见这类问题，但是，许多发生在同辈女孩儿身上的类似的悲剧，却使冰心触目惊心。她很同情遭到这种命运袭击的女性，在她写的短篇小说《秋风秋雨愁煞人》里，就写了三个年轻的

女性，她们是同窗好友，都有相似的理想和抱负，但是一个过早地病逝，另一个名叫英云的，本是一个道德、学问都极其卓越的姑娘，志向很远大，性格很清高，接受了“五四”时期的新思潮的影响，很想在青年时代为国为民做一点事情。她又长得极美，有一种超群旷世的风度，所以深得女同学们的喜爱。但是，在她高中毕业的前一年，正当她幻想着要继续深造，好好研究一些高深的学问，以便将来更好地试试身手，为社会服务，并用此正大光明的手段，来赢得人们的敬重的时候，她的见识浅薄的父母，却执意地把她许配给了她的表兄作妻室，因为她的姨父——她未来的公公，是个司令，家里极其阔绰，英云的父母便以为女儿的终身有托，将来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所以根本不征求她本人的意见，就把她许配出去了。不料英云却是一位很有见识的女性，她对那种官僚家庭很看不起，对那种成天用打牌、听戏、赴宴会等等打发光阴的生活方式十分反感，对那种婢媪成群，车马呼拥的气派，一点儿也不羡慕，觉得过这样的日子比囚徒生活还要难受。

尤其是对于那位即将成为她的丈夫的表兄，他身上那种高等游民、纨袴公子的习气，丝毫不求上进的劣根性，更是难以忍耐。然而，面对着两个顽固的封建家庭，一个弱女子又有什么办法可想呢？本来极有理想、极有才干的英云，最终还是顺从了封建家长的安排，她只能写信给她的同窗好友——作品中的第三个女孩子“冰心”，凄惨地告诉她：“我心中满了悲痛，也不能多说什么话。淑平是死了，我也可以算是死了。”

但是最使冰心同情的，恐怕还是那些学有专长却报国无门的青年知识分子们。他们到英美等国去留学，学成后都兴冲冲地回到祖国，想干一番事业。但是，他们发展实业的种种计划，都不约而同地被官僚机构碾成了粉末。上面的总长不停地更换，技术干部如果在人事上没有后台，就会变成宗派倾轧的牺牲品。国家的这种现状，好比一瓢瓢冷水，相继泼洒到他们赤热的心头，使得他们的心逐渐地变为死灰。这种现象引起了冰心的注意和深思，她为此而写出了《去国》这篇小说，发表在 1919 年 11 月 22 日至 26 日的《晨报》上。

小说的主人公英士，是个学习成绩优秀的留美学生，有真才实学。回国以后，想干一番事业："中国已经改成民国了，虽然共和的程度还是幼稚，但是从报纸上看见说袁世凯想做皇帝，失败了一次，宣统复辟，又失败了一次，可见民气是很有希望的。以我这样的少年，目前少年时代大有作为的中国，正合了'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那两句话。我何幸是一个少年，又何幸生在少年的中国。"

但是，社会的现状与他的希望之间存在着太大的距离，他虽然怀抱着科学救国的雄心壮志，但却不愿意奴颜婢膝，不愿意卷入社会上那种污浊的漩涡。他又没有改变现状的能力，最后只有"去国"这一条道路可走，又回到美国去了。当他下了这个决心的时候，痛苦地说到："可怜啊！我的初志，决不是如此的，祖国啊！不是我英士弃绝了你，乃是你弃绝了我英士啊！"

这些充满了理想，奋发有为的一代青年人，他们正值青春勃发的美好时刻，展现在他们眼前的社会现实，却是充满

了问题的，纷繁复杂的人生，这里有的是新与旧的冲突，革新与保守的矛盾，民主与封建的斗争。

那么，应该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矛盾、冲突和斗争呢？

在短篇小说《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里，那个十九岁的青年主人公凌瑜，就面临着这样一种严肃的抉择。

这是一个被五四运动的新思潮唤醒了的年轻人，他愿意抛弃过去的“独善其身”的志趣，而担当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重任。他鼓起了勇气，满怀着热情，努力地奔走，想要唤起国魂，抵御外侮，拯救苦难的众生，好好地干一番为国为民的事业。

然而，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总是受到反动当局的镇压。国事是一天比一天更糟，外侮是一天比一天更烈。凌瑜既不愿意袖手旁观，又确实是无能为力，这使每一个关心国事的热血青年，都会感到十分的烦闷和苦恼，凌瑜当然也不会例外。

但是，怎么办呢？

凌瑜思前想后，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条摆脱苦闷的道路，也是无可奈何的方法，这就是—— 自杀。

但当他佇立海边，准备跳进蔚蓝的大海的时候，忽然听到了身后响起的娇美的童声—— 有两个美丽的孩子，正在沙滩上玩耍，他们唱着优美动听的歌儿，并送给凌瑜甜蜜的微笑。

这两个孩子的形象，立刻软化了凌瑜的心灵，当他们看到了凌瑜的痛苦的面容时，就用两颗纯洁童贞的心灵来安慰他说：“先生！世界上有的是光明，有的是快乐，请你自己去找吧！不要走那一条黑暗悲惨的道路。”

冰心解决凌瑜生死问题的法宝是“童心”，她把孩子当作天使来膜拜。——童心不仅驱散了凌瑜心中的阴翳，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拯救了出来，童心还使他的内心发生了剧变，升腾起了庄严华美的感情。

但是，难道童心就能解决社会上的问题、矛盾、冲突、斗争吗？

读者可能这样自问，也可能询问开出这一治疗社会痼疾药方的冰心。

然而，冰心对于童心的爱慕和崇拜，不仅表现在这篇小说中，以后还要反复地表现、阐述和咏唱。

走出了家庭，走入了社会的冰心，面对着摆在面前的种种社会问题，开始了沉思和探索，在不断思索的过程中，仿佛就告别了少年时代的那种浑浑噩噩的欢快情绪，而渐渐地成熟了，拥有了聪慧的青年人难以排遣的那种忧郁和苦闷的情绪。

这种忧郁和苦闷，表现了她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正如她在一篇名叫《一个忧郁的青年》的小说中，借用小说中的人物彬君之口所说的那样：“从来我们可以说都是小孩子，无论何事，从幼稚的眼光看去，都不成问题，也都没有问题。从去年以来，我的思想大大的变动了，也可以说是忽然觉悟了。眼前的事事物物，都有了问题，满了问题。”“世界上一切的问题，都是相连的。要解决个人的问题，连带着要研究家庭的各问题，社会的各问题。要解决眼前的问题，连带着要考察过去的事实，要想象将来的状况。——这千千万万如乱丝

的念头，环绕着前后左右，如何能不烦躁？”

作为当时女性青年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之一的冰心，她在自己的小说里，所提出与反映的问题，都是那时的青年男女非常关心、非常切身的问题，特别顺应时代的潮流。因此，这位不满二十岁的女作家的“问题小说”，就在青年读者与知识分子读者群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有的留学生看了她的《去国》，立刻给发表这篇作品的《晨报》，写来了题为《读冰心女士的〈去国〉的感言》的文章[①]，文章倾诉了他的所感，所见，所闻，都如小说中的人物英士一样，有着类似的感慨和苦闷。正因为这篇《去国》提出的问题普遍存在于社会，所以该文作者十分痛切地说道：“对于这篇《去国》，我决不敢当它是一篇小说，我以为它简直是研究人才问题的一个引子。”

她的《斯人独憔悴》，被学生剧团改编成话剧，在北京的舞台上演出。因为许多生活在封建专制家庭之中的青年，都有颖石、颖铭兄弟的感受。

这样热烈的反响，是冰心本人未曾预料到的。她是一个心地纯正的青年，只是为了写出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为她同时代的青年、妇女、知识分子一吐心中的积郁，就得到了同时代人如此强烈的共鸣，这使年轻的冰心很高兴。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纪念《晨报》创刊一周年的特刊上，她的文章《晨报……学生……劳动者》，竟然能够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同时又是鼎鼎大名的名流学者们，如蔡

① 载 1919 年 12 月 4 日《晨报》

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的文章，并列在同一个版面上，因而觉得非常荣幸。

她的小说得到了共鸣、欣赏和赞扬，但也有人发出了疑问，有人说她“何苦多作悲观语，令人读之，觉满纸秋声”。也有人在报刊上写文指责说：“有个朋友在《晨报》上，看见某女士所作的《斯人独憔悴》小说，便对我说只晓得痛恨，是没有益处的，总要大家努力去改良才好。”

对此，冰心专门写了《我做小说，何曾悲观呢？》[①]一文，说明自己创作小说的目的：

> 我做小说的目的，是想要感化社会，所以极力描写那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好叫人看了有所惊觉，方能想去改良，若不说得沉痛悲惨，就难引起阅者的注意，若不能引起阅者的注意，就难激动的悲惨到十倍的呢。

她还针对上面提到的“痛恨”与“努力改良”之说，解释道：

> 这“痛恨”和“努力改良”，便是我做小说所要得的结果了。这样便是借着“消极的文字”，去做那“积极的事业”了。

一旦以“问题小说”步上了文坛，冰心就再也难以收拢自己的步伐。用这位年轻的女作家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写得滑了手，就一直写下去。”[②]“我写东西，写得手滑了，一

① 载 1919 年 11 月 11 日《晨报》

② 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直滑到了使我改变了我理想中的职业。”[①]

之后，冰心把眼光逐渐地放远放宽，从她身边的青年、妇女、家庭、知识分子等问题，逐渐地扩大到了更为广阔的领域。

在此之后不久，冰心又写作了一系列有关兵士生活与反对军阀混战的作品。上面已经说过，冰心童年的时候生活在海边，她对那些与她父亲朝夕相处的海军军官与水兵，是很熟悉的。这些慈爱憨厚的大朋友，与她热爱、眷恋的大海，与她童年时代的幻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如她自己在《我的童年》[②] 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我的游踪所及，是旗台，炮台，海军码头，火药库，龙王庙。我的谈伴是修理枪炮的工人，看守火药库的残废兵士，水手，军官，他们多半是山东人，和蔼而质朴，他们告诉我以许多海上新奇悲壮的故事。”每逢回忆起这些人，冰心的心里，都会涌起一股怀念、敬重的情绪。

做为一个善良的海军军官学校校长的女儿，她对那些背井离乡，渴念亲人，过着飘泊不定生活的下级士兵们，充满了同情，她为他们写出了象《一个兵丁》这样的小说。《一个兵丁》里面的老兵，本是一个纯朴憨厚的农民，他日夜为兵营站岗守门，心中却只是思念远在家乡的儿子，他无法解脱渴念儿子的心情，只能憨憨地与住在兵营附近的孩子小玲亲热，这个小玲与他的儿子胜儿同年，他用与小玲亲热、嬉戏

① 冰心：《回忆“五四”》，写于 1979 年 3 月 2 日。

② 写于 1942 年 3 月 27 日的那篇。

的办法，来填补内心的寂寞和怅惘。

在另外的一篇小说《一个不重要的军人》里，冰心又刻画了一个与《一个兵丁》里面的老兵十分相似的下级士兵福和。他原来也是一个极为朴实、厚道的农民，为了生计当了兵，对待同伴，对待百姓，对待不相识的孩子，都象对待自己的哥哥、嫂嫂、侄儿一样地忠厚。有的兵白吃小摊贩的东西，白坐车子，他都默默地掏出钱来还给摊贩和车夫，有的兵踢打卖花生的孩子，他上来劝解，却被平白无故地狠狠踢几脚。他剩下的零钱，都分文不剩地交给了哥哥、嫂嫂和舅舅。待他因为被踢害了痨病，以至去世以后，“他是一个不重要的军人，没有下半旗，也没有什么别的纪念，只从册上勾去他的名字。”然而冰心通过这个形象，却歌颂了那些朴实、憨厚、善良，心地纯正的劳动人民出身的士兵。

因为冰心十分喜爱象老兵、福和这样的兵士，她就不懂得为什么要把他们驱逐到战场上去互相厮杀。她希望人们之间互相友爱，不明白为什么同胞之间要互相杀戮。在小说《一篇小说的结局》里，她就通过一个士兵的口，倾诉了她本人对为什么要发生战争这件事情的迷惑不解：“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母亲。母亲啊！世界为什么要有战争？我们要爱国，为什么就要战争、就要杀人呢？母亲啊！”

《一篇小说的结局》可以算是一篇反战小说。这是她的一系列的反对军阀混战的作品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篇。但是该篇作品的构思方法与其他几篇略有不同，这次是由作品中的一位人物—— 年轻的女大学生蓼如女士，在构思一篇反战小说，而不是由作家冰心自己来叙述故事。蓼如笔下只有三

个人物—— 一位在前线作战的儿子，一位在家中盼望儿子归来的老母亲，第三个人物是那个儿子的表兄，这位母亲的侄儿，他也正在前线作战。蓧如女士笔下的故事极其简单：老母亲正在家中等待着即将归来的儿子，这是一间极为暖和的房间，母亲已为儿子准备好了又热又香的酒菜，她怀着一颗慈母的爱心，把这些酒菜盖好，静静地等候着儿子，时时摸一摸菜肴是否仍然温热。衣袋里装着的，是儿子半年多前的来信，这封信已经被母亲看烂了，背也背得出来。当门外终于响起了皮靴和腰刀的声音，老太太激动地站起来准备迎接儿子，走进来的，却不是儿子梦涛，而是侄儿希和，—— 原来她盼望已久的亲爱的儿子，已经被战争杀死了。儿子曾在写给母亲的那封信上，向母亲倾诉过这样的烦恼："有两件事，我心中永远不至于模糊的，就是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母亲，母亲啊！世界为什么要有战争？我们要爱国，为什么就要战争就要杀人呢？母亲啊！"当蓧如女士将这篇故事构思成为这种结局时，她自己也不禁十分吃惊了，因为她本想以大团圆的结局结尾，写成母子团聚的乐境的，但是却自然而然地写成了母子生离死别的悲剧，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因为战争的残酷性就是如此。

在小说《鱼儿》里，冰心又通过对那位失去了右臂的老兵的同情，表现了自己对封建军阀混战的反感，当那位老兵告诉小说中的小姑娘—— "我"，在一次海战中，两边都死了不少人，伤了不少人的情况后，"我凝望着他说，'既是两边都受苦，你们为什么还要打仗？'他微微的叹息，过了一会说，'哪里是我们？……是我们两边的舰长下的命令，我们不能不

打，不能不开炮啊！’”这位被战争莫名其妙地夺去了右臂的人，“他自己受了伤了，尝了痛苦了，还要听从那不知所谓的命令，去开炮，也教给后来的人，怎样开炮；要叫敌人受伤，叫敌人受痛苦，死了，沉在海里了！—— 那边呢，也是这样。他们彼此遵守着那不知所谓的命令，做这样的工作！—— ”

冰心对那些为了一己的私利，而制造战争，蛊惑人们互相残杀的封建军阀，充满了憎恨的感情；而对那些在混战之中受到伤害和遭遇痛苦的军人，则是充满了善意的同情。

她在《一个军官的笔记》里，构思了一个巧妙的故事：这个军官和他的亲爱的堂兄在战场上遇见了，各人在自己主子的统领下成了对立的双方，都糊里糊涂地负了伤，成了残废，然后又在医院里碰面了。“为谁牺牲？为谁奋勇？”“哪里是荣誉的军人，分明是军阀的走狗”。

这种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思想，也发展到了对于国际关系的看法上。在小说《国旗》里，她就借着描写两个小孩子（一个中国小孩子—— 是作品里的“我”的小弟弟，一个日本小孩子—— 是作品中的“我”的邻居）之间的纯真的友谊，表现了她的渴望和平的思想，并进而模模糊糊地表现了她的渴望世界大同的思想。这个“小弟弟”曾经有过一个德国小朋友杰蒙，但是他的二哥哥说中德是交战国，不许他和杰蒙玩；现在，这个“小弟弟”又有了一个日本小朋友武男，他的二哥哥又说不许他和武男玩，因为中国孩子要爱国，和日本孩子玩，中国同学要笑话，纯真的小弟弟就发表了一个令人惊奇的见解：“他也爱我们的国，我们也爱他们的国，不是更好么？各人爱各人的国，闹的朋友都好不成！我们索性

都不要国了，大家合拢来做一国，再连上杰蒙……”当“小弟弟”举着中国的国旗，武男举着日本的国旗，两个可爱的小脸上都显现出黯寂可怜的神情时，作品中的“我”感到，正是这一小块用布制造的国旗，隔开了两个小朋友的天真的友谊。“这小小的巾儿，百千万面，帐幕般零零碎碎的隔开了世界上的，天真的，伟大的爱！人类呢，都蒙蔽在这百千万面的旗影里，昏天黑地的，过那无同情，不互助的生活！”“我”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之下，让两个举着不同国旗的孩子，一块儿玩去，这两个旗子，“并在一处，幻成了一种新的和平的旗帜”。二哥哥终于承认了朋友的爱比国家的爱更深，而“我”则追求一种更为博大的境界：“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

冰心反对战争，反对那些发动战乱、制造战乱、利用战乱谋取私利的军阀，但是冰心对于普通的士兵，却总是充满了同情和敬意。她的散文《到青龙桥去》，就弹出了她对军人看法的基调。

她对有些报纸、杂志把军人描绘成兽性的、沉沦的、罪恶他形象，感到非常的悲哀与不平。她不由自主地对写作这类文章的文人产生了不满：“文学家啊！怎么呈现在你们笔底的佩刀荷枪的人，竟尽是这样的疯狂而残忍？平民的血泪流出来了，军人的血泪，却洒向何处？”她认为正是这类的文学家歪曲了军人的形象，是他们“笔尖下抹杀了所有的军人，将混沌的一团黑暗暴虐的群众，铭刻在人们心里。从此严肃的军衣，成了赤血的标帜；忠诚的兵士，成了撒旦的随从。可

怜的军人，从此在人们心目中，没有光明之日了！”“造成人们对于全体的灰色黄色衣服的人，那样无缘故无条件，概括的厌恶，文学家，无论如何，你们不得辞其咎！”

冰心对离乡背井的军人充满了同情，他认为正是好战的军阀，“将这些勇健的血性的青年，从教育的田地上夺出来，关闭在黑暗恶虐的势力范围里，叫他们不住的吸收冷酷残忍的习惯，消灭他友爱怜悯的本能。有事的时候，驱他们到残杀同类的死地上去；无事的时候，叫他穿着破烂的军衣，吃的是黑面，喝的是冷水，三更半夜的起来守更走队，在悲切声中度生活。”

她对这些军人不仅是充满了同情，她对他们可以说是满怀着敬意。她说：每逢看见穿着灰黄色军服的人，就觉得亲切，不仅是亲切，而且还“永远起一种庄肃的思想”。

在《到青龙桥去》中，她就描写了七位凝重，温柔，有教养，守纪律的军人。这些军人的神态、言语和行动，都使冰心深深地敬重和赞美，以至于当她下了火车，登上了万里长城之后，那七位军人的形象，仍然在她的脑际萦绕，竟使她面对着雄伟壮丽的长城，也产生不出她平时最易产生的感慨，而仍然思念着那七位军人的平和而又庄重的语言，严肃而又温柔的神情。

冰心自小生活在舒适温暖的家庭里，但是她对贫困、苦难的劳动人民，倒是充满了善意的同情。

在她写作上面那些作品的同时，她还写出了象《三儿》这样的小说。

这是一篇极为短小的作品，借用现在流行的术语来说，也可称为“小小说”。写了一个名叫三儿的贫苦孩子，无辜丧命的故事。象三儿这样生活在军营附近的孩子，冰心在烟台的大海旁边曾经见到过，他们的境遇与冰心本人的境遇完全不同，然而冰心这个富裕人家的女儿，对他们还是表现出了极为友善的态度。三儿是个以拣拾破纸烂布为生的孩子，一天偶尔走过军营的打靶场，为了拣拾几个打过了的弹壳，多卖几个钱，竟被一个打靶的下级军官当场打死了。三儿的母亲悲痛欲绝地要让军官偿还儿子的命债，冷酷的军官竟以三儿不认识牌子上写的“闲人不得入内”的字眼为理由，反诬是孩子自己闯的祸。冰心这篇小说笔下的下级军官，已与她在其他作品中刻画的军官形象有了明显的不同，这是一个残忍凶暴的家伙，而她笔下的穷苦孩子三儿，倒是一个长着铮铮铁骨的汉子，他在这样小小的年纪，竟然能够忍耐着巨大的伤痛，一面劝慰母亲：“妈妈我们家……家去！”一面自己走回去了。那个军官只用二十块钱就算了结了命债，孝顺的三儿尽着自己最后的力气，睁开了眼，把这用自己的性命换取来的二十元钱交给了母亲：“妈妈给你钱”，就瞌然长逝了。

与三儿命运相似的，是冰心又一篇小说《最后的安息》里的童养媳翠儿，这也是一个生长在城近郊区的农村苦孩子，她的厄运倒不象三儿那样是来自小官僚的迫害，而是来自没有文化的凶恶婆婆的虐待与蹂躏。可怜这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子，竟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她的婆婆和小叔子们的毒打和烫伤，最后竟被打死了。不过冰心对这个翠儿，抱的主要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态度，小说中的另一个富裕人家的女儿惠姑，家境、

性格、为人处世的态度，几乎就是冰心本人的化身，她真诚地同情这个小女伴儿的命运，她劝父亲把翠儿买下来，带到城里去。然而这种同情总带着一点儿高高在上的味道，不象对三儿那样，同情之中，还带着几分赞美，几分敬意。

在这类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的作品中，发表在1920年5月20日至21日《晨报》上的《还乡》，似乎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那就是：它不仅描写了农民生活的疾苦，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的因循守旧。

冰心在福州出生，在芝罘和北京长大，从来也没有到过她的祖籍福建省长乐县乡下。但她在《还乡》这篇小说里，却生平第一次地描写了她的故乡，描写了世世代代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她的族人所过的那种极为痛苦的生活，以及他们那种因循守旧，呆头呆脑，不思变革的生活方式。作品描写了一位读过书，到过外国，被人们称为“洋翰林”，年纪轻轻就当了局长的人物以超，被族人请回老家认本家，拜祠堂，以向邻村显威风的故事。

熟悉谢家历史的人都知道，冰心的父亲谢葆璋，就是一位读过书，出过国的“洋翰林”，谢葆璋的祖父也象作品中以超的祖父一样，是“因为饥荒”，才“逃到城里去的”。在冰心自己的文字里，也曾提到过她的父亲被族人请回故乡一事，可见这篇小说的人物以超，是以她的父亲作模特儿，而这篇小说叙述的故事和情节，是以她父亲返回故乡祭扫祖坟一事作为构思的依据的。因此可以说，这篇小说的产生，来源于谢葆璋口述给女儿的返乡回忆：

我记得在1911年到1912年之间我们在福州的时候，横岭乡有几位父老，来邀我的父亲回去一趟。他们说横岭乡小，总是受人欺侮，如今族里出了一个军官，应该带几个兵勇回去夸耀夸耀。父亲恭敬地说：他可以回去祭祖，但是他没有兵，也不可能带兵去。我还记得父老们送给父亲一个红纸包的见面礼，那是一百个银角子，合起值十个银元。父亲把这一个红纸包退回了，只跟父老们到横岭乡去祭了祖。1920年前后，我在北京《晨报》写过一篇叫做《还乡》的短篇小说，就讲的是这个故事。①

冰心是想借着这个故事，写出我国南方一隅的农村生活的艰辛和困苦："连妇女孩童都是终年忙碌，遇见荒年，竟有绝食的时候。至于医药一切，尤其不方便，生死病苦，听之天命，以超十分的可怜他们，眼泪几乎要落了下来。"同时借着这个故事，写出农民们思想上的落后与保守：当以超劝说这些族人们把辫子剪掉（这已是辛亥革命以后了），他们却答以："割辫子就不好戴笠子了"作遁词，不肯剪；以超劝说这些族人们让自己的子弟们去读书，他们却答以："我们庄稼人，念书是没有用处的，地里的事还忙不过来呢"；以超劝说这些族人们在祠堂前的空地上栽些树木，他们又答以："一位地理先生说过的，栽些树木，便破了风水了"。这些人的生活很苦，生老病死，都听之于天命，但却因循守旧，不思变革。这使对他们的困苦怀着悲愤的同情，而对他们的愚昧又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的以超，十分的矛盾："小村野地，在那月光之下，显得荒凉不堪。

① 冰心：《我的故乡》

以超默默的抱膝坐着，回想还乡后这一切的事情，心中十分懊恼，又觉得好笑。一转念又可怜他们，一时百感交集，忽然又想将他的族人，都搬到城里去，忽然又想自己也搬回这村里来，筹划了半天—— 一会儿又想到国家天下许多的事情。对着这一抔一抔的祖先埋骨的土丘，只觉得心绪潮涌，一直在墓树底下，坐到天明”。

这种令以超又可恨又可怜的思想与生活方式，恐怕不仅仅是存在于中国的农村，即使是在中国的城市，这种愚昧和保守，也仍旧是普遍地存在着。

在开明的父母亲的薰陶和教育下长大，自己又在中学和大学预科学习了自然科学的知识，本人又曾立志当一名医生的冰心，她在群众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仍然处于愚昧的状态，相信迷信、相信占卜的风气还普遍存在于中国的家庭生活之中的时候，却写了一篇歌颂科学、歌颂西医西药、肯定精神因素对于人的生理机能会产生影响的小说《骰子》。

冰心在这篇小说里，借用了一个老太太的病情，从沉重到康复的简单而又简单的故事，说明了相信迷信占卜的坏处；并对那些留着长长的指甲，手上身上都不洁静的中医，提出了含蓄的批评。而对那位懂得科学的规律，懂得治疗生理的疾病，要以治疗精神的郁结一齐下手的西医，表示了赞赏；尤其是对那一个正在接受着新式学校的教育，聪明、懂事的小姑娘雯儿—— 病老太太的孙女儿，利用奶奶的迷信思想巧施小计，为她治愈了心病的小学生，更是表现出了由衷的喜爱之情。

年轻的冰心，在一两年的短短的时间里，写出了为数不少的小说。十余年之后，她在为自己的全集所写的《自序》里，曾经概述过她写作问题小说前前后后的经过："放园表兄觉得我还能写，便不断的寄《新潮》、《新青年》、《改造》等十几种新出的杂志给我看。这时我看课外书的兴味，又突然浓厚起来。我从书报上，知道了杜威和罗素，也知道了托尔斯泰和泰戈尔。这时我才懂得小说里是有哲学的，我的爱小说的心情，又显著的浮现了。我酝酿了些时，写了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很羞怯的交给放园表兄。用冰心为笔名"。"稿子寄去后，我连问他们要不要的勇气都没有！三天之后，居然登出了。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创作，觉得有说不出的高兴，放园表兄又竭力的鼓励我再作。我一口气又作了下去，那时几乎每星期有出品，而且多半是问题小说，如《斯人独憔悴》，《去国》，《庄鸿的姐姐》之类"。"这时做功课，简直是敷衍！下了学，便把书本丢开，一心只想做小说。眼前的问题做完了，搜索枯肠的时候，一切回忆中的事物，都活跃了起来。快乐的童年，大海，荷枪的兵士，供给了我许多的单调的材料。回忆中又渗入了一知半解，肤浅零碎的哲理。第二期（1920—1921）的作品，小说便是《国旗》，《鱼儿》，《一个不重要的兵丁》，等等。散文便是《无限之生的界限》，《问答词》，等等"。①

① 《冰心全集·自序》

第五章 爱的哲学

我的心啊！
你昨天告诉我，
　世界是欢乐的；
今天又告诉我，
　世界是失望的；
明天的言语，
　　又是什么？
教我如何相信你！

——冰心：《繁星·一三二》

1919年的冬天，已经发表了《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秋风秋雨愁煞人》、《去国》等问题小说的十九岁的冰心，在一本杂志上，很偶然地，看到了一个十分新鲜的名字——泰戈尔，同时看到了这个老泰戈尔写出来的，一小段、一小段的，充满了哲理，又十分美妙的诗歌，这是郑振铎翻译的《飞鸟集》（《Stray Birds》）的连载。

在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冰心与她的大弟弟一起，在他们那个舒适温暖的家里，围炉而坐，倾心阅读着这位异国诗

人写作的神奇的诗句。当冰心读着泰戈尔诗中那些关于太阳，月亮，星星，土地，大自然，特别是那些关于上帝，神，生命，死亡和不朽的爱等等富于哲理，而又十分清新美妙的词句的时候，这位十九岁姑娘的那颗敏感、善良的心里，充满了虔诚的感动："泰戈尔！美丽庄严的泰戈尔！当我越过'无限之生'的一条界线—— 生—— 的时候，你也已经越过了这条界线，为人类放了无限的光明了。""只是我竟不知道世界上有你—— "[①]。泰戈尔的诗使她十分的感动，而泰戈尔诗中流露的思想，同样使她觉得与自己的思想十分的合拍："你的极端信仰—— 你的'宇宙和个人的灵中间有一大调和'的信仰，你的存蓄'天然的美感'，发挥'天然的美感'的诗词，都渗入我的脑海中，和我原来的'不能言说'的思想，一缕缕的合成琴弦，奏出缥缈神奇无调无声的音乐"。她觉得自己的思想与泰戈尔的思想"在'梵'中合一了。"[②]

也是在这一年的冬天，冰心在协和女大理预科这所教会学校里，学习了西方的"梵"学—— 《圣经》。她在下一年的秋天所写的一篇散文《画—— 诗》里，就记述了《圣经》给她的印象：她在教授《圣经》课的安女士的房间里，看到了一幅小羊与牧羊人的图画，画面上的景象是："一片危峭的石壁，满附着蓬蓬的枯草，壁上攀援着一个牧人，背着脸，右手拿着竿子，左手却伸下去摩抚岩下的一只小羊，他的指尖刚及到小羊的头上。天空里却盘旋着几只饥鹰。画上的天色，也和那天一样，阴沉—— 黯淡。""牧人的衣袖上，挂着荆棘，

①② 冰心：《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

他是攀崖逾岭的去寻找他的小羊，可怜能小羊！它迷了路，地下是歧途百出，天上有饥鹰紧迫着——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牧人来了！并不责备它，却仍旧爱护它。它又悲痛，又惭悔，又喜欢，只温柔羞怯的，仰着头，挨着牧人手边站着，动也不动。”[①] 这幅画给了她“暗示”、“教训”和“安慰”，而安女士放在膝头的《圣经》，又让她看到了这样的思想：“上帝是我的牧者——使我心里苏醒——”“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手所创造的……”[②]《圣经》课带给她的，是诗情和画意，这种诗情和画意，一直萦绕在她的心头，“从那时到现在永远没有离开我——”[②]。

东方的哲理诗人泰戈尔的诗句，和西方的宗教教徒信奉的《圣经》，都对着她歌唱上帝的爱，神的爱，大自然的爱，人类的爱，不朽的爱；歌唱永生，死亡，幸福，受苦，沉默，等等。那么，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在上面生存的世界到底是欢乐的还是烦闷的？年轻的女作家冰心，常常思考这样的问题。

于是，她在1920年的8月至9月，连续写了三篇思索性的，也可以称之为探讨性的散文，这就是《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无限之生”的界线》和《画——诗》，又在下一年写了一篇同样性质的散文《问答词》。

《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写在冰心读过《飞鸟集》半年多以后，那是因为泰戈尔的诗给她留下了十分隽永的印象。她

① 冰心：《画—诗》

② ② 冰心：《画—诗》

在这篇散文里，向这位印度诗人描写了自己初读他的诗作后的感受："我读完了你的传略和诗文——心中不作别想，只深深的觉得澄澈……凄美。""泰戈尔！谢谢你以快美的诗情，救治我天赋的悲感；谢谢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灵的寂寞。"她要向这位印度诗圣表示她的赞叹和感谢，虽然泰戈尔可能并不知道有一位中国姑娘正在向她敬礼，然而冰心却要向他倾吐自己的心思。

但是最使冰心费神的，还是关于人生意义的思索。——假如每一个人的生命，最终都要匆匆地归结为死亡，那么还要生命干什么呢？既然世上所有的惊才，绝艳，丰功，伟业，一遇见死亡，就立即倒下，化为尘土，即使你是权势显赫的帝王，功名卓著的英雄，一遇到死亡，也就立即屈服在它的权威之下，那么，"这样的人生，有什么趣味？纵然抱着极大的愿力，又有什么用处？又有什么结果？到头也不过是归于虚空，不但我是虚空，万物也是虚空。"[①]

冰心每逢想到这里，就觉得极度的灰心和失望。一个绝顶聪明的人的灰心和失望，有时也会把她（或他）的思想引向虚无。

在冰心1920年9月4日写的散文《"无限之生"的界线》里，一个名叫冰心的女孩子就说了一段十分透彻的话："人生世上，劳碌辛苦的，想为国家，为社会，谋幸福；似乎是极其壮丽宏大的事业了。然而造物者凭高下视，不过如同一个蚂蚁，辛辛苦苦的，替他同伙驮着粟粒一般。几点的小

① 冰心：《"无限之生"的界线》

雨，一阵的微风，就忽然把他渺小之躯，打死，吹飞。他的工程，就算了结。我们人在这大地上，已经是象小蚁微尘一般，何况在这万星团簇，缥缈幽深的太空之内，更是连小蚁微尘都不如了！如此看来，……都不过是昙花泡影，抑制理性，随着他们走去，就完了！”

然而，女作家冰心在让作品中的人物冰心说完了这段话之后，却又立刻借着作品中的另一个女孩子，假拟的已死的宛因之口，用万全的爱的观点，来说服作品中的那一个女孩子冰心：“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我就是万物，万物就是太空：是不可分析，不容分析的。这样—— 人和人中间的爱，人和万物，和太空中间的爱，是昙花么？是泡影么？那些英雄，帝王，杀伐争竞的事业，自然是虚空的了。我们要奔赴到那‘完全结合’的那个事业，难道也是虚空的么？去建设‘完全结合’的事业的人，难道从造物者看来，是如同小蚁微尘么？”“万全的爱，无限的结合，是不分生—— 死—— 人—— 物的，无论什么，都不能抑制摧残他，你去罢，—— 你去奔那‘完全结合’的道路吧！”

从此之后，冰心便一直徘徊在对于人生意义的探索里，她常常陷入欢乐还是烦闷的判断之中，不能自拔。

这种对于人生意义的探索，在一年之后的 1921 年 10 月 1 日所写的散文《问答词》里，又再一次表现了出来。这说明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冰心的心：“我想什么是生命！人生一世只是生老病死，便不生老病死，又怎样？浑浑噩噩，是无味的了，便流芳百世又怎样？百年之后，谁知道你？千年之后，又谁知道你？人类灭绝了，又谁知道你？”

冰心对于人生意义的探索，更多地表现在她的一些小说里。

五四运动的浪潮把冰心从她那个小家庭里，卷了出来，卷入了外面这个更广阔的，但也是十分庞杂的社会。这个大的、错综复杂的、充满了矛盾和问题的社会，与那个她所熟悉、所眷恋、所依傍的亲切温暖的小家庭，完全不同。在生她、养她、爱她的那个小家庭里，人和人之间，总是充满了爱护、关怀、信任，父母之爱，手足之情，使这个家庭总是洋溢着欢乐、温暖、和谐的气氛。但是，当她从这种气氛的包围之中走了出来，踏进了外面那个广阔的，但却是庞杂的社会之后，心地善良的冰心，面对着种种尖锐的矛盾、冲突和不协调，使她常常感到困惑不解，有时甚至忧郁烦闷。她在这两个环境、两种境遇中徘徊，她爱这个小家，也爱那个大社会。但是小家回报给她的，是同样深沉的爱；而社会回报给她的，却是排解不开的矛盾与问题。

她虽然用上面提到过的那些问题小说，反映了社会上存在着的种种问题和痼疾。但是，她一方面把诸如此类的问题摆入了作品，另一方面，她自己的心里，却又产生出了更大的矛盾，那就是：客观的社会现实，与她心中向往的理想生活之间，存在着太大的距离。——她的家庭里充满了温暖，而社会上却到处都有严寒和辛酸。泰戈尔、《圣经》故事，还有她所享有的母爱、父爱、手足之情，等等，都告诉她：世界是爱的；但是，社会上却又充斥着憎恶，甚至杀戮。那么，世界究竟是爱的，还是憎的？人生究竟是欢乐的，还是烦闷的？

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这位温柔娴雅的青年女作家，常常静静地思索这样的问题。当她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就有静坐沉思的习惯，现在，当她倾心思索，想要寻找改造社会痼疾的药方的时候，她的最好的同伴，仍是一根细细的笔杆。她常常徘徊于互相矛盾的思绪之中，自己也找寻不到明确的答案。因此，她作品中的人物，内心也就充满了矛盾。

她在1920年写的那篇小说《一个忧郁的青年》里，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彬君之口，提出了她对社会、对人生的种种疑问："从前我们可以说都是小孩子，无论何事，从幼稚的眼光看去，都不成问题，也都没有问题。从去年以来，我的思想大大的变动了！也可以说是忽然觉悟了。眼前的事事物物，都有了问题，满了问题。……现在是要明白人生的意义，要创造我的人生观，要解决一切的问题。""世界上一切的问题，都是相连的。要解决个人的问题，连带着要研究家庭的各问题，社会的各问题。要解决眼前的问题，连带着要考察过去的事实，要想象将来的状况。——这千千万万，纷如乱丝的念头，环绕着前前后后，如何能不烦躁？"

也正如她在组诗《繁星·一三二》里所写的那样：

我的心啊！
你昨天告诉我，
　世界是欢乐的；
今天又告诉我，
　世界是失望的；

又是什么？
教我如何相信你！

做为一个心地善良的青年女性，她愿意这个世界上总是充满了欢乐；但是做为一个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她又看到了许多令自己失望的事情。这种失望的情绪，是当时那些有理想、肯思考的一代女性青年知识分子共同具有的心绪。在与冰心同时代的女作家的作品里，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思绪的流露，不过因为她们的处境，尤其是性格的差异，而表现形式不同罢了。比如在“五四”时期登上文坛的另一位女作家庐隐的作品里，失望往往是用血泪般的控诉和热烈的呼喊倾泻出来的；而性情温柔恬静的冰心，则在这一时期的作品里，用温婉忧郁的语言，温文尔雅的态度，轻轻地，含蓄地，吐露出了她的失望和不解。正如她在《繁星·八七》中所唱的那样：

知识的海中，
神秘的礁石上，
处处闪烁着怀疑的灯光呢。
感谢你指示我，
生命的舟难行的路！

1921 年年初，“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之后，最活跃的，也是规模最大的文学团体之一—— 文学研究会成立了。许地山和瞿世英，都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他们介绍冰心参加了

文学研究会。

做为一名严肃的作家，冰心愿意用自己的作品，来反映她所熟悉的现实生活，表达她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感受和感慨。而做为一名端庄的女性，她却不愿意走出家门和校门，到社会上去活动，去交际。这种娴雅的作风，这位女作家保持了一生，除了非常必要的活动之外，她是很少走出家门校门的。这真象唐朝诗人王昌龄的那句诗所写的一样："一片冰心在玉壶"。一个始终保持着清高节操的知识分子，一生都能做到这一点，也是很不容易的。

那时候，年轻的一代，正在冲破长期封建思想的桎梏，开始有了正常的交往。而处世谨慎的冰心，却在一篇名为《"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的文章里，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现在已经渐渐的有了男女'团体'和'个人'的交际，但是若没有必要的时候，似乎不必多所接近，因为这种的交际很容易起社会的误会心。"

而她的文学写作实践，也确实正处在欣欣向荣的高潮时期。

她已经用"问题小说"为自己的创作开辟了道路，她又用散文、小说和诗歌，探索着人生的意义，现在，当她成了文学研究会中的一员之后，她仍然一如既往地，孜孜不倦地继续探索着人生与社会的诸问题，以及解决种种问题的方法。

在参加了文学研究会之后不久，这一年的4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2卷第4号上，冰心就又发表了一篇引起强烈反响的小说《超人》。

鲁迅在这篇小说发表十四年之后，在评论中国二十年代

的小说时，曾经这样地讲到当时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在北京这地方，—— 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1920 年至 1922 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①

冰心在《超人》中描写的男主人公何彬，就是生活在这片好似寂寞荒凉的古战场一样的土地上，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的，患有阴郁症的一位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

何彬表面上很"冷"："他住的那一座大楼上，同居的人很多，他却都不理人家，也不和人家在一间食堂里吃饭，偶然出入遇见了，轻易也不招呼"。"他不但是和人没有交际，凡带一点生气的东西，他都不爱；屋里连一朵花，一根草，都没有，冷阴阴的如同山洞一般"。其实，他的这种表现，都是内心痛苦的反映，不过是他的满腹理想，一腔热情，在现实面前遭到碰壁之后，在他的心里引起的巨大失望，扭曲地发泄出来的结果。

他常常痛苦地叨念："世界是虚空的，人生是无意识的。人和人，和宇宙，和万物的聚合，都不过如同演剧一般：上了台是父子母女，亲密的了不得；下了台，搞了假面具，便各自散了。哭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笑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与甚互相牵连，不如互相遗弃；而且尼采说得好，爱和怜悯都是恶。"

但是，他的这种厌世的思想，却因为受到了一个纯朴、天

①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真、可爱的孩子——禄儿的启发和感召，而转变了。

禄儿在病中的呻吟，使何彬忽然想起了许多童年时代的往事——他的慈爱的母亲，家中院里的鲜花，还有天上的繁星，等等。尤其是当何彬本人也病倒了之后，护理他的白衣妇女，使他以为是慈爱的母亲已经来到了自己的身旁，特别是在何彬的帮助之下恢复了健康的禄儿，也到医院里来看望他，给他留下的那一段话："我有一个母亲，她因为爱我的缘故，也很感激先生。先生有母亲么？她一定是爱先生的。这样我的母亲和先生的母亲是好朋友了。所以先生必要收母亲的朋友的儿子的东西。"

禄儿的这一段歌颂母爱的话，深深地震动了何彬的灵魂。这个原来被人认为心肠很冷的人，竟然泪流满面。他不仅接受了禄儿的启示，而且极为诚恳地向这个孩子表示："我再深深的感谢你从天真里指示我的那几句话。小朋友啊！不错的，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

在《超人》中，冰心想用母爱这一个无病不治的药方，来医治象何彬这样的患着忧郁症的青年人。这正如她在《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中，想用童心这一个无病不治的药方，来医治凌瑜这样的患有厌世症的青年人一样。这是她的善良的愿望，她希望象何彬这样的同时代人，能够从苦闷、悲哀、抑郁、幻灭的精神境界中摆脱出来，重新走上热爱生活、热爱社会、热爱人类的道路。

因为当她自己苦闷、彷徨的时候，她也是用"母爱"这一无病不治的法宝，来医治自己的：

母亲啊！
　撇开你的忧愁，
　容我沉酣在你的怀里，
　　只有你是我灵魂的安顿。①

母亲啊！
　天上的风雨来了，
　　鸟儿躲到它的巢里；
心中的风雨来了，
我只躲到你的怀里。②

然而，冰心为何彬、凌瑜这样的青年找来的医治厌世病的药方，是否就是一剂对症下药的药方呢？

童心，母爱，这两个被冰心崇尚得甚至已经带上点儿神化了的情感，是否就是医治一切精神疾病的无往而不胜的法宝呢？

不管是否如此，反正《超人》发表之后，立刻在知识分子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为冰心的《超人》审稿的茅盾，在《小说月报》发表达篇小说时，特地用“冬芬”作笔名，在这篇小说的末尾，加了一个《超人·附注》：“雁冰把这篇小说给我看过，我不禁哭起来了！谁能看了何彬的信不哭？如果有不哭的啊，他不

① 冰心：《繁星·三三》
② 冰心：《繁星·一五九》

是‘超人’，他是不懂得吧！冬芬附注。”[①]

头脑冷静的茅盾，竟然能被这篇小说感动得流泪，可见冰心笔下的何彬，是如何的典型了。他确实地代表了当时一大批具有如此思想感情的青年知识分子。

象何彬这样的一批青年人，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急骤地觉醒，抱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认识，投入了乐观救世、改革社会现状的呐喊洪流之中，不久，就在中国特有的现实生活面前，到处碰壁，一直碰得头破血流，因而又急骤地跌入了悲观厌世，甚至是悲观恨世的深渊之中。其中有些痛苦得不能自拔的青年，就走上了与社会决绝，因而决心自杀的道路。翻开当时的报刊，有关这类青年自杀的报导，时有所见。

冰心通过凌瑜、何彬这样的人物反映的，就是这种时代病。

所以，《超人》才能使茅盾感动得下泪。

茅盾在这篇小说发表了十四年之后，在他所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里，再一次地提到了《超人》：“《超人》发表于1921年，立刻引起了热烈的注意，而且引起了摹仿（刘纲的《冷冰冰的心》，见《小说月报》第13卷3号），并不是偶然的事。因为‘人生究竟是什么’？支配人生的，是‘爱’呢，还是‘憎’？在当时一般青年的心里，正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冰心在《超人》中间的回答是：世界上人‘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她把小说题名为

① 《小说月报》第12卷第4号，1921年4月10日出版。

《超人》，但是主人公的何彬实在并不是‘超人’，冰心她不相信世上有‘超人’。”

在冰心的心中和笔下，大概只有“爱”，才是唯一能够拯救青年灵魂的法宝。题材与《超人》相似的另一篇小说《烦闷》中，那位没有姓名的，以第三人称代表的男主人公“他”，也是一个患了厌世症的青年人。从他童年时代的生活经历看，简直就是冰心本人经历的再现，他“有生以来，十二年荒凉落寞的海隅生活，看着渺茫无际的海天，听着清晨深夜的喇叭”，“使我独学无友，只得和书籍亲近。更可恨我们那个先生，只教授我些文学作品，偏偏我又极好他。终日里对着百问不答神秘的‘自然’，替古人感怀忧世”。“他”虽然是个男性，但他表现出来的忧郁和烦闷，恐怕在相当程度上是表现了女性冰心的心境，只不过冰心的抑郁和烦闷，不象“他”的那样强烈，那样极端，那样难以排解罢了。

“他”也象何彬和凌瑜一样，是个患了忧郁症的青年知识分子。

他被一种幻灭的情绪支配着，觉得自己与这个社会实在是格格不入。

他看见一位聪明的同学，就想：“这孩子很聪明，只是总不肯用一用思想——其实用思想又有什么用处，只多些烦恼，不如浑化些好。”

他看见两位同学之间，一会儿坏，一会儿好，内心就生出了这样的感慨：“人生只谋的是自己的利益，朋友的爱和仇，也只是以此为转移——世间没有真正的是非，人类没有确定的心性。”

他常常起着无名的烦闷，同学们吃饭去，他偏不吃饭去，还想："到底是吃饭为活着，还是活着为吃饭？一生的大事，就是吃饭么？假如人可以不吃饭，岂不可以少生许多的是非，少犯许多的罪恶么？"

他在烦闷已极的时候，还写了一篇愤世嫉俗的文章，道出了他同时代人的共同的苦闷。这篇文中之文的题目叫做《青年人的危机》，"他"在其中这样地写道：

> 青年人一步一步的走进社会，他逐渐的看破"社会之谜"。使他平日对于社会的钦慕敬礼，渐渐的云消雾灭，渐渐的看不起人。
>
> 社会上的一切现象，原是只可远观的。青年人当初太看得起社会，自己想象的兴味，也太浓厚；到了如今，他只有悲观，只有冷笑。他心烦意乱，似乎要往自杀的道上走。
>
> 原来一切都只是这般如此，说破不值一钱。
>
> 他当初以为好的，以为百蹴不能至的，原来也只是如此。——这时他无有了敬礼的标准，无有了希望的目的；只剩他自己独往独来，孤寂凄凉的在这虚伪痛苦的世界中翻转。
>
> 他由看不起人，渐渐的没了他'爱'的本能，渐渐的和人类绝了来往；视一切友谊，若有若无，可有可无。
>
> 这是极大的危险不是？我要问作青年人环境的社会！

那么，他的这种极端的烦闷，怎样才能得到解脱呢？——冰心为他找寻的方法，仍然是母爱和童心。

他百无聊赖的时候，只能奔回自己温暖的家庭。因为"只有'家'是人生的安慰，人生的快乐"，他"轻轻的推开门，屋里很黑暗，却有暖香扑面。母亲坐在温榻上，对着炉

火，正想什么呢。弟弟头枕在母亲的膝上，脚儿放在一边，已经睡着了。跳荡的火光，映着弟弟雪白的脸儿，和母亲扶在他头上的手，都幻作微红的颜色”。

这一片温馨光明的景象，这充满了“母亲的温柔的爱，和孩子天真极乐的睡眠”的图画，便把他的满腔烦愁立刻驱散出心头，化成为两眶“爱感之泪，聚在眼底”。他完全从烦闷的情绪中解脱出来了，心里竟然喊出了这样的一句话：“人生只要他一辈子是如此！”

可见，母爱和童心，这两个治疗厌世症的法宝，是多么地灵验啊！

然而，“他”，还有《超人》之中的何彬，是否得到了彻底的解脱呢？仿佛并没有。因为，“他”在投入了母亲的怀抱之后，依然是泪流满面；而何彬虽然向禄儿悔过了，却仍然把帽儿戴得低低的，也是泪痕满脸地，不声不响地走掉了。

心地善良的冰心，看到了社会上的种种弊病，也看到了同时代人的痛苦和幻灭，她想用母爱和童心，来医治社会和青年的疾病，使自己的同时代人快乐起来，并使社会朝着健康的方向，逐渐地走向进步。生活在知识分子圈子里面的冰心，没有什么其他的妙法，她便从自己的善良愿望出发，把解决问题的途径，归结为童心和母爱。

这种结论恐怕也是她从自己的生活体验中总结出来的妙法。她有一个快乐的家庭，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

“家”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但烦闷—— 忧愁，
都在此中融化消灭。①

所以，虽然她也有着自己同时代人的烦恼和苦闷，却能从自己的家庭里得到解脱和安慰。在面对社会问题而寻求答案的时候，她就想用医治自己不良心绪的药方，来医治同代青年的心病。

这种对于童心和母爱的膜拜，在《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超人》、《烦闷》和一些诗里，已经强烈地表现了出来，而在《最后的使者》这篇小说里，冰心更把儿童写成了世间一切欢乐与希望的源泉。一个天才的诗人，再不愿把忧愁、烦闷和悲伤带进他的诗作里，他愿为了年轻的一代，而努力歌唱希望和光明。他请求众神之王的神帮助他，给他介绍一位指引他走向光明、快乐的使者。神告诉他："从世界之始，至世界之终，这一端是空虚黑暗，那一端是缥缈混沌。人类的生命，只击箭般从这边飞到那边，来去都不分明。因此悲伤是分内的，快乐是反常的。一个人能有多少日月，悲伤是他的颖悟，何必不使他心胸清明呢？"但是诗人不肯就此离去，他追随着雨的使者，夜的使者，水的使者，花的使者，这些使者只能给他眼泪、感慨、抑郁、悲伤，并不能使他看见欢乐和希望。诗人乞求众神之王给他介绍一位能够劈开黑暗，摧倒忧伤的使者，聪明的众神之王虽然知道"宇宙的神秘，和人类的深思，本不能遮蔽人生的烦闷"，还是给他指点了一位

① 冰心：《繁星·一一四》

“未曾长成，只养育在鸿濛的国土里”的天真的孩子：“天外，翩翩地飞来双翅雪白的婴儿，挟着金斧，前面回翔着，欢唱道：‘诗人啊！我便是希望的使者，现在入世了。诗人啊，跟着我来！’”多少年过去了，似乎只有这个孩子，才能“领着少年人希望着前途，老年人希望着再世；模糊了过去，拒绝了现在，闪烁着将来”。冰心笔下的童心，对人类是多么的珍贵啊！

在冰心的另一篇小说《遗书》里，她更是借着作品中引述的一部著作中的话，直接赞颂了人的童年期：“人间惟襁褓婴儿，初无罪恶。梦中时有笑容，此为人生最乐时期。”

她在组诗《繁星》中，还这样地唱道：

万千的天使，
　要起来歌颂小孩子；
小孩子！
他细小的身躯里，
　含着伟大的灵魂。①

真理，
　在婴儿的沉默中，
　　不在聪明人的辩论里。②

婴儿，

① 冰心：《繁星·三五》
② 冰心：《繁星·四三》

是伟大的诗人，
在不完全的言语中，
吐出最完全的诗句。①

冰心自己有一颗赤子之心，又非常疼爱她的同胞兄弟，还格外地喜欢任何一个小孩子。在冰心善良的心目中，儿童的绯红的笑脸，天真的笑声，甚至于走路的姿态，都象天使一样地可爱。

在短篇小说《爱的实现》里，冰心对于童心的歌颂，更是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作品中的主人公、诗人静伯，在一个有着澄蓝的海水，和起伏不断的远山的避暑胜地，写作以《爱的实现》为题的长文时，给他以创作的灵感和启迪的，不是眼前的美丽的大自然，而是两个有着黑黑的头发，绯红的脸颊，深深的笑窝儿，雪白的臂儿的小孩子。

这是一对姐弟。每天清晨，都要从静伯住处的墙外走过去，傍晚的时候，又会从原路走回来。他们的可爱的形象及欢乐的情绪，竟然成了诗人文思的源泉，以至每天清晨和黄昏，诗人都要侧耳倾听孩子的足音，和他们的活泼的笑声。一天没看到他们，文思就停滞，有时竟然写不下去。这种感情发展到极致，就是一回碰上了阴天，早晨这两个孩子依然象平日一样地走了过去，傍晚因有大雨，却没有按时地返回来，静伯焦急地等待着，他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只好干脆迎着风

① 冰心：《繁星·七四》

雨跑出去，去迎接这两个带给他灵感的孩子。

正当他佇立于沉黑的泥泞之中，头上顶着光亮的闪电，身上淋着密集的雨柱，翘首盼望着他们归来的时候，他听到了身后响起来的快乐的笑声。等到他慢慢地走回自己的住处，进了自己的屋子，却忽然惊喜地发现，这两个前来避雨的孩子，正微笑着酣睡在他书桌对面的摇椅上。他看着这两个孩子的娇憨的睡态，和他们那露在衣服外面的细嫩的肥白的小腿，立即文思如涌，于是笔不停挥地写下去，终于完成了自己的长文《爱的实现》。

在这篇小说里，冰心笔下的孩子，简直已经化成了天使，化成了司文艺的神。

对于童心的膜拜，使得冰心笔下的儿童，总是非常的可爱。即使是那些并未被她神化了的儿童，也都令人十分的爱怜。

象《离家的一年》中的那位小弟弟，虽然也曾为了一点儿小事，与他的小姐姐吵嘴，但是他的软弱、多情、聪明、懂礼貌、老实和爱娇，却使读者非常的喜欢—— 这是一个学习成绩优秀的好学生，也是一个很有人情味儿的乖孩子。

那么，被冰心反复地歌颂，有时甚至加以神化了的童心，是否就能彻底医治象“他”，象何彬、凌瑜这类青年人的厌世症，为他们解答世界之谜，并且解决社会上的一切问题、矛盾和纷争呢？

似乎也未必。

象《离家的一年》里的那位十三岁的小弟弟，还有他的小姐姐，这两个聪明、可爱、纯洁的孩子，这样小小的年纪，

就要忍受寂寞和惆怅。

还有短篇小说《寂寞》里的那个可爱的小男孩小小，他虽然有个幸福的家庭，有位慈爱的母亲，但他同样无法摆脱“寂寞的悲哀”，他那亲爱的小不点儿的堂妹随家南下了，他也只有任这寂寞的心情，“弥漫在他稚弱的心灵里”，他只能伏在枕头上哭泣，而别无其他的办法。

甚至于那位在《最后的使者》中被冰心神化了的“最后的使者”——可爱的童心的化身，似乎也并不能够完全解决诗人的问题，诗人也只能跟着他“向着渺茫无际的尽头走”。

所以，一向把儿童看作天神一样的冰心，在她的散文《问答词》里，竟然说出了这样的一段话：“小孩子似乎很完满，因为他无知无识。然而难道他便永久是无知无识？便永久是无知无识，人生又岂能满足？”

她在组诗《繁星》里，又这样唱道：

不要羡慕小孩子，
他们的知识都在后头呢，
烦闷也已经隐隐的来了。①

冰心是多么愿意在这个世界上，只存在着温存的母爱，和天真的童心啊。她希望所有的人，都象儿童一样地纯洁，母亲一样地善良。如能做到这样，大概就不会再有问题和矛盾，不会再有冲突和斗争，不会再有战争和杀戮了。然而，这只

① 冰心：《繁星·五八》

能是善良的冰心的虚幻的梦想而已，社会从来就不是这样的。冰心一方面希望自己的幻想能够成为现实，另方面却又清醒地看到了这种幻想的难以成为现实。所以，当她在用这种办法说服别人的时候，似乎也正在努力地说服着自己。她的内心，是多么地矛盾啊！

除去母爱和童心之外，冰心在为她的同时代人医治时代病的时候，也把求援的手，伸向了美丽的大自然。

在美丽而神奇的大海旁边度过了童年时代的冰心，极为喜爱大自然，甚至是极为崇拜大自然。她曾经这样地比喻过自己与大自然的关系：

我们都是自然的婴儿，
卧在宇宙的摇篮里。①

冰心认为大自然是灿烂庄严的，而寄居在大自然中的人类，却有许多的烦恼，还人为地造出来了许多的什么贫，富，智，愚，劳，逸，苦，乐，等等。

这种人类社会与美丽的大自然不相和谐的思想，在短篇小说《月光》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

《月光》中的那位青年维因，他觉得社会是充满了悲凄苦痛的，他本人生活在这个人类社会里，既乏味又无聊，他很想把自己与美丽的大自然调和起来。这种思想发展到极端，就

① 冰心：《繁星·十四》

使他想要选择一处极美的风景，在他的内心与大自然高度协调的时候，骤然地结束掉自己的生命。

他说："生的日子和地方，我们自然不能挑选了，死的日子和地方，我们却有权柄处理它。譬如我是极爱'自然'的，如果有一日将我放在自然景物极美的地方，脑中被美感所鼓荡，到了忘我忘自然的境界，那时或者便要打破自己，和自然调和，这手段就是常人所谓的自杀了。"

在这样的思想的指导之下，在一个风景优美的避暑胜地，一个皎洁的月夜，维因独坐在湖边，他望着头上的明月，觉得："月啊！它皎皎的临照着，占据了普天之下望月的人意识的中心点，万古以前是如此，万古以后也是如此。—— 一霎时被云遮了，一霎时圆了，又缺了。无量沙数的世人，为它欢悦，替它烦恼，因它悲叹。—— 它知道世人的赞羡感叹么？它理会得自己的光华照耀么？它自己心中又有什么感想？……然而究竟它心中有什么感想！它自它，世人自世人。因为世人是烦恼混沌的，它是清高拔俗的，赞慕感叹，它又何曾理会得。世人啊，你真痴绝！"他望着面前的湖水，觉得："湖水呢？无量沙数的人，临流照影，对它诉尽悲欢，要它管领兴亡。它虽然温静无言，听着他们的歌哭，然而明镜般的水面，又何曾留下一个影子。悲欢啊，兴亡啊，只是烦恼混沌，这话它听了千万种千万遍了。水涡儿萦转着，只微微的报以一笑。世人啊，你真痴绝！"

面对着这月光，这湖水，还有这山色，这树林，他觉得此时此刻的大自然，已经将自己浸透，他愿意立即打破烦恼混沌的自己，与大自然调和。

于是，他就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湖水之中，自杀了。

在短篇小说《遗书》里，那位在大海旁边养病，最终也死在大海旁边的宛因，在重病之中，也总是欣赏着大自然，歌颂着大自然："好灿烂的月光啊，海面和向月的岸上，都被幽辉染得如同罩上一层银雾一般。山影和林影，却是深黑的，微风吹着树梢，疏叶受光，也闪烁的摇动。月下人影清澈，轻绡的衣裳，意淡至欲无。""晚霞真是好，五彩的锦衾般，覆盖着金海。岛山渐渐的青淡下去，似乎要睡着。"她在临死的时候，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消化在这世界的尘土里"，而自己的精神，也已经"调和在这太空的魂灵"里去了。她追求的，也是人与大自然的调和与统一。

既然伟大的母爱与纯洁的童心，并不能够完全治愈青年们的时代病，难道就要学习维因或宛因，把自己的肉体和灵魂，消灭在美丽的大自然的怀抱之中吗？况且，假使真是这样地做了，人类就能摆脱掉自己的苦恼和烦闷，从而完全解决面临的问题与矛盾吗？

对于这一点，冰心本人似乎也并无太大的把握，所以她才唱出了：

自然啊！
请你容我只问一句话，
　一句郑重的话：
"我不曾错解了你么？"①

① 冰心：《繁星·四四》

花儿低低的对看花的人说：
“少顾念我吧，
我的朋友！
让我自己安静着，
开放着，
你们的爱
是我的烦扰。”①

既然母爱、童心、大自然，都不能完全解除青年人的时代病，那么，烦闷的情绪，大概就是永远难以避免的了。

每当冰心这位年轻的女哲人想到这里的时候，她就用积极的态度来提醒着自己：

智慧的女儿！
向前迎住吧，
“烦闷”来了，
要败坏你永久的工程。②

我的心啊！
警醒着，
不要卷在虚无的漩涡里！③

她在后来所写的另一组诗《春水》里，还这样规劝着年

① 冰心：《繁星·八九》
② 冰心：《繁星·五一》
③ 冰心：《繁星·五三》

轻的朋友：

梦里采撷的天花，
　醒来不见了——
我的朋友，
人生原有些愿望，
只能永久的寄在幻想里！[①]

她在写作《超人》，《烦闷》之前，还曾写过一篇寓言式的小说——《一个奇异的梦》[②]，它借作品中的第一人称的“我”——一个小孩子所做的一个梦——“我”和一个叫做“社会”的似人非人的“他”的对话，来表达作者的思想。表面上看来，立意有些奇特，而实际上，这确是一篇内容极其严肃的小说。冰心是想借着这个似梦非梦的构思，来说明如下的一个道理：社会哺育了年轻的一代，供给了他们种种物质方面的和精神方面的需求，教给了他们什么叫善，什么叫美，给了他们快乐。可是许许多多的青年，并不感觉自己是接受了社会的恩典，反而觉得社会只给了他无限的忧患、痛苦、罪恶，想把自己对社会所欠的债务一笔勾销；不知道在接受了社会的养育之恩以后，便应该返过来也做社会的奴仆，替社会服务。因此，“社会”便化作人形，走来找这个“我”，教导他应该如何摆正自己与社会的关系。

① 冰心：《春水·一三五》
② 载《晨报》1920年8月1日

这个小孩子接受了“社会”的教导，“立誓不做一个忘恩负义的青年”。当他卸去了心理上的重担之后，他本来有病的身体，也就很快地康复了。

但是这篇寓言体的小说，多少带着一些说教的味道，虽然作者本来的用意，是要从积极的方面，给“我”这样的小青年，开出一剂治疗忧郁病的药方。比起开列母爱、童心那类药方的小说来，似乎较少受到读者的感动，也就较少受到读者的注意。

1921 年暑假，冰心从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毕业，她接受了一些人士的劝告，改行入了文本科，还跳了一个年级。五十八年之后，她回忆这段往事，还说：“写作占用了我的大部时间，我的理科的功课就落后了一大截。因为白天出去作宣传，实验室的实验功课又欠了不少，那是无法补上的。在我左顾右盼之顷，在我周围的人们劝说之下，1921 年，在理预科毕业之后，我就改入了文本科，还跳了一班。”[①]“学理科有许多实验要做，比如说生物解剖这一类课程，缺了就很难自己补上。我因为常常上街搞宣传、开会，实验的课就缺了许多，在我对写作的兴趣渐渐浓厚了以后，又得到周围人们的帮助和怂恿，我就同意改行了。理预科毕业后，我就报升文本科，还跳了一班。从那时起，我就断断续续地写作起来，直到现在。”[②]

① 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② 冰心：《回忆“五四”》，写于 1979 年 3 月 2 日。

从升入文本科之后，冰心就放弃了她的想当一名医生的理想，而彻底地、全心全意地转入了她所热爱，也最擅长的文学领域了。

迈入燕京大学文本科之后不久，冰心便把她自己的组诗《繁星》整理了出来，并于1921年9月1日，写出了《繁星·自序》。几个月之后，这一百六十四节清新、隽永的“零碎的思想”，就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关于《繁星》写作的经过，冰心在《繁星·自序》里这样叙述过：

> 1919年的冬夜，和弟弟冰仲围炉读泰戈尔的《迷途之鸟》(Stray Birds)，冰仲和我说：“你不是常说有时思想太零碎了，不容易写成篇段么？其实也可以这样的收集起来。”从那时起，我有时就记下在一个小本子里。
>
> 1920年的夏日，二弟冰叔从书堆里，又翻出这小本子来。他重新看了，又写了“繁星”两个字，在第一页上。
>
> 1921年的秋日，小弟弟冰季说，“姐姐！你这些小故事，也可以印在纸上么？”我就写下末一段，将它发表了。

她在1932年清明节写的《冰心全集·自序》里，也说过：“我写《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说，因看泰戈尔的《飞鸟集》，而仿用他的形式，来收集我零碎的思想（所以《繁星》第一天在《晨报》登出的时候，是在《新文艺》栏内。登出的前一夜，放园从电话内问我，‘这是什么？’我很不好意思的说：‘这是小杂感的一类东西……’）。”

她在 1958 年 3 月 18 日写的《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一文里，也说过：

> 五四运动的时候，我还在大学预科，新文化的高潮中，各种新型的报刊多如雨后春笋，里面不但有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文章论著，也有外国文学的介绍批评，以及用白话写的小说、新诗、散文等。在我们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我们在课外贪婪地阅读这些书报，就是在课内也往往将这些书报压在课本底下，公开的“偷看”，遇有什么自己特别喜欢的句子，就三言两语歪歪斜斜地抄在笔记本的眉批上，这样做惯了，有时把自己一些随时随地的感想和回忆，也都拉杂地三言两语歪歪斜斜地写上去。日子多了，写下来的东西也有相当的数量，虽然大致不过三五行，而这三五行的背后，总有些和你有关的事情，看到这些字，使你想起很亲切很真实的情景，而舍不得丢掉。
>
> 这时我偶然在一本什么杂志上，看到郑振铎译的泰戈尔《飞鸟集》连载，这集里都是很短的充满了诗情画意和哲理的三言两语。我心里一动，我觉得我在笔记本的眉批上的那些三言两语，也可以整理一下，抄了起来。在抄的时候，我挑选那些更有诗意的，更含蓄一些的，放在一起。因为是零碎的思想，就选了其中的一段，以繁星两个字起头的，放在第一部，名之为《繁星集》。

半年多之后，在 1922 年 3 月 5 日至 6 月 14 日之间，冰心又写出了她的第二部组诗《春水》的一百八十二段小诗。

冰心这些零碎的思想，仍然是围绕着她一贯歌咏的主题：母爱、童心、大自然，同时也有关于道德、伦理、自身等等问题的思考与阐述。可以说，是她在问题小说与散文中的思

考的补充。

但是，冰心最初发表的诗作，却不是《繁星》（《繁星》发表于 1922 年 1 月），而是一些单篇的小诗。关于自己的写诗，她在 1932 年写的《冰心全集·自序》里，曾经有过这样的叙述：

> 我立意做诗，还是受了《晨报副刊》记者的鼓励。1921 年 6 月 23 日，我在西山写了一段《可爱的》，寄到《晨副》去，以后是这样的登出了，下边还有记者的一段按语：
>
> 可爱的
> 除了宇宙，
> 最可爱的只有孩子。
> 和他说话不必思索，
> 态度不必矜持。
> 抬起头来说笑，
> 低下头去弄水。
> 任你深思也好，
> 微诟也好；
> 驴背上，
> 山门下，
> 偶一回头望时，
> 总是活泼泼地，
> 笑嘻嘻地。
>
> 这篇小文，很饶诗趣。把他一行行的分写了，放在诗栏里，也没有不可。（分写连写，本来无甚关系，是诗不是诗，须看文字的

内容。）好在我们分栏，只是分个大概，并不限定某栏必当登载怎样怎样一类的文字。杂感栏也曾登过些极饶诗趣的东西，那么，本栏与诗栏，不是今天才打通的。

记者

在大学文本科读书期间，冰心写出了象《送神曲》、《病的诗人》（一）、《病的诗人》（二）、《诗的女神》、《假如我是个作家》、《将来的女神》、《向往（为德诗人歌德九十年纪念作）》、《病的诗人》（二）、《不忘》、《晚祷》（一）、《玫瑰的荫下》、《不日》、《安慰》（一）、《安慰》（二）、《晚祷》（二）、《致词》、《解脱》、《信誓》，等诗。

她在《诗的女神》（写于 1921 年 12 月 9 日）一诗中，描绘了她自己心目中的诗的女神的形象，那是：

看啊
　是这般的：
　　满蕴着温柔，
　　微带着忧愁，
欲语又停留。

她在《假如我是个作家》一诗里，又倾诉了她所希冀的，读者与她这位作家的关系：

假如我是个作家，
我只愿我的作品
人到他人脑中的时候，
平常的，不在意的，没有一句话说；

流水般过去了，
不值得赞扬，
更不屑得评驳；
然而在他的生活中
痛苦，或快乐临到时，
他便模糊的想起
好象这光景曾在谁的文字里描写过，
这时我便要流下快乐之泪了！

假如我是个作家，
我只愿我的作品
被一切友伴和同时有学问的人
　　轻藐—— 讥笑；
然而在孩子，农夫，和愚拙的妇人，
他们听过之后，
　慢慢的低头，
　深深的思索，
我听得见“同情”在他们心中鼓荡；
这时我便要流下快乐之泪了！

于是，她便用一颗普通人的善良的心，来温柔地歌颂母爱（《安慰》（一）、《致词》），歌颂儿童（《纪事—— 赠小弟冰季》），歌颂大海（《安慰》（二）），歌颂星星（《晚祷》（二））。同时，也继续地探求着人生的意义：

月明如水，
树下徘徊——

沉思—— 沉思。
沉思里拾起枯枝，
　慨然的鞭自己
　　地上月中的影子。

“人生”——
世人都当它是一个梦，
　且是一个不分明的梦。
不分明里要它太分明，
我的朋友，
　一生的忧患
　　从今起了！

珍惜她如雪的白衣，
　却仍须渡过
　　这无边的黑海。
我的朋友！
　世界既不舍弃你，
　　何如你舍弃了世界？

让她鹤一般的独立，
　云一般的自由，
　　水一般的清静。
人生纵是一个梦啊，
　也做了一个分明的梦。

沉思—— 沉思，

沉思里抛了枯枝，
悠然的看自己
地上月中的影子。

——《解脱》

冰心的诗作，象她的散文一样，文字清丽，构思别致，意境隽永；尤其是她的《繁星》和《春水》，更是真挚，亲切，富有艺术魅力。这种温柔、细腻，而又微带着忧愁，微含着哲理的诗风，正象冰心的为人和性格一样，令人感到可爱、可亲、可敬，同时又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

所以，有人在熟读了冰心的诗作之后，会说她是一位诗人；而有人在看完了冰心的清新优美的散文之后，又称她是一位散文家；而从冰心以“问题小说”步上文坛看，又称她是一位小说家。

无论是她的诗作、散文或小说，在思想风格与艺术风格两方面，都充分地表现出了冰心“这一个”。那就是：有一种互相矛盾的心理，常常困扰着大学时代的冰心—— 使她在歌颂快乐的时候，也不曾忘记了忧愁；在歌唱幻想的时候，也不曾忘记了失望。这种互相矛盾的心理，逐渐地形成了冰心许多断断续续的思想和观念，于是它们便象深深的流泉一样，从冰心那颗聪慧的头脑里，潺潺地流向她那清秀的笔端。

十分了解冰心的茅盾先生分析得好：

冰心女士把社会现象看得非常单纯，她以为人事纷纭无非是两根线交织而成；这两根线便是“爱”和“憎”。她以为“爱”或

“憎”二者之间必有一者是人生的指针。她这思想，完全是“唯心论”的立场。可是产生了她这样单纯的社会观的，却不是“心”，而是“境”。因为她在家庭生活小范围里看到了“爱”，而在社会生活这大范围里却看见了“憎”。于是就发生了她的社会现象的“二元论”①

① 茅盾：《冰心论》

第六章 留 学

美国不是我的国，沙穰不是我的家。
—— 冰心：《山中杂记》

每一个刚刚获得了大学毕业证书的姑娘，大概都会经历一种心花怒放的心境，何况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女大学毕业生犹如凤毛麟角的时候呢。所以，当 1923 年的初夏，二十三岁的冰心，以优异的学习成绩，从燕京大学本科毕业，并得到了金钥匙—— “斐托斐”名誉学位—— 的奖赏的时候，她的心情是非常快乐的。

尤其令她高兴的是，几乎就在同时，她又得到了燕京女大的姐妹学校—— 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这在她的同时代人中，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所以，她在大学本科毕业之后，立即准备东渡太平洋，到大洋彼岸去继续求学。

离国之前不久，年轻的女作家刚刚开始在《晨报副镌》的《儿童世界》栏里，发表她的《寄小读者》通讯。这一组优美的、独具风格的散文，后来成了冰心最主要的代表作，流传久远，名震遐迩。这是年轻的冰心当时不曾预料到的。她在这一年的 7 月 25 日写的《通讯一》里，郑重地向她的小读者

们宣告："小朋友，我要走到很远的地方去。我十分的喜欢有这次的远行，因为或者可以从旅行中多得些材料，以后的通讯里，能告诉你们些略为新奇的事情。—— 我去的地方，是在地球的那一边。"同时，她也恳请自己的小读者，能够想念着她："我走了—— 要离开父母兄弟，一切亲爱的人。虽然是时期很短，我也已觉得很难过。倘若你们在风晨雨夕，在父亲母亲的膝下怀前，姐妹弟兄的行间队里，快乐甜柔的时光之中，能联想到海外万里有一个热情忠实的朋友，独在恼人凄清的天气中，不能享得这般浓福，则你们一瞥时的天真的怜念，从宇宙之灵中，已遥遥的付与我以极大无量的快乐与慰安！"

冰心虽然从年纪很小的时候起，就经常跟随着母亲南来北往，对旅行并不陌生。但是，过去的几次迁徙，都是与家人厮守在一起。即使是在路途上，也从未离开过母亲和兄弟一步，仍然享受着天伦之乐和手足之情。

然而，这一次，她却要离开慈爱的父亲和母亲，离开与她亲密无间的弟弟们，离开她的第二故乡北京，离开她的祖国，远渡重洋，到一个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十分生疏的异国去了。这对于从未离开过亲人，特别眷恋家庭的冰心说来，确实又是一件十分伤心的事情。

她既舍不得离开父母亲，也舍不得离开弟弟们和亲戚、朋友们。但是为了不惹得母亲、父亲和亲人们难过，多情而又细心的冰心，不得不一直强忍着离别之苦：

我自从去年得有远行的消息以后，我背着母亲，天天数着日

子，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我也渐渐的瘦了。[1]

她的亲爱的妈妈，舍不得女儿远离开她，但是为了女儿的前途着想，又不能不放她走。妈妈是多病的，女儿要远渡重洋，到大洋彼岸的异国去，距她有万里之遥，一想到这里，她就难过得心口痛，常常连连不断地咳嗽。夜里躺在床上，也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但是自己的这种心情，又不愿意让女儿知道，反而要强打起精神来，鼓励女儿说："不要紧的，这是好事！"[2] 还要为女儿操办行装。又怕女儿难过，影响了身体，她亲自细心地安排女儿临行前的衣食睡眠。为了不流露自己惜别的感情，有时就躲着女儿，不与女儿讲话。

她的慈祥的父亲，一方面要鼓励女儿，安慰妻子，一方面也要强忍着惜别的痛苦。这位已过中年的军人，总是努力克制着自己的叹息，慢慢地教导女儿说："我十七岁离家的时候，祖父嘱咐我说：'出外只守着两个字：勤，慎，……'。"[3]

就连三个年龄不大的弟弟，也知道"姐姐走了，我们家里，如同丢了一颗明珠一般"！[3]最小的弟弟，因为学习过地理，知道地球是圆的，就跟姐姐开玩笑说："姐姐，你走了，我们想你的时候，可以拿一条很长的竹竿子，从我们的院子里，直穿到对面你们的院子去，穿成一个孔穴。我们从那孔

①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五》
②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五》
③③ 冰心：《往事 （二） ·九》

穴里，可以彼此看见。我看看你别后是否胖了，或是瘦了。”[①] 他们之间，彼此都不敢流露真情，以免惹得姐姐伤心。在《往事 （二） ·二》里，冰心写下了这样一个动人的片断：

……涵不言语，杰叹了一口气，半晌说：“母亲说……她舍不得你走，你走了她如同……但她又不愿意让你知道……”

几个月来，我们原是彼此心下雪亮，只是手软心酸，不敢揭破这一层纸。然而今夜我听到了这意中的言语，我竟呆了

忽然涵望着杰沉重的说：“母亲吩咐不对莹姐说，你又来多事做什么？”

暂时沉默—— 这时电灯灿然的亮了，明光里照见他们两个的脸都红着。

杰嗫嚅着说：“我想……我想不要紧的……”

涵截住他：“不，我不许你说！”声音更严厉了。

这时杰真急了，觉得过分的受哥哥的呵斥。他也大声的说：“瞒别人，难道要瞒自己的姐姐？”他负固的抵抗着。

我已丧失了裁判的能力，茫然的，无心的吹灭了蜡烛，正要勉强的说一两句话——

涵的声音凄然了，“正是不瞒别人，只瞒自己的姐姐呢！”

这个家庭里，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挚爱的感情，冰心怎能割舍得开呢？

① 冰心：《寄小读者 · 通讯一》

就这样挨到了8月3日[①]，虽然大家都怕这一天到来，但是，出发的日期还是来了。

绷紧的心弦已经到了不能再紧的程度。吃午饭的时候，母亲一看见冰心，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淌了下来。冰心自己呢？——“心中的酸辛，千万倍于蘸饺子的姜醋！”“我叫了一声‘妈妈’，挨坐了下去。我们冰凉颤动的手，紧紧的互握着臂腕，呜咽不成声！”[②]

象十三年前初到北京时那样，冰心又坐到了马车里。不过这次是她独自远行的第一步。她的母亲怕自己和女儿都会过于悲痛，不敢出来送她，送她的都是小孩子——她的弟弟们，舅舅的孩子们，还有这些孩子的小朋友们。她在一群天真可爱的孩子们的簇拥之下，坐上了马车，到了火车站。

当火车就要开动的时候，她的最小的弟弟，舍不得他这唯一的姐姐离他远去，一双童稚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与姐姐默默地道了别。等到火车开动以后，冰心望着渐渐远去了的弟弟的身影，心里想念着刚刚离别了的家中的亲人。为了排遣心中的离愁，她顺手拿起随身带着的一本书《国语文学史》，想借着读书来改变一下自己的思绪。不料，刚翻了几页，就忽然看见一页书的空白地方，竟然写着五个大字：“别忘了小小。”[③]这是她那位最小的弟弟的笔迹。她看到了他的笔迹，

① 冰心在《往事 (二)》文后自注：“每篇末的日月，是那段‘往事’发生的时期和地点；和写作的时地，是不相干的。”根据《往事 (二) ·九》篇末冰心自注的日月，断定冰心离京的日子是1923年8月3日。

② 冰心：《往事 (二) ·九》

③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三》

又想起了刚刚在火车站临别时，她双手捧住的那张小脸，和那一双酸泪盈眸的稚气的眼睛，心里又立刻充满了思念之情。

火车沿着津浦路南下。思念亲人的冰心，躺在卧铺上，睡不着觉。直到抵达山东境内的泰安之后，她才步下车厢，到站台上去走走，眺望远处的泰山。当火车开到临城的时候，她想起了抱犊冈劫车的事情，还幻想着能够见到象武松、林冲、鲁智深这样的梁山泊好汉。这些好汉的生活和作为，在她的幼年时代曾经激起过她奇异的幻想。当然，她不会见到他们，她也没有看见抱犊冈，但是，她却看到了许多山东籍的士兵，又听到了她自小就听惯了也说惯了的山东话。这使她想起了她儿时的居住地——烟台。这个地方，冰心一直把它当作自己灵魂上的故乡。

冰心想用观看车外变换的风景，来排遣自己心中的离愁。可是离愁却时时缠绕着她，不肯离去。

火车经过蚌埠的时候，冰心包用的这间房间里，走进来了一母一女。那女儿已有二十岁左右，长着一脸麻子，却擦脂抹粉，打扮得珠光宝气，忸怩作态地向她母亲撒娇，要汤要水。那位母亲呢，对这样一个女儿，却是充满了爱怜。这一片慈母的心肠，使敏感的冰心想起了自己的母亲，顿时，思念的潮水涌上心头，她不得不走出房间，站在车厢甬道的窗边，悄悄地擦去眼角的泪水。

到上海以后，冰心休息了几天，接待了许多来看望她的亲戚朋友，为《晨报》的《儿童世界》栏写了三篇《寄小读者》通讯，料理了一些杂务。之后，于8月17日的下午，登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约克逊号”邮船。“约克逊号”的

汽笛长鸣，徐徐地驶出黄浦江码头，留学生冰心，真正开始了横渡太平洋的旅程。这个庞大的轮船，载着她，也载着她的浓重的乡愁，还载着一百多名也象冰心一样，到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飘然东去了。

这个在大海旁边度过了童年的孩子，再一次地亲近了大海。她望着脚下波涛滚滚的海水，忆起了烟台濒临的那一大片蓝极绿极的广阔无垠的海面。她常常一个人在舱房里或甲板上，悄然而立，凭栏凝望着。对于童年的回忆，和对于母亲、父亲、弟弟们的思念，陪伴着她。

经过了三天的航行，“约克逊号”于19日的夜晚，抵达了日本国的神户港。当轮船上的许多旅客都上岸观光去之后，冰心独自一个人登上了“约克逊号”邮船的最高点，观赏这异国之夜的风光。她“初次看见这般璀璨的世界，天上微月的光，和星光，岸上的灯光，无声相映。不时的还有一串光明从山上横飞过，想是火车周行”。[①] 她面对着如此美妙的夜景，忽然涌出了极为强烈的思念亲人的情绪，她想：“倘若此时母亲也在这里……”[②] 与她同享这观赏夜景的乐趣，该有多么好啊！她是多么地想念她的亲爱的母亲，慈祥的父亲，和那远在北京的温暖的家庭啊！这思念竟是如此地沉重，以至于想要拿起笔来，给她可爱的小朋友们写通讯的力气，都没有了！

第二天的早晨，她与同船的旅伴们一起上了岸，游览了

①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七》
②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七》

神户的市容。这是冰心第一次踏上日本国的土地。后来，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她又跟随着丈夫吴文藻，并带领着她的孩子们，到日本长住。全国解放以后，她又多次地出访过日本。然而，在她生平第一次地踏上这块异国土地的时候，在冰心的眼里，原来神户竟与中国很相象，它的市容与祖国一些城市的市容差不多，只是街道两旁的店铺，要比中国的店铺矮一些。冰心最注意的还是小孩子，她觉得日本小孩子的衣着，要比中国小孩子的衣着，来得鲜艳些，再衬着他们的那象中国小孩子一样黑的眼睛，一样黑的头发，使冰心觉得，他们个个都很可爱。

这一天的黄昏，轮船继续乘风破浪，从神户向横滨进发。这是一段历来都不平稳的航程。

当“风浪要来了”的信息，在乘客中间传开的时候，身材瘦小的冰心，一点儿也不惊慌，相反地，她却有着“无名的喜悦，暗地里从容的笑着”[①]，因为她是一个海军军官的女儿，自幼就见惯了大海的各种容颜。而当托着盘子的餐厅侍者，身体开始左右摇晃，有的旅客已经支持不住，人们都在对付晕船的时候，冰心却“渐渐的觉得快乐充溢，怡然的笑了”。[③]她觉得自己的身心，与大海离得愈来愈近，仿佛要去接受海的女神的邀请，去赴她的夜宴似的。当同船的人们都已坚持不住，纷纷地逃回自己的舱房之后，冰心的瘦小的身体，却迎着海风，走到了舱外。这时候，甲板上早已空无一人，只有灯光，和栏杆外面的海涛声，伴着她的身影。她微笑着，再

①③ 冰心：《往事 （二） ·五》

一次攀登上轮船的高处，迎着夏夜的海风，掠一掠自己的秀发，然后再走到栏杆旁，把一个救生圈放在甲板上，自己抱膝坐在上面。她放眼望去，周围是连成一片的暗灰色的天空和海水，她看见船尾的栏杆，左右摇晃着，与暗灰色的天边的水平线，反复地、互相重叠着起落，高度只相差五六尺。她抬首望天，在一片暗灰色的苍茫之中，只闪烁着一两颗星星。全船的人都躺下了，只有她一个人坐在船顶之上，想着临行前父亲含笑对她说的那句话："这番横渡太平洋，你若晕船，不配作我的女儿！"她想念着父亲，也想念着母亲，她的被惊涛骇浪激扬起来的思绪渐渐平静了。她高兴地感觉到：自己已经经受住了第一次风浪的考验。她在心里骄傲地对自己宣布：她确实配作父亲的女儿。她觉得海就是一位伟大的母亲，而船，就是母亲给她安置的摇篮。几百个婴儿都在安睡，唯独她，这个清醒的女儿，还在倾听母亲讲给她听的故事。

21日的黄昏，轮船靠近了横滨。冰心倚在轮船的栏杆上，写了几张小纸条，把它们分别地装在几个盛胶片用的锡筒里，封好了口，再把它们投到海水里去。她在纸上写下的，是一个向渔民祝福的吉祥的句子："不论是哪个渔人捡着，都祝你幸运。我以东方人的至诚，祈神祝福你东方水上的渔人！"

待轮船在横滨码头停靠稳当了之后，冰心便再一次地跟随着旅伴们登上了岸，游览了横滨的市容。然后，坐上电车，直达东京。他们先到了中国青年会，之后，又到一个日本饭店去吃了顿中国饭。入乡随俗，冰心和她的同伴们也学着日本人的样子，脱鞋进门，席地而坐，在这家清洁幽雅的木质结构的饭店里，吃了一顿几乎与中国的家常便饭没有什么两

样的日本便饭——米饭，牛肉，干粉，小菜之类。饭后，他们又冒雨乘车，游览了日比谷公园，靖国神社，博物馆，二重桥皇宫等等名胜古迹。不过都是来去匆匆，走马看花。在匆忙之中，细心的冰心也没有忽略了摄影。她本想把这些照片寄回祖国去，给母亲看看。可惜的是，在雨中匆匆抢拍的镜头，模模糊糊，竟然洗不出这些异国情调的风景来。

游览了东京之后，冰心又回到了横滨。23日“约克逊号”邮轮就渐渐地远离了日本的海岸，而进入了更加茫茫无际的大海之中。

在大海之中飘流的冰心，十分想念自己的母亲。她在轮船上，写了三首思念母亲的诗。在8月25日写的《惆怅》里，她这样唱着：

当岸上灯光，
　水上星光，
无声地遥遥相望。
苍茫里，
　倚着高栏，
只听见微击船舷的波浪。
我的心
　是如何的惆怅——无着！

梦里的母亲
　来安慰病中的我，
絮絮地温人的爱语——
几次醒来，

药杯儿自不在手里。
海风压衾，
明灯依然，
我的心
是如何的惆怅—— 无着！

循着栏杆来去，——
群中的欢笑，
掩不过静里的悲哀！
“我在海的怀抱中了，
母亲何处？”
天高极，
海深极，
月清极，
人静极，
空泛的宇宙里，
我的心
是如何的惆怅—— 无着！

两天之后，她又写了两首诗：《纸船—— 寄母亲》和《乡愁》。她在《纸船—— 寄母亲》中这样唱道：

我从不肯妄弃了一张纸，
总是留着—— 留着，
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儿，
从舟上抛下在海里。
有的被天风吹卷到舟中的窗里，

有的被海浪打湿，沾在船头上。
我仍是不灰心的每天的叠着，
总希望有一只能流到我要它到的地方去。

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儿，
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
这是你至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
万水千山，求它载着她的爱和悲哀归去。

在《乡愁》里，她更是恢复了童心，觉得远离了故乡的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孩子，而与自己同船的游伴，也象她一样，都变成了小孩子。他们不知道面前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只顾向着已经远离了的祖国遥望，因为只有在那边，才有爱他们的亲人：

我们都是小孩子，
偶然在海舟上遇见了。
谈笑的资料穷了之后，
索然的对坐，
无言的各起了乡愁。

记否十五之夜，
满月的银光
射在无边的海上。
琴弦徐徐的拨动了，
生涩的不动人的调子，
天风里，

居然引起了无限的凄哀！

记否十七之晨，
浓雾塞窗，
冷寂无聊。
角儿里相挨的坐着——
不干己的悲剧之一幕，
曼声低诵的时候，
竟引起你清泪沾裳？

你们真是小孩子，
已行至此，
何如作壮语？

我的朋友！
前途只闪烁着不定的星光，
后顾却望见了飘扬的爱帜。
为着故乡，
我们原只是小孩子！
不能作壮语，
不忍作壮语，
也不肯作壮语了！

也正是在“约克逊号”邮轮上，年轻的冰心邂逅了一位青年学者。这位青年学者，也是从上海踏上“约克逊号”轮船的。他长得高高的，瘦瘦的，有一副长方形的面庞。在这副面庞上，有着粗黑的双眉，细长的双目，大小适中的嘴，笔

直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玳瑁边眼镜。他是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被选送至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去深造的。[①] 既然他与冰心乘的是同一艘轮船，又是同到美国去留学的，他们就很自然地相识了，交谈了。这位青年学者，就是后来与冰心共同生活了五十六个年头的知名教授吴文藻。

在“约克逊号”邮轮上初识冰心时的吴文藻，还是一个仪表堂堂、文质彬彬的小伙子。他年纪虽轻，却学识渊博。虽是攻读社会学与民族学的，却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古今文学名著。他与这位有名气的年轻女作家交谈，话题总在文学的范畴之内。冰心觉得他是一位诚恳的、不拘泥于俗套的谈伴，书读得很多。将近半个月的旅途生活，使他们两人之间，有了初步的了解。

又在海上飘流了七八天之后，9月1日，“约克逊号”邮轮终于抵达了美国西海岸的西雅图。

在轮船即将靠岸的时候，冰心在轮船的甲板上，看到了全体侍者写给全体中国留学生的一封信。这封信的文字虽然不够通顺，但是情意却是赤诚的。原来这条美国邮轮上的侍者，都是中国的广东人，他们飘洋过海，到大洋彼岸去谋生，受够了西方人的轻视，他们是多么地希望自己祖国的留学生，能够堂堂正正地为国争光，为所有的中国人争口气啊！所以才在这些年轻人即将登岸的时候，用全体侍者的名义，写了一封措词诚恳的勉励信，贴在甲板上，表示他们的心意。这

① 据冰心1986年3月17日下午对笔者的谈话。

种拳拳的爱国之心，使冰心十分感动。

“约克逊号”邮轮徐徐地靠拢了西雅图的码头。冰心随着鱼贯而出的人流上了岸，这是冰心第一次踏上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

她抬眼一看：码头上，除去刚刚上岸的中国留学生之外，都是长着金色头发蓝色眼睛的外国人。再回头一望：在它上面度过了十几天海上生活的“约克逊号”，已经默默地停泊在岸旁。这沉默地停靠在码头旁边的巨轮，又使她蓦地回想起了半个月前离开上海的情景。她深深地意识到：此时此刻，她与祖国，已经相距万里之遥了！

西雅图是一座新兴的港口城市。五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野，如今，已经变成为一座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市内有两个湖，街道整齐，景物清幽的美丽海港了。冰心在这里，游览了两天，就又坐上了三日的夜车，沿途经过落矶山、芝加哥、春野等地，于9月9日的中午，抵达文化中心波士顿。

冰心稍作休息之后，又利用威尔斯利大学开学前的空闲时间，旅行了绿野、春野等地，参观了侯立欧女子大学、斯密司女子大学、依默和司德大学的建筑群，还到了大西洋岸边，看海鸥和在沙滩上嬉戏的孩子。

9月17日，冰心终于抵达了这次远行的目的地—— 威尔斯利女子大学。

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校园很美丽。在校园的旁边，有一座湖，冰心给它取名叫作“慰冰湖”。冰心就住在校园里面一座名叫闭璧楼的学生宿舍里。这座楼是由一位名叫闭璧约翰的船主捐款建筑的，所以，在这座楼的厅、招待室和甬道里，

到处都悬挂着描述“海”的图画。这样的环境，一方面使自幼就在海边长大，特别热爱大自然的冰心，感到很喜欢；另一方面，这美丽的景色，又常使刚刚离开了自己的父母和亲人，只身来到了异国的冰心，生发出丝丝如缕的乡愁，使她常常地思念自己的母亲和父亲，思念自己的故乡和祖国。

来到威尔斯利大学不久，就到了中国人十分重视的节日——中秋节，这是照例的一年一度家人团聚的日子。阴历8月14日的夜晚，皓月当空。这明媚的月光使她十分地思念自己的亲人。她想起了“看月多归思，晓起开笼放白鹇”的诗句。心想：如有白鹇可放，自己一定打开笼门，让它们飞归故里，去会见自己的亲人。然而她又想：家，毕竟是太远了，纵有白鹇可放，它的双翼，又怎能飞越过浩浩万里的太平洋呢？然而她身边并无白鹇，她是什么办法都没有的，她在无可奈何之中，只好跑回屋里，放下了两重帘子，蒙头睡下了。由于不忍见这月光，当15日的黄昏，天气由晴转阴之后，冰心竟然暗暗地感谢苍天，使她不必再忍受这难以忍受的乡愁了。同学们邀她到慰冰湖里去荡舟，等待月明。她不得不去，但是云彩总是严严实实地、厚厚地遮盖着天空，一起荡舟的同学们感到失望，冰心却感到释然，感到“千金也买不了她这一刻的隐藏”[①]，她十分感谢这个阴天，使她不再生出思乡的感触。

她以为这就算是逃过了中秋，也逃过了自己最难忍受的思念的痛苦。没想到，第二天的夜晚，在她最不提防的8月

①② 冰心：《往事 （二） ·六》

16日，她偶然地走入了住在楼东的一位同学的房间，却忽然看到了满室的月光！她对着室中清亮的满月，心中立刻涌起了无限的感伤，她被一股强烈的辛酸之感困扰着，仿佛是站在万丈悬崖的顶上，下面就是贮满了酸水的海洋。她真想纵身向下一跃，跳进这充满了乡愁的海水之中去。她这样描述着自己的乡愁："乡愁麻痹到全身，我掠着头发，发上掠到了乡愁；我捏着指尖，指上捏着了乡愁。是实实在在的躯壳上感着的苦痛，不是灵魂上浮泛流动的悲哀！"[2]她赶忙地辞别了同学和月光，跑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用手绢把摆在桌上的父母亲的相框蒙上，又拿起了一本厚厚的书，强迫自己苦读。但是她读不下去，只好躺到床上，默默地流下思念的泪水。

为了寄托自己的乡愁，她又把父母的照片摆在读书写作的案头，望着双亲的照片，就好似看到了他们生动的面容一样。她还把故乡福建的特产——水仙花，带到了大洋彼岸，她不再象住在北京家里时那样，要依仗着两老来侍弄她屋里的花草，而是时时不忘给来自故乡的鲜花添水和修剪，让它们能够在这远离祖国的异地他乡，开放出秀丽、典雅的花朵来。

她也非常想念自己的弟弟们，回忆着过去在北京的家里，弟弟们带给她的快乐和温暖。她想起有一次，在秋天，弟弟们都到郊外野游去了，她一个人坐在家中的廊子上，承受着袭来的秋风，听着墙外传来的叫卖声，一种萧瑟的寂寞感忽然涌上了心头，身上又不胜秋风吹来的凉意，使她觉得无趣，而且惆怅。可是，就在这时，弟弟们回来了，传来了他们欢快的笑声和喧哗声，冰心刚刚还感觉到的惆怅和寂寞，立刻被弟弟们的归来驱赶得无影无踪。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使冰

心了解到了手足之情的可贵。她知道了，原来弟弟们就是她的快乐和安慰，“我也明白只要人心中有了春气，秋风是不会引人愁思的。”[1]

除去思念父母和弟弟们之外，冰心也十分地思念自己的小读者。她在上面提到的那个令她难以自制的月夜过去之后不久，就在这一年的10月14日的早晨，她早早地起了床，然后就沐浴着朝阳，穿过树林，来到了慰冰湖畔。她悄悄地坐到了湖岸边。湖水的微波轻轻地拍击着湖岸，一层一层的湖水的波浪，悄悄地涌上了湖边的潮石。冰心面对着眼前的湖景，把纸张摊开在膝头，继续写作她的《寄小读者》，向她的小朋友们报告慰冰湖畔的消息。

她先把面前的慰冰湖介绍给他们：“小朋友，我真不知如何的形容介绍她！她现在横在我的眼前。湖上的月明和落日，湖上的浓阴和微雨，我都见过了，真是仪态万千。小朋友，我的亲爱的人都不在这里，便只有她——海的女儿，能慰安我了。”[2] 因此，冰心便给它取名叫“慰冰”。“每日黄昏的游泛，舟轻如羽，水柔如不胜桨。岸上四围的树叶，绿的，红的，黄的，白的，一丛一丛的倒影到水中来，覆盖了半湖秋水。夕阳下极其艳冶，极其柔媚，将落的金光，到了树梢，散在湖面。我在湖上光雾中，低低的嘱咐它，带我的爱和慰安，一同和它到远东去”。“小朋友！海上半月，湖上也过半月了，若问我爱哪一个更甚，这却难说。——海好象我的母亲，湖是

①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八》

②②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七》

我的朋友。我和海亲近在童年，和湖亲近是现在。海是深阔无际，不着一字，她的爱是神秘而伟大的，我对她的爱是归心低首的。湖是红叶绿枝，有许多衬托，她的爱是温和妩媚的，我对她的爱是清淡相照的。”②

也是一个这样清幽的早晨，冰心又写出了一组类似《繁星》与《春水》那样的组诗《远道》十七首。她在这十七首小诗里，写她是如何地盼望着接到家中的来信，而因为：

信差悠然的关上了信柜，
微笑说“所有的都在这里了。”①

而使盼望家信的冰心：

我微微的起了战栗，
“这是何等残忍的话啊！”④

她常常这样满怀着希望，又带点儿恐惧地走下楼来，却常常：

因着空的信匣，
却诅咒了无味的生活。②

她只好反复地苦读着过去收到的家书，聊以自慰。又经常在梦里，梦见自己回到了家中。只要一收到家里的来信，就会

①④ 冰心：《远道·五》
② 冰心：《远道·三》

使她高兴得流泪。而如果恰逢这种时候，有同学闯进屋里来，她就：

对着凝视着我的她，
揉着眼睛
掩饰的抱怨着烦难的功课。①

如果有一位美国同学对她说："再见，我回家去！"这"我回家去"四个字，就会使她：

呆立了半晌②

想念自己那个远在万里之外的家庭，因而羡慕这位家在近旁的回家者的好福气。当有的同学向她炫耀：

我的父亲是世界上最好的爹爹，
母亲是最好的妈妈！③

她的那颗温柔的心里：

竟起了无谓的不平⑤

① 冰心：《远道·十二》
② 冰心：《远道·十五》
③⑤ 冰心：《远道·七》

因为冰心觉得:只有自己的父亲才是世界上最好的爹爹,只有自己的母亲才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她在睡梦中见到了这位最好的母亲,梦中的母亲正象过去一样地嘱咐她:

秋风起了,
不要尽到湖上去啊![1]

为了安慰思念母亲的自己,她:

连梦中母亲的话语
也听从了![2]

她苦苦地思念着母亲,却清晰地记得临别时母亲对她嘱咐的一句话:

自己爱自己![2]

她懂得慈母这句话语的分量,那是因为爱女远去他方,慈母无法随时照料,而要求女儿自己照管好自己的一片心意。她为了使远在彼岸的母亲放心,努力地这样做了,还自嘲地说:

离开母亲三个月了,
竟能悠悠地生活着!

①② 冰心:《远道·八》
②冰心:《远道·十七》

忙中猛然想起，
就含泪的褒奖自己的坚强。①

冰心在一人独处的时候，虽然常常被浓郁的乡愁所包围，好在，她的周围还有一群活泼、漂亮、友好的外国女孩子。这些女孩子，不仅是她求学时候的同学，也是她散步、泛舟时候的游伴。她们对冰心这个温柔恬静的东方女性，表现出了亲切友好的感情，渐渐地，她就不再觉得陌生和寂寞了。

又到了一个阴历的月中，月亮正圆的时候，冰心接受了一位异国的东方女同学的邀请，和她一起，踏着明澈的月光，再到慰冰湖畔去散步。在月光的笼罩之下，四周显得朦胧而且神秘，淡淡的湖波，微微地起着涟漪，在月光下面，如同叠锦一般。闪烁着点点灯火，与天空中的星星，互相辉映。在这一片宁静温柔的气氛之中，偶尔地，会从湖的深处，隐隐传来欢声和笑语。也能看见一只小船，载着两个人儿，从湖面上，慢慢地划入林荫的深处。在这样迷人的景色的衬托之下，这两个属于不同国度的东方女儿，在谈着“理想的和爱的天国”，谈着她们之间的友情。冰心为了纪念她和那位异国的东方女同学的友谊，把在这个月夜的经历和感受写成了一篇散文《好梦》，寄给了引导她走上文坛的摇篮—— 北京的《晨报》，所以，这篇文章还有一个副标题，叫做：《为〈晨报〉周年纪念作》。

① 冰心：《远道·十四》

然而，这充满了新鲜感的异乡的学校生活，冰心只过了两个多月。11月26日的夜晚，冰心忽然重病。昏迷之中，只觉得被医生、护士们诊断过了，注射过了。并在无所知觉之中，被人抬着，离开了挂满了“海”的图画的闭璧楼，而住进了圣卜生疗养院。

圣卜生疗养院就在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大范围之中，在一座小山上。住进疗养院之后的冰心，仍然受到她的同学、老师以及医生、护士的爱护。她结识的那些外国女孩子仍然关怀着她，不时地给她送来慰问的信件和鲜花。玫瑰、菊花，一簇一簇的，使她的病房里总是充满了鲜艳的色彩和鲜花的清香。一位住在闭璧楼里的热情的美国女孩子，写信告诉她：“从村里回来，到你屋去，竟是空空，我几乎哭了出来！看见你相片立在桌上，我也难过。告诉我，有什么我能替你做的事情，我十分乐意听你的命令！”① 另一个美国女孩子这样希望她：“感恩节近了，快康健起来吧！大家都想你，你长在我们的心里！”②

一个日本女孩子，给她写来了一张满含着哲理的字条：“生命是无定的，人有时虽觉得很近，实际上却是很远，你和我隔绝了，但我觉得你是常常近着我！”③冰心虽然没有写明这位日本女孩子是谁，但是笔者觉得很象那位在一个月夜，与冰心同游慰冰湖畔，谈论理想与爱的天国的东方女性。

还有一位中国同胞，冰心的中国朋友，写信问候她：“今天怎么样，要看什么中国书么？”④冰心虽然同样没有明写这

①②③④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九》

位写信的同胞的名字，但从这位写信者的口气看，笔者冒昧地猜想，可能是出自那位青年学者的手笔。

疗养院里有着绝好的医生和温柔的看护妇，对冰心这个外国留学生，料理得很细心，很周到。况且如刚才所说，院址就在大学校园内的小山上，看护妇常把冰心的病床推到窗前，使她能够远远地望见心爱的慰冰湖。

她住在舒适的病房里，看看书，写写字，想念自己的同学和老师，更怀念远在祖国的亲人。她一看见窗外天空中的星星，就忆起父亲如何指点她，让她认识天上的星座：

> 记否去年的一个冬夜，我同母亲夜坐，父亲回来的很晚。我迎着走进中门，朔风中父亲带我立在院里，他指点给我看：这边是天狗，那边是北斗，那边是箕星。那时我觉得父亲智慧是无限的，知道天空缥缈之中，一切微妙的事。”①

她一听到看护妇接听外国女同学询问自己健康状况的电话，就猛然地忆起过去在家里，自己生病时，弟弟接听问候她健康状况电话的情景。

当她提笔写信给父亲，报告她在这里的生活，她的思绪就会倒转十几年，想起儿时在烟台的大海边，那次黑夜里，她到旗台上去寻找父亲，父女二人如何在山上山下彼此呼唤的那一幕。而现在，他们是隔着汪洋大海，在彼此呼唤了！

她在这座圣卜生疗养院里，写出了一篇至情的歌颂母爱

①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九》

的文字——《寄小读者·通讯十》：

小朋友！当你寻见了世界上有一个人，认识你，知道你，爱你，都千百倍的胜过你自己的时候，你怎能不感激，不流泪，不死心塌地的爱她，而且死心塌地的容她爱你？

她爱我，不是因为我是“冰心”，或是其他人世间的一切虚伪的称呼和名字！她的爱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唯一的理由，就是我是她的女儿。总之，她的爱，是屏除一切，拂拭一切，层层的麾开我前后左右所蒙罩的，使我成为“今我”的原素，而直接的来爱我的自身。

冰心认为只有母爱才是无私的，忘我的。“假使我走至幕后，将我二十年的历史和一切都更变了，再走出到她面前，世界上都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只要我仍是她的女儿，她就仍用她坚强无尽的爱来包围我。她爱我的肉体，她爱我的灵魂！她爱我前后左右，过去，将来，现在的一切！”[①]

这样的思想，在她离开祖国之前不久，也曾通过一首名叫《致词》的诗，表现出来：

假如我走了，
　彗星般的走了——
母亲！
　我的太阳！

①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十》

七十年后我再回来，
　到我轨道的中心
　　五色重轮的你时，
你还认得这一点小小的光明么？

假如我去了，
　落花般的去了——
母亲！
　我的故枝！
明年春日我又回来，
　到我生命的根源
　　参天凌云的你时，
你还认得这一阵微微的芬芳么？

她凝然……含泪的望着我，
　无语—— 无语。
母亲！
　致词如此，
　累你凄楚——
万全之爱无别离，
万全之爱无生死！

冰心认为，已经长成为一个成年人的自己，和她所喜爱的小孩子们之间，有一根牢固地维系着友谊的纽带，这就是对于母爱的依恋和歌颂："世界上没有两件事物，是完全相同的，同在你头上的两根丝发，也不能一般长短。然而—— 请小朋友们和我同声赞美！只有普天下的母亲的爱，或隐或显，

或出或没，不论你用斗量，用尺量，或是用心灵的度量衡来推测；我的母亲对于我，你的母亲对于你，她的和他的母亲对于她和他；她们的爱是一般的长阔高深，分毫都不差减。小朋友！我敢说，也敢信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敢来驳我这句话。”①

在冰心的心目中，一切都是可能毁灭的，天上的星辰也许可能掉到海里，大海的咆哮也许可能冲垮房屋，天空也许可能不复存在，然而，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之中，只有一种东西是决不会毁灭的，那就是：母爱！

冰心在圣卜生疗养院里住了将近一个月之后，于12月15日，离开了圣卜生疗养院，转到了青山沙穰疗养院。在沙穰，一直住到了第二年的7月5日才离开。

沙穰疗养院座落在青山上，被一片茂密的绿色松林紧紧地包围着。在大海旁边度过了童年的冰心，在此之前，大概自己也不曾料到，会在异国的青山峻岭之中，度过半年多的青春岁月。

沙穰疗养院是一座绿树丛中的白屋。这里的可爱之处是被无边无际的绿色包围着，环境极其幽雅清静。从白屋的栏杆旁边望出去，山的前面，是一层接一层的大山地，非常空旷，满种着绿色的树木。冰心来到这里的时候，正值岁末的严冬，树上覆盖着耀眼的白雪。山的尽头有一个大冰湖，是沙穰村的小朋友们的溜冰场。湖的周围，也被小山和高树包

①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十》

围着。山的后面，是一片大森林，只见满山遍野都是高大的松树。曲曲折折的山间小路上长满了青草，向深处望去，不知可以走到多么遥远的地方，十分幽静。每逢雪花飘落的时候，四周的景色更是变得美丽如画："四围山上的层层的松枝，载着白绒般的很厚的雪，沉沉下垂，不时的掉下一两片手掌大的雪块，无声的堆在雪地上。"[①] 假如飘起纷纷扬扬的大雪，那么，你踏在绒绒的白雪上面的脚印，只消一会儿工夫，就会被洁白匀整的雪花所覆盖，又变成一片纯洁莹白的世界。而当天气晴朗的时候，山前山后的树梢上，就会洒满金黄色的阳光。

在闭璧楼读书的时候，虽然眷恋着美丽的慰冰湖，却不能忘乎所以，因为惦念着功课，总是来去匆匆，无法尽兴地赏玩。有时一面在湖边散步，一面还要温习功课；一边在湖里荡舟，一边就要看看腕上的手表，准备着去上课或者自习。然而现在，在青山沙穰，却可以抛开一切，完全陶醉在大自然的包围之中。只要不耽误了试验体温的时间和一日三餐，其他时间都由自己支配，爱做什么就做什么，爱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医生和看护妇，都不会来干涉你，打扰你。

热爱自然的冰心，觉得此时此地的自己，过的简直就是鸟儿一样自由自在的生活，因为她可以无忧无虑地随处游泛，或山巅，或水涯，或林中，或雪地，轻松自如，自由自在。

她喜欢沿着山后的林间小径，慢慢地散步，踏着青青的小草，沉思默想，草上的薄冰会发出轻微的声响，这声响，这

①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十二》

意境，又会使她想起中国古诗中的句子：

空谷足音。

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有时，她也喜欢沿着屋前的山路走。高兴之极的时候，还要走到溜冰场上去。一面观赏着小孩子们的矫健活泼的身影，一面在温暖的阳光下欣赏着森林树梢耀眼的白雪。

散步，游山，往往是她一个人独来独往。每逢经过一处山亭，一溪流泉，或一簇芍药花下，她都要象小孩子那样，挖一个小坑，把她随身携带的纱巾，或名片，或西湖风景画，等等，埋在土里，留作纪念。下次再来经过此处的时候，她会愉快地微笑，因为这满山遍野之中，很多地方，都有她独自留下的纪念品啊！

沙穰村的美国小孩子们，常常看到有一个黑头发的穿着皮大衣的年轻姑娘，在林间的小路上行走，还常走到他们的溜冰场上来，他们都非常好奇地注视着她，还悄悄地赠给她一个“蛮族”的雅号。因为北美森林中的蛮族都是黑发披裘的，他们以雪为屋，过着冰天雪地的渔猎生活。当疗养院中医生的外甥女儿把这个笑话讲给冰心听的时候，冰心高兴了，还惭愧自己并不象北美蛮族那样勇敢。

来到这里十天之后，就到了美国人十分重视的圣诞佳节。

圣诞节的前夜，冰心照例地卧在床上，望着院中：白色的雪地中间有一棵翠绿的松树，树巅点缀着一颗大星星，树枝上挂着颜色鲜艳的彩带和许多小星星。十二点钟的时候，耳旁传来了圣诞歌声，冰心望着天上的月亮，地上的白雪，树上的星星，度过了她在外国遇到的第一个外国节日。

第二天，12月25日的早晨，护士向这位中国姑娘祝贺“圣诞大喜”，并给她捧来了几十包用红丝线缠绕起来的圣诞礼物。冰心怀着喜悦的心情，把它们一包一包地打开，里面装着的，不是玩具，就是她喜爱的书籍。

这一天的晚上，露天学校的小朋友们，又在疗养院里开了一个圣诞晚会。美丽的圣诞树上系着许多礼物，其中的一包，送给了大朋友冰心。—— 那是一支五彩漆管的铅笔，一端有个橡皮帽子，上面还写了一首诗：

亲爱的，你天天在床上写字，写字，
　必有一日犯了医院的规矩，
　墨水沾污了床单。
给你这一支铅笔，还有橡皮，
　好好的用吧，
可爱的孩子！

这些露天学校的孩子们，也是这座疗养院的小病友。热爱儿童的冰心，与这些天真可爱的外国孩子交上了朋友。她到他们的学校里去参观，坐在他们的小教室里去听课，与他们亲密无间地交谈。保罗，彼得，都成了她的小伙伴。

还有那些与她同病相怜的外国姑娘，也是她的新朋友。——这里有M，一位有着慈爱的双亲和美满的家庭的美国女孩子，她天真烂漫，又带着一点儿神经质。有R，她聪明，灵巧，能干，管理着图书馆的钥匙，负责着医院里天气表的测量，星期日由她来弹琴，中国文字也学得很快。还有失去了父母，希望得到别人的同情和爱，却又能够隐忍不露的，性格坚强的E。有父亲酗酒，家庭生活凄苦不幸的爱尔兰女孩子D。有具有东方女性的温柔和腼腆的西方女孩儿A。

除了M 之外，后几位女孩子都没有幸福的家庭。冰心把自住在自己国家里的她们更幸福。她不无自豪地想到：

> 我比她们强多了，我有快乐美满的家庭，在第一步就没有摧伤思想的源路。我能自在游行，寻幽访胜，不似她们缠绵床褥，终日对着怏怏一角的青山。我横竖已是一身客寄，在校在山，都是一样；有人来看，自然欢喜，没有人来，也没有特别的失望与悲哀。她们乡关咫尺，却因病抛离父母，亲爱的人，每每因天风雨雪，山路难行，不能相见，于是怨嗟悲叹。整年整月，置身于怨望痛苦之中。这样的人生！[①]

她和这些女伴们互相怜惜，互相爱护。她们常常举行快乐的聚会。外面刮风下雪的时候，她们就坐在大厅里，随随便便地说笑，开收音机，弹琴，织毛线。一位希腊女孩子荣，常常与冰心合作，一个弹琴，一个唱歌，虽然既不会弹，又

①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十五》

不会唱，而当别人认为不行的时候，荣还傲然地宣布：你们懂得什么?这是东西两古国合奏的音乐，你们哪里配领略!因此，疗养院里就常响着她们的歌声和笑声。

天性善良的冰心，还结交了几个温良的动物作朋友。——她每日都到山后面的牛棚去，喂那匹拉牛乳罐车的斑白大马。每逢她跪在樱花树下，拔出十样锦的叶子，准备喂它的时候，冰心都觉得这匹马会转过脸来，善良地凝望着她，仿佛是对她表示欢迎和等待。还有一只棕色的小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因为不认识，它曾经朝着冰心吠叫，着实地把冰心吓了一跳。但是当她从女伴们那里知道，它原来是一只驯良的小狗时，再遇见它，她就先呼唤它的名字，果然，它竟摇着尾巴走近前来，与冰心亲近。于是，这只小狗便成了冰心的朋友，每次游山，它都陪伴着她，护送着她。还有一只活泼的小黑猫，喜欢卧在她的床上，陪伴她入睡。

冰心在这里，从冬住到春，又从春住到夏。她有时静静地观看日出，月落，白雪，森林，有时就听着青鸟的快乐的歌唱，看着红胸的知更雀在白雪地上跳跃。有时又独自一个人，悄然地在山中闲行，观察每一棵树，每一丛花，和她走过的每一处地方。有时还去探望筑在玫瑰丛或丁香丛里的雀巢，看望小鸟的家庭。——森林中的雀巢，都筑得很低，冰心一伸手，就能够摸到；但她决不会做出取卵捉雏的怪事，她不愿意破坏鸟儿幸福的家庭。她想：假如自己被人捉去了，关在笼子里，永不能回来，那么，她的父母该要如何心碎呢!她爱自己的双亲，她也就体贴了小鸟的双亲。

年轻的冰心，常常独自面对着大自然，沉思凝想。而她

的感情和思绪，也仍如她住在闭璧楼或是住在圣卜生疗养院时那样，牵念得最多的，还是她的母亲、父亲和弟弟们。这正如同她自己所说的那样：

在最美的环境之中，时时的怀念最亲爱的人。①

她有时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静静地遥望着窗外的青山，思念着亲人，而悄悄地流泪；当思念的情绪十分深浓的时候，她索性就拿起笔来，写她童年时代的故事，写她的慈爱温柔的母亲，写她的勇敢正直的父亲，写她的手足之情的兄弟，写他们的那个远在大洋彼岸的幸福的家庭，写父亲、母亲对她的爱抚和保护，以及弟弟们对她的依恋和友爱。而在描写她的家庭故事的时候，她着墨最多的，还是歌颂母爱的伟大。

在这里，在青山之上，她又继那篇歌颂母爱的长篇书信《寄小读者·通讯十》之后，写了一篇《通讯十二》，可以算作是集中地歌颂母爱的续篇。她在这篇通讯中发誓，她要：

一心一念，永住永存，尽我在世的光阴，来讴歌颂扬这神圣无边的爱！

因为只有这种爱，才使她透彻地觉悟到："我们居住的世界是极乐的。"② 这不仅是由于，只有"这如火如荼的爱力，使这

① 冰心：《悟》

②③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十二》

疲缓的人世，一步一步的移向光明”！[3]而且还由于，如她在《通讯十》中曾经歌颂过的那样：

> 她的爱不但包围我，而且普遍的包围着一切爱我的人；而且因着爱我，她也爱了天下的儿女，她更爱了天下的母亲。小朋友！告诉你一句小孩子以为是极浅显，而大人们以为是极高深的话，“世界便是这样的建造起来的！”

冰心对于母爱的神圣无边，已经形成了信仰。这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

> 经过了别离，我反复思寻印证，心潮几番动荡起落，自我和我的母亲，她的母亲，以及他的母亲接触之间，我深深的证实了我年来的信仰，绝不是无意识的！[1]

在她离国东渡的前夕，在上海，冰心曾经在她那篇《寄小读者·通讯六》里，写过一段带着孩子气的，但却是非常深刻入理的，议论时政的话：“大人的思想，竟是极高深奥妙的，不是我们所能以测度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是非，往往和我们的颠倒。往往我们所以为刺心刻骨的，他们却雍容谈笑的不理；我们所以为是渺小无关的，他们却以为是惊天动地的事功。比如说吧，开炮打仗，死了伤了几万几千的人，血肉模糊的卧在地上，我们不必看见，只要听人说了，就要

①②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十二》

心悸，夜里要睡不着，或是说呓语的；他们却不但不在意，而且很喜欢操纵这些事。又如我们觉得老大的中国，不拘谁做总统，只要他老老实实，治抚得大家平平安安的，不妨碍我们的游戏，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而大人们却奔走辛苦的谈论这件事，他举他，他推他，乱个不了，比我们玩耍时举‘小人王’还难。”而她觉得能够净化这个世界，使这个世界和谐起来的，只有神圣的母爱：

> 小朋友，谁道上天生人有厚薄？无贫富，无贵贱，造物者都预备一个母亲来爱他。又试问鸿蒙初辟时，又哪里有贫富贵贱，这些人造的制度阶级？遂令当时人类在母亲的爱光之下，个个自由，个个平等！[2]

她劝告她的娇憨的小朋友们，要珍惜这种神圣无边的感情：“你们有这个经验么？我往往有爱世上其他物事胜过母亲的时候，为着兄弟朋友，为着花鸟虫鱼，甚至于为着一本书一件衣服，和母亲违拗争执。当时只弄娇痴，就是母亲，也未曾介意，如今病榻上寸寸回想，使我有无限的惊悔。小朋友！为着我，你们自此留心，只有母亲是真爱你的，她的劝诫，句句有天大的理由，花鸟虫鱼的爱是暂时的，母亲的爱是永远的！时至今日，我偶然觉悟到，因着母亲，使我承认了世间一切其他的爱，又冷淡了世间一切其他的爱。”[1]

---

①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十二》

冰心虽然已经二十三岁了，却是生平第一次远离开母亲的怀抱。这种小鸟首次单独远飞的处境，使她童心复来。在她专门写给小朋友们看的那篇散文《山中杂记——遥寄小朋友》里，她就这样写着："山中的生活，是没有人理的。……正是童心乘时再现的时候，从前的爱好，都拿来重温一遍。""病中不必装大人，自然不妨重做小孩子！"童心复来的冰心，也格外地留恋倚靠母亲膝下的情景。所以，当她病愈之后，于1924年的夏天，应K教授之邀，住进一个消夏别墅之后，得知有一个年仅五岁的小男孩阿历，对她这个离开了母亲的东方姑娘很同情，悄悄地对自己的母亲说："看那个姑娘多可怜啊！没有她母亲相伴，自己睡在大树下的小屋里！"[①] 冰心听说此事之后，竟然"默默相感，微笑中几乎落下泪来"。[③]

年轻的冰心有一颗爱美的心。在冰心看来，只有大自然的美，才是美的极致。

青山赢得了这个海的女儿的爱恋。她爱看青青的松树和白雪，她爱闻松枝和松子的清香，她爱听树叶的微语和小鸟的歌唱，她喜爱踏在树林的枯叶上散步，喜欢独自与青松及白雪相伴。她甚至愿意终身生活在这幽静的森林之中。

在歌颂母爱的同时，冰心也在纵情地歌颂大自然。她要赞美朝霞，她要赞美月夜，她要赞美雨珠和雪花，她要赞美云朵和星辰，她要赞美鲜花和绿草，她要赞美青山和海洋，她要赞美大自然母亲养育出来的一切神奇而又美妙的孩子。冰

①③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二十一》

心认为“世界上最难忘的是自然之美……有人能增加些美到世上去，这人便是天之骄子。”[1]

她这样写到她所居住的青山：“青山真有美极的时候。2月7日，正是五天风雪之后，万株树上，都结上一层冰壳。早起极光明的朝阳从东方捧出，照得这些冰树玉枝，寒光激射。下楼微步雪林中曲折行来，偶然回顾，一身自冰玉丛中穿过。小楼一角，隐隐看见我的帘幕。虽然一般的高处不胜寒，因此琼楼玉宇，竟在人间，而非天上。”[2]

她把沙穰比作自己的乳母，在《寄小读者·通讯十九》中，她这样比喻沙穰和她之间的关系：“她（指沙穰——笔者注）是单纯真朴，她和我结的是护持调理的因缘，仿佛说来，如同我的乳母。我对她之情，深不及母亲，柔不及朋友，但也有另一种自然的感念。”

她既爱沙穰的青山，又爱无边的大海。请看，她是用了怎样聪慧的想象和别致的语言，来描写、比较她所深爱的“海”与“山”的：

> 海是动的，山是静的；海是活泼的，山是呆板的。昼长人静的时候，天气又热，凝神望着青山，一片黑郁郁的连绵不动，如同病牛一般。而海呢，你看她没有一刻静止！从天边微波粼粼的直卷到岸边，触着岩石，更欣然的溅跃了起来，开了灿然万朵的银花！[3]

①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九》
②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十六》
③② 冰心：《山中杂记》

海是蓝色灰色的，山是黄色绿色的。拿颜色来比，山也比海不过，蓝色灰色含着庄严淡远的意味，黄色绿色都未免浅显小方一些，固然我们常以黄色为至尊，皇帝的龙袍是黄色的，但皇帝称为“天子”，天比皇帝还尊贵，而天却是蓝色的。②

而最为难得的是，她在这里的生活，每天都很清闲自在，既不受人打扰，也无功课要做。“完全来与‘自然’相对，以读书，凝想，赏明月，看朝霞为日课。有时夜半醒来，万籁俱寂，皓月中天，悠然四顾，觉得心中一片空灵。我纵欲修心养性，哪得此半年空闲，幕天席地的日子，百忙中为我求安息。造物者！我对你安能不感谢？”① 她可以自由自在地思念亲人，怀念故乡，观赏风景，偶尔也与女病友们（都是外国女孩子）嬉笑游戏。

想要动笔写作的时候，还可以用“流水行云的写作态度”，“想提笔就提笔，想搁笔就搁笔”，② 就这样闲适而又从容自在地写作出了许多优美的散文——象《寄小读者》二十九封通讯中的不少篇章，《山中杂记》，《往事（二）》，等等，以及短篇小说——《悟》，《六一姐》，《别后》，等等。冰心认为：正是这种流水行云的写作态度，是她一生中所未曾经历过的，因而也是最值得留恋的，所以她说：“沙穰最可纪念处也在此！”⑤

1924年1月，面对着美丽的青山，冰心写出了短篇小说

①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十一》

②⑤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十九》

《悟》。茅盾先生称这篇小说是三年前发表的那篇小说《超人》的“姐妹篇或补充”[1]。

作品中的人物之一钟梧，也是一个患有厌世症的人，可以说是《超人》中的何彬在精神上的病友。他因为自己生活经历的坎坷——五岁丧母，十三岁丧父，颠沛流离，半工半读，受够了苦，而没有一个亲他爱他的人，使他看透了社会和人生，因而形成了他的厌世主义的人生哲学。他觉得“世界是盲触的，人类都石块般的在其中颠簸，往深里说，竟是个剑林刀雨的世界！不知有多少青年，被这纷落的刀剑，刺透了心胸，血肉模糊的死亡呻吟在地上。”他对人类的私心，和某些人物为人品质上的弱点，更是看得入木三分，十分极端，他说：“提起人类，不知我要迸出若干血泪！制度已定，阶级已深，自私和自利，不惜以各种卑污的手段，或个人，或团体，或国家，向着这目的鼓励奔走。种种虚伪，种种残忍，‘当面输心背面笑，翻手作云覆手雨’，什么互助，什么同情，这一切我都参透了！”在钟梧的眼睛里，人生没有别的，只有痛苦，只有眼泪。

而作品中的另一个人物，也是这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名叫星如的，则与钟梧抱着完全不同的观点。因为他有幸福的家庭，有深爱他的母亲、父亲、叔叔和妹妹，被钟梧称之为天之骄子，人之骄子。虽然星如也曾经被厌世的时代病传染过，在“厌世主义里，打过转身”，然而他却早已醒“悟”了，终于认定了在这个世界上，“一切只为着‘爱’”！他认为导致

①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钟梧走上厌世主义的思想道路的原因，也就是社会上的一切自私自利的根源，是——“均由不爱而来”。所以，他规劝着自己的朋友钟梧，而且热切地向他表示，要“与你一边流迸着血泪，一边肩起爱的旗帜，领着这‘当面输心背面笑，翻手作云覆手雨’的人类，在这荆棘遍地的人生道上，走回开天辟地的第一步上来！”

那么，星如是用了怎样的法宝，来克服自己的曾经厌世的主张，又说服着正在患着严重的厌世症的朋友呢？原来，他还是借助着母爱、童心和大自然，这三个冰心反复使用的法宝。星如在与钟梧辩论的信中，首先就向钟梧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有关母爱的外国故事，这个母爱的故事，曾经深深地震动过星如本人的灵魂，使他自己“如沉下酒池，如跃入气海，如由死入生，又如由生入死”。而当他领悟这种伟大的爱时，正值他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之中，他是在一个沉黑的雨夜，望见那点象征着母爱的不灭的灯光的。而当他正为这则故事激动万分的时候，“苦雨之后，忽然明月满天，造物者真切的在我面前，展开了一幅万全的‘宇宙的爱’的图画。那夜的湖山，清极，秀极，灿烂极，庄严极，造物者怎知我正在歧路徘徊，特用慧力来导引，使我印证，使我妙悟”？

除去引证外国母爱故事来教育他的朋友之外，星如还用启发钟梧自己回忆童年的办法，来唤醒他对世界的好感：“我的环境和你的不同，说别的你或不懂，而童年的母爱的经验，你的却和我的一般。自此推想，你就可了解了世界。茫茫的大地上，岂只人类有母亲？凡一切有知有情，无不有母亲。有了母亲，世上便随处种下了爱的种子。于是溪泉欣欣的流着，

小鸟欣欣的唱着，杂花欣欣的开着，野草欣欣的青着，走兽欣欣的奔跃着，人类欣欣的生活着。万物的母亲彼此互爱着；万物的子女，彼此互爱着；同情互助之中，这载着众生的大地，便不住的纡徐前进。”

作品中的星如，虽然竭尽了全力来替“爱的哲学”辩护，用母爱、童心、大自然做他论辩的法宝，来感化他的论敌；但是，他是否说服了钟梧，让后者也接受了他的哲学呢？

作品中没有明确的交代。只是在星如患病住院期间，钟梧曾送来一束鲜花表示慰问，但他的思想观念是否转变了，作者并未做出明确的回答。

反正星如在致钟梧的信中，是用这样的口气辩论的：“再退一步，辩论至此，已知短兵相接！纵使世界如你所说，是剑林刀雨淋漓刺人的世界；而因着还有一个锋镝余生的我，便仍旧不能证明他是完全不爱的。一日有我在，一日你的理论便不能成立，我要化身作一根砥柱，屹立在这苦海的乱流中，高歌颂扬这不完全的不爱！”“再退一步，已是退无可退，纵使我的理论完全是假的，你的理论完全是真的，为着不忍使众生苦中加苦，也宁可叫你弃你的真来就我的假。不但你我应当如此信，而且要大声疾呼的劝众生如此信。”

其实，作品中的星如与钟梧所代表的两种观念之间的矛盾，就是作者冰心内心矛盾的反映。星如的哲学，正是冰心所要坚持的哲学；而钟梧的论调，则是冰心在观察了社会之后，对现实生活所下的结论。冰心本人仍然处于不能自拔的矛盾之中。她正如作品中的星如所说的那样，常常是“自问自答，自证自疑”。

茅盾先生在这篇小说发表了十四年之后，曾经这样评论过它："在这一篇里，冰心更进一层，说：'地层如何生成，星辰如何运转，霜露如何凝结，植物如何开花，如何结果……这一切，只为着爱！'然而《悟》发表的当时，对于青年方面的影响，或者说，青年方面来的反应，却反不及《超人》那样多。这原因，倘从《悟》的本身上去找，是找不到的。这是因为《悟》与《超人》中间虽然只隔开一年多，然而中国青年对于'人生问题'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一部分的青年已经不愿再拿这个问题来自苦，而另一部分的青年则已认明了这问题的解答靠了抽象的'爱'或'憎'到底不成。"①

1924年3月26日的黄昏，浓郁的思乡之情，又强烈地撞击着冰心的心扉。她坐在沙穰疗养院的房间里，思绪却已越过了高山和大海，回到了位于大洋彼岸的渤海之滨——她度过了幸福的童年的烟台。这位才思敏捷的中国女儿，就在这一天的黄昏，在异国他乡的白屋里，写出了一篇回忆她的童年生活片断的小说——《六一姐》。

她在缅怀自己童年生活的同时，也歌颂了山东农村纯朴善良的劳动人民，她把这些纯朴美好的形象，与自己的童年生活片断穿插起来，交织在一起描写，就使她所经历过的平凡而又普通的生活场景，充满了诗意。

六一姐是一位美丽而又善良的农村少女，性格温柔，很会体贴人。她八九岁的时候，母亲就出来给人家当奶妈，于是她就成了冰心童年时期的旅伴。就象闰土对待迅哥儿一样，

①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她也会把许多新奇的游戏教给冰心。她们经常在谢家庭院的附近，在海隅沙滩，一块儿游戏，一块儿谈天。然而这个聪明的农村少女，却没有自己的名字，她的弟弟叫六一，她就被叫做六一姐。

六一姐十一岁的时候，就忍痛地把自己的脚缠裹了起来，因为："痛也没有法子，不裹叫人家笑话。"传统的封建思想意识和生活习俗，从六一姐的孩童时代起，就摧残着她。

在西方留学，接触了许多快乐的、活泼的外国女孩子的冰心，写到这里，心里就漾起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她爱自己童年时代的伙伴，这些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的农村少女们。然而，象六一姐这样的女孩子，等待着她们的生活前途究竟如何呢？—— "她这时一定嫁了，嫁在金钩寨，或是嫁到山右的邻村去，我相信她永远是一个勤俭温柔的媳妇"。"她或在推磨，或在纳鞋底，工作之余，她偶然抬头自篱隙外望海山，或不起什么感触"。她的前途就是出嫁，烧火，做饭，推磨，做针线，操劳一辈子家务，没有感触，没有怨言，直到老，直到死。

但是，正是这一位自幼就在农村接受着传统的封建习俗摧残的农村少女，却能够用她那颗善良的心，和练达人情的处世态度，来保护冰心这位受过教育的城市小姑娘。—— 那就是，当作品中的"我"，与六一姐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在金钩寨看社戏，在众多的穿红着绿的农村妇女与农村女孩子中间，作品中的"我"却只穿着很素静的衣服，尤其是她那双不裹脚的天足，在农村女孩儿们的眼睛里，更是一桩没有见到过的奇事，—— 这些可怜的孩子，她们以自己的被摧残

为正常，而以自然的天足为奇怪，—— 当她们窃窃地议论与她们大不一样的“我”，而使“我”觉得局促不安的时候，六一姐却用极其简单的言语为她解了围。使得若干年后回想起此事的冰心，仍然从心里感激六一姐当年对她的“庇覆”。

冰心在描写这一生活场景的同时，还穿插着描写了一位美丽的烟台少女的形象，她是六一姐的同伴之一。小冰心只在这次看社戏时与这位美丽的少女见过一面，但却始终把她的形象记在心里。——“我脑中常有她的影子，后来看书一看到‘芦萝村’和‘西施’字样，我立刻就联忆到她，也不知是什么缘故”。“头发不很青，却是很厚。水汪汪的一双俊眼。又红又小的嘴唇。净白的脸上，薄薄的搽上一层胭脂。她顾盼撩人，一颦一笑，都能得众女伴的附和。那种娟媚入骨的风度，的确是我过城市生活以前所见的第一美人儿”！

冰心置身于许多金发碧眼的西方美人中间，却在怀想与歌颂属于祖国的东方劳动女性的善与美，这说明她是多么地怀念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和自己的祖国。

正如她自己在《六一姐》中所写的那样：“这两天来，不知为什么常常想起六一姐。”“十年来四围寻不到和她相似的人，在异国更没有起联忆的机会，但这两天来，不知为何，只常常想起六一姐！”“她决不能想起我，即或能想起我，也决不能知道这时的我，正在海外的海，山外的山的一角小楼之中，凝阴的廊上，低头疾书，追写十年前的她的嘉言懿行。”

写完了《六一姐》之后不久，这一年的6月2日，冰心从青山上的树林中散步回来，无意中发现了一篇没有写完的

旧稿，那是她在1921年的冬天动笔写作的，也是一篇抒写离情别绪的作品。自己看过之后，竟然在“百无聊赖之中，顿生欢喜心”！[①]于是，她立即拿起笔来，把它续写完毕，就成了今天的小说《别后》。

我们从作品中的人物之一——中学生永明快乐的家庭生活里，无疑地可以看到谢葆璋家日常生活的影子。永明和他的紫衣姐姐宜姑之间的亲密和融洽，又好似冰心和她的弟弟们之间的友爱关系的缩影。而作品中的男主人公“他”——永明的同学——和“他”对已经与他分别了的姐姐的思念，则又象是冰心的弟弟们思念远离家园的姐姐，虽然冰心与“他”的姐姐之间在性格、教养、处境等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他”在永明的家里作过客之后，看到了紫衣姐姐宜姑与弟弟永明之间的亲密无间，感到十分的寂寞和惆怅，因此也十分想念自己的姐姐。虽然自己的姐姐只是一个性格麻木的人，对于任何人都很冷淡，难得向“他”问寒问暖，而且长得也不好看。但是，她毕竟是自己的姐姐，是“他”唯一的亲人。所以，“他”这样写信给自己的姐姐：“你撇下我去了，我真是无聊，我真是伤心！世界上只剩了我，四围都是不相干的冷淡的人！姐姐啊，家庭中没有姐妹，如同花园里没有香花，一点生趣都没有了！亲爱的姐姐……”

其实，病在异国的冰心，处境仍是优越的，生活也是幸

① 冰心《别后》后注

福的。这里有医生和看护妇微笑的脸庞，他们对她调理得很细心，为她准备了精细可口的营养饭菜，一切都不必冰心劳神，连头发都不用自己梳理。这里还有外国女同学不断地送来的慰问书信和鲜花，有美国教授和长者们接二连三的探望。这一切，都使冰心感到愉快和温暖。

虽然如此，在这千里之外的异地，冰心还是加倍地思念故乡与祖国。她常常这样地自问："正不知北京怎样，中国又怎样了？怎么在国内的时候，不曾这样的关心？"[①] 她在写给弟弟们的信里，还引用了华兹华斯的诗《我在不相识的人中间旅行》，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直至到了海外，
　在不相识的人中间旅行：
英格兰！我才知道我付与你的
　是何等样的爱。

只消把诗中的"英格兰"三字改成"中国"二字，就是冰心感情的真实体现了。

面对着异国美丽的青山，灿烂的灯火，冰心却在惦念着家里的菊花："菊花上市，父亲又忙了，今年种得多不多？"[②] 还非常地想念"北京城里此时街上正听着卖葡萄、卖枣的声音呢！"[②] 有一次为了解脱思乡之苦，竟然不顾病后不吃零食

①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八》
② ②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八》

的习惯，从一个黑人摊贩手里买了两包炒花生栗子，其实她哪里是要吃炒花生栗子，无非是想念北京，想要重温一下旧日的生活。她在写给祖国小朋友们的信中说："故乡没有这明媚的湖光，故乡没有汪洋的大海，故乡没有葱绿的树林，故乡没有连阡的芳草。北京只是尘土飞扬的街道，泥泞的小胡同，灰色的城墙，流汗的人力车夫的奔走，我的故乡，我的北京，是一无所有！"然而，"北京似乎是一无所有！——北京纵是一无所有，然已有了我的爱，有了我的爱，便是有了一切！灰色的城围里，住着我最宝爱的一切的人，飞扬的尘土啊，何时容我再嗅着我故乡的香气……"①

1924年的7月5日，病愈的冰心，离开了沙穰疗养院。临行的前一天，正是美国的国庆日。这一天的晚上，外面是美国人放起的鞭炮和烟火，气氛十分热烈。在楼里，病友们也都来到了冰心的房间，与她话别。这些美国姑娘们，与她开玩笑，把无数新生的松子，悄悄地撒在冰心的床上，这虽然是些长着软刺的小东西，却使冰心的衾枕上有了松枝的香气。

出发的这一天，冰心又是绝早地起床，一个人悄悄地走上山去，与她所熟悉的每一棵树，每一丛花，每一个地方，默默地道别。这里到处都有她过去埋在土里的纪念品，她把这些小小的纪念品留在了青山，也把自己的友情留在了青山。这一天的黄昏，女伴们站在沙穰白屋的大门边，给她送行，一一同她握手。有的扬起了手中的白巾，有的摇铃，有的流泪，

①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二十》

向这位中国姑娘表示惜别之情。

病愈之后的冰心，游览了玷池，玄妙湖，侦池，角池，大西洋滨岸，娜罕等地，又应K 教授之邀，到了白岭山上之后，住在一座古朴的具有十八世纪田野风味的山中别墅里。白岭是一座既雄伟又妩媚的山峰，处处有湖，湖山相衬，十分美丽。这座别墅就建立在山岭之上。远近无人，屋后就是茂密的树林。屋前屋后，都有嶙峋的怪石，环境十分幽静。K 教授正是要让冰心体会一下，真正新英格兰的农家生活方式，该是什么样子。这所房子里，有着砖砌的壁炉和立在地上的油灯，有粗糙的陶器，桌上摆着采来的野花，黄昏时要自己提着罐子去取牛乳，采摘葚果来佐餐。这一切，都使冰心想起了她童年时代生活的地方—— 芝罘。

冰心住在这幽静美丽的白岭山间别墅里，继续给小朋友们写信，描述她在大洋彼岸见到了的，千姿百态的异国风光，并给他们讲述美洲红人酋长戚叩落亚的故事。

之后，冰心又到了太平洋之滨的伍岛。她在这里，又一次地亲近了大海。她不仅在海湾里荡小舟，而且还乘大船出海遨游。有一次，她与 15 名游伴乘船去海上聚餐，知道她是航海家的女儿的B 博士，笑着请她坐到船尾去，充当舵手，而且跟她开玩笑说：试试看，你身上是否流着航海家的血。在大家的微笑注目之下，她真的坐到了船尾，而且接过了舵轮，这时候，她才真正理解了父亲的职业，和父亲的生活。当由她掌舵的大船，驶过了波流汹涌的水域、终于抵达了岸边，大家停舟登岸之后，游伴们都笑着向冰心举手致敬，称她为船主，称她为航海家的女儿。

1925年的年初，冰心又回到了慰冰湖边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住进了娜安辟迦楼，继续她的学业。

这一年的11月19日的黄昏，她坐在娜安辟迦楼的房间里，写了一篇探索人生意义的小说《剧后》。一位正当妙龄的女郎安娜，在表演莎士比亚的剧作时，扮演朱丽叶，由于她的美丽、才华，使她的观众们倾倒、迷醉。她把自己的惊才绝艳献给人群，人群则回报给她以鲜花、掌声和狂热的崇拜。然而，当她从幸福的陶醉中解脱了出来，自照着镜中可爱的形象，冷静地一想：原来绝艳的躯体和迷人的爱情都是极为短暂的，在时间这个可怕的黑影的笼罩之下，一切都会急骤地消失，绝艳的躯体就会变成“一架白骨嶙峋的骷髅”，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忠贞爱情也会随之埋葬于地下。冰心通过这篇小说，想要告诉读者这样一个道理：一切属于尘世之上的美貌、爱情和荣誉都是暂时的，而只有那“冰轮般停在窗外，映入镜里，正做了她顶上的圆光”的“树影后西斜的月光”，只有这美妙无穷的大自然，才是永恒的。

这一年的年底，12月12日，冰心又写了一篇短诗《相思》。这是一首十分含蓄的诗作，诗人没有写明她思念的是谁——是她万里之外的母亲、父亲和弟弟们呢（过去，她在写作思念他们的文字的时候，总是明明白白地写出来），还是她于两年前结识的那位同在美国求学的青年学者呢？诗人没有明说，读者也看不出来。冰心在诗中这样写道：

躲开相思，
披上裘儿
　走出灯明人静的屋子。

小径里明月相窥，
枯枝——
　在雪地上
　　又纵横的写遍了相思。

这一年的感恩节，她还在旅行途中的车上，写成了一篇小说《姑姑》。她自己称这篇小说为“戏作”。写的是一个十九岁的纯洁青年，单恋上了一个十八岁的姑娘——他的同学的姑姑由于痴情，而使自己处处被动，甚至闹出了种种笑话的故事。冰心绝少爱情题材的作品，正如郁达夫所说：“她的写异性爱的文字不多，写自己的两性间的苦闷的地方独少的原因，一半原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思想在那里束缚她，但一半也因为她的思想纯洁，把她的爱宇宙化了秘密化了的缘故。”[①] 冰心笔下的这个十九岁的青年“他”，虽然有些笨拙的举动，但是他的感情的纯洁和真挚，思想的纯朴和天真，却使读者非常喜欢他，理解他。相反地，那个年纪轻轻，却为人虚伪的“姑姑”，她的思想的浅薄，以及不懂得尊重别人的感情，利用别人的纯洁的情感而差遣人、捉弄人的作风，相比之下，就显得格外地做作。尤其是，这位姑姑竟然找了一个学问比谁都不如的有钱有势的“绣花枕”作丈夫，其认识

①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之浅薄，就可见一斑了。所以说，虽然这是一篇戏作，但因为作品必定会反映出作者的思想，冰心生活态度之严肃，也能够从这篇“戏作”中看出一点儿来。

美国的风景是美妙的，美国的朋友是友好的。但是，做为一个中国留学生，一个中国青年，一个中国女性，一个中国作家，她并不留恋属于异国的山水、建筑和舒适的生活，她清醒地认识到：“我不是一个乐而忘返的人，此间纵是地上的乐园，我却仍是‘在客’。”[①] 当她在银湾的黑岭和乔治湖旅游的时候，她就想念自己童年时的家——芝罘；当她在雄伟、妩媚的白岭别墅里消夏的时候，看到英格兰人古朴的乡居生活方式，也立刻想到了在芝罘的见闻。她有时一面弹琴看书，一面却回味着和弟弟们在一起傻顽痴笑的日子，一面独自在森林中散步，一面就希望着身旁能够有自己的弟弟们同行奔走。她就在这种思乡情绪的伴随之下，度过了三年的留学生涯，以《论李清照的词》为题，通过了研究院的毕业论文，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

1926年的7月，她象三年前离开祖国时那样，又登上了“约克逊号”邮轮，不过这次不是去国，而是再一次远渡重洋，投向祖国与亲人的怀抱了。

她的行李箱里，装着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研究院的毕业证书和文学硕士证书，还装着一封厚厚的长达六页的信——这是吴文藻向冰心正式求婚的信件，请冰心带回祖国，呈报给她的双亲，请求得到谢葆璋夫妇的批准。

①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二十》

轮船愈是挨近祖国的土地，冰心愈是激动不已。当7月27日的黎明，轮船已经驶入黄海的时候，海上已能望见中国船只的帆影，冰心这时再也无法入睡，她望着东方的朝霞，盼望着与母亲和亲人们的团聚。“我俯在圆窗上看满月西落，紫光欲退，而东方天际的明霞，又已报我以天光的消息！母亲，为了你，万里归来的女儿，都觉得这些国外也常常看见的残月朝辉，这时却都予我以极浓烈的慕恋的情意”。①

等到黄昏到来的时候，“约克逊号”邮船终于徐徐地驶进了黄浦江口。这时候，学成归国的冰心，激动地走到甲板上，紧紧地抱柱而立，“迎着江上吹面不寒的和风，我心中只掩映着母亲的慈颜，三年之别，我并不曾改，我仍是三年前母亲的娇儿”。②

她在上海稍稍休息了几天，因为天热，因为看不惯上海摩登女士们的服装，尤其是因为思母心切，就又于8月3日登车北上，急不可耐地投向母亲的怀抱了！

北京的蔚蓝的高空，白白的云朵，绿色的杨柳枝条，粉红色的夹竹桃，都使冰心感到格外亲切。当然，还有与更加亲爱的母亲，父亲，弟弟们的重逢，更使冰心欣喜异常。她快乐地对小朋友们宣告：“我回家了！这‘回家’两字中我迸出了感谢与欢欣之泪！”②

到家以后，冰心就于这一个月的月底，8月31日，完成了她《寄小读者》的第二十九篇通讯。为这部在以后产生了

①②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二十八》

②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二十九》

很大影响的儿童文学著作，暂时地画了一个句号。

第七章 返 国

我的脚已踏着了祖国的田野，我心中复杂的蕴结着欢慰与悲凉！

——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二十八》

北京的夏末秋初，是一年之中最好的季节，这时，天空显得极其高远，又蔚蓝，又辽阔。而夏末秋初的燕园，也正处于一年之中最美丽的时刻，—— 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和楼群，以及蜿蜒曲折的小径，在一片蓝天的映衬之下，显得轮廓分外鲜明；苍翠的树木及绿茸茸的草皮中间，点缀着迟开的花朵：金色的矢菊，紫色的藤萝，淡紫色的、白色的以及各种各样颜色的大朵菊花，还有点点滴滴或一簇一簇的色彩鲜艳的不知名的花朵；而在这一片深绿、浅绿和姹紫嫣红的包围之中，更有一洼清澈的湖水衬托着秋景，使得这所美丽的校园，显得极其宁静、清幽。

从美利坚合众国留学归来的冰心，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明媚的季节里，在1926年的夏末秋初，一个新的学年度刚要开始的时候，回到了她的母校，回到了她与之阔别了三年的美丽的燕园的。

然而，这时候的谢冰心，已经不再是那个才思敏捷、温柔恬静的女高材生，而是一名严肃端庄、为人师表的女助教了。虽然她仍然象三年前离开母校时那样——个子瘦小，聪慧的目光中还是时时流露出纯洁的稚气。

这个有着瘦小的个子和丰满的面庞的年轻女助教，不仅是她的双亲、她的弟弟、她的家庭的掌上明珠，而且也是她的母校——燕京大学的骄傲。当她在燕大本科读书的时候，她就是《燕大季刊》编辑部国文组的编辑，还是闻名校内、校外、文坛、知识界的青年女作家。当她从本科毕业的时候，她获得了金钥匙的奖赏，又获得了留学生的奖学金。而当她留学归来，在异邦获得了硕士学位之后，就又被燕京大学同学会推举为执委常务委员，燕大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中的校友代表。《燕大月刊》编辑部在聘请一些名流学者当顾问时，又把年轻的冰心当作名流，聘为诗歌顾问。《燕京学报》还把助教谢冰心聘为自己刊物的编委，在 1927 年出版的创刊号上，第一篇文章的作者是大学者王国维，第二篇文章就是冰心早已脱稿的大学本科毕业论文《元代的戏曲》。可见燕京大学对待自己的高材生谢婉莹，给予了多么显赫的荣誉。

冰心到燕京大学教书以后，冰心的父亲就又南下，迁回了上海，在那里定居了。

谢葆璋的家位于上海市区西部的徐汇区，是一座三层的小楼房。笔者曾就上海旧居的具体地址一事请教过谢冰心先生。谢冰心先生答复说：她只记得是在徐汇区，当时的法租界内，她父亲的房子，与当时的非租界区（即华界）只隔着

一条河，但是具体的路名与门牌号码，已经记不清楚了。[①] 事后，笔者曾专程到上海市徐汇区去寻访。——现在的徐汇区，已是马路展宽，高楼林立，一派现代化的景象了，既找不到那条河，也找不到昔日的房子了。

父亲带领着全家南下之后，就只留下了冰心一个人在北京，住在燕园之中的朗润园里。这是一座大园之中的小园，别有洞天，曲径通幽，安静美丽，很合冰心的口味。虽然仍是想念南方的双亲，和分散在各地、努力求学的弟弟们，还有那位远在大洋彼岸的青年学者吴文藻。但是，一个刚刚走入了社会的年轻学者和作家，总要能够独立于家门之外，何况先前已经只身在美国，经受了三年独立生活的锻炼呢。

在文坛上享有盛名的冰心，一生具有谦逊的美德，到了老年之后，这位中外闻名的老前辈，仍然总是自谦地说："我个人是个不学无术的人，没有什么'学'可'讲'。'不学'，就是没有学问，如果大家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那是得不到的；'无术'，就是没有什么技术，如果大家希望听我讲完以后，就能知道怎样写作，而且写得很好，那也是会失望的。"[②] 其实，她在二十六岁的青春年华，就是一位很有修养的青年女性学者了。她生性严肃，恬淡，没有功课的时候，总是一个人坐在园中之园的书斋里，或者是到校门东南侧的图书馆里去读书，写作；需要上课的时候，就走出图书馆或书斋，到教室里去，到学生中间去，教育他们，指导他们。清晨或傍

① 据谢冰心先生 1986 年 3 月 17 日下午对笔者的谈话。

② 冰心：《谈点读书与写作的甘苦》

晚，她也喜欢散散步，沿着曲曲弯弯的柏油小路，流连于湖畔，在绿草地上行走，或是登上低低的小丘，在亭子上的矮凳上小憩。她一边踱步或小憩，就一边细细地思索。

燕京大学位于北京的西郊，远在西直门外，靠近颐和园和圆明园遗址的地方。校园内又是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绿树红花，加上最先进的西式设备，给知识分子们提供了极其舒适而又美丽清幽的生活环境。冰心身在这样幽雅的大学校园之内，过着最典型的学者式的生活，表面上看来，一切都是十分美满的。

然而，校园虽然远离喧闹的城市，但在燕京大学高高的院墙外面，世界却是很不平静的：

在这一年的春天，冰心返回祖国之前不久，日本帝国主义等八国，为了阻挠中国的国民军在中国的土地上——天津布防，竟然向中国政府发出了强横的通牒，之后又炮击了中国的大沽。面对着日本等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爱国的北京大、中学生，又象七年前五四运动时期那样，在3月18日这一天，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群众大会，之后又整队游行至位于东城铁狮子胡同的段祺瑞执政府，向政府当局请愿，并向日本帝国主义者表示抗议。不料，做为执政府首脑的段祺瑞，竟然命令自己的卫队，向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青年学生开枪，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女大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等人，当场饮弹身亡。这个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的现场，就在离谢葆璋家很近的地方。

除此之外，在1926年这一年，各派封建军阀之间的混战也愈演愈烈。4月份，直、鲁两系军阀，趁段祺瑞被迫辞职的

时机，进逼北京。5月份，吴佩孚又企图组阁，却遭到了奉系军阀的反对。下半年，待冰心返回燕京大学之后，国内政局呈现复杂的形势。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北伐战争已经开始，湖北、江西、河南等地已是战火纷飞。10月24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举行了武装起义。之后，无锡、苏州、杭州等地的产业工人与手工业工人，也相继举行了罢工。9月份，英国太古公司的轮船，因在四川万县境内撞沉了十余只中国民船，被中国的地方当局扣留，此事发生之后，英国停泊在宜昌与重庆的军舰竟然直趋万县，炮击了万县县城，使中国的四千名无辜百姓死在英国海军的炮火之下，因而导致了中国反英运动的爆发。

这些在北京城里和全国各地接二连三地发生的事件、斗争，越过了燕京大学高高的院墙，把火与血的残酷现实，摆在了如冰心这样的知识分子们的面前。这种情景和世态，就不能不影响到冰心的思绪。虽然冰心后来曾经自谦地宣布：

> 1926年回国以后直至1929年，简直没有写出一个字。若有之，恐怕只是一两首诗，如《我爱，归来吧，我爱》，《往事集·自序》等。缘故是因为那时我忙于课务，家又远在上海，假期和空下来的时间，差不多都用在南下北上之中，以及和海外的藻通信里。如今那些信件，还堆在藻的箱底。现在检查数量，觉得那三年之中，我并不是没有创作！”①

① 《冰心全集·自序》

其实，住在燕园中的冰心，仍在默默地思索。她过去一贯歌颂童心，歌颂善良，歌颂母爱，歌颂大自然，虽然也有过关于“爱”还是“憎”的思索和怅惘，不过那还只是有些踌躇，有些疑惑，因此她在自己的作品中仅仅含蓄地写到了自己的思考。

但是，到了这时候，随着世事的变化和她本人年龄的逐渐增长，以及思想的逐渐成熟，她的思考也就更加深刻，困惑也就更加明朗了。

她虽然平时忙于授课，寒暑假忙于到上海探望双亲，生活过得充实而幸福。但是，这个个人生活与家庭生活都适意、幸福的冰心，却又时时感到内心充满了“虚空与寂静”，“迷惘与糊涂”。这种“虚空与寂静”、“迷惘与糊涂”是谁给她造成的呢？—— 当然都是社会生活给她造成的。她在《往事集·自序》的一开头就这样写道：

我是一个盲者，
　看不见生命的道途，
只听凭着竿头的孩子，
　走着跳着的引领，
　一步步的踏入通衢。

心头有说不出的虚空与寂静，
　心头有说不出的迷惘和糊涂，
小孩子，你缓一缓脚步，
　让我歇在这凉荫的墙隅。

她曾经多次歌唱过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和爱恋，互助与匡扶；她是多么地希望，人与人之间永远是如此地充满了善意。她在这首《往事集·自序》中仍然这样地期望：

人世间只有同情和爱恋，
人世间只有互助与匡扶；
深山里兔儿相伴着狮子，
海底下长鲸回护着珊瑚。

但是，社会现实似乎并不如此理想，它使善良的冰心十分灰心：

我听得见大家嘘气，
　又似乎在搔首捋须；
我听得见人家在笑，
　笑我这般的幼稚，痴愚……

失望里猛一声的弦音低降，
　弦梢上漏出了人生的虚无，
我越弹越觉得琴弦紧涩，
　越唱越觉得声断喉枯！

这一来倒合了人家心事，
　我听见欣赏的嗟呼。
只无人怜惜这干渴的歌者，
　无人怜惜她衣汗的沾濡！

人世间是同情带着虚伪，
人世间是爱恋带着装诬……

那个引导盲者的纯洁的孩子，就是冰心一向十分珍重的童心的化身。然而纯洁的童心固然可爱，可敬，可佩，却解决不了冰心内心的矛盾和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她只得非常伤感地唱出了：

小孩子，你天真已被众生伤损，
　大人的罪过摧毁了你无辜，
觉悟后的彷徨使你不敢引导，
　你茫然的走了，把我撇在中途！

在她写于1929年4月22日的一首短诗《我曾》中，她也表示了自己的困惑和惆怅：

我曾梦摘星辰，
　　醒来一颗颗从我指间坠落；
觉悟后的虚空呵，
　　叫我如何不惆怅？

我曾梦撷飞花，
　　醒来一瓣瓣从我指间飘散；
觉悟后的虚空呵，
　　叫我如何不凄怆？

我曾梦调琴弦，
　　醒来一丝丝从我指间折断；
觉悟后的虚空呵，
　　叫我如何不感伤？

我曾梦游天国，
　　醒来一片片河山破碎；
觉悟后的虚空呵，
　　叫我如何不怨望？

社会生活给予她的是彷徨和困惑，而逃避困惑和彷徨的唯一出路似乎只能是投向家庭与亲人的怀抱。她在思念双亲的同时，也非常思念仍在大洋彼岸留学的爱人，因此，对自己的爱情一向视如珍品，极少在文中披露一点儿端倪的冰心，第一次在燕园写出了为吴文藻而歌唱的诗歌——《我爱，归来吧，我爱》。

但是，当她拿起笔来，欲给吴文藻写诗，请他归来的时候，这位为社会和祖国时时忧虑的女作家，却不是用自己的柔情召唤自己的爱人，而是用祖国母亲的声音呼唤他——一位留学异国的游子，一位热爱祖国、热爱母亲的青年。这首写于国耻纪念日（1928年的5月7日）深夜的诗，在呼唤这位热爱祖国、热爱母亲的年轻人，请他快快地归来，回来拯救自己的处于危难之中的祖国：

这回我要你听母亲的声音，
我不用我自己的柔情——

看她颤巍巍的挣扎上泰山之巅！
一阵一阵的
　突起的浓烟，
　　遮蔽了她的无主苍白的脸！

她颤抖，
她涕泪涟涟。
她仓皇拄杖，哀唤着海外的儿女；
她只见那茫茫东海上，
　无情的天压着水，
　　水卷着天！

只为的是强邻欲壑难填，
只怕的是我海外的儿们
　将来——
还不如那翩翩的归燕，
　能投到你宗祖的堂前！

归来吧，儿啊！
先把娘的千冤万屈，
　仔细地告诉了你的友朋。
你再召聚你的弟兄们，
　尖锐的箭，
　　安上了弦！
　束上腰带，
　　跨上鞍鞯！
用着齐整激昂的飞步，

来奔向这高举的烽烟！

归来吧，儿啊！
你娘横竖是活不了几多年。
拚死也要守住我儿女的园田！
儿啊，你到来时节，
　门墙之内：
　　血潮正涌，
　　血花正妍！
你先杀散了那叫嚣的暴客，
再收你娘的尸骨在堂楼边！
……
……

我爱，归来吧，我爱！
我不用我自己的柔情——
你听泰山的乱石惊鸣，
你听东海的狂涛怒生！

我爱，归来罢，我爱！
我不用我自己的柔情，
我爱，归来吧，我爱！
我要你听母亲的哀音！

诗中倾诉出来的这种忧心如焚的情绪，已经不仅是对于社会现状的彷徨和困惑了，而是表现出了一位忧国忧民的女作家，对于外侮的憎恨，和希望孱弱的祖国强盛起来，希望

青年一代拯救祖国、保卫祖国的热烈的赤子之心了。

1929年，吴文藻博士学成归国。这一年的6月，冰心与吴文藻举行了婚礼。

这时候，冰心已经二十九岁了。关于自己的爱情和婚姻，冰心在到了八十岁的高龄之后，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我很早就决定迟婚。那时有许多男青年写信给我，他们大抵第一封信谈社会活动，第二封信谈哲学，第三封信就谈爱情了。这类信件，一看信封也可以看出的。我一般总是原封不拆，就交给我的父母。他们也往往一笑就搁在桌上。我不喜欢到处交游，因此甚至有人谣传我是个麻子。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很多人围着来看我，原来是想弄清楚冰心是不是麻子。我是留学回来以后，二十九岁才结婚的。"①

而当有人问到她，为什么在许多男性朋友之中，独独选中了吴文藻的时候，冰心说：那是因为"他的率直与真诚，譬如别人初见总是'久仰久仰，拜读过许多大作'那么敷衍。他却不那么着，在通了没有几封信时，他便老实地批评我念书太少了。他成了我的畏友，之后我们时常互相寄书传看，每星期总有两次。""他的兴趣很广，除了社会学之外，哲学文学都是他所爱好的，若论读书，他念得比我多得多了，对文学他只看些名作，不象我这样'死扣'。"②

① 秦牧：《一代女作家的光辉劳绩—— 祝贺谢冰心同志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周年》

② 子冈：《冰心女士访问记》

他们的婚礼极简朴，也极富有诗意。他们悄悄地离开了燕园，在更加荒僻的西山大觉寺里找到了一间简陋的客房。这个客房中只有一张普通的木床，一张没有涂上油漆的方桌。这张方桌还只有三条腿，另一条腿是用几块砖头垫起来的。这两位留学美国的博士和硕士，就在这样一个好似位于荒山野岭之中的房间里，度过了新婚之夜。这是一个安谧宁静的初夏的夜晚，有冰心曾经歌咏过的明月、星星和天空与他们相伴，为他们庆贺。他们的新婚之夜，好似一首充满了浪漫情调的优美的诗歌。

新婚之后，他们就双双南下，蜜月旅行去了。先到上海去见冰心的双亲，然后再去杭州、莫干山，与蓝色的湖水和翠绿的竹林相伴了。

冰心和吴文藻的婚姻是幸福美满的。他们双方都极有教养，互敬互让，相亲相爱。

1929 年的下半年，冰心在燕京大学被提升为讲师。从这一年至 1931 年，她除了在燕京大学教书之外，还在女子文理学院兼课，作国文系的讲师。

然而，再美满的生活，也会有不顺心的事情来打扰。一向顺利、有福的冰心，在她与心爱的人度过自己一生中这段最甜蜜的日子的前后，却是她的亲爱的母亲病重，乃至生命处于垂危状况的时刻。正如她自己后来所说的："我们结婚以后，正是两家多事之秋。我的母亲和藻的父亲相继逝世。我们的光阴，完全用在病苦奔波之中。这时期内我只写了两篇

小说，《三年》，和《第一次宴会》。”[1]

冰心与吴文藻结婚之前，她的母亲杨福慈就病倒了。生的是一种令病人自己和侍疾的人都极痛苦的病症：骨痛，“由指而臂，而肩背，而膝骨，渐渐下降，全身僵痛，日夜如在桎梏之中，偶一转侧，都痛彻心腑”。[2] 虽然病得骨瘦如柴，痛苦万分，却还时时惦念着她的唯一的爱女的婚事和幸福。这个女儿已经二十九岁了，她有着超人的聪慧，和在女性之中少有的学问和修养，但在慈母的眼睛里，她永远是个娇憨的孩子，除了三年留学之外，她从未离开过自己的膝下。自己现在已经病入膏肓，不把爱女的终身大事了却，做母亲的能放得下心吗？

在那篇自叙传性质的小说《第一次宴会》里，冰心就很动感情地描写了慈母如何为女儿的婚事操心的情景。

小说中的“瑛”和“桢”，无疑地就是冰心和吴文藻的化名。

杨福慈把最无私的母爱奉献给了亲爱的女儿，在一般的父母都做不到的历史背景下，开明的杨福慈就支持自己的女儿选择了好学校，读完了中学和大学，又忍受着思念之苦，支持女儿到万里之外的异国去留学。这样有头脑、有见地，又温柔、又体贴的好母亲，在自己重病缠身，痛苦异常，甚至生命垂危的时刻，却在为无力送给女儿贵重的陪嫁而伤心。在小说《第一次宴会》里，冰心曾经这样描写过女主人公

① 《冰心全集·自序》

② 冰心：《南归》

“瑛”的母亲：“是可给的都给了女儿了，她还是万般的过意不去。觉得她唯一的女儿，瑛，这次的婚礼，一切都太简单，太随便了！首饰没有打做新的，衣服也只添置了几件；新婚没有洞房，只在山寺里过了花烛之夜！这原都是瑛自己安排的，母亲却觉得有无限的惭愧，无限的抱歉。觉得是自己精神不济，事事由瑛敷衍忽略过去。和父亲隐隐的谈起赠嫁不足的事，总在微笑中坠泪。父亲总是笑劝说，‘做父亲的没有攒钱的本领，女儿只好吃亏了。我陪送瑛，不是一箱子的金钱，乃是一肚子的书！—— 而且她也不爱那些世俗的东西。’”这种思想，这种情感，这种作派，不正是冰心和她的双亲的活生生的、绘形绘声的表白和写照吗！

度过蜜月之后，冰心又从杭州返回了上海，为重病之中的母亲侍疾。她整日地陪坐在母亲的病榻前，当母亲的精神稍微好些的时候，她就象小的时候那样，偎依在母亲的身边，与母亲说些甜蜜的知心话。她们共同回忆着在芝罘，在福州，在北京度过的那些快乐的、幸福的时光，共同思念着冰心的两个不在上海而远在异地的弟弟—— 一个弟弟正在北京求学，另一个最小的弟弟继承父业，正在大洋中航海。

母亲看着这个刚刚度过了燕尔新婚的唯一的爱女，心中很高兴。但是，她的无所不在的博大的爱心，却又使她觉得还欠女儿什么。她觉得一个做母亲的责任，不仅是要把她栽培成人，还要使她成家之后，过得安适，舒服，应有尽有。为了歌颂这种博大无边的母爱，冰心在《第一次宴会》里，还细致地刻画了“瑛”的母亲的心理，又描写了一支银花插的故事：“瑛”的父亲是一个廉洁的清官，没有积攒起什么财产，

使“瑛”的母亲不能好好地陪送她这唯一的爱女，这使她的心里很过意不去，但是她又尊敬和爱戴自己的丈夫，觉得清官比贪官正直得多。她想遍了自己的私房和体己，还只剩下了一朵珠花，这是她自己的老母亲过去留给她的，她要把它郑重地送给女儿做纪念。这样做了，她还觉得很不够，又看定了小圆桌上的一支银花插，这是一个光彩夺目的银花插，它有盘绕圆茎的座子，还有朝上开着的五朵喇叭花，花筒里正插着美丽的绸花。这个银花插，是她丈夫的一个英国朋友去年送给她作生日礼物的。因为这个英国朋友一向爱面子，所以她想这个银花插可能还值几个钱，而且那五朵喇叭花，每朵都是可以脱卸下来的，可以重叠着套在一块儿，女儿带着旅行也方便，就把它也送给了女儿。她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不久，已经是罄其所有了，把她能够给的一切，都给了女儿。这种无微不至的慈母之心，不正是冰心的母亲杨福慈，对待她的唯一的爱女的一贯态度吗。

结婚以前的冰心，是双亲膝下的爱女；结婚之后的冰心，是丈夫眼中的爱妻。冰心既爱她的可亲可爱的父母，又爱她的可亲可爱的丈夫。这种父女、母女之间的爱与恋人、夫妻之间的爱，虽然是同样的浓烈，同样的深沉，但是，其性质与个中的甘苦，又是绝对的不同。特别是在慈母病重与自己新婚同时出现的时候，一个远在上海，一个又在北京，一颗心同时悬念着两地，那么，是在母亲身边侍疾，还是在丈夫身边陪伴，这个问题，大概也曾使既是深爱着母亲，又是深爱着丈夫的多情的冰心，有点儿苦恼。

她在《第一次宴会》中，就借着女主人公“瑛”，含蓄地

表达出了这种爱母与爱夫之间的微妙的矛盾心理状态。她写了“瑛”的母亲，在重病之中，虽然非常希望心爱的女儿陪伴着自己，但是，想到北方还有一个人—— 刚刚新婚不久的女婿，还在盼望着女儿早些归去，就勉强地打点起精神来，催促女儿快走。她怕女儿放心不下她自己，还反过来劝慰着女儿：“自昨夜起，我觉得好多了，你去尽管放心……”

冰心用“瑛”的母亲的这种博大的胸怀，和无私的爱心，再一次歌颂了母爱的无私和伟大，以至于深爱自己丈夫的“瑛”都会起了这样的念头：“她竟然后悔自己不该结婚，否则就可以长侍母亲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不但她自己情牵两地，她母亲也不肯让她多留滞了！”

“瑛”在母亲的病榻前陪伴了一个月左右，在母亲的不断催促之下，决定启程北上。她含泪告别了双亲，又登上了北上的列车。母亲的充满了病痛的，但是又勉强克制着痛苦的面容，父亲的充满了忧虑的苍老的脸庞，一直萦绕在她的脑际。她惦念着他们，常常不由自主地落泪。就这样地，一路从上海回到了北京。“瑛”的这种体验和感受，不正是新婚之后不久，却遭逢慈母病重的冰心，当时的内心体验和感受吗。

冰心和她的温存的、体贴的、新婚的丈夫吴文藻，在燕京大学校园内，安置了他们俩人的新家。

这个新家座落在燕园内偏南一点儿的燕南园里。这也是个园中之园，十分安静，有青青的松柏和翠竹，在松柏和翠竹之间，是盖起不久的形式各异的两层小楼或平房。冰心和吴文藻的这座小楼，是专门为他们夫妇造的，打图画样时，他

们两位都参加了意见。

这些楼房或平房，各成单元，互不相扰，这一座和另一座之间，都拉开了相当的距离，互相之间却又用石子铺成的甬道连接起来。总之，是个非常幽雅的去处。

在这对新婚夫妇的新居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书，不是什么名贵的花草，也不是什么珍奇的古玩，而是许多文学的，哲学的，艺术的善本书，除去各种各样的出自中外古今各种名家之手的杰作之外，也有许多名贵的字画。至于新出版的各种杂志和学术刊物，则更是丰富多彩。冰心把它们都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客厅里的半圆雕花红木桌上。别小看这个半圆形的红木小桌，它是最吸引来访的朋友或学生的目光的地方，几乎每一个来访的人，一迈进冰心、吴文藻家客厅的门槛，就都会不约而同地先走到这张红木小桌的前面，翻看最新出版的杂志和书刊。

这是一对有学问的、有教养的夫妇，建立起来的一个和谐的、幸福的家庭。

然而，他们这个小家刚刚建立起来不久，就在半年之后，这一年的冬天，12 月 14 日的中午，冰心和吴文藻刚双双地从城里回来，就在家里客厅的桌上，看到了一封从上海拍来的电报，这是谢葆璋老人用了十分谨慎的措词，向女儿发过来的一行字："……母亲云，如决回，提前更好。"①

冰心看过这封电报之后，知道母亲的病，一定已经到了

①②③④⑤ 冰心：《南归》

危险关头了。她决定立即南下，赶快回到母亲身边，“即使是猪圈，是狗窦，只要能把我渡过海去，我也要蜷伏几宵。”[2]

温存的丈夫体贴她，怕她急坏了身体，轻声慢语地安慰她：“这无非是母亲想你，要你早些回去，决不会怎样的。”[3]她仍是感到“全身颤栗，如冒严寒”[4]，内心充满了怔忡和恐怖的情绪，夜晚睡在床上，也仿佛睡在冰窖之中。她是多么地害怕，怕这位给了她伟大、无私的母爱的慈母，会永远地舍弃她，离开这个世界啊！

在战战兢兢的心情里，收拾好行李，清理好学校里的事务（这时离放寒假还有几个星期）之后，冰心便于18日的下午，乘快车到了天津。新婚的丈夫一直随车把她送到天津，然后就等待轮船开船的日子。由于内心的焦虑，住在旅馆中等船的时候，她的老病——慢性盲肠炎就发作了。她呕吐，神志模糊，到南下的轮船启程的时候也未减轻，但她还是坚持要走。吴文藻只得把她送到预先订好的舱位里，哽咽着对她说：“你病得这样！我是个穷孩子，忍心的丈夫。我不能陪你去，又不能替你预备下好舱位，我让你自己在这时单身走！”[5]

冰心坐在南下的轮船上，看得见的，只是窗外的海面，——先是溏沽海域的碎裂的冰块，后是渤海、黄海的滚滚的洪涛；听得见的，只是同船人们的嘈杂的谈话声，笑骂声，和令人难以忍耐的呕吐声和涕唾声，夹杂着油味，垢腻味，烟味，咸味，等等乱七八糟的气味。过惯了安静的书斋生活，和住惯了清静的房舍的冰心，忍受着这一切，紧闭双目，躺在自己的铺位上，不饮不食。就这样，熬过了几天。

22日的下午，轮船终于驶进了吴淞口，直到晚上六点钟，才停靠在浦东码头边。12月底，天时已短，夜幕开始缓缓地拉下，这时候，冰心却还没有过江去，又找不到来接她的家人，她又疲倦，又冷，又失望，又害怕，只好顶着凛冽的寒风，坐到颠簸着的摆渡上，急急地过江。等摆渡摇到了浦东的彼岸，冰心的脚终于踏上了外滩的土地的时候，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又冷又累的冰心，终于奔回了父母的家中。

母亲病得已经不成样子了，骨瘦如柴，全身疼痛如割，有时甚至昏迷不醒。但是这位有着伟大的母爱和坚强的性格的母亲，对于自己的病痛，都是默默地忍受着，从来不痛哭，不狂喊，而是仍象平时那样对待自己的孩子，言语间充满了慈爱，没有一句性急的话语。当她得知她的唯一的爱女，要回上海侍疾的时候，她想的不是女儿将会给她带来的安慰，而是心疼她这亲爱的孩子，怕她受惊，怕她吃苦，怕她伤心，轻声地说："可怜的，她在船上也许时刻提心吊胆的想到自己已是没娘的孩子了！"①

等到女儿已经到家，在她身旁服侍的时候，她还时时惦念着女儿的饥饱和冷暖。天气冷了，她就忍受着自己的病痛，劝女儿要多加点衣服："你的衣服太单薄了，不如穿上我的黑骆驼绒袍子，省得冻着！"②

在她痛苦得难以忍耐的时候，竟然仍是心疼着在她身旁服侍的女儿，看着女儿喘息着说："辛苦你了……等我的事情

① 冰心：《南归》

②②③ 冰心：《南归》

过去了，你好好的睡几夜，便回到北平去，那时什么事都完了。”[2]

她为子女操劳了一生，弥留之际，却是十分的满意。她对女儿说：“我自小千灾百病的，你父亲常说：‘你自幼至今吃的药，总集起来，够开一间药房的了。’真是我万想不到，我会活到六十岁！男婚女嫁，大事都完了。人家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这次病了五个月，你们真是心力交瘁！我对于我的女儿，儿子，媳妇，没有一毫的不满意。我只求我快快的好了，再享两年你们的福……”[3]

有着这样的胸襟和情怀的母亲，是多么地让儿女们敬爱啊。他们的心中虽然已经雪亮，知道母亲是不久于人世的人了，在轮流看护、轮流休息的时候，背着母亲，总是偷偷地流泪。但是在母亲面前，却都勉强地笑着，高兴着，让母亲看到他们的努力装出来的笑脸，哄着母亲高兴，用娇憨的语言劝慰她。为了宽慰母亲，也是为了报答母亲对他们的爱，他们愿意在母亲在世时的有限时光之内，多给母亲些欢乐。

除夕的时候，家家户户正在高兴地过年，而谢葆璋家里，却是一片紧张的气氛。除夕的这一天，杨福慈的自我感觉很不好，她难受，着急，频繁地催促女儿为她请医生。冰心立即为母亲请来了上海最有名的德国医生Ｖ大夫，这位医学权威诊断了杨福慈的病症之后，用英语低声地告诉冰心说：“没有希望了，现时只图她平静的度过最后的几天罢了！”[1]

元旦过后的第三天，是谢葆璋的生日。四十年前，他选

①② 冰心：《南归》

择了自己的生日举行婚礼，因此，这一天，也是他和杨福慈结婚的四十周年纪念日。孩子们决定借着这一天，给母亲一个最后的慰藉："1月3日，是父亲的正寿日。早上便由我自到市上，买了些零吃的东西，如果品，点心，熏鱼，烧鸭之类。因为我们知道今晚的筵席，只为的是母亲一人。吃起整桌的菜来，是要使她劳乏的。到了晚上，我们将红灯一齐点起；在她床前，摆下一个小圆桌；桌上满满的分布着小碟小盘；一家子团团的坐下。把父亲推坐在母亲的旁边，笑说：'新郎来了。'父亲笑着，母亲也笑了！她只尝一点菜，便摇头叫'撤去吧，你们到前屋去痛快的吃，让我歇一歇'。我们便把父亲留下，自己到前头匆匆的胡乱的用了饭。到我回来，看见父亲倚在枕边，母亲朦朦胧胧的似乎睡着了。父亲眼里满了泪！我知道他觉得四十年的春光，不堪回首了！"[2]

在悲痛欲绝的情景中，强颜欢笑，——这是儿女们对即将辞世的母亲的最后的安慰。这次聚会之后，杨福慈的病急转直下，两天之后的夜里，困极倦极的冰心，在睡梦中被母亲与父亲的大声争执声惊醒，"我赶紧起来，只听见母亲说：'你行行好吧，把安眠药递给我，我实在不愿意再俄延了！'那时母亲辗转呻吟，面红气喘。我知道她的痛苦，已达极点！她早就告诉过我，当她骨痛的时候，曾私自写下安眠药名，藏在袋里，想到了痛苦至极的时候，悄悄的叫人买了，全行服下，以求解脱——这时我急忙走到她面前，万般的劝说哀求。她摇头不理我，只看着父亲。父亲呆站了一会，回身取了药瓶来，倒了两丸，放在她嘴里。她连连使劲摇头，喘息着说：'你也真是……又不是今后就见不着了！'这句话如同兴奋剂

似的，父亲眉头一皱，那惨肃的神宇，使我起栗。他猛然转身，又放了几粒药丸在她嘴里。我神魂俱失，飞也似的过去攀住父亲的臂儿，已来不及了！母亲已经吞下药，闭上口，垂目低头，仿佛要睡。父亲颓然坐下，头枕在她肩旁，泪下如雨。我跪在床边，欲呼无声，只紧紧的牵着父亲的手，凝望着母亲的睡脸。四周惨默，只有时钟滴答的声音。那时是夜中三点，我和父亲颤栗着相倚至晨四时。”[①] 又强挨了一天半，到了1月7日的早晨，“母亲的痛苦已到了终极了！她厉声的拒绝一切饮食。我们从来不曾看见过母亲这样的声色，觉得又害怕，又胆怯，只好慢慢轻轻的劝说。她总是闭目摇头不理，只说：‘放我去吧，叫我多捱这几天痛苦做什么！’父亲惊醒了，起来劝说也无效。大家只能围站在床前，看着她苦痛的颜色，听着她悲惨的呻吟！到了下午，她神志渐渐昏迷，呻吟的声音也渐渐微弱。医生来看过，打了一次安眠止痛的针。又拨开她的眼睑，用手电灯照了照，她的眼光已似乎散了！”[②] 一家人挣扎着，救护着，但终归无用。到了这一天晚上的9点45分，这位给了冰心三十年母爱的，温柔而又高尚的慈母，停止了呼吸，与世长辞了！

这位把自己纯洁无私的母爱，“慈怜温柔”地施予她儿女们的母亲，“乃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中最好的一个。不但我如此想，我的许多朋友也如此说。”[②] 接受过这样的母亲的恩泽的儿女，一旦失去了她的爱，将会感受到怎样的痛苦，失望，

①② 冰心：《南归》

② 冰心：《我的母亲》

孤独，寂寞，悲哀，大概是人人都能想象出来的吧：

我从此是没有娘的孩子了！这十几天的辛苦，失眠，落到这么一个结果。我的悲痛，我的伤心，岂是千言万语所说得尽？[1]

我再不要领略人生，也更不要领略如十九年一月一日之后的人生！那种心灵上惨痛，脸上含笑的生活，曾碾我成微尘，绞我为液汁。假如我能为力，当自此斩情绝爱，以求免重过这种的生活，重受这种的苦恼！[2]

完了，过去这一生中这一段慈爱，一段恩情，从此告了结束。从此宇宙中有补不尽的缺憾，心灵上有填不满的空虚。[3]

在极度痛苦之中，她只有写信给远在北京的爱人，在那里找寻另一种同样深沉，也同样无私的爱：

我从前有一个心，是个充满幸福的心。现在此心是跟着我最宝爱的母亲葬在九泉之下了。前天两点半钟的时候，母亲的钢棺，在光彩四射的银架间，由白带上徐徐降下的时光，我的心，完全黑暗了。这心永远无处捉摸了，永远不能复活了！……

不说了，爱，请你预备着迎接我，温慰我。我要飞回你那边来。只有你，现在还是我的幻梦！[4]

但是，处于极度痛苦之中的冰心，同时也知道，必须“自家料理着回肠，思想又思想，解慰又解慰”[5]。在伤心的同时，也要料理着生活。

①②③④⑤ 冰心：《南归》。

在她母亲尚未瞑目的时候，她就与父亲一起，为母亲选定好了钢棺，又为母亲选择好了墓地。

母亲寿衣的材料，以及帽子、手套、袜子、袍子，等等，都是冰心冒着严寒，上街亲自选购的。又是冰心背着母亲，悄悄地叫来了裁缝，把寿衣的式样、尺寸、颜色，不厌其详地一一交待给裁缝，一件一件地精制出来的。

母亲去世之后，还是她，帮着父亲料理好了亲友们告别遗体、入殓、出殡等等丧葬的事宜。

为了表达自己对母亲的爱心，她剪下了自己的一缕头发，同时还把母亲生前一直珍重地收存起来的她儿时的胎发，以及她在大学毕业时得到的“斐托斐”名誉学位的金钥匙，连同父亲的和弟弟、弟媳的，以及侄女小菊的头发，都装在了一个小白信封里，放在棺内母亲遗体的旁边。

在冰心的安排之下，逝去的母亲的遗体，被安放在万国殡仪馆的一间紫色的屋子里，她安稳地仰卧在矮长榻上面，盖着一床深棕色的锦被，旁边绕着鲜花，点着一对白蜡烛。当全家人和亲友与这遗体告别之后，他们才将母亲的遗体安稳地装在钢棺内，让她枕在一个白绫簇花的枕头上，再给她齐肩罩上一床红缎绣花的被子，棺盖是玻璃的，彼此看得见，棺前仍然点着一对高高的白蜡烛。在紫绒的桌罩下立着一个银色的十字架。他们就这样，又体面、又肃然地，把慈爱的母亲送到了另一个世界。

家中再也没有欢乐的气氛了。彼此看着身上的孝衣，是一片素白。弟弟把钟摆停在了 9 点 40 分的地方，不忍再看到它走到母亲停止呼吸的钟点—— 45 分。母亲昨天还躺在上面

的床，已经搬走，空出来了一片地方。家里显得无边的空虚和寂寞。冰心怕老父支持不了，就日夜都守在父亲屋中，陪伴着他，白天与老父作伴，每到晚上，勉强睡下，也是常常惊醒。有时她一个人走进母亲生前起坐的屋子里，其中的一切，都会使她回忆起母亲生前的情景，即使是炉中炭火的光亮和噼啪声，也会使她无限地思念已经逝世的母亲。她觉得辛酸，又觉得害怕，于是便写信给远在北京的爱人，向他诉说："母亲死后的光阴真非人过的！"①

虽然失去了这样一位慈母，说句公道话——比起社会中其他的一些人们来，冰心还是幸福的。她还有她钦佩、爱戴的丈夫，和她尊敬、爱护的老父，以及三个相亲相爱的弟弟。她要学习自己的母亲，用仁爱的心对待他们。正如她自己在《南归》中所说的那样："我受尽了爱怜，如今正是自己爱怜他人的时候。我当永远勉励着以母亲之心为心。我有父亲和三个弟弟，以及许多的亲眷。我将永远拥抱爱护着他们。"

料理完了母亲的丧事之后，冰心的大弟弟从上海调到了广州。她便与尚在北京求学的二弟一起，把老父接到了北京。而将母亲去世的消息，死死地瞒住在外航海的最小的弟弟。当这个最小的弟弟，在大哥让他交给二哥的信封里，看见了一条系臂的黑纱，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偎倚慈怀的甜梦已经再也无法实现时，是接替母亲的责任的慈蔼的大姐，给了他抚爱和安慰。他在第二次离开祖国的土地，又踏上远航的征途时，曾经满怀着感激与信任的感情，写信给他的二哥说："母亲是

①② 冰心：《南归》

死去了，幸而还有爱我们的姐姐，紧紧的将我们搂在一起。”[2]

冰心帮助父亲，料理完了母亲的丧事，之后又侍奉着老父，回到了北京。母亲病逝前后的这几个月的生活，使她感到非常的劳顿。但是，也算了却了人生与家中的一件大事。

回到北京之后不久，她又遇到了人生中的另一件大事，那就是：在1931年的2月，她的第一个孩子——长子宗生（吴平），出世了。

三十一岁的冰心，身体是弱的，她经受住了怀孕时的不适和分娩时的痛苦，作了母亲，心情是非常愉快的。她要学习自己的母亲，把她曾经享受过二十九年之久的无私的母爱，再由她，传交给自己的孩子。

她在教书之余，尽心竭力地抚育自己的儿子，在她的精心照料下，儿子长得又白又胖，而且活泼聪明。由于孩子的拖累，她写作较少了，在孩子出生之后的1931年，她只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分》，一篇散文《南归》，两首诗——《我劝你》和《惊爱如同一阵风》，翻译了一本叙利亚作家凯罗·纪伯伦所著的散文诗集《先知》。

《分》是冰心根据自己在产院里分娩时的切身感受和观察、体验而创作出来的小说。这是一篇十分有意思的作品，它以巧妙的构思，把作者的丰富的想象融进了真实的生活里面，赋予两个刚刚离开母体的初生婴儿，以思考和谈话的能力。这两个初生婴儿之间的对话，给这篇小说涂上了寓言、童话的色彩，而冰心在这篇小说中表露出来的思想与情感，已与她本人在过去作品中表露出来的思想与情感，有了很大的不同。

这两个躺在育婴室的小床上“对话”的初生婴儿，那个第一人称的“我”，白净秀气，是教授的儿子，而另一个有着圆圆的头，大大的眼睛，黑黑的皮肤，结实挺起的小胸脯的，则是屠户的儿子。他们两个，在医院的育婴室里，都穿着同样的白白长长的小衣服，床挨着床，可以亲密地、无拘无束地谈话，成了相亲相爱的好朋友。可是，这对初生的婴儿，一旦走出医院的大门，贫富的悬殊就会把这两个孩子分离开来，一个将到社会的上层去享福，一个将到社会的下层去奋斗。其实，即使住在医院里，他们两个表面上虽然是暂时平等的，但是，他们父母之间经济、社会地位的悬殊，也已明显地表露了出来：一个的母亲是住在头等病房里，一个人一间；而另一个的母亲则是在生第五个孩子的时候，才第一次住进了医院，住在十几个人公用的大病房里。一个的父母在他刚刚生出来之后，就计划着他的将来，准备着为他储存教育费；另一个的父亲，为了谋生，却让孩子的母亲把儿子丢给祖母，到有钱人家当奶妈去。

冰心前几年曾在她的小说《最后的安息》、《六一姐》等作品中，对那些家境贫穷、心地善良的孩子们，表示过怜悯与同情。而在这一篇《分》里，她却给贫困的孩子，抹上了自信自豪的光彩，那个又壮又黑的屠户的儿子，虽然也羡慕教授儿子的福气，却能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生活道路，对前途充满了自信。他把自己比做路边的小草，而把小朋友比做花房里的鲜花，他对那朵娇嫩的鲜花表现出了一种“似怜悯又似鄙夷”的态度。他骄傲地对他的小朋友宣布：“你将永远是花房里的一盆小花，风雨不侵的在划一的温度之下，娇嫩的

开放着。我呢，是道旁的小草。人们的践踏和狂风暴雨，我都须忍受。你从玻璃窗里，遥遥的外望，也许会可怜我。然而在我的头上，有无限阔大的天空，在我的周围，有呼吸不尽的空气。有自由的蝴蝶和蟋蟀在我的旁边歌唱飞翔。我的勇敢的卑微的同伴，是烧不尽割不完的。在人们脚下，青青的点缀遍了全世界！”他以自己贫苦的出身为荣，长大了决心继承父业，他高声地宣布：“宰猪的！多痛快，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大了，也学我父亲，宰猪，—— 不但宰猪，也宰那些猪一般的尽吃不做的人！”

这样一种贫穷者对待富有者的态度，在冰心的作品中出现，的确是很新鲜的，非常地引人注目。而当他们脱下了医院里的白衣服，教授的儿子换上了一身温软美丽的婴儿装，屠户的儿子穿上了一件打着补丁的旧蓝布棉袄时，冰心知道，这两个出身不同的孩子，是从精神上，到物质上，一切的一切，“都永远分开了！”

同时，过去一向虔诚地歌颂母爱，认为在母亲面前个个自由，人人平等，唱出过：上天生人无厚薄，因为无论是贫还是富，无论是贵还是贱，造物者都给他预备了一个母亲来爱他的冰心，到了写作《分》的时候，她已经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并非所有的儿童都有享受母爱的福气，有时生存下去的需要比情感的慰安更重要。屠户的妻子象教授的妻子一样爱孩子，但是为了生存下去，她却不得不丢下自己的儿子，到有钱人家当奶妈去；而这个刚刚下生不过几天的孩子，虽然自己母亲的奶水极充足，他却必须要离开母爱的怀抱，到祖母跟前，去喝米汤。

从全心全意地歌唱“爱的哲学”，到清醒地认识到“分”，这是冰心在思想上的一个不小的变化，因而引起了进步文化人士的充分注意。茅盾说：“谁也看得出，这篇《分》跟冰心女士从前的作品很不同了。如果我们把她最近的一篇《冬儿姑娘》（见《文学季刊》创刊号）合起来看，我们至少至少应该说，这位富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作家不但悲哀着‘花房里的一朵小花’，不但赞美着刚决勇毅的小草，她也知道这两者‘精神上，物质上的一切，都永远分开了’！”[①]“《往事集·自序》写于1929年夏，到这个时候是五年了[②]；这五年内世界的风云，国内的动乱，可曾吹动冰心女士的思想，我们还不很了解，但是在她的小说《分》里头，我们仿佛看到一些‘消息’了。”[③]

在这一年写的散文《南归》，是为了纪念于1929年逝世的母亲的，所以她给这篇散文起了一个副标题，叫做《贡献给母亲在天之灵》。她写这篇散文的时候，距离母亲去世已将近两年了，她所以一直未把丧母的哀痛诉诸文字，一方面是因为这种哀痛太强烈，太深沉，她一时半会儿还无法从沉痛的感情中自拔出来；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她想把母亲去世的消息，瞒住自己远在海外航行的最小的弟弟，不愿意他在远离故土亲人的情况下，得知这个对他刺激太大的消息，直等到他回国了，敬谒了慈母的坟墓之后，对他体贴入微的亲爱的大姐，才痛定思痛，把这段情感的历程诉诸笔

①③ 茅盾：《冰心论》

② 《冰心论》写于1934年夏

端。正如冰心自己在文中所说的那样："现在我不妨解开血肉模糊的结束，重历我心上的创痕。把心血呕尽，眼泪倾尽，和你们恣情开怀的一恸。然后大家饮泣收泪，奔向母亲要我们奔向的艰苦的前途！"

诗两首——《我劝你》和《惊爱如同一阵风》，都写于这一年的7月，都发表在丁玲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上。

《惊爱如同一阵风》，是在旅途中写的。那是身边的一个人，指给她看的一片晚霞，惊醒了她心中的诗魂。虽然全诗很短，却充满了如画的意境：

惊爱如同一阵风，
在车中，他指点我看
　西边，雨后，深灰色的天空，
　有一片晚霞金红。

另一首《我劝你》，是用十分严肃的态度，却又是带点儿玩笑的口吻，来规劝那类意志薄弱、心猿意马的女人的，请她们要当心那些轻浮的浪漫诗人引诱你去作的感情游戏；否则，假若你不谨慎，就将给老实的丈夫带来痛苦，失去了家庭的和睦和幸福：

最软的是女人的心，
你也莫调弄着剧意诗情！
在诗人，这只是庄严的游戏，
你却逗露着游戏的真诚。

你逗露了你的真诚，
你丢失了你的好人，
诗人在他无穷的游戏里，
又寻到了一双眼睛！

在写作诗歌、散文、小说的前后，冰心翻译的《先知》，先从4月18日起，在天津的《益世报·文学副刊》连载，副刊停止后，又于8月23日作序，由新月书店出版了单行本。

做了母亲的冰心，在北京迎接了1932年的到来。在这一年里，除去教书和抚养孩子之外，她也继续从事着文学创作活动。

这一年的夏天，她写了一篇名为《寻常百姓》的散文。可以说，这是《南归》的续篇。

因为她写的虽然是一只小小的白燕，而这只白燕却是她的慈母的遗物——这是六年前，她的母亲健在的时候，在上海给孙女儿买的玩物。而今，已是燕在人亡了。她的深情的父亲，在爱妻去世之后，花了半价的车船票，把这只小小的白燕，从上海带到了北京。冰心对这只代表着她母亲遗物的小生命，十分地爱护，用来寄托她对母亲的思念之情。而当这只白燕突然于一个晚上失踪了之后，冰心感到难以言传的失望和焦急。失去了慈母的冰心，又丢失了她的母亲的遗物，内心的烦躁与惆怅，都在这篇散文中表现了出来。

这一年，她还应北新书局之约，自己编辑了《冰心全集》，并于清明节写成了《冰心全集·自序》。分诗歌、散文、

小说三集，由北新书局于 1932 年 8 月至次年的 1 月出齐。

从 1933 年起至 1934 年，冰心除去在燕京大学教书之外，又开始在清华大学兼课，担任国文系讲师。

在 1933 年的 10 月 17 日，冰心完成了一篇别具风格的短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

这是一篇引人注目的作品。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我们的太太”，以及围绕着她的那一群男女，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科学家，诗人，文学教授，哲学家，政治学者，医生，女画家兼诗人，美国女艺术家，等等，总之，都是开口莎士比亚，闭口汤姆司·哈代，喜欢清谈叔本华的哲学，以及诗、词、美术、音乐、舞蹈等高雅话题的人物。这些人物都活跃在冰心熟悉的生活圈子里，与冰心属于同一个阶层。

过去，当冰心写到这一个阶层的人物时，即使寥寥几笔，也总是把他们刻画成文雅、有教养、心地善良的君子。但是，在《我们太太的客厅》这篇小说里，冰心却第一次在自己的笔下，把本阶层的一群无聊男女，描绘成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精神空虚，装腔作势，矫揉造作的俗物。

这位太太用她作银行家的丈夫的金钱，布置了一个闻名中外的“文艺沙龙”，目的是为了突出她自己，让那些无聊的诗人学者们围绕着她，象众星捧月一样，还可以在她这里享受着眼福、耳福、口福。她一面用着丈夫的金钱，尽情地享受和挥霍，一面却暗骂自己的丈夫是丑陋的、猥琐的、世俗的，公然与那些吃喝她的丈夫的无聊男人们调情。而当她的女皇地位受到了那个美国风流寡妇的挑战时，又在中国男人

面前与那个洋女人争风吃醋。她选择女友的标准是找“陪衬人”，在她认识的所有女人中间，她只选中了一个又黑、又胖、又邋遢、又粗野的女画家作朋友，为的是衬托出她的莹白、苗条、服装和谈吐的斯文、高雅。

作品中的那个“白袷临风，天然瘦消”的诗人，简直就象拆白党，专会用几句歪诗讨取阔女人的欢心，然后跟在女人后面，以打秋风为业。

这是冰心生平第一次，对她所熟悉的本阶层的一群人物，作出的一定程度的讽刺和谴责。

继这篇小说完成之后不久，冰心又在同一年的 11 月 28 日，完成了另一篇描写劳动人民生活和表现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短篇小说《冬儿姑娘》。

这篇作品的女主人公冬儿，是个被丈夫遗弃了的砸石工人的女儿，从八九岁的小小年纪，就做卖鸡子、卖柿子、卖花生等的小贩，用自己辛苦劳动的汗水，养活母亲和自己。

她的形象，与几年前冰心刻画的劳动妇女形象——比如那位奶娘的女儿、忠顺的六一姐（《六一姐》）；比如那位无父无母的孤儿、逆来顺受的翠儿（《最后的安息》）——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冬儿是一个敢做敢为的姑娘，绝不逆来顺受，也绝不谦卑忠顺，她只是凭着自己的勤劳，自己的力气，用诚实的劳动，为母亲和自己换一口饭吃。她不信神，也不信邪，既敢与大兵粗声大气地讲理，也敢砸了香头的牌位。一个赤贫如洗的女孩子，在那样的乱世里头，竟然能够用抗争作武器，在社会上站住了脚。

这篇小说完全是用第一人称的“我”，用叙述的口吻，来描述冬儿姑娘的音容笑貌，一言一行的，而这个“我”的身份，就是冬儿姑娘的母亲。听她讲述冬儿故事的人，是她服侍的女主人 （当“我”向她的女主人讲述关于她的女儿的故事的时候，这位第一人称的“我”，已经从一个砸石工人变成大户人家的女佣人了）。

冰心赋予了冬儿姑娘勇敢坚强的性格，她对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不再抱着从前那种悲天悯人的态度了，而是对象冬儿姑娘这样的劳动者，表现出来的某些自发的反抗行动，表示了叹喟和赞赏。

作品中的这个姑娘虽然长相不佳，“傻大黑粗的，眼梢有点往上吊着”，但是她的敢作敢为，敢说敢骂，光明正大，“明人不做暗事”的开朗性格，却让读者非常同情和喜爱。

除去上述的小说之外，冰心在这一时期，还写作了一篇关于教会问题的小说《相片》。冰心在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含蓄地指出了教会人士的伪善。这篇小说的女主角，是一位住在中国、上了年纪的美国人施女士，她是一所教会学校的老师。初来中国的时候，正值她的青春年华，有一张美丽的椭圆形的脸庞，一头淡黄色的秀发，又常穿一件玫瑰色的衣裳，使她成了这所教会学校里的外国女教员中，最美丽的一个。但不知是为了什么，她并没有嫁给爱慕她的同胞毕牧师。光阴似流水一样地流逝，她的一头浅黄色的秀发，颜色逐渐地变成了灰白。毕牧师也早就有了一位年轻活泼的太太。老之将至的施女士，只得寂寞地搬出教会学校的小楼，移居到了校外的一条小胡同里，种点花，养只狗，逛逛庙会，多数的时

光则是一个人坐在房间里，默默地望着墙壁或炉火。

一个中国小姑娘王淑贞的出现，改变了施女士这种寂寞的生活情调。王淑贞是一个前清老秀才的遗孤，她的父亲王先生，生前曾经当过施女士的官话老师。小淑贞的母亲去世后不久，父亲王先生也跟着去世，无父无母的小淑贞，从此便来到了施女士的身边，成了施女士的养女。

王淑贞长得非常瘦小，苍白，但却能够十分温柔、安详地陪伴着施女士。尤其是当施女士生病的时候，她更是十分细致、周到地加以看护和伺候。施女士愿意这个小女孩，永远呆在自己的身边，追随着自己，解除她的寂寞，安慰她的晚年。有时，施女士也会忽然想到，这个小女孩总有一天会长大，那时，假如她要结婚呢？每逢想到这里，施女士就会感到莫名其妙的恐怖，一种无法再次忍受的冷寂之感，立刻会袭上她的心头，使她的全身都打起寒战。不过淑贞尚小，人也非常老实，这种事情仿佛还是极其遥远的将来才能发生的，她仍然安静地陪伴着施女士。

时光不知不觉地过去，淑贞终于长大了。施女士为了永远把她拴在自己的身边，就把这个中国姑娘带到了美国新英格兰的一个小镇上。这是施女士出生的地方。

正是在施女士故乡的老宅里，王淑贞同住在这里的两个中国人—— 神学院的李牧师和他的儿子李天锡邂逅相遇了。后者是一位热爱美术的青年，但是因为没有钱，只能在神学院里听讲。他是一个典型的中国青年，有理想，有教养，爱祖国，爱艺术，温文尔雅。在这异国的偏僻小城里，只有中国姑娘王淑贞能够理解他。

而当施女士终于在她的养女王淑贞的身上，看到了爱情到来的迹象，尤其是看到了王淑贞的一张相片，在这张相片上："背景是一棵大橡树，老干上满缀着繁碎的嫩芽，下面是青草地，淑贞正俯着身子，打开一个野餐的匣子，卷着袖，是个猛抬头的样子，满脸的娇羞，满脸的笑，惊喜的笑，含情的笑，眼波流动，整齐的露着雪白的细牙，这笑的神情是施女士十年来所绝未见过的！"

做为一名信仰宗教的教师，此时的施女士，却表现出了极端的自私。她害怕孤独，害怕王淑贞会离开自己。她并不顾及养女本人的意愿，就擅自决定，立即带领这位动了爱情的姑娘，远离开她的恋人李天锡，返回中国去。难道一个信奉宗教的教师，就应该这样践踏别人的感情吗。

1934年的年初，冰心发表了《新年试笔》一文。她在这篇文章里，写出了她幻想中的理想国的形象：

> 大地上处处都是光明，看不见一丝云影。山上没有一片焦黄的叶；一眼望去尽是参天的松柏，树上随意的乱生着紫罗兰，雏菊，蒲公英。松径中，石缝中，飞溅着急流的泉水。
>
> 江河里也看不见黄泥，也不飘浮着烂纸和瓜皮；只有朝霭下的轻烟，濛濛的笼罩着这浩浩的流水。江河两旁是沃野千里，阡陌纵横，整齐的灰瓦的农舍，家家开着后窗，男耕女织，歌声相闻。
>
> 城市象个花园，大树的浓荫护着杂花。整洁的道路上，看不见一个狂的男人，妖的女人，和污秽的孩子。上学的，上工的，个个挺着胸走，容光焕发，用着掩不住的微笑，互相招呼，似乎人

人都彼此认识。

黄昏时从一座一座的建筑物里，涌出无数老的，少的，村的，俏的人来。一天结实的有成绩的工作，在他们脸上，映射出无限的快慰和满足。回家去，家家温暖的灯光下，有着可口的晚餐，亲爱的谈话。

蓝天隐去，星光渐生，孩子们都已在温软的床上，大开的窗户之下，在梦中向天微笑。

而在书室里，廊上，花下，水边，都有一对或一对以上的人儿，在低低的或兴高采烈的谈着他们的过去，现在，将来所留恋，计划，企望的一切。

具有细腻的艺术鉴赏力的茅盾先生，在这一年的《文学》杂志第3卷第2号上，发表了评论1934年以前的冰心作品的总论——《冰心论》。茅盾从冰心所处的历史时代，谈到了冰心的思想，又从冰心思想的形成过程，谈到了冰心的作品，和冰心的家庭。他很有见地地指出：

原来“五四”期的热蓬蓬的社会运动激发了冰心女士第一次的创作活动！

是那时的人生观问题，民族思想，反封建运动，使得冰心女士同“五四”时期所有的作家一样“从现实出发”！然而“极端派”的思想，她是不喜欢的；所以在《两个家庭》中，她一方面针砭着‘女子解放’的误解，一方面却暗示了‘良妻贤母主义’——我们说它是“新”良妻贤母主义罢，——之必要。在《斯人独憔悴》中，她勇敢地提出“父与子的冲突”来了，可是她使得那“子”——“五四”式青年的颖名，终于屈服在旧官僚的“父”的淫威之下，只斜倚在一张籐椅上，低徊欲绝地吟着：“出门搔白首，

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而在《去国》这一篇，她使那位学成归国，满怀壮志的年轻留美学生终于灰心去国，“不如先去到外国，做一点实事”；而且这位青年留学生的父亲，——从前带了一箱炸弹，雍容谈笑进了广州城的老革命党，又是多么暮气颓唐。她的问题小说里的人物就是那样软脊骨的好人。

她既已注视现实了，她既已提出问题了，她并且企图给个解答，然而由她生活所产生的她那不偏不激的中庸思想使她的解答等于不解答，末了，她只好从“问题”面前逃去了。“心中的风雨来了”时，她躲到“母亲的怀里”了。这一个“过程”，可说是“五四”时期许多具有正义感然而孱弱的好好人儿他们的共同经验，而冰心女士是其中“典型”的一个。

这一年的7月，冰心、吴文藻夫妇，接受了美国留学时的老同学、当时担任平绥铁路局局长的沈昌先生的邀请，并自己出面，又替他邀请了郑振铎、顾颉刚、赵澄、雷洁琼、文国熊、陈其田、容庚等作家与学者，组成了一个“平绥沿线旅行团”，先从7月7日至18日，后又从8月8日至25日，沿着中国工程师詹天佑领导设计、修建的平绥铁路，前后作了两次社会调查性质的旅行。参加者之一的郑振铎，在写到这次西行的文章中，曾经这样说过：“此行得友好们的帮助不少，特别是冰心、文藻夫妇。这趟旅行，由他们发起，也由他们料理一切。”[①]

这位留学美国的沈局长，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很

① 郑振铎：《西行书简·小叙》

有事业心，这次是想借用著名作家们的笔，将平绥沿线的经济状况、物产情况、民族分布、宗教信仰、民族历史、文化古迹、风俗人情、风景名胜、旅行见闻、新鲜观感，等等，一起写出来，然后出版，还要出版英文的导游手册，以便让更多的同胞，还有国外的友人，了解平绥铁路沿线的情况，以利于发展西北的铁路事业，并进而开发大西北。

7月份，正值北京的酷暑，这支由八位作家和学者（第一次旅行容庚先生未参加）组成的浩浩荡荡的队伍，离开了炎热的北京，从清华园车站登上了平绥铁路局准备好的公事专车，经过丰台、青龙桥、康庄、怀来、沙城、宣化、张家口、大同、云岗、口泉镇等地，17日，到达了平地泉。因为铁路被山洪冲断，不能继续前行，八人商议的结果是：暂时返京，等铁路修好了以后，再来一次，直抵绥远。

这生平第一次的塞外之行，给冰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在青龙桥车站瞻仰了“山峡之间，丁香花丛里”的“黯绿色的詹天佑先生的铜像”，又在车站的近旁，观望了万里长城的雄姿，那“雄伟高厚的城墙，飞龙一般的越岭蜿蜒”，使她联想起古代“城头拒胡，烽火烛天，戍卒无声的满山攀走之状”这样壮观的景象，使这位温柔细腻的女作家，也感到热血沸腾了。

冰心又在宣化参观了市容，及北城门外的龙烟铁矿旧址，天主教修道院，回教清真寺。在张家口参观了市容，在大同参观了九龙壁及大华严寺等古迹。

她还在山西云岗参观了有名的石窟，在口泉镇附近的永定庄参观了煤矿。她和同伴们都学着矿工的样子，穿上了很

厚的蓝布套衣、套鞋，戴上了柳条编成的帽子，拿着镁光灯，柱着棍子，坐上吊车，缓缓地降到了离地面三百公尺的矿井里。这位一直过着温暖舒适的学者生活的女作家，也象真正的矿工那样，俯下了自己矮小的身躯，用手举着镁光灯，在只有六七尺宽的地道中慢慢行走。脚下是又湿又热的泥水，头上是用木柱支撑着的危险的洞顶，洞顶上和洞壁上还不断地滴答着污黑的水点，周围是污浊闷热的蒸气。等到她和她的同伴们从这个又窄又矮又闷又危险的矿洞中回到地面上来的时候，她才发现自己的白晰的面庞上以及鼻孔和耳朵眼里，都塞满了黑色的煤末。这样的生活体验，大概会使她终生难忘吧。

7 月 17 日，冰心一行抵达了平地泉车站。因为卓资山一段的铁轨被水冲断，正在修复，火车不能继续前行，他们无法到达绥远。正在商量的时候，得知当时担任绥远主席的傅作义的专车，刚从北京开到这里，也是因为铁轨出事，不能前进，正停滞在这里。傅作义得知作家、学者们正在此地的消息，就专程到他们的车上来见面。冰心一行作为答谢，也到傅作义的行辕去回拜。在行辕，冰心第一次与傅作义先生的夫人刘芸生见了面。

然而这一天给冰心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塞外草原的黄昏。那是一幅只有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才能见到的壮观静穆的图画："晚霞艳极，四山青紫，起伏如线，萋萋芳草，平坦的直铺到天边。而四天的晚霞，由紫而绯红，而浅绿，而鱼肚白，层层的将这一片平原包围了来，所谓'天涯何处无芳草'，'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者，始于今日见之！"

塞外的山，塞外的水，塞外的天空和土地，给冰心带来了许多新鲜的感受。她在离开平地泉的前夕，写下了这样充满了感情的话语：

> 这种无边高朗的天空，无限平阔的草原，无尽清爽的空气，是只有西北高原才能具备的，我愿个个南方孩子，都能到此一游，一洗南天细腻娇柔之气！

这一天的午夜，他们乘坐的专车离开了平地泉，沿着原来的路线，返回了北京。

二十天之后，这个旅行团的一行八人（其中的文国熊女士换成了容庚先生），再次从清华园出发。这次一直到达了绥远，又从绥远出发，经归绥，抵达了百灵庙，见到了当时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的秘书长德王。沿途看见的蒙古包、蒙古骑手，还有大草原上的羊群、马群、骆驼群，甚至于狼，以及时晴时阴，时雨时雹，变幻莫测的塞外大自然的奇特风貌，都给冰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后，他们又从原路返回了绥远和包头，参观了磴口、公积坂、李达召、旗下营等处，之后，再从绥远返回北京。

这次离家半个多月，冰心很思念自己的老父及爱子。她在返回北京的途中，在宣化给他们买了一筐葡萄，在沙城买了一瓶青梅酒，在南口买了一筐白桃。当她和吴文藻于 8 月 26 日返回家中的时候，她不仅带回了自己新鲜的见闻，还给家人带回了塞外的名产。

为了纪念这两次为时共六个星期的旅行，她在半年之后

写成了《平绥沿线旅行记》，和一篇散文《二老财》。

她在8月9日的记事里，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晚，张宣泽先生约餐于绥远饭店，会见了许多绥远各界人物。席间又谈到王同春事迹，听到王同春女儿二老财的故事，大大的引起我的兴趣。将来拟为专文以纪此河套无冠帝王之公主！"这《二老财》一文，即是冰心该篇记事中预言的"专文"，写于1935年的11月。

冰心在《二老财》的开头就这样写道："民国廿三年八月九夜，我在绥远的一个宴会席上，听到了一个奇女子的事迹。她是河套民族英雄王同春氏的独女，'河套的穆桂英'，她的名字是二老财。"

冰心笔下的二老财，究竟算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应该怎么样的来评价她，笔者因对河套的历史知之甚少，实在难以判断。但是读了《二老财》之后，却对冰心这位女作家的善良，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上面已经说过，二老财的故事，是冰心在一次宴席上，从别人的闲谈之中听来的。而参加宴会的人中，又知道二老财的身世的人，必是当时傅作义的部下。他们对这位骑马佩枪的女人，抱着又惊慑，又爱戴，同时又夹杂着一点儿轻蔑，一点儿不以为然的态度。但是，他们在席间关于这位蓝衣皮帽、指挥自如的女人的谈话，却激起了冰心这位女作家的联想，使她对二老财这位稀奇的女性，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希望得知关于二老财的更多的故事，还想看一看她的照片。甚至想与二老财见上一面。

冰心为何对二老财这个与自己相距甚远的人物，抱着如此之大的兴趣与同情心呢？这固然一方面是因为冰心自小是

男装，看惯了大海旁边的军营，偏爱飒爽英豪的女性，在《红楼梦》里的那些女孩儿中间，她最爱“冰雪净聪明，雷霆走精锐”的尤三姐，她曾经多次地谈到自己童年时代的禀性，自嘲为“野性”。但是，另一方面，却也可以看出冰心的善良——她只是偶尔听说了一位“同性”的故事，就又兴奋，又怅惘的，一夜都没有睡着觉，心里总是想着这个女人的事情，眼前总是闪现着一个想象中的女人的飒爽身影。一直到了返回北京的家中之后，关于二老财的念头，仍然萦绕在冰心的脑海里，她始终在惦念着这个素不相识的孤身女人。甚至充满了同情地想象着：这个孤身的女人，是否正一个人郁郁地居住在她父亲的老屋里？每当逢年过节的时候，她去祭奠父亲的亡灵时，又该怎样地“泪随声坠”？

除去顾念和同情之外，冰心还对这个女人寄予了希望。她希望，在这国难当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越伸越长，西北的危难也刚开始的时候，做为一个民族英雄的女儿的二老财，应该起来，跃马佩枪，带领着自己的部下，准备好，与民族敌人决一死战。

1935 年 5 月，冰心的第二个孩子出世了，这是一个女孩儿，也就是冰心的长女宗远（吴冰）。这一年的 10 月，冰心接受了《妇女生活》杂志记者子冈的来访，关于冰心的两个孩子，子冈曾经有过这样的描述：

> 当我正在翻阅着桌上的杂志的时候，两个四五岁的孩子从楼上唱唱笑笑地走下来，彼此相逗着，看到我重又退到楼上去，拖

了许多玩具下来。我和他们不通姓名地熟识了，由稍大的一个口里知道，小的一个是谢先生的孩子。脸上告诉人，他营养很足，一对小亮眼睛不住嘻笑，他四岁。—— 这是儿子吴平。

这时有一个女仆抱下冰心的五个月的女孩儿来，白白胖胖的。

把孩子抱在手里，笑着，“我们两个孩子全是吃羊奶，这里有一只瑞士羊。你来时我正给她洗澡，一早上就忙着这些事。——这就是大女儿吴冰。①

大女儿出生后的这一年的夏天，冰心曾经回到童年时代的居留地烟台小住。

1935 年的冬天，天气特别的冷。春天也来得特别的迟，仿佛也特别的难。冰心听着窗外时时刮起的狂风，看着地面上被狂风卷起来的黄沙，就只能用雪莱的那个著名的诗句来安慰自己：既然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好容易盼到了一天，看见柳梢上出现了嫩黄色，春意就要来了。不料，当天下午，就下起了夹着雪花的冷雨。又好容易盼到了一天，院子里的桃花终于开了，粉红色的花朵，夹在绿叶中间，仿佛在向人间宣告，春天终于来了。不料，当天下午，又刮起了夹着沙土的黄风。喜爱明媚的大自然的冰心，在对于春的失望的情绪中，有一天，偶尔看到了四棵海棠树开放着玲珑娇艳的花。这些海棠花，是被浅浅的红与淡淡的白染成的，很象是一位“天真，健美，欢悦的少女”。这

① 子冈：《冰心女士访问记》

些可爱的花朵使冰心想起了快乐活泼的孩子，也使她感受到了春天的魅力。于是，在1936年的5月，她就为这些海棠花写出了一篇名为《一日的春光》的散文。

在写作《一日的春光》之前的大约两个月左右，冰心还在或生病，或有杂事缠身的情况下，连续地写作了几篇题材很不相同的散文。这就是3月8日写作的《一封公开信》，3月22日写作的《胰皂泡》，和3月23日写作的《记萨镇冰先生》。

她在那篇《一封公开信》里，披露了自己写作的习惯以及自己关于“灵感”问题的见解。冰心的作品，都是她真情实感的自然的流露，倘若没有什么可写时，她就是摊着纸，拿着笔，使劲地想，就这样坐上几个小时，也硬是一个字都写不出来。而假若灵感来到，“即或时在夜半，我也能赶紧披衣起坐，在深夜的万静中来引导这思潮的奔涌”。冰心这样形容灵感的来到：“是很突然的，象一阵风，象一线闪光，有一个人物，一件事情，一种情感，在寂静中，烦闷中，惆怅中，忧郁中，忽然来袭，我心里就忽然清醒，忽然喜悦，这时文思会通畅得象一股急流的水。”

半个月之后，大概是思潮来到了，她忽然又忆起了自己的童年，在22日写出了一篇名为《胰皂泡》的散文。从表面上看，这篇散文写的是她童年时代喜欢玩的吹胰皂泡的故事，细细体味，其中却又不乏一个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的感慨和苦闷。她这样地说到她自己：“生来是个痴孩子，我从小就喜欢做昼梦，做惯了梦，常常从梦中得慰安，生希望，越做越觉得有道理，简直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最后简直把昼梦当作

最高的理想，受到许多朋友的劝告讥嘲。而在我的精神上的胰皂泡没有一破灭，胰皂水没有洒到我的心眼里使我落泪之先，我常常顽强地拒绝了朋友的劝告，漠视了朋友的讥嘲。”

上面已经说过，海军上将萨镇冰先生是谢葆璋的老师、上司和同乡，也是谢葆璋最崇敬的榜样和最亲密的朋友。谢葆璋常对家人这样说：“中国海军的模范军人，萨镇冰一人而已。”在父亲的影响下，冰心从小就很注意萨镇冰的一言一行，而他的言谈和行动，确实也使小冰心对他愈来愈敬仰，愈来愈崇拜。以至于她长大之后，一直想写一本关于萨镇冰上将的传记。

她在 1936 年 3 月 26 日夜完稿的散文《记萨镇冰先生》里，就叙述了几件有关萨将军的嘉言懿行。萨镇冰那种“军人是不能贪图安逸的，在岸上也应当和在海上一样”的模范军人风范，他那种清廉正直、爱兵如子、爱才如命的为人，他那种谨守时刻、温恭周到、风趣洒脱的作风，尤其是他那种临危不惧，勇敢坚毅，在庚子之变以后，以威德服人的大将风度，不仅令作者倾倒，在读者眼中，也堪称是模范军人中最令人叹服的模范。

冰心十分感谢她的父亲，让她从小就认识了这样一个军人。在女儿冰心的眼里，谢葆璋是一位聪明的父亲，因为“他知道往青年人脑里灌注的，应当是哪一种的印象”。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几篇散文之外，这一年的 7 月，冰心还发表了一篇小说《西风》。这是一篇很有意思的小说，主题就是职业妇女面临的职业与婚姻之间的矛盾。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事业与爱情之间的矛盾。

大概自从妇女离开了锅台，走出了家庭，有了职业妇女这一名称之后，就存在着这个矛盾现象了。《西风》写的就是一位女性知识分子秋心，年轻时因把事业看得重于一切，而拒绝了一位爱她的青年男子——远的爱情，但十年之后，到了“卷地西风，半帘残月”的中年，虽然事业极其顺利，可是因为没有爱情，总是孤单一人，内心就常感到寂寞和惆怅。尤其是，她又在火车上与远不期而遇，看到十年前被她拒绝的远，依旧是年轻，潇洒，而且做了两个孩子的父亲，有一位年轻的夫人。等到车船到站，远全家四口快乐地相聚，只有她是孤单的一个人。事业顺利，爱情幸福的冰心，看样子并不赞成妇女为了事业而牺牲了爱情。她在小说的结尾，让秋心看着阴沉的天空，又让萧萧地吹来的西风卷在她的身上，使她感到格外地孤独和寂寞。

这一年，茅盾继《冰心论》之后，又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里，评论了冰心的小说。

与此同时，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里，评论了冰心的《繁星》和《春水》，称它们为“哲理诗，小诗的又一派”。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评论了冰心的散文，称赞“冰心女士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要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记得雪莱的咏云雀的诗里，仿佛曾说过云雀是初生的欢喜的化身，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星辰，是同月光一样来把歌声散溢于宇宙之中的使者，是虹霓的彩滴要自愧不如的妙音的雨师，是……，这一首千古的杰作，我现在记也记不清

了，总而言之，把这一首诗全部拿来，以诗人赞美云雀的清词妙句，一字不易地用在冰心女士的散文批评之上，我想是最适当也没有的事情”。

这一年的10月1日，冰心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上签了名。

也是在这一年的下半年，吴文藻博士得到了“罗氏基金会”的基金，出国考察一年。冰心也随丈夫吴文藻教授，到欧美游历了一年。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也日益高涨，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这一年的6月29日，冰心夫妇从欧洲取道苏联，乘坐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经过东三省，进入山海关，回到了北京。关于这一年游历的生活和见闻，冰心自己在四十三年之后是这样追述的：

> 一个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生活的圈子无论多么狭小，也总会受到周围气流的冲击和激荡。三十年代，中国已经临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外有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压迫侵略，内有腐败软弱的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政府的欺凌剥削，任何一个中国人，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都开始有自己的、那怕是模糊的走出黑暗投向光明的倾向和选择。1936—1937年，我在欧美游历了一年，使我对资本主义世界，感到了不满和失望。回国来正赶上了“七七事变”，我又到了我国的大西南——云南的昆明，和四川的重庆，尤其是在重庆，我看到了蒋介石政府不但腐朽反动而且奸

险凶残……”[1]。

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把炮口对准了北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全面的抗日战争爆发了。当时，冰心正怀着身孕。这一年的11月，她的第三个孩子——二女儿宗黎（吴青）出世了。冰心一方面抚育着新生的婴儿，一方面维持着燕京大学的功课，同时做着撤离北京，迁居到大后方去的准备。她逐日逐月地整理着家中的东西，把她认为不甚重要的家具，该送人的送人，该捐的捐，该卖的卖了。而把她和吴文藻认为最珍贵的东西，象她在美国三年留学期间的日记，吴文藻从做学生时起就开始坚持写作的已有几十年的日记，她和吴文藻两人之间的通信，她的母亲和朋友给她的信件，她的父亲年轻时写给爱妻的信和诗，她的小读者们的来信，以及她所尊敬与爱戴的学者、作家们亲笔签名的赠书，其中有鲁迅的、周作人的、茅盾的、老舍的、巴金的、丁玲的、苏雪林的、凌叔华的赠书，还有印度诗人泰戈尔的《新月集》，等等。除此之外，她与爱书成癖的吴文藻多年来所收集购买的大量善本书，各种画集，笺谱，字画，和许多有艺术价值的纪念品，等等，她和吴文藻两人带领着几名学生，逐个地登记，包裹，装箱。她常常是坐在地上，忙碌地收拾着，累了，饿了，就地喝点茶，用点儿点心，接着再收拾。全部整理好了之后，一数，已经装满了十五只大木箱。除去这十五只大木箱之外，还有吴文藻教授花费了十五年的工夫，编

① 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写好的装满了几十个布匣的教材和笔记。她和吴文藻把这些无法带走的珍贵的书籍和文物，都寄存在未名湖畔燕京大学课堂的楼上，她觉得这样一定万无一失，准备着将来从大后方返回北京的时候，再把它们取出来。

第八章 大后方

我走，我要走到天之涯，地之角，抖拂身上的怨尘恨土，深深地呼吸一下兴奋新鲜的朝气。

——冰心：《默庐试笔》

1937年，对于中国人民说来，是充满了灾难的一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炮击宛平城，中国守军吉星文部奋起抵抗，从此，宁静而美丽的文化古都北京城，就再也不宁静了。勇敢御敌的爱国将领佟麟阁等战死在疆场，大批大批的日本侵略军开进了北京，文化古都北京陷入了日本侵略军的魔爪之下。

三个星期之后，7月28日的清晨，一群涂有日本国旗的轰炸机，在燕京大学附近的西苑兵营，扔下了三十多颗炸弹，把这里炸成了废墟。掌握了现代化武器的日本侵略者，其野蛮凶残的程度，比火烧圆明园时的八国联军还要猖狂。中国的警察，在燕京大学校园所在的海甸区，被日本侵略者的步兵活活地砍死。在中国的土地上，一大队一大队的穿着深黄色军服和戴着奇形怪状的尖顶军帽或钢盔的日本兵，横冲直撞，烧杀抢掠，无所不为。他们登上了西直门城楼，挂上了

日本国的膏药旗，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城楼上狂笑。

昔日繁华的王府井大街和米市大街一带，商店挂起了日本招牌，收音机里响起了日本的音乐。在故宫，在北海，再也看不见穿着长褂的或穿着西服的中国游客了，在那里高视阔步的，是一些穿着军靴的或者穿着木屐的日本游客及日本大兵。

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在天安门广场，二十年前，这个曾经是热血青年们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示威游行的地方，这个曾经是学生时代的冰心，与同学们一起为被捕的大学生们募捐，进行爱国宣传的地方，也变成了日本兵和膏药旗逞凶肆虐的地方。他们的机关枪队，监视着零零落落的中小学生，强迫这些已经变成了亡国奴的中国孩子，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庆祝”所谓保定、南京等地的陷落。

北京，这个有着爱国传统的城市，中国人民珍爱的文化古都，现在，不管是在城里还是在城外，已经到处都悬挂起了五颜六色的异国旗帜：日本的，意大利的，德国的，也有美国的，英国的，等等，等等，就是不见了中国自己的旗帜。

美丽、庄严的北京，这座昔日如此可爱、可亲的城市，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座沦陷敌手的城市，成了一个令人悲愤的皮囊。

面对着这一切，从小就熟悉甲午海战的故事，读书时又参加过“五四”反日爱国游行的冰心，虽然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却又怎能咽得下这口气，在北京忍辱偷生呢？

我走，我要走到天之涯，地之角，抖拂身上的怨尘恨土，深

深地呼吸一下兴奋新鲜的朝气。①

于是，在 1938 年，冰心夫妇把冰心年老的父亲谢葆璋安顿好，就带领着三个孩子，启程出发了。他们离开了陷入敌手的北京，辗转到达了祖国的大西南—— 云南的昆明。

昆明，这座春之城，花之城，四季如春的温暖的气候，滋润了树木和花草，到处可见色彩鲜艳、形象别致的花朵，以及根深叶茂、翠绿欲滴的大树，整个城市都被郁郁葱葱的树木和花草所包围，显得极为美丽和幽雅。这里是远离前线的大后方，听不见炮声，看不见炮火，也没有令人厌恶的、趾高气扬的异国侵略大兵，一切似乎都象战前一样。

在靠近市中心的一条深幽的巷子里，立着一座庄严的大门。门内是一条盘旋向上的石阶路，宁静幽远，情景好象北京西郊的风景区，—— 这就是云南大学的校址。抵达昆明之后，吴文藻教授就在这所美丽的校园里教书。而女作家冰心，则自愿地到了云南省的呈贡县，在当地的简易师范学校里，义务教课。

呈贡县位于昆明市的郊区。昆明市区虽然美丽，但昆明的郊区更美。这里几乎是处处皆景，—— 西山，龙门，滇池，金殿，睡美人，一个接着一个，风景连着风景。有的郁郁葱葱，有的巍峨壮丽，有的秀美多姿，它们都能让你徘徊反顾，流连忘返，有时简直就象步入了神仙世界。用一句让人们用

① 冰心：《默庐试笔》

滥了的语言来形容，这里才真正称得上是：美不胜收，目不暇接。

冰心所住的呈贡县，位置在昆明西山的东北。西山，是昆明郊区的风景区中最为著名的风景区。出了城门向西，要经过极为葱郁的片片树林，沿着蜿蜒曲折的柏油公路，盘旋而上。山路虽不险峻，但盘旋曲折，蜿蜒多姿，因而使得周围的山景和树木更加引人入胜。开凿在悬崖峭壁之上的龙门，陡峭惊险。然而只有登上这里，才能将流淌于脚下的滇池之水，一览无余。—— 这是一大片美丽的湛蓝色，泛着柔和的涟漪，它的温暖的气息和柔美的颜色，就象整个昆明的风姿一样，柔媚，动人。

位于西山东北方向的呈贡，也是一个风景极其优美的地方。冰心在呈贡所住的楼房，就建在一片碧绿的松林之中。她的书房，后窗朝西，从窗中向左右望去，就可以看见呈贡县八景中的三景，只听名字，就能想象得出景色的优美，这三景是：“凤岭松峦”、“海潮夕照”、“渔浦星灯”。热爱自然的冰心，把自己的书案放在了这面窗户的下面，每当她备课、写作得稍感疲倦的时候，只需抬头遥望窗外，便可欣赏到窗外奇妙的景色。

这所楼房的前廊朝东，清晨可以看日出，看朝霞，黄昏可以看晚霞，看月上。阴天，则可以看风雨。即使是风雨，这里也比别处的风雨来得别致：“从天边几阵白烟，白雾，雨脚如绳，斜飞着直洒到楼前，越过远山，越过近塔，在瓦檐上

散落出错落清脆的繁音。”[1] 不用下楼，就可以看到这样五光十色，变化莫测的美景。

如果走下楼去，就是更为开阔，更为深邃的景致了。若下楼出门转向东北，那是一片茂密的翠绿的松林，在这片翠绿的松林中间，又参差地长着红穗的荞菜，有的深红，有的浅红。这深红和浅红，点缀着绿色的树林和黄色的土地，还有灰色的院墙，十分鲜艳夺目。若下楼出门向南，再出荆门，走上北边的一个斜坡，又可见已经成林的一片棕色的栗树群，这个林间有一片广场，隐约还可看见林外的山影和湖光。如果是在清晨，这里尤其清静，只有淡淡的云露，与和暖的爽风，陪伴着这片美景。冰心最喜欢在黎明时分，到这片广场上来散步，沐浴着和暖的晨光和晨风，赏心悦目。她有时一个人坐在林间的草地上，静静地看书；有时也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到这里来玩耍，看着她们快乐地游戏，奔跑，心中充满了甜蜜和愉快的感觉。

假如走到这座山坡的尽头，那里还有一个松柏环绕的平台，这个平台上面有石块和石磴，可以坐着休息，也可以站着观景。由这里向下望去，可以看见昆明城内的街市和房屋，错落有致。而由此处向南边望去，则可以看见城外的三景：龙街子山上的“龙山花坞”，罗藏山的“梁峰兆雨”，城南印心亭下的“河洲目渚”。这个平台，以及这个平台上的石磴和石块，是冰心的朋友们最喜爱的谈话与休息的场所。尤其是年纪较轻的朋友，只要走到冰心的家里来，必定要跑到平台上

① 冰心：《默庐试笔》

的草坡上，游戏，谈笑，或者横躺竖卧在松柏树下，领略自然的风光，不到开饭的时候，是舍不得离开这里的。

昆明，这个处处皆景的美丽城市，曾经令多少人向往，又令多少人倾倒啊！尤其是她那四季如春，花团锦簇的郊区，更是令人喜爱，依恋。冰心自己说过："回溯生平郊外的住宅，无论是长居短居，恐怕是默庐最惬心意。"[1] 不但是冰心在美国留学时去过的伍岛，白岭，无法与默庐相比，即使是冰心童年时代生活的地方——烟台，比起呈贡来，也显得山过于高，水过于深，不如呈贡的风采来得诱人："论山之青翠，湖之涟漪，风物之醇永亲切，没有一处赶得上默庐。我已经说过，这里整个是一首华姿华斯的诗！"[2]

住在这诗一样的呈贡的冰心，她的热爱大自然的天性，得到了满足。这里是大后方，生活也过得"妥帖，快乐，安稳"[3]，丈夫、孩子们都在身边，按说她可以乐而忘忧，乐而忘返，心满意足地在这里过日子了。

但是，处身在美丽的大自然怀抱之中，又过着快乐的生活的冰心，却又无时无刻地不在苦恋着已遭沦陷之苦的北京，虽然她这里的环境，"实在比我北平西郊的住处，还静，还美。"[2]

为什么这样苦恋着北京呢？因为："我的一生，至今日止在北平居住的时光，占了一生之半，从十一二岁，到三十几岁，这二十年是生平最关键，最难忘的发育、模塑的年光，印

①②③ 冰心：《默庐试笔》

②② 冰心：《默庐试笔》

象最深，情感最浓，关系最切。一提到北平，后面立刻涌现了一副一副的面庞，一幅一幅的图画：我死去的母亲，健在的父亲，弟，侄，师，友，车夫，用人，报童，店伙……剪子巷的庭院，佟府堂前的玫瑰，天安门的华表，‘五四’的游行，‘九一八’黄昏时的卖报声，‘国难至矣’的大标题”[2]，—— 这一切，都十分牵动冰心的感情，使她不能忘怀。除去这些令她苦恋的人物与经历之外，还有北京香山的红叶，大觉寺的杏花，故宫的金壁辉煌的殿堂，北海的巍峨壮观的白塔，隆福寺的庙会，甚至于东来顺的涮羊肉，全聚德的烤鸭，沿街叫卖的冰糖葫芦，糖炒栗子，这些满渗着浓重的北京风味的一切，都勾起了冰心的记忆，使她思念，使她苦苦地留恋着她的第二故乡—— 北京！

但是，她也知道，她是不能回去的，她绝不能够回到那个被敌人蹂躏着的第二故乡去，她不能看着这个在敌人铁蹄下呻吟着的美丽的城市而不动愁容，她觉得自己如此热爱与留恋的第二故乡，好象已经死去了！“北平死去了！我至爱苦恋的北平，在不挣扎不抵抗之后，断续呻吟了几声，便恹然地死去了！”[1]

1940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处于最困难的阶段里。3月份，汉奸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日本帝国主义者立即发表声明，表示承认和支持。从5月份开始，侵华日军即从已经沦陷了的武汉，发动了西犯的攻势，企图把侵略的魔爪，进一步伸向我国的大后方—— 四川和云南。在这生死

① 冰心：《默庐试笔》

存亡的紧急关头，蒋介石政府不是积极抗战，却把精力用于对付自己的同胞——真正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7月份悍然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8月初，日本侵略军一方面配合国民党的剿共计划，大举进犯太行山区的抗日根据地，进行灭绝人性的烧杀；一方面又派出大群大群的轰炸机，对重庆狂轰滥炸，使这座山城燃起了大火，几日不灭。8月底，日本侵略军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云南，把无数的炸弹丢进了美丽的春城昆明。

就在这一年，冰心的父亲谢葆璋，在惦念着远在万里之外的爱女、女婿和外孙、外孙女儿，又忧心如焚地关注着艰苦抗日的战局的焦虑的心情中，与世长辞了。

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热衷于消灭异己的国民党当局，表面上却要打出抗日的招牌来。也是在这一年，宋美龄以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校友的名义，用前后同学的身份，从重庆写了一封信给住在呈贡的冰心。其中的意思是：你躲在昆明的呈贡，不能参加抗日的工作，欢迎你到重庆来，参加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工作，以便直接地投入抗战活动，等等。宋美龄的本意，是想让这位有名的女作家，出来为国民党当局装装门面。其实，冰心1923年去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研究院作研究生的时候，在这所大学里读本科的宋美龄早已毕业离校了。她们两人在美国，从来没有碰过面。但是，女政客宋美龄，要想拉拢有名气的女作家谢冰心，就利用了这种其实是非常勉强的所谓同窗之谊，而且把这种政客耍弄的权术手段，加上了一种堂而皇之的抗日的名义。由于这样的一个因由，这一年的冬天，冰心全家便离开了昆明，到了被国民党

政府明令为陪都的山城重庆。

重庆这座城市的面貌，与昆明相比，实在是大不相同的。——昆明有象北京一样的蔚蓝的天空，有象北京一样的和煦的阳光；而重庆这座山城，却常常是雾，常常是雨，再加上老是爬不完的上上下下的台阶。还有许多令人一望便会触目惊心的断壁残垣，在碎石烂木中间，大火燃烧的痕迹，仿佛是涂抹的墨黑的颜色，这是几个月前，日本侵略军的狂轰滥炸，给重庆人民留下来的灾难的印记。重庆是陪都，有许多国民党当局的要员，各种各样的机构，有许多从内地迁来的大学，众多的教授，学生，作家，艺术家。这里也有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代表，有广大的爱国志士，有工人，有农民。有许多新闻记者，也有国民党的特务机构，等等。这里聚集着各种各样的政治势力，也聚集着愈来愈多的普通人。这里真是又拥挤，又忙乱。

冰心全家到了这里之后，住在郊区的歌乐山腰，她为这个住处取名叫“潜庐”。据冰心本人告诉笔者：全国解放后，她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去重庆视察，曾经去过歌乐山；但是，潜庐所在的那段山腰，因军事设施之故，而不能随便出入了。①

冰心这样描写了这个新家：“潜庐只是歌乐山腰向东的一座土房，大小只有六间屋子，外面看去四四方方的，毫无风趣可言！倒是屋子四围那几十棵松树，三年来拔高了四五尺，把房子完全遮起，无冬无夏，都是浓阴逼人。房子左右，有

① 据冰心 1986 年 3 月 17 日下午对笔者的谈话。

云顶、兔子二山当窗对峙，无论从哪一处外望，都有峰峦起伏之胜。房子东面松树下便是山坡，有小小的一块空地，站在那里看下去，便如同在飞机里下视一般。嘉陵江蜿蜒如带，沙磁区各学校建筑，都排列在眼前。隔江是重庆，重庆山外是南岸的山，真是‘蜀江水碧蜀山青’。重庆又常常阴雨，淡雾之中，碧的更碧，青的更青，比起北方山水，又另是一番景色。”①

知道冰心抵达重庆，七君子之一的史良，以及邓颖超的朋友刘清扬，便专程拜访了冰心，并把妇女指导委员会的背景和其中的复杂情况，通报给冰心。当她知道这个所谓指导委员会的内幕之后，正直的冰心，便立即退回了该委员会送给她的薪金与聘书。这时候，冰心一家的经济是很拮据的。但是，清高的冰心，不愿意与污七八糟的指导委员会发生任何关系。因此，刚刚与这个组织割断联系，冰心便立即参加了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

住在歌乐山腰的冰心，虽然躲掉了国民党政客的纠缠，却躲不开敌机轰炸的灾难。当一群一群的轰鸣着的日军轰炸机，从“潜庐”的屋顶上飞过，惊醒了她的熟睡着的孩子们的时候，她是多么地希望，自己柔弱的手里，也能握上一杆钢枪啊！她在刚刚来到重庆之后不久的这一年的除夕，写了一首名叫《鸽子》的诗：

砰，砰，砰，

① 冰心：《力构小窗随笔》

三声土炮；
今日阳光好，
这又是警报！
我忙把怀里的小娃娃交给了他，
“城头树下好藏遮，
两个孩子睡着了，
我还看守着家。”
驮着沉重的心上了小楼，
轻轻的倚在窗口；
群鹰在天上飞旋，
人们往山中奔走。
这声音
惊散了隐栖的禽鸟，
惊散了歌唱的秋收。

轰，轰，轰，
几声巨响，
纸窗在叫，
土墙在动，
屋顶在摇摇的晃。
一翻身我跑进屋里，
两个仓皇的小脸，
从枕上抬起：
“娘，你听什么响？”
“别嚷，莫惊慌，
你们耳朵病聋了，
这是猎枪。”

“娘，你头上怎有这些土？
你脸色比吃药还苦。”
我还来不及应声，
一阵沉重的机声，
又压进了我的耳鼓。
“娘，这又是什么？”
“你莫做声，
这是一阵带响的鸽子，
让我来听听。”
檐影下抬头，
整齐的一阵铁鸟，
正经过我的小楼。
傲慢的走，欢乐的追，
一霎时就消失在
天末银灰色的云堆。

咬紧了牙齿我回到屋中，
相迎的小脸笑得飞红，
“娘，你看见了那群鸽子？
有几个带着响弓？”
巨大的眼泪忽然滚到我的脸上，
乖乖，我的孩子，
我看见了五十四只鸽子，
可惜我没有枪！

吴文藻的一位老同学，正在重庆主编一个名叫《星期评论》的刊物，知道冰心来到了重庆，就找上门来，约请冰心

为他的刊物写稿。这时候，年关已到，冰心为了解决生活上的燃眉之急，就答应为他撰写。用后来冰心自己的话说："我那时——1940—1943年——经济上的确有些困难，有卖稿的必要（我们就是拿《关于女人》的第一篇稿酬，在重庆市上'三六九'点心店吃的1940年的年夜饭的）。"[①] 于是，在《星期评论》的第8期上，就登出了《关于女人》的第一篇文章，题为《我最尊敬体贴他们》。这篇文章署名"男士"，是冰心为自己取的一个别致有趣的笔名。冰心为何不用自己原来那个极为有名的冰心，却改用"男士"呢？冰心后来说："这几篇东西不是用'冰心'的笔名来写，我可以'不负责任'，开点玩笑时也可以自由一些。""这就好象一个孩子，背着大人做了一件利己而不损人的淘气事儿，自己虽然很高兴，很痛快，但也只能对最知心的好朋友，悄悄地说说。"[②]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一层更深的用意，就是：冰心不愿意在重庆使用自己的笔名，鉴于那件妇女委员会的事情，她不愿意卷入那种带有政治背景的事儿，当然也不愿意国民党当权者来纠缠她，包围她。郭沫若后来曾经在自己的文章中追述过这样一件事："记得在重庆时蒋宋美龄曾与谢冰心作过一番谈话。蒋宋美龄问：'中国国民党为什么没有一位女作家？'谢冰心回问：'中国国民党又有哪一位男作家？'这是在文艺圈子里面传播得很广的一段插话。"[③] 可见这位清高、温柔的女

① 冰心：《〈关于女人〉三版自序》
② 冰心：《〈关于女人〉三版自序》
③ 郭沫若：《斥反动文艺》

作家，自有她的不攀附权贵，不阿谀奉承的骨气。

在1941年这一年，冰心从1月至12月，接连地为《星期评论》写了九篇《关于女人》的文章，它们的题目是：《我最尊敬体贴她们》、《我的择偶条件》、《我的母亲》、《我的教师》、《叫我老头子的弟妇》、《请我自己想法子的弟妇》、《使我心疼头痛的弟妇》、《我的奶娘》、《我的同班》。

《关于女人》的九篇作品发表以后，受到了文化界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叶圣陶就以翰先为笔名，在《国文杂志》上，把《关于女人》中的一篇《我的同班》作为范文，进行了评讲。文字修养功底很深的叶圣陶先生，在篇首这样介绍说："'男士'当然是笔名，究竟是谁，无法考查。但据'文坛消息家'说，作者便是大家熟悉的冰心女士。从题取笔名的心理着想，也许是真的。现在假定他真，那末，冰心女士的作风改变了，她已经舍弃她的柔细清丽，转向着苍劲朴茂。"①

1943年春天，当时有一家"天地出版社"，想要出版《关于女人》的单行本："今年春天，'天地出版社'托我的一个女学生来说，要刊行《关于女人》，我便把在《星期评论》上已经印行的九段，交给他们。春夏之交，病了一场，本书的上半本，排好已经三月，不能出版。'天地社'催稿的函件，雪片般的飞来，我只好以新愈之身，继续工作。山上客人不少，这三个星期之中，我在鸿儒谈笑、白丁往来之间，断断续续的又写了三万字，勉强结束。"② 这样写出的三万字就是

① 载《国文杂志》桂林版第1卷第4、5号合刊。

② 冰心：《〈关于女人〉后记》

《关于女人》后面的七篇：《我的同学》、《我的朋友的太太》、《我的学生》、《我的房东》、《我的邻居》、《张嫂》、《我的朋友的母亲》。

自己是一个女性，而且是一个“女性味儿”十足的女性——性格温柔，举止娴雅，既是一位贤惠体贴的妻子（身边有一位非常理想的丈夫），又是一位慈爱宽厚的母亲（膝下有三个非常可爱的儿女），有着一个知识妇女所能拥有的最为美满的家庭。在这种情况下，却要装扮成一个“男士”，假托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而且是一个“条件”（用今天的话来说）很好的男子——他有着很好的工作，有着很好的家庭背景，还很有点儿名气，却尚未娶妻，是个“超大龄未婚男子”。用这样一种身份的人物的笔，来写文章，对于这位善于歌颂爱，歌颂美，歌唱温情的女作家来说，可以算作是第一次尝试，也是一种极有意思的创举。

聪慧的冰心，她在这部系列创作的一开始，就别出心裁地引用了曹雪芹《红楼梦》里的一大段话，作为该书的《抄书代序》：“……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识见，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愧则有余，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日欲将以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绣袴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负罪固多，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故当此蓬牖茅椽，绳床瓦灶，未足妨我襟怀；况对着晨风夕月，阶柳庭花，更觉润人笔墨；我虽不学无文，

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衍出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破一时之闷，醒同人之目，不亦宜乎？……”既借用了曹雪芹这个男人的笔，表达了女作家自己创作诸篇的谐谑笔调；又借用“何妨用假语村言”这样的词句，含蓄地表明了女作家的真实身份。

在《我最尊敬体贴他们》里，冰心用了很多幽默、游戏的笔墨，说自己“在二万万零一个男人之中，我相信我是一个最尊敬体贴女性的男子。认得我的人，且多称誉我是很女性的，因为我有女性种种的优点，如温柔、忍耐、细心等等，这些我都觉得很荣幸。同时我是二万万零一个人之中，最不配谈女人的，因为除了母亲以外，我既无姐妹，又未娶妻”。但是在这类诙谐、幽默的字里行间，冰心却又借助这位极有教养的“男士”之口，极讲道理地阐述了她的男女平等的观点。她在谈到有的男人给自己罗列了二十六个择偶条件这件事时，极为明智而合理地指出：“我以为男子要谈条件，第一件事就得问问自己是否也具有那些条件。”一般男人都喜欢找个长相美丽的妻子，冰心劝他说：当你提出这类条件时，请“先去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是不是一个漂亮的男子”。一般男人又都喜欢找个性格温柔的妻子，冰心又劝他说：当你提出这类条件时，也“得反躬自省，自己是否一个绝不暴躁而又讲理的人”。诸如此类的条件，冰心都一一耐心地，而又非常合情合理地，给以规劝。在当时——四十年代，就已存在着知识妇女的事业与家务之间的矛盾，冰心这位“男士”深深地理解，一个女人，假如她“不幸而被恋爱征服，同时又对事业不忍放弃”，那么就糟了，“这两股绳索就会把她绞死”！

在一对知识分子夫妇（假如夫人是位职业妇女）的家庭中间，经常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假如饭生菜不熟，或小孩子喧哗吵闹，做丈夫的就会以责备的眼光看太太，太太却以抱歉的眼光来看”丈夫和客人，而客人“只好以悲悯的眼光看天”。“我心里真想同那做丈夫的说：‘天哪！她不是和你一样，一天坐八小时的办公室吗？’—— 我不是说一天坐了八小时的办公室，请客时就应当饭生菜不熟，不过至少他们应当以抱歉的眼光对看，或且同以抱歉的眼光看”客人。“至于把这责任完全推给太太的办法，则连我这一个女性的男子，也看不过了”。

正因为冰心在第一篇文章里，就表现了彻底的男女平等的思想，所以她才借用一个男子的言语来自嘲，说：“有一个朋友看了这一段，以为象我这样尊敬体贴女人的人，可以做个模范丈夫，必不难找个合式的太太。”

在第二篇《我的择偶条件》里，冰心更是运用戏谑诙谐的语言，给自己罗列了二十五条“择偶条件”，虽然这一大串择偶条件，都是出自一个有教养的、通情达理的、中年男子之口，带着很大的玩笑成分，但其中却也不乏严肃的内容，表现了冰心对于妇女的美及修养等问题的看法。比如，冰心笔下的“男士”就希望自己将来的配偶要懂得雅致的美，“希望对方也不浓施脂粉，厚抹口红”，“希望对方不穿浓艳及颜色不调和的衣服，我总忘不了黄莘田先生的两句诗：‘颜色上伊身便好，带些黯淡大家风。’”还希望自己将来的配偶要有较为高尚的生活情趣，“因为我是学文学的，所以希望对方至少能够欣赏文艺”。“因为我很择客，所以希望对方也不招致许

多无聊的男女朋友，哼哼洋歌，嚼嚼瓜子，把桔子皮扔得满地”。“因为我颇有洁癖，所以希望对方也相当的整齐清洁——至少不会翻乱我的书籍，弄脏我的衣冠”。“我对于屋内的挂幅，选择颇严，希望对方不在案侧或床头，挂些低级趣味的裸体画，或明星照片”。“因为我自觉是个‘每逢大事有静气’的汉子（看见或摸着个把臭虫时除外，但此不是大事），所以希望对方遇有小惊小怕时，不作电影明星式的捧心高叫”等等。

读了冰心在上面两篇文章里所运用的这些诙谐、幽默、戏谑、游戏的笔墨，就会使得了解“男士”的真正身份的人，读来觉得韵味无穷，而喜笑颜开。即使过了四十几年之后，当“男士”即是冰心已为读者所知的现在，再来重读这些文章，仍然会觉得余味无穷。

冰心本人是女人，并且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女人，她认识许多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女人，而且非常了解自己的同性，她自己在《关于女人》的《后记》里，就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所认识的女性，往少里说，也有一千个以上：我的姑姨妗婶，姐妹甥侄，我的女同学，我的女朋友，我的女同事，我的女学生，我的邻舍，我的旅伴；还有我的朋友的姑姨妗婶，姐妹甥侄……这其中还有不少的惊才绝艳，丰功伟烈，我真要写起来，一辈子也写不完。但是这些女人，一提起来，真是‘大大的有名’！人人知晓，个个熟识，我一生宝贵女人的友情……”

而在她所认识的女性中，她第一个要写的，就是自己的母亲。冰心这样写到她：“天下的儿子，至少有百分之七十，

认为他的母亲乃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我则以为我的母亲，乃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中最好的一个。不但我如此想，我的许多朋友也如此说。她不但是我的母亲，而且是我的知友。我有许多话不敢同父亲说的，敢同她说；不能对朋友提的，能对她提。”冰心写到她的母亲如何有着政治的头脑，如何在辛亥革命前为同盟会传递着消息，如何在辛亥革命后“将她所仅有的一点首饰，换成洋钱，捐款劳军”。“五四”以后，又如何对新文化运动感到兴趣，而看书看报。在家庭里，她又是如何地匡护着丈夫和子女，把无私的爱交给他们，是一位最典型的贤妻良母。“她有现代的头脑，稳静公平的接受现代的一切。她热烈的爱着‘家’，以为一个美好的家庭，乃是一切幸福和力量的根源”。在这样的母亲的教养和熏陶之下，冰心和她的弟弟们都长成了有着良好教养和端正品格的一代新人，以至到了中年的冰心，“关于妇女运动的各种标语，我都同意，只有看到或听到‘打倒贤妻良母’的口号时，我总觉得有点逆耳刺眼。当然，人们心目中‘妻’与‘母’是不同的，观念亦因之而异。我希望她们所要打倒的，是一些怯弱依赖的软体动物，而不是象我的母亲那样的女人”。

除了自己的母亲之外，“第二个女人，我永远忘不掉的，是T 女士，我的教师”。这位T 女士的原型，就是她在贝满女中读书时，教她历史、地理、地质等课的老师丁淑静。不过她不曾教过冰心代数，也没有给冰心补过课，给冰心补课的是另一位外校教师—— 培元蒙学的一位数学老师。但文中

“其他的描写，还都是事实”。[①] 在《我的教师》里，冰心为读者刻画了一位“最美丽、最和平、最善诱”的年轻女教师的形象。她很年轻，却很负责任，很有学问，性格很温柔，很自尊，又很孝顺。这位长相美丽的T女士，一辈子过着严肃而有意义的生活，虽然“至死未结婚”，但她逝世后，“追悼哀殓她的”，却“有几万人”。当冰心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得知她去世的消息后，“忽然流下泪来，这是母亲死后第一次的流泪”。

在《关于女人》中，冰心刻画了好几位性格不同、职业不同、身份也不相同的知识妇女形象。除去T女士之外，象《我的同班》中那位态度坦白、判断公允、“有和男人一样的思路”，受到男女同学一致爱戴的“学生领袖”—— 闽南大姐L女士。象《我的同学》中那位“鸡群中的仙鹤，万绿丛里的一点红光”的容貌美丽的C女士（C女士的原型就是冰心在贝满女中及协和女大上学时的同学陈克俊）。象《我的朋友的太太》中的那位很有审美素养的学生物的“居里夫人”L太太。象《我的学生》中的S，《我的邻居》中的M（M同时也是“男士”从前的学生，“男士”的同事的女儿），《我的朋友的母亲》中的K老太太。其中还有一位法国的知识妇女，这就是《我的房东》里描写的那位白发盈颠，“绝等漂亮”，“绝等聪明”，且又“温柔雅澹”的巴黎老小姐——R小姐。

在冰心笔下的这些知识妇女的形象中，我们不会忘记那位聪明、有才、自幼爱好写作、勤奋学习的M太太（《我的

① 冰心：《我入了贝满中斋》

邻居》)。本来她会有个光明的前途，但是，因为嫁了一个不通人情的丈夫，又有一位不通人情的婆婆，再加上抗战期间大后方的种种不便与通货膨胀，她又是个只知读书不会理家的人，生活便一天天地困难，人也便一天天地憔悴下去了。这个在北方长大的女人，是多么地希望能够在有着浓郁明艳的风光的南方，写一点诗，写一点文章，教教书啊，这些本来都是她非常擅长的事情。然而，丈夫和婆母的偏见，使她不得不终日地缠绕于琐碎的日常家务之中，身体不支，精神不振，让远在北方的父母也时时为她操心。这篇作品虽然也涉及了抗战时期的社会生活，但从它的主题看，却是冰心早在“五四”时期就非常关心的那个家庭问题的延续。不过在《我的邻居》这篇作品里，不象在《两个家庭》那篇作品中那样，冰心谴责的是M 这个不通人情、自私狭隘的男性作家。

我们更不会忘记《我的学生》中的S。她是这篇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是“男士”的学生，这是一位在知识妇女中少见的，兼有聪明、活泼、要强、能干、肯吃苦、会生活、坚韧刚毅、乐于助人等等品质的十分难得的人物。S是个外交官的女儿，自小在澳洲长大，说得一口极流利的英语，是个完全洋化了的女孩子。在她刚一出场的时候，她给作者留下的印象就是：“除了黑发黑睛之外，她的衣着，表情，完全象一个欧洲的少女。”她的作风也象欧美女孩子一样，既活泼又淘气，会模仿教授们的方言土语、南腔北调，对赛球、骑车、散步、溜冰、演讲、排戏、唱歌、跳舞等等事项，无所不会，无所不精。

其实这个生性活泼的女孩子，生活态度却是极其认真严

肃的。这不仅表现在她自己努力读书，学习成绩门门优异上，尤其表现在她对恋爱婚姻的态度上，她选择丈夫的标准上。——她并不理会那些围在她身边，陪着她跳舞，陪着她打球，陪着她玩耍和游戏的男朋友们，却独独地选定了一位恰如古寺里的老僧一样的地质学家P做丈夫。因为P虽然对唱歌、跳舞之类绝对外行，在他的老师们的眼睛里，却是一个绝好的学生，极为用功，性格又极为踏实、沉静，除去读书之外，似乎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兴趣。对于狂舞酣歌，一向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而一进入书房，一看到标本，立即就会精神百倍，一谈到专业，立即就会口若悬河。难怪一位很有见识的老者这样评价P："P就是地质本身，他是一块最坚固的磐石。"

S能够选中这样的一个人物当丈夫，足可看出她评价人物的标准，以及她的生活态度的严肃。但是有了这样一块"磐石"当丈夫，也并不妨碍她把自己的家庭布置成为"澳洲中国公使馆"，S本人完全是欧美主妇的派头，总是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保姆、洗衣妇、厨子、园丁、司机，都会听英语。习惯于在这样的生活方式里过活的S，抗日战争爆发后，却毅然决然地跟随着丈夫到了大后方，过起了节衣缩食，艰苦朴素的生活。自己动手盖房子，打家具，做咸鸭蛋和泡菜，在溪边的流水里洗衣服，补袜子，还自己开垦了菜园，种上了辣椒、西红柿，豆角，黄瓜、茄子，又自己喂养了鸡、羊、犬、猫、白兔、松鼠。S一切都是自己动手，从早忙到晚，把这个处在水边山后的茅屋，整理得井井有条，就其整洁和美观说来，绝不比北京的公使馆逊色，因此S自己，也戏称这

是公使馆的“山站”。

这个身处大后方的知识妇女，不仅把精力贡献给了丈夫、孩子和家庭，也把精力贡献给了从北京撤退到大后方来的同事、朋友和当地的老百姓们。乡下孩子有病，也抱出来给她看。P 的一位同事出差去了，他的太太忽然得了急性盲肠炎，热心助人的 S，便自己开着汽车把她送到了医院，又义务地服侍了她三个星期，还输给了病人 400cc 血。这位太太的丈夫不在身边，又不肯自己出钱买血、请护士，一切重担便都落在了热心助人的 S 身上。而当那位太太的丈夫回到了太太的身边，S 终于返回了自己的家中，见到了累坏了的 P，苦坏了的孩子们时，S 自己却因为失血过多，营养不足，操劳过度，而瘦得不成样子，终于支持不住，躺下去了！原来 S 的身体早就有些不支，只是她太要强，仍旧勉强支撑着局面，这次重大的损耗，使她患上了黍形结核症。这种不治之症，终于夺去了这个美丽、年轻的生命。

冰心非常喜欢这个 S，所以当她在这篇作品的结尾处，写到第一人称的“我”接到了 P 写给他的报告 S 病逝的信之后，心中立即涌出了沉痛的哀思：“忽然广场上一声降旗的号角，我不由自主的，扔了手里的信，笔直的站了起来。我垂着两臂，凝望着那一幅光彩飘扬的国旗，从高杆上慢慢的降落了下来。在街角的余音里，我无力的坐了下去，我的眼泪，不知从哪里来的，流满了我的脸上了！”实际上，S 是把自己的充满了活力的生命，间接地、默默地贡献给了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了。

《我的朋友的母亲》中的 K 老太太，也是一位令人难以忘

怀的人物。这是一位头脑清醒、通情达理、很有见识的老年知识妇女，她用极其鲜明的态度和干练的手段，轻而易举地处理好了一件在别人看来是十分难解的问题，这就是她的儿子K 及他的助教F 小姐之间的爱情纠葛，以及如果这种感情发展下去，就会波及到K 的太太及他们的孩子，破坏他们原有的老少三代和睦的家庭。老太太不仅劝住了儿子，还把聪明能干的F 小姐动员上了前线，保护了等在北京苦守的儿媳和孙子，保住了老太太辛苦维持了几十年的和谐宁静的家庭。她的远大的目光和豁然大度的胸怀，使她明智而又简单地解开了这个复杂的感情之“结”。从表面上看，这也是一篇描写家庭问题的小说，但是，造成这种家庭问题的原因，却是战争给社会带来的动乱和离散，所以，这又是一篇描绘社会问题的小说，正象作品中的K 老太太对“我”所说的：“都是这战争搅得人乱七八糟的。”也如K 老太太对F 所说的：“战争虽长，也终有和平的一天。有一天，胜利来到，惊喜袭击了各个人的心，那时真是‘飞鸟各投林’，所剩下的只是一片白茫茫的大地。”

虽然因为用了“男士”的笔名，冰心在《关于女人》里，常常使用一些玩笑的笔法，但是，细细地体味起来，她在《关于女人》中所刻画的许多人物，和在这些人物身边演绎出来的故事，作者的立意，又常常是极为认真和严肃的。

象《我的同班》中的L 女士，她象《我的教师》中的T 女士一样，终生从事着严肃的工作——她是一名优秀的产科医生，她那双灵巧的手，为这个世界接引降生了许多生命，当北京已经沦陷于敌手之后，笑口常开、性格开朗的她，却

“常常深思的皱着眉”，对她的同学“男士”说：“我呆不下去了。在这里不是‘生’着，只是‘活’着！我们都走吧，走到自由中国去，大家各尽所能，你用你的一支笔，我们用我们的一双手，我相信大后方还用得着我们这样的人！”当“男士”向她表示：“你们医生是当今第一等人材，我这拿笔杆的人，做得了什么事？”时，她“正色拦住我说：‘×××，我不许你再说这些无益的话。你自己知道你能做些什么事，学文学的人还要我们来替你打气，真是！’”最后她终于悄然地离开了北京，到了在西南的一个城市，剪短了已经灰白的头发，穿上了戎装，当上了军医，为中华民族的未来而继续地工作了。

冰心笔下的另外几个知识妇女，象M 太太、S、K 老太太等，她们的自身，虽然没有走上抗日战争的前线，但是，她们却都在默默无言地忍受着战争带给她们的苦难，并在当时艰难的境遇里，尽可能地维持着较为正常的生活秩序。

这种反对侵略战争的思想，同样表现在描写异国知识妇女的《我的房东》里。六十开外的R 小姐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小说家，她为了自己的事业——终生全心全意地从事写作，而没有结婚。她有高雅的生活情趣，择友极严。但当德国法西斯侵占了巴黎之后，她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习惯遭到了挑战和破坏。冬天的巴黎缺乏燃料，而如果家里没有德国军官居住，就不能领到燃料，但是以她那样的为人，怎能想象，她会允许异国侵略军的军官住进自己的家呢？“男士”顾念着她，她也顾念着回到了沦陷的北京的“男士”，他们用这样的语言互相勉励：“振奋起来吧，一个高贵的民族，终久是要抬头的！”

《关于女人》中还有两篇引人注目的文章，这是为两位劳动妇女而作的。其中的《我的奶娘》颇富感情，写的是她幼时的乳母。这是一位忠厚、朴实、责任心强的农村妇女，她长相虽然不大好看，心地却正直善良。她的丈夫是被日本人欺负死的，因此对日本侵略者怀着仇恨和深深的戒心。她的唯一的女儿夭折了，她就把希望寄托在她哺乳的荣官身上，希望他长大后能够为她报杀夫之仇，能“跨海征东”，“出了我那死鬼男人的气”。她常常当着荣官父母的面，讲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及他们的种种兽行。冰心为何在这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怀念起了已经去世很久的奶娘，是很令人注意的。因为正是这位丈夫被东洋鬼子欺压而死的劳动妇女，第一个在冰心幼小的头脑里灌输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思想。冰心清楚地记得她的聪明的预见：“将来我们这里，要没有东洋人造反，您怎样罚我都行！”与日本侵略者战斗过的谢葆璋，每逢听到这里，总是连连地点头，称赞奶娘有见识：“她这话有道理，我们将来一定还要吃日本人的亏。”正象冰心自己说的：“我的抗日思想，还是我的奶娘给培养起来的。”“从此我恨了日本人，每次奶娘带我到街上去，遇见日本人，或经过日本人的铺子，我们互搀着的手，都不由的捏紧了起来”。奶娘为她播种下的爱国抗日思想的种子，象父亲为她播种下的一样，在冰心的头脑里生了根。所以，当她青年时代参加学生运动，在游行示威的队伍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时，她一方面想念着自己的父亲，一方面又觉得“仿佛我的奶娘在牵着我的手，和我一同走，和我一同喊似的”。而今天，已经做了三个孩子的母亲的冰心，在抗日的大后方，又怀念起了为她播

种抗日思想种子的乳母。她这样地告慰着九泉之下的故人："安息吧，这良善的灵魂。抗战已进入了胜利阶段，能执干戈的中华民族的青年，都是你的儿子，跨海东征之期，不在远了！"

另一篇以劳动妇女为题的文章是《张嫂》。冰心在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可怜，在'张嫂'上面，我竟不能冠以'我的'两个字，因为她不是我的任何人！她既不是我的邻居，也不算我的佣人，她更不承认她是我的朋友，她只是看祠堂的老张的媳妇儿。"这是一位极其能干，而且特别能够吃苦耐劳的典型的农村劳动妇女，她永远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种地，挑水，砍柴，洗衣，织渔网，打豆子，做饭，打扫卫生，什么都干；总是在做，不是匆匆的进来，就是急急的出去，手上，肩上，背上，腰上，总不空着，总有活儿干；虽然贫苦，十二岁就当了童养媳，但却一直自尊自爱，从不多说什么，只是默默无言地苦干。艰苦的劳动已经吞食了她的青春，二十五岁的青年妇女，看上去却象三四十岁的人，但她从来没有怨言，只是一味高高兴兴地勤恳地苦干。冰心对象她这样的劳动妇女充满了敬意，她借用作品中的"我"，这样地赞扬着张嫂："她不知道她正在做着最实在，最艰巨的后方生产的工作。我呢，每逢给朋友写信，字里行间，总要流露出劳乏，流露出困穷，流露出萎靡，而实际的我，却悠然的坐在山光松影之间，无病而呻！看着张嫂高兴勤恳的，鞠躬尽瘁的样儿，我常常猛然的扔下书站了起来。""那一天，我的学生和他一班宣传队的同学，来到祠堂门口贴些标语，上面有'前方努力杀敌，后方努力生产'等字样。张嫂站在人群后面，也在

呆呆望着。回头看见我，便笑嘻嘻的问：‘这上面说的是谁？’我说：‘上半段说的是你们在前线打仗的老乡，下半段说的是你。’她惊讶的问：‘×先生，你呢？’我不觉低下头去，惭愧的说：‘我么？这上面没有我的地位！’”

用这样虔诚的口吻表示对劳动人民的敬佩的赞颂，并且谦恭地把自己和劳动人民加以对比而自愧不如，这样的态度，与冰心过去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相比，又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比起以前写作的《最后的安息》、《六一姐》来，固然是有了极大的不同，就是比起十年前写的，态度已有很大改变的《分》和《冬儿姑娘》来，也可看出明显的变化了。

冰心对于忍辱负重，吃苦耐劳的中国妇女，一直抱有深深的敬意。她在开头的那篇《我最尊敬体贴她们》里，就说过：“在散离流亡的抗战时代，我看见过多少从前在沿海口岸，摩登城市，养尊处优的妇女们，现在内地，都是荆钗布裙栉风沐雨的工作，不论家里或办公室里，都能弄得井井有条。对于这种女人，我只有五体投地。假如抗战提高了中国的地位，提高了军人、司机、乃至一般工人的地位，则我以为提得最高的，还是我们那些忍得住痛耐得住苦的妇女。”

冰心对女性的了解很深刻，评价也适当：“我对于女人的看法，自己相信是很平淡，很稳静，很健全。她既不是诗人笔下的天仙，也不是失恋人心中的魔鬼，她只是和我们一样的，有感情有理性的动物。不过她感觉得更敏锐，反应得更迅速，表现得也更活跃。因此，她比男人多些颜色，也多些声音。在各种性格上，她也容易走向极端。她比我们更温柔，也更勇敢；更活泼，也更深沉；更细腻，也更尖刻……世界

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正因为冰心对女性有如上这样一种看法，她才又在《关于女人》的《后记》里，继续抒发了她在青少年时代就已经开始形成了的爱的哲学：“女人似乎更重视亲子之爱，弟兄姐妹的爱，夫妻的爱，朋友的爱……她愿意为她所爱的对象牺牲了一切。实际上，还不是她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她是无条件的，‘摩顶放踵’的牺牲了，爱了再说！在这‘摩顶放踵’的过程之中，她受尽人间的痛苦，假如牺牲而又得不到代价，那她的痛苦，更不可想象了。”“你说，叫女人不‘爱’了吧，那是不可能的！上帝创造她，就是叫她来爱，来维持这个世界。她是上帝的化生工厂里，一架‘爱’的机器。不必说人，就是任何生物，只要一带上个‘女’字，她就这样‘无我’的，无条件的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冰心这本《关于女人》，与她过去的作品风格有着明显的不同，因而在冰心的作品群中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她象自己的童年时代那样，又一次地女扮男装，不过这次不是穿上小军服，佩上小军刀，而是用自己的那枝生花妙笔，和非常俏皮的笔名“男士”了。她对自己扮演的角色很喜欢，笔头也极端胜任，因此使角色演得十分逼真，扮相也十分美好。这样的扮演给作品增加了很多的幽默，同时也增加了很多的情趣。冰心这位细心的“男士”，绝不显露自己女性的真身，但又常常运用一些妙语双关的神来之笔，使得了解作者真相的读者，不禁要拍案叫绝，赞赏作者的幽默，同时敬佩作者的聪明。比如：在《我的母亲》里，她写了这样一句话：“在我

底下，一连串的又来了三个弟弟。”又写了这样一句话：“我的至爱的母亲，我现在除了‘尚未娶妻’之外，并没有失却了‘家’之一切！”在《我的择偶条件》里，她又这样写道：“天哪，假如我真是个女人，恐怕早已结婚，而且是已有了两三个孩子了！”在假设中，吐露出了冰心自己实在的情形，而又不露痕迹，真是妙趣横生，引人入胜。

正因为《关于女人》的别致隽永，所以此书一出版，就获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很快地，就成了一本畅销书。一版，再版，连续地出，连冰心自己也说：“国内各报的‘文坛消息’上，都在鼓吹着‘《关于女人》销路极畅’，而在美国的女朋友，向我索书的时候，还摘录美国的文艺杂志，称誉《关于女人》为：‘The Best—Seller in chingking’”[①]。The Best—Seller in chi— ngking 这句英语译成汉语，意思就是：重庆的畅销书。

除去这个集子之外，冰心过去的作品，还由巴金主持，重新编辑成为《冰心著作集》（包括《诗集》、《小说集》、《散文集》），在大后方的重庆出版了。关于这件事，巴金这样说：“有一天我同冰心谈起了她的著作，说是她的书应该在内地重印。她说：‘这事情就托给你去办吧。’我答道：‘好，让我给你重编一下。’就这样接受下来她的委托。我得到作者的同意把编好的三册书交给开明书店刊行。”[②]

除去《关于女人》之外，冰心还在重庆写了几篇题材很

① 冰心：《〈关于女人〉再版自序》

② 巴金：《〈冰心著作集〉后记》

不相同的散文与诗。象上面提到过的以日机对重庆的狂轰滥炸为题材而作的诗《鸽子》，就不仅记述了日本飞机如何骚扰重庆的平民，还表现了冰心这位刚毅的母亲，如何用慈母的胸怀，保卫着自己年幼的孩子。象描写她在重庆的新居与生活点滴的《力构小窗随笔》。象纪念她在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留学时的同学，抗战时期死在重庆的女农学家沈骊英女士的散文《悼沈骊英女士》。沈是一位自强不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踏踏实实的科学工作者，又是一位“助夫之事业成功为第一，教养子女成人为第二，自己事业之成功为第三”的最典型、最模范、最聪明、最识大体的贤妻良母。她有幸福的婚姻，又有美满的家庭，还有自己热爱的事业，但在抗战时期的艰苦环境中，终因劳累过度而死亡。还有象回忆性的散文《我的童年》，这是应一位名叫李曼瑰的学生之约，而为李在编辑的一个妇女刊物而写的。象为吴文藻的朋友罗莘田教授的一本“自云南昆明至四川东川西川和川南旅行的游记”《蜀道难》所作的《〈蜀道难〉序》。其实这篇《序》中写的并非关于这本游记的本身，而是写作这本游记的这个人。象在战争结束之前不久，在1945年8月9日夜完成的，悼念她的多情的老友——她在福州女子师范预科时的同学，五四运动时期女学界联合会活动中的同伴，抗战期间对山而居的远邻，又是她的同乡的王世瑛的散文《我的良友——悼王世瑛女士》。王世瑛是北京女高师的毕业生，“五四”时期另一位女作家庐隐的同窗好友，她有一个极为美满快乐的家庭，但却没有等到抗战胜利，就病逝了。

而在所有的这些散文作品中，最引人注意的，恐怕还是

在1942年12月12日至1944年12月1日在潜庐之中的力构小窗下面，断断续续地写作而成的《再寄小读者》的四篇通讯。为什么这四篇写给小朋友们的通讯，会写了整整两年，冰心没有说明。但是，冰心在住进了潜庐之后，曾经写过这样的一段话："这房子里常常很静，孩子们一上学，连笑声都听不见。只主人自己悄悄的忙，有时写信，有时记账，有时淘米，洗菜，缝衣裳，补袜子……却难得写写文章！"① 可见冰心在战时的重庆，辛苦劳碌的状况，生活方式已与以往大不相同了。

这一次写《再寄小读者》，与1923年7月开始写《寄小读者》的第一封通讯，中间已经间隔了十九年半的时光。那时候，冰心还是一位刚刚大学毕业，即将出国留学的女青年，而现在，却是已经过了不惑之年的中年妇女了。在这将近二十年的漫长岁月里，冰心个人的生活也有了不小的变化，——她长大了，结了婚，有了孩子，做了母亲，又做了教师，作为一名知识妇女，她又多读了许多书，多走了许多路。这正如冰心自己所说的："这二十年的生命中虽没有什么巨惊大险，极痛狂欢，而在我小小的心灵里，也有过晓晴般的怡悦，暮烟般的怅惘，中宵梵唱般的感悟，清晨鼓角般的奋兴。"②

然而，当她在经历了二十年的生活之后，再与小朋友们通讯时，她最喜欢歌唱的主题，仍然是母爱。当然，也还有

① 冰心：《力构小窗随笔》

② 冰心：《再寄小读者·通讯一》

对于人生意义的探索。

她在1942年1月3日（阴历腊月初八）写的那篇《再寄小读者·通讯三》里，通篇都是对于母爱和自己母亲的歌颂。与二十年前在《寄小读者》里对于母爱的歌颂所不同的只是：那时她的母亲仍健在，而现在她的母亲却是早已去世了！然而慈母的形象和精神永远保留在她的心底："我们一家团聚，或是三三两两的在一起，常常有大家忽然沉默的一刹那，虽然大家都不说出什么，但我们彼此晓得，在这一刹那的沉默中，我们都在痛忆着母亲。""我们在玩到好山水时想起她，读到一本好书时想起她，听到一番好谈话时想起她，看到一个美好的人时，也想起她——假如母亲尚在，和我们一同欣赏，不知她要发怎样美妙的议论？要下怎样精确的批评？我们不但在快乐的时候想起她，在忧患的时候更想起她，我们爱惜她的身体，抗战以来的逃难，逃警报，我们都想假如母亲仍在，她脆弱的身躯，决受不起这样的奔波与惊恐，反因着她的早逝，而感谢上天。但我们也想到，假如母亲尚在，不知她要怎样热烈，怎样兴奋，要给我们以多大的鼓励与慰安——但这一切，现在都谈不到了。"她在二十年来的奔波劳碌之中，常常希望能有母亲相伴在自己的左右，尤其是在她感到疲倦，烦躁，颓丧的时候，更是希望能有母亲做自己精神的支柱，每逢这种时候，她就希望："假如母亲尚在，纵使我不发一言，只要我能倚在她的身旁，伏在她的肩上，闭目宁神在她轻轻的摩抚中，我就能得到莫大的慰安与温暖，我就能再有勇气，再有精神去应付一切。"然而，母亲确实是早已不在人间了，每逢想到这里的时候，她就感到了失母的莫大的悲哀。因此，

她希望小朋友们“永远生活在母亲的恩慈中”。她也希望：“没有母亲的小朋友”，能让自己“母亲的美华永远生活在你的人格里！”

生命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二十年来，冰心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索。但是，过了不惑之年的冰心，似乎仍然不能给“生命”、“人生”下个确切的定义。她只能把生命比喻作向东流去的一江春水，有时会遇到巉岩前阻，有时会遇到细细平沙，有时会遇到暴风雨，有时会遇到晚霞新月，总之是并不平坦，而终于还会流进大海。她又把生命比喻作“一棵小树”，在春、夏、秋中成长，而在冬天的朔风中倒下，落在大地的怀抱里。她认为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宇宙这个大生命中的微小的一息、一滴、一叶，而这每一个微小的一息、一滴、一叶，又都各自有着自己的使命。

《再寄小读者·通讯二》，可以算是冰心的“友谊篇”。她在这篇通讯里，向小朋友谈了友谊的重要、交友的艺术。她的“你能择友，则你的朋友将加倍的宝贵你的友情”、“使你堕落，消沉的，不是你的好朋友。同时也要警惕，你是否在使你的朋友奋兴，向上”？“当你的心帆飘流于‘理’‘欲’的三叉江口，波涛汹涌，礁石嶙峋，你要寻望你朋友的一点隐射的灵光，来照临，来指引”等等一系列精辟的见解，对于今天的小朋友以至于年轻人，仍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住在歌乐山上的冰心，把大部分的时间，用于理家和写作。有时，也与文化界的朋友们交往。1943年的夏天，郭沫若就托老舍把一张条幅转交给冰心，上面书写的，是郭沫若赠冰心的一首五律：

怪道新词少，病依江山楼。
碧帘锁烟雨，红烛映清流。
婉婉唱随乐，殷殷家国忧。
微怜松石瘦，贞静立山头。

1945年的8月，终于传来了战争结束的消息。这是盼望了八年之久的消息啊！当这个消息象旋风一样，迅速地传遍了重庆，传遍了四川，传遍了中国的每一个城市和乡村的时候，冰心正在潜庐里。周围的小孩子们在放声地笑，周围的大孩子们在放声地哭，周围的朋友们在向她讨酒喝。而女作家冰心，却静静地沉默着。——她是在回想这历时八年之久的战乱，并思考着这场灾难带给人们的教训。

第九章 战 后

含辛茹苦再来收拾，再来建设，再来创造。

—— 冰心：《给日本的女性》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时刻想念着第二故乡北京的冰心，终于在 1946 年的 7 月返回了北京。

这时候，冰心的老父谢葆璋先生，已经去世了六年。

回到北京之后的谢冰心，第一件要紧的事情，就是奔回她的母校燕京大学去。这是她青年时代读过书，和留学之后教过书的地方，也是她结婚以后，与吴文藻共同经营的小家庭的所在地。

燕京大学的校园，与战争爆发前一样，仍旧是郁郁葱葱，幽雅清静。湖水依然清清地漾着，树木青草依然绿绿地长着。大礼堂、图书馆和教学楼的建筑群，在一片湖光树影的衬托之下，也仍然象战前一样，翠瓦飞檐，富丽堂皇。

只是冰心和吴文藻战前在燕南园所住的房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廊子前种植的红月季和白玫瑰，通通被人连

根拔去，一株也不见了；小院里搭起来的一架紫藤萝，连花带藤带架子，也不翼而飞。但是，最令冰心伤心的，是楼上吴文藻教授的书房里，四壁皆空，吴文藻的几十盒笔记教材，都荡然无存了！原来，这里曾经是日本宪兵的住所，吴文藻的书房，就是日本宪兵拷问教授们的地方，吴文藻的笔记、教材，连同装存它们的书匣子，早就被日本宪兵运走了，不知去向。她又赶紧离开燕南园，跑到了另外一个珍藏她的爱物的地方。那是另外的一座大楼，这座大楼的顶阁，就是她们全家离开北京前，存放书箱的地方。冰心视为珍宝的东西，上面提到过的她在美国留学期间的日记，她和吴文藻之间的通信，她的母亲、朋友和许多“小读者”写给她的信件，吴文藻从做学生时候起就坚持写作的日记，她父亲年轻时在海上写给她母亲的信和诗，以及许多中外作家和学者送给她的亲笔签名的书籍，还有各种各样的照相册，善本书，画集，字画，笺谱，艺术品等等，共十五只大木箱，冰心都把它们存在这间顶阁里，结果也同燕南园的书房一样，也都变得四壁皆空了！冰心和吴文藻视若珍宝的一切，都已不翼而飞，荡然无存了！

冰心兴冲冲地从大后方飞回北京，没想到外表上没有任何变化的燕园，内里却遭到了这样重大的劫掠。她面对着眼前见到的一切，心里难过得不知如何是好，眼泪就慢慢地落了下来。学校的工友见到她这样，就悄悄地走到她跟前，轻声地告诉了她事情的经过：“在珍珠港事变的第二天清早，日本兵就包围了燕京大学，学生们都撵出去了，我们都被锁了起来。第二天我们也被撵了出去，一直到去年８月，我们回

来的时候，发现各个楼里都空了，而且楼房拆改得不成样子。……您的东西……大概也和别人的一样，再也找不转来了。”①

对于一个酷爱读书的作家和学者说来，大概没有什么损失，能比丢失了最心爱的书籍和资料更重大了！聪明才智堪与李清照媲美的冰心，这时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那位才思敏捷的宋代女词人：“我总忆起宋朝金人内犯的时候，我们伟大的女诗人李易安，和她的丈夫赵明诚，仓皇避难，把他们历年收集的金石字画，都丢散失了。李易安在她的《金石录·后序》中，描写他们初婚贫困的时候，怎样喜爱字画，又买不起字画！以后生活转好，怎样地慢慢收集字画，以及金石艺术品，为着这些宝物，他们盖起书楼来保存，来布置；字里行间，洋溢着他们同居的快乐与和平的幸福。最后是金人的侵略，丈夫的死亡，金石的散失，老境的贫困……充分描写了战争中文化人的末路！”“我不敢自拟于李易安，但我的确有一个和李易安一样的，喜好收集的丈夫！我和李易安不同的，就是她对于她的遭遇，只有愁叹怨恨，我却从始至终就认为战争是暂时的，正义和真理是要最后得胜的。”②

1946年的冬天，吴文藻博士做为战后赴日的中国代表团的职员，到日本进行社会考察。为了陪同丈夫东渡日本，冰心把孩子们分别寄养在舅舅家里，于这一年的秋天，和吴文藻一起来到南京，进行出国远行的准备工作。离开中国之前

① 冰心：《丢不掉的珍宝》

② 冰心：《丢不掉的珍宝》

不久，在这一年的10月，冰心写了一篇别有情趣的散文《无家乐》，讲的是她远行之前，把小家庭暂时解散，三个孩子寄养舅家，她与丈夫准备远行，这一时期的生活和心情。

冰心自从结婚以后，直到这时，已经做了她的小家庭的十七年主妇，尤其是抗战八年，这位作家兼家庭主妇的担子更重，她自己就用爬行的蜗牛来形容自己的处境："在下雨或雨后的天，常常看见蜗牛拖着那粘软的身体，在那凝涩潮湿的土墙上爬，我对它总有一种同情，一番怜悯，这正是一个主妇的象征！""蜗牛的身体，和我们的感情是一样的，绵软又怯弱。它需要一个厚厚的壳，常常要没头没脑的钻到里面去，去求安去取暖。这厚厚的壳，便是由父母子女，油瓶盐罐所组织成的那个沉重而复杂的家！结果呢，它求安取暖的时间很短，而背拖着这厚壳，咬牙蠕动的时候居多！"而现在，当她把孩子寄养在弟弟们的家里，只剩下了她与丈夫两个人的时候，她便产生了一种如释重负，无家一身轻的感觉。因为这时候，她不必再为菜单、算账、洒扫之类的事情来动脑筋了。所以这位幽默的女作家，便说自己的眼睛更亮了，耳朵更灵了，过去听不见的声音，现在听见了，过去看不出的颜色，现在看出了，过去想不起来的人物和事件，现在又都想起来了。尤其是，摆脱了重担之后的轻松，使她没事也想找点事情来做了。

可是，当她尝到了这种一身轻的快感之后，却又忽然地感到了空虚和怅惘，就象是在童年时候，盼望着过春节，而一过了正月十五，却又感到寂寞一样。也象那只爬行的蜗牛，虽然尝到了解脱责任的自由，却又常常想念背上的厚壳。她

就在这样一种矛盾复杂的心情之中，跟随着丈夫吴文藻，在南京、上海做着出国东渡的准备，又忙里偷闲，在远行之前到杭州西子湖畔休息了三天。她在秀丽的西子湖畔，散步，看湖，并流连于苏堤之上，一方面饱览着美丽的风光，一方面也在思索着八年抗战带给人们的惨痛的教训。她发现“八年的痛苦流离，深忧痛恨”，“自己仍保存着相当的淳朴，浅易和天真”。[①]她坚信她自己在青年时代就形成的爱的哲学：“世界上最大的威力，不是旋风般的飞机，巨雷般的大炮，鲨鱼般的战舰，以及一切摧残毁灭的战器——因为战器是不断的有突飞猛进的新发明。拥有最大威力的，还是飞机大炮后面，沉着的驾驶射击的，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理智的人类”。“机器是无知的，人类是有爱的”。“人类以及一切生物的爱的起点，是母亲的爱”。[②]

她就抱着这样的思想，带着自己最小的女儿，与丈夫吴文藻一起，于这一年的11月到了日本的东京。抵达东京之后，11月29日，她就写了一篇阐述她的上述观点的散文《给日本的女性》，向异国的妇女讲授她的关于母爱的看法：“母亲的爱是慈爱的，是温柔的，是容忍的，是宽大的；但同时也是最严正的，最强烈的，最抵御的，最富有正义感的！”“她看见了满天的火焰，满地的瓦砾，满山满谷的枯骨残骸，满城满乡的啼儿哭女，……她的慈爱的眼睛，会变成锐明的闪电，她的温柔的声音，会变成清朗的天风，她的正义感，会飞翔

① 冰心：《给日本的女性》

② 冰心：《给日本的女性》

到最高的青空，来叫出她严厉的绝叫！”

冰心把未来的和平的希望，都寄托在各国妇女充满了正义感的母性之中，她希望各国的母亲，都来“阻止一切侵略者的麻醉蒙蔽的教育”，都来“阻止一切以神圣科学发明作为战争工具的制造”，都来“阻止一切使人类互相残杀毁灭的错误歪曲的宣传”。她希望全世界的母亲都要学会教育自己的孩子，让他们知道：战争是不道德的，仇恨是无终止的，暴力和侵略终究是要失败的。让他们知道：“世界是和平的，人类是自由的，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只有爱，只有互助，才能达到永久的安乐与和平。”

冰心虽然是做为吴文藻博士的家属同去日本的，但是，由于她本人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及影响，抵达日本之后，就立即引起了日本学界的注意。这里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一位日本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的仓石武四郎先生。他在很久以前，为了向日本学生介绍中国“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品，在翻阅、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冰心的小说《寂寞》，和散文《寄小读者》，他认为这是必须介绍给日本读者的文献，因此就着手翻译了出来。当他在 1946 年的冬天，得知冰心本人已经来到了东京的消息之后，便立刻去拜访了冰心。他对这位虽然早已拜读过作品，但却第一次会面的中国女作家的印象是：“文如其人”，“她的为人竟和她的作品一样”，“在她热情温纯的心底蕴含着清澈的智慧，当对方的要求还没有完全讲出时，她就已经尽量想方

设法满足你了”。[①] 在这次会面时，仓石武四郎便向冰心提出：请她为东京大学中国文学专业的学生讲课。第二年的春天，冰心、吴文藻夫妇带着小女儿，一块儿到京都游览，仓石武四郎又邀请冰心，在东方文化研究所为京都大学的学生作了一次讲演。在此之前不久的１月６日，她还应庆应大学的《学生新闻》之约，写了一封《给日本学生的一封公开信》，面对着这样一个战败国里的青年学生，冰心好象一位既有远见，又有菩萨心肠的和平使者，她向日本青年提供了几条具有真知灼见的建议。

她对这个战败国的青年们说：“要承认世界上一切人类，是生来平等的，没有任何民族，可自称为‘神明之胄’。在人人自由，个个平等的立场上，只有合作，只有互助，才能建立起世界的和平。”她希望日本青年建立起自由民主的理想，她更希望在东半球上望衡对宇的唇齿之邦——中日两国的青年，更应该建立起开诚布公，恳谈互商的机会。除此之外，她还体贴在战争中死去了无数男性公民的日本国情，针对着日本当时女多男少的情况，把希望寄托于日本妇女，提出了男女平等的主张。她希望过去一向男尊女卑的日本社会，能够承认两性的平等，女人应和男子一样，享受同样的教育，在法律上享有同等的地位。特别是在当时的日本，女多于男，如果妇女仍旧受不到教育而停留在无知的状况，如果不尊重妇女的人格和她们的言论与思想，那么，日本就会遭受巨大的损失。这些见解，这些建议，对于一个战败国的青年来说，都

① 仓石武四郎：《〈如何鉴赏中国文学〉前言》

是极为诚恳，充满了善意的。

冰心在东京住了半年之后，1947 年的 6 月返回祖国，先南京，后北京，参加了“国民参政会”会议，并看望了两个大一点儿的孩子。在北大燕南园自己的家中小住的时候，母校热烈地欢迎自己的高材生和名教授。住在燕南园的教授的孩子们，听说《寄小读者》的作者回到了燕南园，便成群结队而来，想要看看这位了解他们、与他们有着共同语言的女作家的丰采。

冰心是 6 月 16 日抵达燕南园的，当天晚上，燕南园就有人请她吃饭，为她接风。席间，这些教授们谈起了南方的学潮。冰心告诉大家，前几天在南京，曾经参加了有巴金、靳以等十几位作家参加的茶会，大家谈起学潮，觉得南京政府对待学生的态度，还不如对待汉奸。—— 汉奸在监狱里，病了，把他们挪出来，送进医院；可是学生受伤了，却把他们从医院里抓进监牢。南京的军警，用极其粗野的手段对付游行请愿的学生，对女学生尤多侮辱，使得许多旁观的外国记者看了都为之愤愤不平。在上海，特务们大清早就闯进女生宿舍抓人，把只穿着小衣服的女学生从被窝里抓出来。冰心的叙述，使这些教授们的心变得沉重起来。除去南方的学潮之外，他们也谈到了政治，谈到了当时的“国民参政会”。冰心本人是这个参政会的参政员，但是，当她向这些教授朋友们说到参政会的时候，却表示：它是一年不如一年了，而尤以她刚刚参加过的 1947 年的这届最糟。这时候，抗日战争虽然刚刚结束不久，而解放战争已经全面地铺开。冰心坐在参政员席上，只觉得无从讲话，便只好闷坐在那里，写下了不

少打油诗。除了冰心之外的其他女参政员们，倒都有些热心过度，只要有人提到“和平”二字，她们就一个接一个地相继站立起来，每人述说一段所谓的事实，然后就大声疾呼，主张对共产党下讨伐令。冰心还向她的教授朋友们讲述了这样的一件事实：有一个女参政员竟然走到冰心旁边，双手扶着桌子，咄咄逼人地问不发言的冰心：你赞成和平吗？冰心回答说：你这叫什么话，岂有中国人不赞成和平的道理！那位女参政员就说：要和平就得双方进行，光是我们这边要求停战，也和平不了……。冰心赶紧打住她，对她说：请你先回到你的座位上去，这个样子站在这里不好看。由此可见，当时的冰心，虽然身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她对国民党的政治，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

第二天的晚上，6月17日，燕京大学的教职员会，又在燕园中最美丽的临湖轩里举行了座谈讨论会，专门邀请冰心作旅日生活的讲演，并主持讨论有关日本的问题。

谦虚的冰心，首先向同事们表示：自己是以中国代表团职员“眷属”的身份，跟随丈夫到日本去的，所以谈不上讲日本问题，只说说在日本的见闻。

冰心看到，战败国的日本人民生活很苦。国内物资极为缺乏，有钱也买不到东西，物资全由国家集中控制，而向美国、菲律宾、朝鲜、中国出口。除此之外，虽然美国的新闻界常常赞美日本人的合作态度，但是，在冰心看来，日本距离真正的民主化还很遥远。所谓合作态度，其实只是顺民式的合作，而非真正的合作。比如，1946年，日本当局提倡民主，允许罢工，日本工人就天天罢工。而在1947年，听从美

方意见的日本当局忽然禁止罢工，日本的工人也就立刻不再罢工。尤其让冰心不以为然的是：日本妇女的处境，仍然十分悲惨，妇女杂志也都要由男人控制。更为滑稽的是：一次日本的女议员访问冰心，还有一名男议员作陪，由男议员提问，也由男议员作答，女议员不过是个陪衬。针对这种情况，冰心在日本的大学讲演时，就提出：一个社会若不尊重女权，就相当于一个人只用一只脚走路。这种走法，当然是既不快又不稳。而如果日本社会要想民主，要想向前发展，就必须治好另一条腿，让两条腿一块走路才行。冰心在观察了日本的现状之后，得到了这样一条结论，就是：战败国的日本，现在只要求重新建设，自给自足，复兴民族，决对谈不上再侵略别国。将来是否还要侵略，得看以后形势的发展情况。

冰心在国内小住之后，于1948年的6月又返回东京。这次到东京，是由上面提到的那位学者仓石武四郎安排的，应日本东方学会东京支部和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的邀请到东京大学讲学的。冰心为日本的大学生做了五次讲演，为这五次讲演作翻译的就是仓石武四郎先生。

冰心的讲演，受到了日本大学生的热烈欢迎。讲演所在的东京大学三十九号大教室里，挤得水泄不通。听众们纷纷提出要求，要把这几次讲演的稿子，印刷出来，结集出版。

于是，仓石武四郎又忙碌了起来。

他先从研究室的小野泽精一、山井涌、山下龙二三君手里要来了冰心讲演的记录，并留下了其中的一位帮助他作笔记，他边看这三位同事的记录稿，边回忆自己翻译时的情况，在这位同事的帮助之下，完成了译成日文的第一稿。仓石武

四郎一方面为冰心的文稿进行着翻译，整理着记录稿，另方面还要写作自己的讲义，紧张的工作和过度的劳累，终于使他“相当地影响了健康”[①]。冰心是位对自己的文字十分负责任的严肃的学者，她要求，在她的讲演稿出版之前，让她自己过过目。把日文的草稿拿给冰心过目是没有用的，这样，仓石武四郎就又用加强语言学习为理由，请来了在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学习的中山时子君，请她把他翻译好了的日文草稿再翻译还原成中文，然后将这份中文稿拿给冰心来过目。冰心把这份文稿仔细地阅读过之后，删去了其中的一些有趣的插话。虽然仓石武四郎觉得十分的可惜，但是因为冰心不愿意让这些话落实在文字上而流传开去，日本方面也就只得勉强地同意了。在经过了如上一些人士的劳动、过目、翻译、书写之后，这份稿子，终于由中国代表团的阎承惠誊写清楚，于1948年的年底，由冰心转送给了仓石武四郎。仓石武四郎在1949年的元旦至3日这三天，再把由冰心审定的中文原稿改删译成日文，然后由他的同事小野泽精一与山井涌两位誊写清楚，交付讲谈社出版。这本由日本东京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于1949年9月出版的讲演集，即是冰心所著的《怎样欣赏中国文学》（或译《如何鉴赏中国文学》）。在这本书的正文的后面，还列有仓石武四郎所作的鉴赏中国文学的《必读书目》，这是讲谈社的学艺课长洼田稻雄要求仓石武四郎附上去的。据说这是仿照了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德国作家海尔曼·海赛编辑《世界文学文库》所列书目表的例子，而提出

① 仓石武四郎：《〈如何鉴赏中国文学〉前言》

来的要求。

女作家兼学者的冰心，又在1949年至1951年，被东京大学聘为第一任外籍女教授，登台讲授《中国新文学》。除去授课之外，她还应东京大学校刊及日本的妇女杂志之约，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短文。如散文《丢不掉的珍宝》，就是应《妇女月刊》之约而写的。

第十章 归 来

我们的祖国，真是可爱得不能以言语形容。

——冰心：《给国外华侨小朋友的一封信》

住在战败国日本的冰心，一直时时刻刻地关心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在那里，我通过在香港的朋友给我秘密地寄来几本毛主席著作，自己研读，我也偷偷地收听解放区的广播。”①

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的消息传到了东京。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又传到了东京。冰心和吴文藻，还有他们的三个孩子，聚集在收音机旁，倾听着这一来自祖国的喜讯。“1949年10月，祖国解放的消息传来，我感到了毕生未曾有过的欢乐。”②“从这时起，他们夫妇俩和同在东京任职的谢南光、吴半农两位进步人士，出于爱国赤诚，经常聚会交换情况，下定了回到解放了的祖国去的决心。”②

①② 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② 周明：《记冰心》

1951年的秋天，美国的耶鲁大学以优异的待遇邀请冰心夫妇去彼校担任教授职务。冰心和吴文藻看准了这是一个离日返国的最好机会，于是他们立即表示应聘，“并以先到香港做些准备工作”为理由，从东京经横滨，来到了香港，“然后冰心全家便由港秘密乘船转到广州。”[①]“1951年，我们终于辗转曲折地回到了朝气蓬勃的祖国。”[②]

冰心在回到了祖国以后，曾经写文追忆过她在日本时的心情，以及她离开日本时的心境。尤其是她在横滨码头，登上了轮船之后，看到的一只漂在水上的木屐，更是引起了她的许多联想。战后的日本人民，处处面临着苦难，冰心经常看到的，是悲哀憔悴的老人和老妇，痛苦愤怒的工人和农民，忧郁彷徨的青年和少女，他们每个人的脚上，都穿着一双嘎达嘎达作响的木屐。每逢冰心夜晚无眠的时候，她听着楼前走过的嘎达嘎达的木屐声，就会同情地遐想：“苦难中的朋友！在这黑魆魆的长夜，希望在哪里？你们这样嘎达嘎达地往哪里走呢？”[③] 因此，当她登上了归国的轮船，又看到了海上漂着的一只日本人民穿在脚上，风里雨里寸步不离的木屐时，虽然她归国的决心早已下定了，双脚已经踏上了回国的归途，但是面对着这只漂浮的木屐，与日本人民的惜别之情却又油然而生，她对着这只木屐悄悄地自语：“我苦难中的朋友！你怎么知道我要悄悄地离开？你又怎么知道我心里丢不下那些把

① 周明：《记冰心》
② 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③ 冰心：《一只木屐》

你穿在脚下的朋友？你从岸上跳进海中，万里迢迢地在船边护送着我？”

关于冰心全家在东京时准备回国的情况，她在回国以后所写的短篇小说《回国以前》里，也透露出了端倪。她用作品中的“我”——一个住在东京、向往祖国的女青年，和“我”的表兄、作品中的祥哥——一个热爱祖国、具有坚强的民族自尊心的青年，对于“我”的父母决定从东京到美国去，并把“我”也带到美国去上学，表示坚决的反对，而当作品中的那位“林先生”把事实真相告诉了“我”——不是去美国，而是回北京的时候，“我”才喜出望外地看着父母亲笑容满面的面庞。“林先生”继而又向“我”解释了过去未曾把真相泄露出来的原因：“不说到美国去，他们能拿到台湾的签证吗？能离开日本吗？这事情你可不能说出去啊！现在你放心了吧？”那位因为“我”要去美国而不再理睬“我”和“我”的全家的祥哥，当“我”悄悄地告诉他，他们是回北京的时候，态度也发生了急骤的变化：“他就十分惊讶而又高兴地看着我。他用两只手使劲地握住我的手，难过地说：‘你们回去了，我呢？’”“他仿佛变了一个人，冲天的怒气没有了，但是同时头也垂下了，眼光也忧郁了，我从心里同情他！”

经过了深思熟虑，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北京的冰心，看到了她从小就如此熟悉的地方所发生的巨大的变化，内心感到非常的兴奋。她说：“回到祖国，回到我最熟识热爱的首都，我眼花缭乱了！几年不见，她已不再

是‘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而是精神抖擞，容光焕发了。”[①] 那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广场，曾经是她三十年前在学生时代，与同学们一起，排成长队，游行示威走过的地方；如今，那昔日的黯旧的城楼及荒凉的广场，已经变得金碧辉煌，明光四射了。她所熟识的故宫，天坛，北海白塔，仿佛也都换成了新的模样，在她所喜受的北京特有的蓝色高空的衬托之下，显得格外的庄严美丽。然而，最使她感到惊奇、新鲜的，还是首都与祖国的人民：

> 一踏上了我挚爱的国土，我所看到的就都是新人新事：广大的工农群众，洋溢的主人翁的自豪感，在疮痍初复的大地上，欢欣辛勤地劳动，知识分子们的旧友重逢，也都说：“好容易盼到了自由独立的今天，我们要好好的改造，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地为新社会服务！”[②]

冰心回到了北京之后，立即受到了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和爱护，周恩来总理亲自在中南海接见了冰心和吴文藻。

1953 年 9 月 23 日至 10 月 6 日，冰心参加了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久之后，又于这一年的春天，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

祖国的新面貌，和新的人，新的事，都使冰心的心中充满了欢欣，创作的灵感如一股股清泉，奔腾流泄。她写散文，

① 冰心：《归来以后》
② 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写小说，写诗，歌颂北京城，歌颂天安门，歌颂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北京车站、民族文化宫这些新建筑，歌颂十三陵水库，歌颂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歌颂改天换地的农村新面貌，歌颂福州的工艺美术，歌颂祖国文学艺术事业的繁荣。在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同时，她也歌颂着在这块土地上劳动、建设的新人：新一代的“面人郎”，十三陵工地上的英雄民工——小五虎，南口农场的农工，大连港务局的码头工人，十七八岁的苹果脸姑娘，三门峡工地上的青年劳动者。无论从作品的题材、内容，还是从感情、笔调等等各方面来看，冰心这一时期的作品，都与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这是因为时代变了，社会气氛变了，对作家的要求也变了。

新中国的老作家冰心，她在写作“今天”的时候，往往也与“昨天”相比较。她在歌颂她所熟悉的天安门时，就不仅写到了天安门的今天，也写到了天安门的昨天：“古老的天安门和‘不愿作奴隶’的中国人民，是共过患难的！在它破旧荒凉的时代，它看见过蜂拥入城的帝国主义强盗，它听见过敌军的车马碾过踏过的声音。它也看见过万千热血的青年，举起如林的手臂，挥舞着白浪似的纸旗，它也听见他们发出的震天的怒吼。这巨大的声音从天安门前迅速地荡漾开去，激起了滔天的怒潮，洗出了一个光辉灿烂的新中国。”①

她在写到她的故乡和出生地——福州时，也不忘记与过去的福州相比较。回到祖国之后的冰心，曾经象她在十一岁

① 冰心：《仰望天安门》

时那样，又一次回到她的出生地——福州。当她为阔别四十四年终于再见的故乡，而写作散文《还乡杂记》时，她虽然象过去一样写到了故乡的大自然，写到了它的秀美的山峰，青葱的树林，芬香的野花，平坦的公路，同时，她也写到了故乡的农民。不过这些农民的形象，不再象是她曾经在小说《还乡》中描写过的那些痛苦而又麻木的农民了，而是健康、欢快，正在从事着改变家乡面貌的创造性劳动，面貌完全崭新的，可敬而又可爱的新型农民了。她还写到了故乡的解放军战士，这些战士是威武、健壮、严肃、活泼的新一代，他们与冰心过去曾经描写过的那些和蔼的兵丁，不重要的军人，写日记的军官等等，渤海湾里的海军官兵，也已经有了绝对的不同。

那些写到海外华侨的作品，她更是不忘对比今天和昨天，象短篇小说《在火车上》，她在歌颂福建农村的变化，和新社会对华侨子女的培养时，更是花了不少的笔墨，来描写解放前福建农村的贫瘠，和海外华侨背井离乡艰苦创业的艰难，同时也用了不少的篇幅，来描写华侨子女在海外家中的娇养，以及在北京学校里的成长和进步。

然而，回到祖国以后的冰心，着笔最多的，恐怕还是她所喜爱的儿童。正如她自己在第二次文代会期间所说的："在总的路线中，我选定了自己的工作，就是：愿为创作儿童文学而努力。我素来喜欢小孩子，喜欢描写快乐光明的事物，喜欢使用明朗清新的字句。""如今在这万象更新的新中国的环境中，举目四望，有的是健康活泼的儿童，有的是快乐光明的新事物，有的是光辉灿烂的远景，我的材料和文思，应当

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在我的作品中，我要努力创造正面艺术形象，表现新型人物，让新中国的儿童看到祖国的新生的、前进的、蓬蓬勃勃的力量，鼓舞他们做一个有教养的、乐观的、英勇刚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①

正是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之下，冰心为儿童们写作了大量的作品，象中篇日记体小说《陶奇的暑期日记》、短篇小说《好妈妈》、《小桔灯》、《回国以前》、《在火车上》，散文集《归来以后》、《还乡杂记》、《我们把春天吵醒了》、《樱花赞》、《拾穗小札》等等，还有很多短小的诗歌。

冰心回到祖国的时候，已经过了五十岁了。但是，从她为孩子们而写的作品中，你却可以看到她那一颗永远不会变老的童心。

她在《陶奇的暑期日记》里，竟然能够用一个小女孩子的口吻，以第一人称的“我”，来叙述许多少先队员的故事，她对那些还上小学的男学生和女学生，都有很深的了解，象记日记的小淘气—— 陶奇，象勇敢而又诚实，但是喜欢调皮捣蛋的美猴王李春生，象聪明、功课好，可是有点儿懦弱自私的范祖谋，象思想进步、工作积极的陶真，象努力上进、愿意改掉不良习惯的资本家小姐王瑞萱，象患有腿疾、性格坚强、心地善良的新加坡归侨曾雪姣，还有那个学龄前儿童，日本归侨、可爱但很娇气的小秋，个个都是性格鲜明、有血有肉的人物。冰心这位老小孩儿，竟然能够用看上去十分平常的笔墨，把这些性格完全不同的可爱的孩子们，把他们的思

① 冰心：《归来以后》

想、感情和个性，都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而且因为把自己也化装成了小淘气——陶奇这个“我”，仿佛她本人也混杂在这一群可爱的孩子们中间，成了其中不可缺少的、甚至是最主要的一员，向读者们讲述他们自己的平凡的但是又很动人的故事。这些孩子们与作品中的班主任张老师组织成了一个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班集体，他们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共同成长，这是五十年代初期的所有少年儿童都很熟悉的生活。即使是作品中那些着笔不多的大人们，比如那位爱学生如子、循循善诱的张老师，那位言语生动、心肠慈善的陶奇的奶奶，那位工作认真负责、积极肯干的陶奇的妈妈，那位勤劳清苦、心地宽厚的李春生的妈妈，以及那位面色苍白、涂着口红的王瑞萱的妈妈，和自私自利、存有偏见的王瑞萱的爸爸，也都各有个性。而在时代气氛的感召之下，即使是象王瑞萱的父亲这样的资本家，也在努力地学好、变好。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在“我”的眼里，以及在一切少年儿童的眼里，生活总是一片光明了。

五十多岁的冰心，不但具有不变的童心，有时又象一位循循善诱的模范教师。在《陶奇的暑期日记》里，她能够细致地分析出某个孩子的优点和缺点，又能够对症下药，温和地引导他（或她）改正。在作品一开始，张老师为了帮助聪明但是有点不踏实，又很淘气的陶奇，提高作文水平，和掌握运用词汇的能力，跟陶奇的那一番用心良苦、细心别致的谈话；还有专门为陶奇订好，然后郑重地送给他的那一本厚厚的日记本子，都体现了一位对学生既十分负责任，又善于因材施教的高明教师的教学方法。如果不是象冰心这样地爱

孩子，又非常了解儿童的特点，是难以写得如此生动有趣的。

同样地，冰心在短篇小说《好妈妈》里，又把自己化装成了一个学习努力，但是不爱劳动，一切依赖妈妈的女孩子——“我”。这个“我”，在邻居也是同学的一对姐妹——永瑛和永珍的热爱劳动的行为的感动之下，终于转变成了一个既爱学习，又爱劳动的好学生。

在散文《从“到此一游”说起》里，冰心也以一个小孩子——第一人称的“我”出现，她用一个有教养、懂道理的学生的口吻，劝说那些喜欢到处书写“到此一游”的人，希望他们改掉这种不良的嗜好。

而在散文《只拣儿童多处行》里，冰心却以她本来的面目出现了——她不再是一个自称为“我”的小孩子，而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作家了，她在这篇短短的散文中，热情地歌颂着春天和儿童。当她在颐和园里看到了成千盈百的孩子，又同时看到了几棵盛开着花朵的大海棠树——那令她非常喜爱的，她曾经歌颂过的海棠树，她就把海棠花与可爱的孩子们联系在一起，歌唱着：“春光，就会这样地饱满，这样地烂漫，这样地泼辣，这样地华侈！”她告诉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们，为了寻找可爱的春光，她要“只拣儿童多处行”。

在刻画今天的儿童的同时，冰心也没有忘记描写昨天的孩子。她在今天写的回忆昨天的作品，最精采的恐怕要推短篇小说《小桔灯》了。她在这篇短短的小说里，歌颂了一个只有八九岁的小女孩，并在歌颂这个小女孩子的同时，又含蓄而深沉地歌颂了她的爸爸——一个没有在作品中出场的地下党员王春林。这个八九岁的小女孩，解放前夕，在父亲失

踪、母亲病重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坚定地相信："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我们大家也都好了！"她还用自己那双灵巧的小手，用作品中的"我"送给她的红桔皮和一段小蜡头，给"我"做了一盏小桔灯，为"我"照亮天黑路滑的出路，这个用"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使"我""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的小姑娘，不仅使"我"觉得非常的可爱，也一定会使生活在光明的今天的小读者，觉得非常的可爱。

在这些为了儿童而写的作品里，需要特别一提的，还有《再寄小读者》的十四篇通讯。这十四篇通讯写于1958年3月11日至1959年10月14日。1942年12月12日至1944年12月1日，冰心在重庆的潜庐，曾经写过一组《再寄小读者》的四篇通讯，这次重写《再寄小读者》，距离上面的一次，已经十六年。[①] 距离冰心刚刚开始写作《寄小读者》的二十九封通讯，则已经过去了三十五年。三十五年前，当她开始写作《寄小读者》的时候，她就要离开祖国到美国去留学，而三十五年之后，当她开始写作第二组《再寄》的时候，她则是刚从埃及访问归来。当她应《人民日报》副刊编辑之约，拿起笔来，再继续她三十五年前的旧题目，写作《再寄》的时候，祖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面对着她所喜爱的小朋友，心情很兴奋，觉得"鼻子里有点发辣，眼睛里有点发

① 冰心共写作了两组《再寄小读者》。笔者曾就此事请教谢冰心先生，她在1985年8月8日致笔者的信中说："1944年我在四川应《大公报》之约曾写过四篇《再寄小读者》，自己也忘了，……因此1958年又写了《再寄》"。

酸”。于是，她便向亲爱的小朋友们描述了自己刚刚结束的亚洲—— 欧洲—— 非洲之行。然而，她刚刚与小读者们通了三封信，就又登机远行，开始了她的又一次欧洲之行。她在远离开祖国的意大利和苏格兰，都时时地惦念着自己的小读者，在后面的五封通讯里，她就向小读者们描写了这次欧洲之行的见闻—— 瑞士与意大利接壤的阿尔卑斯山；到处可见古城遗迹，而又布满了现代化建筑的罗马；庞贝城的废墟；“水如碧玉山如黛”的西西里岛；罗马城里复活节的钟声；水城威尼斯；苏格兰的依山傍海的爱丁堡。她用不减当年的优美的文字和细腻的观察，把瑞士、意大利、英国这些欧洲国家的美丽风景，描摹给她的小读者们看。但是，与过去的《寄小读者》不同的是，她不再在其中用缠绵的笔调抒写母爱和乡愁，而是用开朗、乐观的笔调，来描写这些地方的现状，并教给小读者们关于历史、地理、风俗的知识。尤其是在后面的六封通讯里，情调更与《寄小读者》有了明显的差别。过去那些抒写母爱、童心和大自然的内容，变成了今天这些关于“六一”儿童节，关于“七一”党的生日，关于暑假读书计划，关于努力学习语文课，关于天安门广场，关于“十一”国庆节等等的亲切的谈心。其中还穿插着关于昨天与今天的对比，关于外国贫苦工人与中国劳动人民的对比。总而言之，老作家冰心，正在用委婉动听的语言，对少年儿童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虽然从语言的风格上，《再寄》还是冰心体，但是从作品的情调和内容方面看，已与《初寄》有了明显的不同。

上面已经提到冰心频繁的出访。她做为我国代表团的成

员，代表着中国的作家、文化界、妇女界，有时还做为和平使者，到世界各国去访问。她到过泰戈尔的国家——印度，多次地出访过日本，还于写作《再寄小读者》之前，经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捷克斯洛伐克而到达了埃及。又于写作《再寄》的途中，访问了瑞士、意大利、英国。做为中国作家的代表，她在1958年10月到苏联的塔什干，1962年2月到埃及参加了亚非作家会议，等等。这一系列的赴会和出访，又给冰心提供了许多写作的材料。她在自己那些写到异国风情的作品里，歌颂了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外国景物。除去上面提到过的瑞士、意大利、英国之外，她还歌颂了日本的樱花，歌颂了列宁格勒城郊的拉兹列夫湖。她又写到了印度，写到了埃及的尼罗河爸爸，写到了战后日本东京的浅草公园。而对这些大自然的描写，又往往与她对刚刚结识的外国朋友的描写联系在一起。我们不会忘记她在开罗结识的那对青年画家夫妇黑白、杜玛德，这是一对在北京的美术学院留过学、会讲汉语的埃及人（《话说文化交流》）。我们也不会忘记那位美丽的意大利姑娘意娜（《忆意娜》），她曾经为冰心朗诵意大利共产党员作家罗大里的诗。我们更不会忘记日本金泽市出租汽车公司罢工的工人兄弟们（《樱花赞》），他们为了表示对中国作家的友情，准时把中国作家代表团送到火车站，竟然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把原来早已定好的罢工时间推迟了一个小时。还有那两位参加亚非作家会议的日本女作家秀子与和子（《尼罗河上的春天》），来中国访问的日本女作家三宅艳子（《南行日记摘抄》），她们都向冰心这位中国女作家倾诉了自己的心声。这时在各种国际会议与社交场

合上出现的冰心，已经是世界上的一个堂堂大国的代表，而不是象三十几年前那样，只是一个年轻的留学生。所以她所结交的朋友，就不再仅仅是她的同学和病友，而是包括不同国籍、不同阶层的各种人物了。

关于冰心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夏衍在《赞颂我的“老大姐”》一文中，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记述：“她不仅是文艺上的全才，而且是一个难得的社会活动家，特别是她在对外活动方面的成就。她博古通今，英语讲得很流利。记得1953年我和她一起参加以丁西林同志为团长的中印友好代表团访问印度，在那次活动中她这方面的才能充分显示出来。有一次，我们访问泰戈尔的故居，在欢迎的茶会上，因为她翻译过泰戈尔的作品，所以丁老和我都推她即席讲话，她先用英语背诵了两首泰戈尔的诗，然后简洁地介绍了泰戈尔对中国的友谊和他在中国的影响；另一次是我们在尼赫鲁官邸吃午餐，席间冰心同志和尼赫鲁的女儿、现任印度总理甘地夫人的谈话，使我这个干了多年外事工作的人感到佩服。她那种不亢不卑，既有幽默，又有节制的风度，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文艺队伍中，可以说很少有人可以和她比拟的。”

1973年的4月16日至5月18日，七十三岁高龄的冰心，做为中国政府派出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第一个抵达日本的大型友好访问团的团员，跟随着廖承志团长，到日本访问了三十三天。回来之后，她于这一年的7月31日，曾经写出了名为《中日友谊源远流长》的散文，记述这次访日的情况。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举国一致，对这个庞大的中国代表团，进行了极其隆重而热烈的欢迎，仅欢迎实行委员会的

委员，就有三千人之众。当时正值樱花盛开的时节，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也象盛开的樱花一样，光明灿烂。冰心在这里参加了不下五百次的参观、访问、会晤、座谈和集会，接触了数以万计的工人、农民、渔民、青年、妇女，以及文化、艺术、科学、教育、新闻、体育、宗教、政界和经济界人士。

“四人帮”垮台之后，顽强的冰心，重又提笔写作。她写文悼念毛主席，悼念周总理，悼念文化界的老朋友——郭沫若、茅盾、老舍。并在七十八岁的高龄，回到了她的母校——过去的燕京大学，现在的北京大学，参加了1978年5月4日举行的建校八十周年纪念大会。5月5日，她开始写作《三寄小读者》的十封通讯。当她提笔写作《三寄》的时候，距离《再寄》已经二十年，而距离《初寄》已经五十五年了。这位有着不灭的童心，而又异常刚毅的老太太，向她亲爱的小读者们表示：“我将永远和你们在一起，努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她在这个百废俱兴，拨乱反正的年代，教育孩子们要“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要“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尤其是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确定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上来”这个方针之后，冰心更是兴奋异常。她在《三寄》的通讯里，就谆谆教导少年儿童，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努力学习。她在写作的同时，还要接见许多慕名来访的外国朋友，她在《三寄》的通讯七里，就记述了接见五十六年前，她在美国留学时的母校威尔斯利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几十位美国姑娘的情景。七十九岁的冰心，看到了这

些与她共一母校的小同学，立刻回忆起了那个美丽的慰冰湖，于是，老太太就象见到了久别重逢的老友，欢快地向这些二十岁左右的美国姑娘们叫出了："好呀！姑娘们，慰冰湖怎么样了？"冰心从这些姑娘们的口中得知：挂满了海的图画的闭璧楼还在，而且在座的一个美国姑娘就住在里边，而娜安避迦楼却已拆掉重建了，慰冰湖还象《寄小读者》中描述的那样美。冰心还问到了当年的老师的情况，可是这些二十年代的教授们，在座的大学生们已经不认识了，或者是仅只听到过他们的名字。

冰心在为少年儿童出版社版《三寄小读者》所写的序（1980年10月29日写于北京医院）中，充满童心也充满雄心地宣布："生命从八十岁开始。"而令人惊异的正是：她在八十岁的高龄，竟然以短篇小说《空巢》，获得了1980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正是这位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足迹踏遍了亚洲、美洲、欧洲、非洲的老作家，当很多人在十年内乱之后，由于对"四人帮"的痛恨，而羡慕起了华侨、外籍华人的时候，热爱祖国、头脑冷静的冰心，却看到了老年美籍华人精神寂寞的一面，他们虽然有洋房和汽车，却不能享受中国老人特别看重的天伦之乐。《空巢》里的美籍华人梁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守着空巢的老人，当他回到祖国，看到了一家老友夫妻团聚，女儿孝顺，外孙女儿活泼，因而对比自己——老妻去世，儿子娶了一个意大利裔的儿媳妇，嫌带孩子麻烦，宁肯养两只波斯猫也不生孩子，回到家里，还要公公给她做饭——的境遇时，对老友一家极为羡慕，不由地发出"你们这个'巢'多满啊！"的感慨。这样清醒的认识，

加上艺术的手法，博得了人们的赞誉。而当同志们向她祝贺获奖的时候，这位在文坛土耕耘了六十余年的老前辈，这位中外闻名的作家，竟然谦逊地表示："是大家照顾我老罗。不过，我也很高兴！我写了一辈子文章了，年轻时由于得文学硕士学位，得过一次金钥匙奖，但是作品得奖，这还是头一次。谢谢大家的鼓励吧。"[①] —— 这样的言谈，这样的为人，除了赢得晚辈的衷心敬仰之外，还能说些什么呢？

① 周明：《记冰心》

后 记

在教书生涯与家务劳动的间隙里，利用晚上、周末、星期日、节假日、寒暑假，再加上午休的时间，断断续续地写完了这本《冰心传》。

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许多多爱护与关怀我的师长、同学、中年朋友与青年读者们的鼓励和鞭策。如果没有他（包括她）们的支持和帮助，在教学任务很重，身体又常患病的情况下，我是难以按时完成本书的写作计划的。

尤其是北京出版社的各级领导，以及与此书有关的编辑同志们，特别是文艺编辑室的负责同志，从为此书的写作进行准备起，到开始动笔，直至修改，以至最后完成的整个过程中，都给予了我许多具体的帮助。

在此，谨向这些给予过我指导、帮助、鼓励、鞭策的所有的同志们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同时，还要感谢此书的传主，我国现代女作家的老前辈——谢冰心先生。她在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又忙于写作的情况下，还对本人进行了口头的和书面的指教。在此，谨向她老人家表示衷心的谢意和敬意。另外，也要感谢1985年新创刊的《女子文学》与《女作家》两个刊物，以及《当代妇女》与《瞭望》周刊海外版等刊物，他们都分别给予了《冰

心传》片断以连载或刊登的荣幸。

我虽然早已过了不惑之年，即将进入知天命之年，但我仍视自己为初学写作者。因为比起许多我的同代人来，我自知还做得很不够。我亲眼看到过不少比我年纪稍长，或与我年龄相仿的朋友，他（或她）们为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准而进行着顽强的努力，夜以继日地工作着。虽然脸上的皱纹一天比一天见多、见深，头发一天比一天显白、显稀，视力出色的眼睛突然戴上了老花镜，健康状况显著地恶化，他们仍然为了四个现代化的理想而坚定地、忘我地工作着。他们的勤奋地苦干精神，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行动的楷模。

作 者

1986 年夏于北京